

内容简介

《红砖的世界：闽南建筑与跨文化对话》是一部融建筑史、文化研究与当代实践于一体的学术著作，以闽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红砖建筑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其技术源流、文化内涵与全球传播路径，揭示一座座“红砖厝”背后所承载的跨文明交流图景。作者张健立足于长期从事闽南城市更新与传统建筑保护的一线经验，将一块看似普通的红砖升华为理解地域文化认同、技术传播网络与全球化互动的关键媒介。

全书以“红砖”为叙事主线，层层展开。首先追溯红砖烧制技术在全球古代文明中的起源与传播，梳理其如何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并在闽南独特的地理、气候与社会结构中落地生根、演化出鲜明的地方风格。继而系统解析闽南红砖建筑的空间组织、装饰语言、材料工艺及其所体现的宗族伦理、风水观念与海洋文化精神。尤为可贵的是，本书并未止步于对传统的静态描摹，而是将视野投向近现代以来闽南建筑的自我更新与当代转化。通过分析漳州古城、九十九湾“闽南水乡”等代表性保护与更新项目，作者展示了如何在尊重历史肌理的基础上，激活传统建筑语言的现代生命力。

更进一步，本书将闽南红砖建筑置于全球华侨网络与跨文化对话的宏大语境中。随着近代闽南人“下南洋”，红砖厝的营造技艺与审美范式被带往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成为海外华人维系文化根脉、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这些散落异域的“红砖飞地”，既是文化移植的见证，也是本土与外来元素持续交融的活态实验室。作者由此提出，现代闽南红砖建筑完全有能力超越地域局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和“跨越语言障碍的世界语”，通过国际展览、联合研究、文化旅行等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本书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既是对闽南建筑遗产的深情礼赞，也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的深刻思考。



PRICE: \$60. 00



红砖的世界：闽南建筑与跨文化对话
The World of Red Bricks: Southern Fujian Architecture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张健 著

The World of Red Bricks: Southern Fujian Architecture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红砖的世界：闽南建筑与跨文化对话

张健 著

作者简介



张健，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1995年福州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毕业，工学学士学位，现任福建中咨规划设计研究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项目策划运营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工程师、福建省工程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福建省发改委重点项目检查组专家、九三学社福建省委青工委副主委、九三学社漳州市副主委、漳州市政协委员、漳州市监委特约监察员。主要研究方向：闽南城市更新与保护发展、闽南传统建筑与闽南建筑风格设计研究。

获奖情况：

- 2003年11月，漳州台湾路历史街区整治保护规划，获福建省建设厅福建省级优秀勘察院设计（城市规划）一等奖；
- 2004年4月，漳州市台湾路历史街区整治保护规划，获中国城市规划协会2003年度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三等奖；
-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漳州市历史街区，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荣誉奖；
- 2019年，漳州古城保护开发修建性详细规划，获福建省城市规划学会2019年度省级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一等奖、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9年度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三等奖；
- 2020年，福建漳州古城宋河街岸更新设计，获中国建筑学会2019-2020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三等奖；
- 2021年9月，福建漳州古城宋河街岸更新设计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三等奖；
- 2023年，漳州市九十九湾“闽南水乡”河道整治和滞洪区建设工程（一期工程）——闽南水乡商贸街（二期），获2023年度福建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成果建筑设计优秀二等奖。

The World of Red Bricks: Southern Fujian
Architecture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红砖的世界： 闽南建筑与跨文化对话

张健 著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CIP INFORMATION

Title: The World of Red Bricks: Southern Fujian Architecture an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题目：红砖的世界：闽南建筑与跨文化对话

Author: Jian Zhang

作者：张健

ISBN: 979-8-90040-012-9

Publisher: CYPEDI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Price: \$60.00

定价：60 美金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The World of Red Bricks: Southern Fujian Architecture and Cross-
Cultural Dialogue**

红砖的世界：闽南建筑与跨文化对话

Address: 100 N Howard St Ste R, Spokane, Wa, 99201. United States

Tel: +888-754-5177

Email: contact@cypedia.net

Format: 170mmx240mm 1/16 Sheets: 15.75

Word Counts: 200.000

Edition: First edition in December 2025

Printing: First printing in December 2025

**CYPEDI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非开放获取·电子版请联络出版社购买·版权归出版社所有·侵权必究

Not Open Access. For the electronic version, please contact the publisher for purchase.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publisher.
Infringement will be prosecuted.

在闽南的山海之间，行走于泉州、厦门、漳州的老街巷弄，最令人难忘的视觉印记，莫过于那一片片历经风雨却愈发温润的红砖墙。它们或砌成规整的“出砖入石”，或雕琢成繁复的窗花门楣，沉默地矗立着，却仿佛在低语，诉说着数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奋斗迁徙与文化交融。正是这份由红砖构筑的独特“地方感”，激发了我撰写《红砖的世界：闽南建筑与跨文化对话》的初衷。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将闽南红砖建筑视为一种地域性的乡土遗产，关注其形式之美、工艺之精。然而，在参与漳州台湾路历史街区、宋河街岸、九十九湾“闽南水乡”等一系列保护更新项目的实践中，我日益意识到，红砖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块“活”的文化化石，其烧制技术本身便是一部浓缩的全球技术传播史；它的空间格局，深嵌着中原礼制与海洋商贸文化的奇妙共生；它的装饰纹样，混杂着儒家伦理、道教符箓与南洋风情的多元印记。更重要的是，当无数闽南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时，他们带走的不仅是谋生的技能，还有对“起大厝”的执念。于是，红砖厝在槟城、马六甲、新加坡乃至更远的地方拔地而起，成为海外华人社群的精神地标。这些散落全球的红砖建筑，共同编织了一张跨越时空的“红砖文化网络”。

因此，本书试图完成一次视角的转换：从“地方建筑”走向“全球对话”。我们不仅要问“闽南红砖建筑是什么”，更要追问“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第一章回溯红砖技术的古老源头，将其置于世界文明交流的长河中考察；第二章聚焦闽南本土，解读红砖如何成为地域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第三章则放眼世界，追踪红砖随华侨足迹的全球播迁，并探讨其在异域文化土壤中的适应与变异。最终，本书落脚于当代——在一个文化同质化风险加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份遗产？我的答案是：真正的传承不是博物馆式的封存，而是自信的、创造性的转化。优秀的现代红砖建筑，本身就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语言”，它既能根植于深厚的传统，又能与当代生活和全球审美对话。

本书的写作，也寄托着我对专业实践的反思。作为一位长期扎根于闽南地区的建筑师，我深感地域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全球化

前

言

PREFACE



浪潮中，我们的城市不必盲目追随西方模式，完全可以从自身丰富的传统中汲取养分，走出一条“既非全盘西化，也非固步自封”的发展道路。那些获奖的更新项目，正是这种理念的尝试。我希望通过本书，不仅记录下红砖的故事，更能激发更多同行、学者、公众乃至海外友人，共同参与到这场关于文化记忆、身份认同与未来想象的跨文化对话中来。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及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健

第一章 红砖的世界：闽南建筑与跨文化对话	1
第一节 红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1
第二节 宋元时期闽南红砖建筑的形成	7
第三节 明清时期红砖建筑的繁荣	12
第四节 近现代红砖建筑的演变	18
第二章 红砖建筑的材料与工艺	25
第一节 红砖的原料与烧制工艺	25
第二节 红砖建筑的构造技术	31
第三节 装饰工艺与特色技法	36
第四节 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41
第三章 闽南红砖建筑的类型与特征	47
第一节 民居建筑的红砖特色	47
第二节 宗教建筑的红砖运用	52
第三节 宗祠建筑的规制与装饰	58
第四节 防御性建筑的砖石结构	64
第四章 红砖建筑的文化象征	71
第一节 红色在闽南文化中的寓意	71
第二节 建筑装饰的吉祥图案	76
第三节 空间布局的文化内涵	82
第四节 建筑符号的社会意义	89
第五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红砖传播	95
第一节 闽南商帮与建筑文化输出	95
第二节 东南亚闽南红砖建筑	101
第三节 台湾地区的红砖建筑特色	108
第四节 跨区域建筑风格的融合	111

第六章 中西建筑文化的对话	119
第一节 国外建筑元素的本土化	119
第二节 殖民时期的建筑交融	125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132
第四节 文化认同与建筑创新	138
第七章 红砖建筑的空间美学	147
第一节 建筑形制的审美特征	147
第二节 色彩与质感的视觉表达	153
第三节 光影在红砖建筑中的运用	160
第四节 建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165
第八章 当代红砖建筑的传承与发展	171
第一节 传统建筑的修复与保护	171
第二节 现代建筑中的红砖应用	177
第三节 新材料与旧工艺的结合	182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实践	189
第九章 红砖建筑的社会功能	197
第一节 建筑空间的社交功能	197
第二节 宗教活动的场所特征	203
第三节 家族文化的空间载体	209
第四节 社区认同的建筑表达	214
第十章 红砖建筑的未来展望	219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特色	219
第二节 数字化时代的传统工艺	226
第三节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233
第四节 跨文化对话的新机遇	237
参考文献	245

第一章 红砖的世界：闽南建筑与跨文化对话

闽南，这片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沃土，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建筑风貌闻名于世。其中，红砖建筑作为最鲜明的视觉符号，不仅构筑了城市与乡村的肌理，更承载着数百年来闽南人与世界交流的历史记忆。本书旨在探寻闽南红砖建筑的深层根源，从一块红砖的旅程出发，解读其背后蕴含的技术传播、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揭示闽南建筑如何在本土与外来的对话中，塑造出独树一帜的“红砖世界”。

第一节 红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红砖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建筑材料，其诞生与传播的历史跨越了数千年，遍及全球多个文明。探讨红砖烧制技术的源头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早期发展脉络，是理解其最终在闽南地区大放异彩的必要前提。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跨文化交流史，展现了技术、艺术与社会需求如何共同驱动建筑形态的演进。

一、红砖烧制技术的起源与传播

红砖并非单一文明的产物，其烧制技术在全球不同区域独立或相互影响地发展，形成了多元的传承路径。从古代文明对黏土的初步利用，到烧制技术的成熟与普及，红砖见证了人类改造自然、营造居所的智慧和。追溯其技术传播的足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项技艺如何跨越山海，最终融入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之中。

（一）古罗马与古埃及的早期砖石技术

人类对砖石材料的利用历史悠久，古埃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利用河水泛滥后留下的肥沃黏土，通过日晒的方式制作泥砖。这种未经过火烧制的砖块成本低廉，制造简便，被广泛用于建造普通民居乃至部分神庙与陵墓的附属结构。尽管日晒砖的耐久性有限，但它代表了人类早期对黏土材料性能的认知与利用，为后续的烧制技术奠定了基础。

与古埃及的日晒泥砖不同，古罗马人在建筑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他们发明并大规模使用了烧制红砖。罗马人发现，经过窑炉高温烧制的黏土砖，其强度、耐久性和防水性能远超日晒砖。这项技术使得建造更为宏大和复杂的建筑成为可能，罗马斗兽场、万神殿等宏伟建筑中都能看到红砖与火山灰混凝土结合使用的身影。罗马人不仅完善了红砖的烧制工艺，还将其标准化，并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将这一技术传播至欧洲、北非和西亚的广阔疆域，对后世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西亚与中亚地区的砖艺发展

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最早使用砖的地区之一。早在数千年前，苏美尔人就开始使用泥砖建造神庙和城市。由于该地区缺少石材，黏土成为最主要的建筑材料。随着技术的发展，他们掌握了烧制砖的技术，并进一步创造出灿烂的琉璃砖艺术。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王国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统治下，建成了宏伟的伊什塔尔城门。城门表面覆盖着数以万计的蓝色琉璃砖，并装饰有黄、白色彩的龙和原牛浮雕，其色彩艳丽，工艺精湛，展现了古代西亚地区砖艺发展的顶峰成就。

在中亚地区，砖砌建筑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伴随丝绸之路的繁荣而不断发展。作为东国外文化交流的枢纽，中亚的建筑艺术融合了来自波斯、希腊化王国乃至中国等多种文明的影响。这里的工匠不仅使用传统的土坯和烧制砖，还发展出复杂的砖砌穹顶和拱券结构，以及精美的砖雕装饰艺术。这些技术随着商旅的脚步，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对沿线地区的建筑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红砖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可能路径之一。

（三）红砖技术传入中国的路径探讨

关于红砖烧制技术如何传入中国，学界至今未有定论，主要存在几种可能性路径的探讨。这些路径不仅是技术传播的通道，更是古代世界不同文明间发生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生动证明。

1. 陆路传播：丝绸之路是一条重要的潜在路径。西亚与中亚地区拥有悠久的烧制砖历史和高超的砖砌建筑技艺，这些技术很可能随着商贸往来、宗教传播和人员迁徙，自西向东传入中国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再逐步向中原腹地渗透。这条路径的优势在于沿线地区砖石建筑文化一脉相承，技术交流的痕迹相对清晰。

2. 海路传播：尤其是宋元时期，以泉州为代表的港口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传教士和工匠带来了他

们的文化与技术。考虑到中亚阿拉伯地区亦是红砖技术的发达区域，这项技术通过海路直接传入泉州等沿海港口，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传播方式可以解释为何红砖建筑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为集中。

3. 本土演化与外来影响结合：中国自身拥有古老的制陶历史和青砖烧制技术。红砖与青砖的烧制过程非常相似，其主要区别在于烧成后的冷却方式：在氧化气氛下自然冷却即成红砖，而通过注水等方式进行还原冷却则成青砖。因此，红砖技术也可能是在中国传统制陶和青砖技术的基础上，受到外来文化或特定需求的启发而产生的变体或独立发展。外来红砖的传入，可能更多是作为一种催化剂，激发了本土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综合来看，红砖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或许并非单一路径，而是陆路、海路以及本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传入与发展，共同成就了中国红砖建筑文化丰富而多元的面貌。

二、中国早期红砖建筑的考古发现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红砖的出现与应用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考古遗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红砖从最初的零星使用，到逐渐成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其角色和地位不断演变。这些深埋于地下的砖石，是解读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丧葬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珍贵密码。

（一）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红砖墓室

汉代是中国砖石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在墓葬建筑中，砖的使用变得十分普遍。此时期出现了大量用砖砌筑的墓室，以替代之前的木椁墓，显示了社会对建筑材料耐久性的更高追求。汉代墓砖主要分为实心砖和空心砖两种。空心砖体量巨大，常用于构筑墓室的主体结构；实心砖则更为灵活，用于铺地或砌墙。部分砖的表面还模印或刻划有各种图像，被称为“画像砖”，内容涵盖神仙异兽、生产生活、历史故事等，为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

从制作工艺上看，汉代的红砖与青砖并存。两者原料同为黏土，区别在于烧窑最后阶段的冷却工艺。青砖因其更为复杂的“饮水”还原冷却工艺，质地往往更坚硬密实，在地面建筑中被视作更高级的材料。红砖则采用自然氧化冷却，工艺相对简单。关于两者工艺的区别，可参见下方的红砖与青砖烧制工艺对比表在汉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中，虽然青砖墓更为常见，但也出土了不少红砖墓或红砖、

青砖混用的墓葬。这表明在当时，红砖作为一种坚固耐用的建筑材料，已被认可并应用于重要的地下工程之中。南北朝时期延续了汉代厚葬的传统，砖室墓的结构更为复杂，红砖在其中的使用也愈发成熟。

红砖与青砖烧制工艺对比表

特征	红砖	青砖
主要工艺	氧化气氛下自然冷却	还原气氛下“饮水”冷却
主要颜色	红色 / 红褐色	青灰色 / 蓝灰色
硬度 / 密度	相对较低，但坚固耐用	相对较高，质地更为密实
传统地位	早期多用于墓葬或次要结构	传统地面建筑中地位更高
烧成环境	氧化气氛	还原气氛

（二）唐代建筑中的红砖使用迹象

唐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辉煌时期，建筑技术与艺术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在唐代，主要的地面建筑，如宫殿、寺庙和官署，仍然以木结构为主导，砖石材料多用于建造墙体、台基、地面铺设以及佛塔等特殊类型的建筑。与汉代相比，唐代砖的生产规模更大，质量也更有保证，出现了专门的官办窑场，以满足大型工程的需要。

考古发现表明，在唐代的一些建筑遗迹中，可以明确看到红砖的身影。例如，在一些唐代佛塔的塔心、塔壁或地宫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红砖与青砖混用或纯用红砖砌筑的情况。这些佛塔作为佛教的标志性建筑，对材料的坚固性要求极高，选用红砖说明其性能已经得到充分认可。同时，在一些城墙、水利工程乃至高级墓葬中，也有红砖应用的实例。唐代红砖的使用虽然不如青砖那样普遍和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已经成为建筑材料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后来红砖的广泛应用积累了技术和经验。

（三）早期红砖技术的地域性特征

中国早期红砖技术的发展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各地不同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

在北方地区，特别是中原腹地，拥有深厚的黄土资源，这里的制陶和制砖历史源远流长。考古发现显示，北方的汉唐墓葬和建筑遗址中，砖的应用非常广泛。由于北方气候相对干燥，对砖的抗渗性要求不如南方严格，同时，该区域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建筑等级制度更为森严，青砖作为“高级”材料的地位更为巩固。

因此，红砖在北方多用于墓葬、城墙内部填充或次要建筑，其应用范围和艺术表现相对有限。

相较之下，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气候湿润多雨，对建筑材料的防水、防潮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早期南方建筑多采用木材、竹子和夯土，但砖石材料的优势显而易见。在技术传播的背景下，南方地区一旦掌握了制砖技术，便迅速根据本地需求进行调整和发展。例如，本地优质黏土的特性、燃料的种类以及对成品颜色的审美偏好，都可能影响最终的烧制工艺。这种地域性的适应与选择，为后来闽南地区将红砖建筑艺术推向极致埋下了伏笔。

三、闽南地区早期砖石遗存

将目光聚焦于闽南，这片土地的建筑历史同样经历了从土木到砖石的演变。在红砖成为其标志性元素之前，闽南地区的先民们利用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形态。探寻唐代以前的窑址与建筑遗迹，分析早期材料的混用现象，是理解红砖技术如何在此地生根发芽、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建筑主角的关键。

（一）唐代以前的窑址与建筑遗迹

福建地区的考古工作已经揭示了丰富的古代窑业遗存。虽然大部分引人注目的窑址集中在宋元之后，但唐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发现，为我们勾勒了闽南早期陶瓷与砖瓦生产的图景。考古调查在晋江、南安等地发现了可追溯至南朝晚期至唐代的窑址群，如磁灶窑址的部分早期堆积。这些窑址早期主要生产青瓷、黑釉陶器等日用器皿，同时也烧制少量的建筑构件，如瓦当、板瓦和普通砖块。

这些早期窑址的出土物中，砖的形态和质地为了解当时的技术水平提供了直接证据。它们大多为青灰色或灰褐色的陶质砖，火候和规整度尚不及后世。目前明确属于唐代以前的红砖遗存发现尚少，这可能意味着在当时，红砖的生产并非主流，或者相关的考古证据仍有待发掘。尽管如此，这些早期窑址的存在证明了闽南地区在唐代或更早已经具备了烧制砖瓦的能力，这为后来吸收和发展更为先进的红砖烧制技术提供了必要的产业基础。三明万寿岩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工石铺地面，更将福建先民改造居住环境的历史追溯至数万年前，展现了此地营造传统的深厚渊源。

（二）早期红砖与本土材料的混用现象

在红砖建筑成为闽南地区的主流风格之前，存在一个漫长的材料探索与融合的过渡阶段。闽南地区拥有丰富的花岗岩资源，这种坚固耐用的石材早已被当地工匠广泛应用于建筑的基座、墙体和梁柱。当红砖作为一种新兴材料出现时，它并没有立刻完全取代传统材料，而是首先以一种补充或结合的形式出现。

这种混用现象在后世演变为一种被称为“出砖入石”的独特砌墙工艺。尽管“出砖入石”的成熟形态多见于明清建筑，但其背后的理念——即不同材料的搭配使用，很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萌芽。早期的实践可能是在夯土墙或石墙中局部嵌入砖块以增加平整度或作为装饰，或是在建筑的某些特定部位，如门框、窗框等处，尝试使用砖砌。这种混搭不仅是出于经济和实用的考虑，即就地取材、物尽其用，也在无意中开启了不同材质、色彩和质感对比的美学探索。红砖的暖色调与花岗岩的冷灰色调形成的视觉反差，为此后闽南建筑独特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红砖技术传入闽南的背景分析

红砖技术最终在闽南地区扎根并繁荣，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这一过程是多种因素合力驱动的结果。

经济的繁荣是技术革新的强大动力。自唐末五代起，随着中原人口因战乱南迁，福建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到了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崛起使其成为世界级的海洋贸易中心，巨大的财富在这里汇聚。富裕起来的商人、宗族和士绅阶层对营造华美坚固的居所产生了巨大需求。他们有财力支持新材料、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追求更加精致和体面的建筑形式。

频繁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技术传入的契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闽南地区是文化交融的前沿阵地。来自波斯、阿拉伯乃至欧洲的商人与水手不仅带来了商品，也带来了他们的建筑文化和营造技艺。红砖在这些地区本就是成熟的建筑材料，通过人员往来和信息传递，其烧制和砌筑技术传入闽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本土的社会文化起到了接纳和推广的作用。闽南人具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和爱拼敢赢的海洋性格，体现在建筑上，便是追求光宗耀祖的“大厝”和讲究排场的营造风气。红砖鲜艳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吉祥与富贵，正合闽南人热情外向的性格与审美情趣。当这种材料被赋予了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意义后，便迅

速在社会上流行开来，最终塑造了“红砖文化区”的独特建筑景观。

第二节 宋元时期闽南红砖建筑的形成

宋元时代，在海洋文明的蓬勃发展与中外文化的深度交融中，闽南地区迎来了其城市发展与建筑艺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泉州港的崛起不仅带来了空前的商业繁荣，更催生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景观。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红砖为标志的建筑风格在闽南地区悄然兴起，并逐渐确立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标志着一场跨越地域与文明的建筑对话的开端。

一、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与背景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泉州港在宋元时期达到了其辉煌的顶峰，成为东国外文明交汇的重要枢纽。这种繁荣并非偶然，而是由其卓越的地理位置、开放的海洋政策以及活跃的文化交流共同铸就的，为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和建筑文化的飞跃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一）东方第一大港的地位与影响

自唐代开埠以来，泉州港便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逐渐在海上贸易中崭露头角。及至宋元，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与鼓励，特别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设立福建提举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国家级的对外贸易口岸。这一举措极大地规范并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泉州港的地位迅速提升。元代，泉州的海外贸易更是达到鼎盛，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两大港口”，贸易范围覆盖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的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描述了“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震撼景象，这无疑是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地位的生动写照。这种国际枢纽地位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它将泉州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使得泉州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网络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城市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市井十洲人”成为常态，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僧侣、传教士和旅行家在此汇聚，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繁荣局面。这种高度的开放性与国际化，为新思想、新技术、新文化的涌入打开了大门，深刻影响了城市

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趣味，为红砖建筑这一新兴事物在闽南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时代基础。

（二）海外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财富积累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黄金航道，更是一条文化动脉。伴随着丝绸、瓷器、茶叶的远销海外，以及香料、珠宝、药材的源源不断地输入，一场深刻的文化交流在泉州悄然展开。阿拉伯、波斯、印度、东南亚等地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中华文化在此碰撞、融合。今天泉州城内依然可见的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教遗址以及大量的印度教石刻，共同构成了“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奇特景观，见证着那个时代文明的和谐共生。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极大地开阔了闽南人的视野，也激发了本土工匠的创造力，他们开始在建筑中尝试吸收与融合外来元素。

与此同时，海外贸易带来了惊人的财富积累。南宋时期，仅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就高达百万缗，对朝廷财政贡献巨大。贸易的繁荣催生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海商，他们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导者，也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推动者。这些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后，往往通过修建宅邸、捐造寺庙、铺路架桥等方式来彰显身份、祈求福祉。他们对建筑品质和艺术性的要求日益提高，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夯土和木结构，而是渴望使用更坚固、更美观、更能体现其财富与地位的新型材料，这为烧制成本相对较高的红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与经济基础。财富的积累与审美品位的提升，共同推动了建筑材料的革新。

（三）“海丝”起点对建筑需求的提升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和核心区，泉州港的繁荣直接刺激了各类建筑需求的急剧增长。首先是与海洋贸易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货物吞吐量和人员往来，港口、码头、仓库、货栈等商贸设施被大量兴建。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海船，其庞大的规模与精良的建造工艺，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港口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

城市规模的扩张和人口的激增，带来了对住宅、市政和公共建筑的巨大需求。蕃商的定居形成了“蕃坊”这一独特的国际社区，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需要相应的建筑空间来承载。同时，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了连接江海，便利货物与人员的流通，宋元时期泉州掀起了一股建桥热潮，诞生了如洛阳桥、安平桥等一批代表当时最高技术水平的大

型石桥，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高效的水陆联运网络，极大地拓展了港口城市的腹地空间。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不仅是对本土营造技艺的一次全面检验，也为新材料、新技术的试验与推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红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在闽南建筑舞台上崭露头角。

二、红砖建筑在闽南的初步确立

在宋元泉州这片东国外文化交融的热土上，红砖作为一种新兴的建筑材料，逐渐打破了传统青砖灰瓦的单一色调。它不仅仅是一种建筑语汇的丰富，更是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在建筑形态上的深刻烙印。从异域文化的影响到本土化的吸收，从官方、宗教建筑的率先垂范到民间居所的逐步采纳，红砖在闽南大地完成了其风格的初步确立。

宋元时期闽南建筑材料对比表

材料	主要成分	相对成本	强度 / 耐久性	社会地位象征
夯土 / 木构	泥土、木材	低	中等	传统民居 / 基础结构
青砖	黏土（还原烧制）	中	良好	传统官署 / 寺庙
红砖	黏土（氧化烧制）	较高	优秀	财富 / 新兴风尚
石材	花岗岩、辉绿岩	极高	极高	大型公共工程 / 地标

（一）伊斯兰建筑文化对红砖应用的影响

宋元时期，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到泉州经商并定居，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蕃坊”。他们不仅带来了商业财富，也带来了独特的伊斯兰建筑文化。这种影响并非是简单的风格照搬，而是深入到了材料选择与工艺技术的交流层面。有学者认为，泉州民居中常见的，将红砖切割、打磨后拼贴成各种精美几何图案的装饰手法，与古代伊斯兰建筑中复杂的砖砌与镶嵌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伊斯兰建筑善于利用砖石等材料，通过不同的砌筑方式形成丰富的立面肌理和光影效果，这种对材料表现力的重视，无疑对当时的闽南工匠产生了重要启发。他们开始探索红砖这种材料的装饰潜力，不再仅仅将其作为结构填充物，而是通过“出砖入石”等技艺，使其成为墙面的主角。伊斯兰建筑中常见的尖拱、穹顶等元素虽然未被闽南民居直接照搬，但其蕴含的几何美学与装饰逻辑，却可能以一种更为本土化的方式，融入到红砖建筑的细节处理之中，促进了红砖拼花、砖

雕等装饰技艺的发展，使红砖建筑从一开始就带有跨文化对话的基因。

（二）官方建筑与宗教建筑中的率先使用

一种新型建筑材料的应用与推广，往往遵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正如上表所示，红砖因其烧制工艺相对复杂，成本高于普通青砖，在初期被视为一种较为贵重的建筑材料。因此，它最先被应用于代表权力与信仰的官方建筑和宗教建筑中。这些建筑拥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和更高的技术要求，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尝试和引领建筑的新风尚。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表明，红砖在宋元时期的闽南并非仅存于民间想象。例如，泉州开元寺内著名的东西塔，在南宋时期被改建为石塔之前，其前身便是砖塔。这有力地证明了在当时，砖（很可能包括红砖）作为核心建材，已被用于构建如佛塔这般体量巨大、等级极高的宗教地标性建筑。大量出土的宋元时期红陶瓦当，也佐证了当时红土烧制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于屋顶铺设，这为墙体使用红砖提供了技术前提和审美上的呼应。这些重要的宗教与公共建筑率先使用红砖或红砖构件，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使其逐渐被社会精英阶层所认知和接受，并视为一种新兴的、具有时代气息的建筑风尚。

（三）红砖从贵族向民间的初步渗透

随着泉州港贸易的持续繁荣，巨额的社会财富逐渐从官方和少数贵族阶层，向更广泛的商人和平民阶层扩散。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得普通民众也开始有能力追求更高品质的居住环境，模仿乃至超越上层社会的建筑品位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官方及宗教建筑的引领下，色彩鲜艳、装饰性强的红砖，自然成为富裕起来的市民阶层竞相追逐的建筑材料。

考古发现显示，早在五代时期，闽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红砖与青瓦并用的建筑实践，这为宋元时期红砖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到了宋元，随着财富的普遍积累和营造技艺的日趋成熟，红砖开始逐步渗透到民居建筑之中，尽管其规模和精美程度可能尚不及后来的明清时期，但“宅第连云、红砖映日”的盛况已初现端倪。这一过程，标志着红砖建筑完成了从被动受外来文化影响，到主动为本土社会各阶层所接纳和使用的关键转变。它不再仅仅是少数建筑的点缀，而是开始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建筑符号，融入闽南的城乡景观之中，为明清时期闽南红砖建筑文化的全面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宋元时期红砖建筑的考古与文献证据

任何历史的论断都需要坚实的证据作为支撑。闽南红砖建筑在宋元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可以在存世的建筑遗构、考古发掘的残片以及泛黄的地方史志中找到清晰的印记。这些物质与文字的证据，共同构建起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红砖在那个辉煌的海洋贸易时代，已经成为闽南建筑语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泉州清净寺等宗教建筑的红砖运用

1. 坐落于泉州涂门街的清净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之一，其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主体建筑呈现出鲜明的外来风格。尽管其最为人称道的是其雄浑的石构建筑形式，仿造了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建筑风格，但在其发展的历史沿革中，砖的运用同样留下了痕迹。例如，其门楼顶部的望月台，现存的垛口等部分即为砖砌结构，虽经后世修葺，但依然保留了早期的形制信息。更重要的是，清净寺的存在本身，就是宋元时期泉州与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海外地区进行深度建筑文化交流的直接物证。

2. 除了清净寺，泉州另一处地标性建筑——开元寺的双塔，也为宋代砖构建筑的存在提供了确凿证据。开元寺东西塔今日以其挺拔的石构闻名于世，但据史料记载，双塔在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和淳熙十二年（1185年）改建为石塔之前，经历过从木塔到砖塔的阶段。东塔（镇国塔）于唐咸通六年（865年）始建为木塔，后毁于火灾，于宋天禧年间（1017-1021年）改建为十三层砖塔。西塔（仁寿塔）于五代梁贞明二年（916年）建为七层木塔，同样在宋代政和四年（1114年）改建为砖塔。这两座规模宏大的砖塔，长期作为泉州港的地标耸立于城市天际线，它们的建造与存在，雄辩地证明了在宋代，砖砌技术已经达到了能够支撑大型高层建筑的成熟水平，这也为红砖在其他建筑类型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上的旁证。

（二）宋代古桥、古塔中的红砖构件

宋元时期是泉州桥梁建设的黄金时代，诞生了如洛阳桥、安平桥等举世闻名的跨海石桥。这些工程巨作虽以石材为主体结构，但在其附属建筑或后期修缮中，亦可见到红砖的身影。例如，横跨洛阳江的洛阳桥，其桥中至今仍存有一座古朴的闽南传统红砖建筑——桥中亭，其门额上悬挂的“海内第一桥”匾额，彰显着

古桥的辉煌历史。尽管这些附属建筑的具体建造年代或有争议，但它们与古桥的有机结合，反映了红砖作为一种普遍的建筑元素，已经深度融入了本地的营造体系之中。

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物质证据。在泉州地区的宋元时期遗址中，曾大量出土了当时的红陶瓦当和砖块。这些构件虽然大多是碎片，但其质地、尺寸和烧制火候，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红陶瓦当的普遍使用，说明以本地红土为原料进行高温烧制的陶制建材已经非常普及，这与红砖的生产技术一脉相承。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砖瓦残片，如同历史的拼图，帮助我们复原了宋元时期闽南建筑斑斓的色彩，证实了“红砖映日”并非后人的想象，而是在当时就已经存在的真实图景。

（三）地方志与文人笔记中的相关记载

除了物质遗存，古代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探寻宋元时期闽南红砖建筑的历史提供了线索。虽然专门论述建筑材料的宋元典籍较为罕见，但从一些地方志和文人笔记的零星记载中，仍能窥见一斑。例如，《闽书》等福建地方志在记述城池、官署、寺庙的修建时，会提及所用材料的规制与来源，为研究当时的建筑活动提供了宏观背景。

更重要的是，诗词文赋往往能提供更为生动的历史场景。宋代文人墨客在描绘泉州等闽南城市的繁荣景象时，常会使用“屋瓦鳞次”、“朱楼画栋”等词汇。虽然“朱”在此处可能泛指红色，但结合考古发现的红陶瓦当和建筑遗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遍布城乡的红砖红瓦建筑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字记录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宋元时期闽南红砖建筑从兴起到初步确立的历史轨迹，使其不再是一段模糊不清的过往，而成为一个有据可考、生动鲜活的建筑传奇。

第三节 明清时期红砖建筑的繁荣

明清两代，闽南社会经济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尽管官方时常推行严苛的“海禁”政策，但蓬勃的民间海洋贸易从未真正断绝。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不仅塑造了闽南商帮敢闯敢拼的性格，也让积累的巨额财富如涓涓细流般反哺乡土，最终凝聚在独树一帜的红砖建筑群之上。这一时期，闽南红砖建筑在技艺与规制上

日臻成熟，走向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鼎盛。

一、海禁与月港贸易对建筑风格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与夹缝中兴起的月港贸易，构成了一对看似矛盾却深刻影响闽南建筑走向的合力。严苛的官方管制与汹涌的民间逐利冲动相互博弈，一方面催生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另一方面又将这种财富的表达方式引向了乡土内部，塑造了闽南建筑含蓄而又张扬的独特性格。

（一）官方海禁下的民间贸易新格局

明清两代，朝廷出于国防和政治稳定的考量，多次颁布“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令。这种高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抑制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却未能禁绝根植于海洋文化的民间商业冲动。闽南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巨大，向海谋生成为世代相承的传统。海禁之下，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利润丰厚的走私贸易便应运而生，并在嘉靖年间达到顶峰，甚至一度演变为“倭寇之患”。这场动荡的本质，正是民间海洋商业力量与官方压制政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

面对屡禁不止的民间贸易，明朝政府最终在隆庆元年（1567年）做出调整，开放福建漳州月港为合法通商口岸，史称“隆庆开关”。这一举措标志着官方海禁政策的局部松动，使一度处于地下的民间贸易部分合法化。月港迅速成为晚明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来自漳州和泉州的商船，满载丝绸、瓷器、糖等货物，远航至马尼拉、日本等地，换回巨额白银。这种官禁民通、亦禁亦开的特殊格局，使得闽南地区成为全球白银流向的重要汇集地，为区域社会的空前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闽南商帮财富的积累与乡土建设

在惊涛骇浪的海洋贸易中，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群体——闽南商帮——迅速崛起。他们或扬帆远航，或坐镇港口，构建了遍布东亚及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从月港到后来的郑氏海商集团，闽南商帮通过贸易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的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更多的部分则遵循着中国传统的乡土观念，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故乡。对于衣锦还海的海洋巨子而言，营建一座宏伟壮丽的家宅，无疑是光宗耀祖、庇荫子孙的最直接方式。

这种荣归故里的情结，直接推动了闽南地区建筑活动的大繁荣。商人们不惜重金，延请最好的工匠，使用最优质的材料，将宅院当成毕生荣耀的象征来精心

打造。于是，一座座被称为“大厝”的红砖建筑在乡村拔地而起，其规模之宏大、装饰之华美，远超普通民居。建筑不仅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成为财富、地位和家族声望的实体展演。商贾们在建筑上的投入毫不吝惜，相互攀比的风气亦助推了建筑形制与装饰的不断升级，形成了“炫奇斗富、讲求排场”的浓厚乡风。

（三）内向型发展对建筑精细化的促进

海禁政策在客观上限制了财富向外扩张的渠道，使得积累的资本大量回流并沉淀于乡土社会内部。当土地置业达到饱和后，兴建豪宅便成为展现家族实力的重要途径。由于宅地面积有限，且传统宗法礼制对建筑的外部尺度和规制仍有无形约束，闽南的富商们便将竞争的焦点转向了建筑的“内涵”——即内部空间的利用和装饰的精细化。这种“内向型”的发展趋势，使得闽南红砖建筑在细部处理上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工匠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将砖、石、木等材料的特性发挥到极致，通过繁复的雕刻、精巧的组合以及丰富的色彩，赋予建筑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力。从梁架斗拱到门窗隔扇，从墙头屋脊到础石地砖，无一处不精雕细琢，无一处不体现着主人的审美情趣与工匠的高超技艺，使建筑本身成为一件集多种工艺于一身的艺术品。

二、官式大厝的成熟与定型

明清时期，闽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形态——官式大厝，在雄厚财力的支撑和激烈社会竞争的推动下，走向成熟与定型。它巧妙地借鉴了中原的建筑规制，又深度融入了地方的文化审美，最终形成一种既有严谨格局又具华丽外观的独特建筑范式，成为闽南红砖建筑的集大成者。

（一）“皇宫起”民居的形制与规制

闽南官式大厝因其形制恢弘、富丽堂皇，常被民间俗称为“皇宫起”。这个称谓一方面带有夸耀的成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其在某些特征上对宫殿式建筑的模仿与借鉴。“皇宫起”大厝的出现，与闽南人“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和敢于突破传统的文化性格有关。尽管封建礼制对民居的等级有着严格规定，非官宦之家不得使用某些特定的建筑样式，但在积累了巨富的闽南商贾面前，这些规制被大胆地逾越和改造。

这种民居的基本形制源于中原的四合院，但在闽南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丰富。建筑多坐北朝南，以中轴线为基准进行对称布局，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和财富的

增长，可以在基本单元（如三开间或五开间）的两侧加建“护厝”（厢房），或在纵向增加进深，形成两进、三进甚至更多进的院落，规模宏大。这种层层递进、主次分明的空间序列，清晰地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尊卑有序和家族伦理。同时，为了适应闽南湿热的气候，建筑内部设置了开阔的天井，既利于采光通风，也方便汇聚雨水，蕴含着“四水归堂”的聚财寓意。

（二）红砖、白石、青瓦的经典组合

如果说宏大的规制是官式大厝的骨架，那么鲜明的色彩就是其悦动的外衣。闽南官式大厝最引人注目的视觉特征，便是红砖、白石、青瓦的经典色彩搭配。墙体广泛使用一种在本地烧制的红砖，色泽艳丽，砌筑的墙面被称为“红砖墙”。这种对红色的偏爱，除了因为当地盛产适合制砖的红土，也与闽南文化中蕴含的吉祥、热烈、富贵的审美取向息息相关。红色在传统上多为宫廷和庙宇所用，民间大规模使用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彰显。

1. 红砖为墙：大面积的红砖墙面构成了建筑的主色调，赋予建筑温暖而喜庆的基调。

2. 白石为基：墙体的下半部分，特别是墙基、勒脚、门框、窗框等处，则大量使用本地产的白色花岗岩。白石坚固耐用，能有效防潮，其素净的白色与红砖的艳丽形成强烈而和谐的对比，清晰地勾勒出建筑的轮廓。

3. 青瓦为顶：屋顶则多铺设青灰色的瓦片，包括板瓦和筒瓦。在阳光下，青瓦的色泽沉稳内敛，与下方张扬的红墙白石形成平衡，使得整个建筑既华美又不失庄重。

这种红、白、青（灰）的色彩组合，共同塑造了闽南红砖建筑鲜明而独特的地域形象，一眼望去，红白相间，层次分明，极富视觉冲击力。

（三）中轴对称与多进院落的布局范式

官式大厝严格遵循着中国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布局原则——中轴对称。从入口的门楼开始，一条无形的中轴线贯穿始终，厅堂、天井等主要空间都被序列性地组织在这条轴线上。两侧的房间、护厝、廊道则以完全对称的形式分布，营造出一种庄重、稳定、均衡的秩序感。这种布局不仅是美学上的追求，更是儒家礼制思想在建筑空间上的物化体现，强调了主次、内外、尊卑的伦理秩序。

典型的官式大厝多为多进院落式组合。“进”指的是沿中轴线纵向排列的院落层次。最简单的为两进，即入口的下厅（门厅）和后方的主厅（正厅）之间隔

着一个天井。规模更大的宅院可达三进、五进甚至更多。每一进都有明确的功能分区，例如，第一进通常作为接待、门房之用；中间的厅堂是祭祀祖先、举行家族仪典和接待重要客人的核心场所；后进则多为长辈或核心家庭的居住空间。

各个院落之间通过廊道（俗称“榫头”）相连，形成一个既有区隔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宽阔的石铺庭院（俗称“埕”）位于大厝前方，是家族成员公共活动、晾晒谷物和举行大型庆典的场所。这种由外到内、由公共到私密的层级化空间设计，完美地容纳了一个大家族“聚族而居”的生活模式，既保证了家族的凝聚力，又为不同家庭提供了相对独立的居住单元，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在建筑上的深刻反映。

三、红砖建筑技艺的巅峰表现

明清时期闽南红砖建筑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规制上，更在于其建造技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工匠们以精湛的手艺，将雕刻艺术与建筑结构融为一体，并发展出多样化的红砖砌筑方法，使得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艺术的巧思与深厚的文化寓意。

（一）砖雕、石雕、木雕的精湛结合

闽南官式大厝的装饰艺术堪称一绝，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将砖雕、石雕和木雕三种不同材质的雕刻技艺精妙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建筑的整体美学。正如上表列出的，这“三雕”艺术各司其职，又交相辉映，使建筑从屋顶到基座都充满了值得细品的艺术细节。石雕多用于建筑的承重和基础部分，如门前的石狮、抱鼓石，墙基的柜台脚、裙堵，以及窗框、石柱和柱础。工匠们利用花岗岩的坚实质地，采用圆雕、浮雕、沉雕等多种技法，雕刻出瑞兽、花鸟、人物故事等题材，既坚固了建筑，又赋予冰冷的石头以生命。

木雕则集中体现在建筑的内部结构和装饰构件上，如梁枋、斗拱、雀替、垂花、窗棂、隔扇等。工匠们选用优质的樟木、楠木，进行透雕、浮雕，题材广泛，从历史演义到祥瑞图案，无不精细入微。尤其是厅堂中的梁架，层层叠叠的斗拱和精雕细刻的员光、瓜筒，不仅是力学与美学的完美结合，更是整座建筑的艺术精华所在。砖雕则更多地应用于墙面装饰，特别是在“水车堵”（屋檐下的装饰带）、“镜面墙”（正厅两侧的墙面）等显眼位置，通过浮雕或透雕手法，塑造出色彩典雅、立体感强的装饰画面。三雕艺术的和谐共生，共同谱写了一曲材

质与工艺的华美乐章。

（二）红砖砌筑工艺的多样化发展

在闽南工匠的手中，普通的红砖变成了充满创造力的艺术语言。他们不仅仅是简单地将砖块垒砌成墙，而是发展出多种极富装饰趣味的砌筑工艺。其中，“出砖入石”是最具地方特色的一种。这种技艺将大小不一的石块与红砖交错混砌于墙体之中，形成红白相间、凹凸有致的独特肌理。相传此法源于明代大地震后，人们利用废墟中的碎砖乱石重建家园的智慧，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建筑美学。

另一种常见的工艺是红砖拼花，也称“砌花”。工匠们将红砖或砖片切割、组合成各种几何图案，如万字纹、龟背纹、古钱纹等，镶嵌于墙面上，形成富有韵律感的装饰带。在一些被称为“镜面墙”的重要墙面上，还会使用专门烧制的彩釉花砖进行组合镶贴，图案更加丰富多彩。“金包银”的空斗墙砌法也十分普遍，即外墙用红砖砌筑，内部填充成本较低的土坯或碎石，既节约了材料，又能在墙体内部形成空气层，起到隔热、防潮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营造智慧。

（三）建筑装饰的繁复与象征意义

闽南红砖建筑的装饰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繁复程度，但这种繁复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充满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几乎每一个装饰图案背后，都蕴含着趋吉避凶、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是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集中展示。装饰题材的运用与建筑部位紧密结合，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符号的意义世界。例如，屋脊上的装饰多采用泥塑、剪粘或交趾陶工艺，塑造双龙、凤凰等神兽，象征着镇宅辟邪和地位尊贵。

墙身“水车堵”上的装饰带，则常以戏曲人物、民间故事为题材，如“三国演义”“八仙过海”等，既是对民众进行忠孝节义的道德教化，也增添了建筑的叙事性和趣味性。门窗、梁枋上的雕刻则多采用寓意吉祥的动植物图案。蝙蝠象征“福气”，鹿象征“禄位”，牡丹象征“富贵”，石榴象征“多子多孙”。这些图案通过谐音、借代、比喻等手法，将家族对福、禄、寿、喜、财的美好期盼物化在建筑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将艺术装饰与象征意义紧密结合的做法，使得闽南红砖建筑不仅是一座物理的居所，更是一座承载着家族历史、伦理观念和人生理想的精神家园。

第四节 近现代红砖建筑的演变

近代以降，闽南社会在东国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原本相对封闭的建筑体系，随着海禁的开放与侨民的回归，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与复杂面貌。红砖，这一承载着闽南人浓厚乡土情结的传统材料，在新的时代浪潮中被赋予了全新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见证了闽南建筑从传统田园风格向近现代多元化风貌的深刻演变。

一、下南洋风潮与侨乡建筑的兴起

自明清以来，闽南地区“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大批民众为了生计远渡重洋，前往东南亚谋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下南洋”风潮。这场深刻影响闽南社会的人口大迁徙，不仅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也为闽南建筑文化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催生了极具时代特色的侨乡建筑。

（一）华侨归乡带来的财富与审美新风尚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许多远赴南洋的闽南人历经艰辛，在异国他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叶落归根、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驱使他们将财富带回故里，而“起大厝”成为他们荣归故里、彰显身份与财富的最直接方式。这些被称为“番客”的华侨，在侨居地长期生活，深受当地以及国外殖民地建筑风格的影响。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资金，更是全新的建筑理念和审美趣味。传统的闽南大厝以单层院落为主，而归侨们则突破了这一形制，开始兴建两层甚至三层以上的高大楼房。

这种审美新风尚的出现，是对传统建筑等级观念的巨大冲击。在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制与色彩受到严格的礼制约束，红色多为皇家与高等级寺庙专用。而侨乡地处沿海，天高皇帝远，加之华侨们视野开阔、财力雄厚，他们敢于突破传统束缚，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成功的炫耀，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建筑之上。于是，鲜艳的红砖、华丽的装饰以及高大的体量，共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建筑风貌，这种风貌既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对一个时代开放与变革的宣告。

（二）“番仔楼”中红砖与南洋风格的融合

这种在侨乡大量涌现、融合中西建筑元素的新式民居，被本地人形象地称为“番仔楼”。“番仔楼”是闽南语中对“洋楼”的称呼，它并非对国外或南洋建筑的简单复制，而是以闽南传统红砖建筑为基底，巧妙融合南洋及西洋建筑风

格的独特创造。其建筑布局，如“七间张、十榑头式两落大厝”的格局，依然遵循着闽南传统民居的中轴对称和院落组合，体现了深植于血脉的宗族伦理观念。

在建筑的立面上，“番仔楼”展现出极为丰富的多元文化特征。它们普遍借鉴了南洋殖民地建筑中常见的外廊式设计，即在建筑正面或四周设置连续的廊柱，形成宽敞的“五脚架”或回廊，以适应闽南地区湿热多雨的气候。这种设计既提供了遮阳避雨的过渡空间，也成为建筑造型的亮点。建筑的檐口、门窗、栏杆等细部，则大量使用从南洋带回的或在本地仿制的西式装饰构件，如罗马式圆柱、精致的山花、曲线优美的拱券等，与传统的红砖墙体形成了鲜明而和谐的对比。

红砖在“番仔楼”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主要的墙体材料，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国外的视觉纽带。工匠们运用精湛的技艺，将温暖质朴的红砖与冰冷坚硬的西式水泥、石材构件巧妙组合，创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艺术效果。例如，在泉州晋江的杨家大楼，其主体虽为典型的西式别墅风格，但在细节处依然可以看到红砖古厝的影子和传统元素的运用，罗马柱与牌匾对联在此共存，展现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韵味与文化张力。

（三）骑楼建筑中的红砖运用

骑楼，作为一种源自南洋、适应亚热带气候的近代商业建筑形式，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被引入闽南地区，并迅速在厦门、泉州、漳州等沿海城市的商业街区普及开来。这种建筑将二层以上的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上，下方形成可供行人遮阳避雨的连续廊道。红砖在骑楼建筑中的运用，不仅延续了其作为结构材料的功能性，更在审美层面赋予了这种商业建筑浓厚的地域色彩与人文气息。在漳州古城，两侧连绵的红色骑楼与古老的明代石牌坊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新旧交融的独特城市景观。红砖的温暖色调与质朴肌理，中和了骑楼作为商业建筑的冰冷感，使其更好地融入了闽南的城市文脉。工匠们利用红砖进行多样化的拼贴与装饰，在骑楼的立面上创造出丰富的几何图案和线条变化，使得这些功能性的商业建筑也同样具备了值得细细品味的艺术价值。对近现代闽南红砖建筑的主要风格类型和特点，可见下表列出的详细对比。

近现代闽南红砖建筑风格特征对比表

建筑类型	主要时期	核心特征	红砖运用特点	融合元素
传统大厝	明清 - 民国初	单层院落、中轴对称	主要结构材料，搭配“出砖入石”	本土传统
番仔楼	清末 - 民国	两至三层高楼、院落格局	主体墙体，与水泥石材结合	南洋、西洋古典柱式、拱券
骑楼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商业建筑、连续廊道（五脚架）	立面装饰、功能性结构	商业、亚热带气候适应性设计
嘉庚风格	20 世纪 20-40 年代	西式主体，传统歇山顶 / 燕尾脊	清水红砖墙，营造庄重感	西式结构、传统屋顶、琉璃瓦

二、国外建筑元素的融入与再造

随着厦门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埠，闽南地区与国外的接触日益频繁。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新的信仰与商业模式，也带来了全新的建筑思想和技术。红砖建筑在这一时期，开始了与纯粹国外建筑元素更为直接的对话与融合。

（一）教堂、学校等公共建筑的新风格

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以鼓浪屿为中心，涌现出一大批由教会、外国机构或归国华侨兴建的教堂、学校、医院、领事馆等公共建筑。这些建筑大多采用纯正的西式或中西合璧的风格，成为当时闽南建筑走向多元化的重要标志。这些公共建筑的风格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展现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风采。

1. 红砖在教堂建筑中的应用：许多教堂将红砖作为主要的立面材料，利用其鲜明的色彩营造出庄重而神圣的氛围。清水红砖墙通过不同的砌筑方式，如英式砌法，形成富有变化的肌理，与白色的花岗岩石雕、窗套线脚形成典雅的色彩对比。

2. “嘉庚风格”的诞生：在学校建筑方面，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 and 集美学村，更是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嘉庚风格”。这种风格被形象地称为“穿西装，戴斗笠”，即建筑主体采用西式结构与廊柱，以满足现代教育的功能需求，而屋顶则坚持使用闽南传统的歇山顶和燕尾脊，并铺上红色或绿色的琉璃瓦。这一创造性实践，是陈嘉庚先生“中国人的建筑，必须有中国人的样子”这一文化自信的宣言，也是对国外建筑风格的批判性吸收与成功再造。

（二）古典柱式、拱券与红砖墙体的结合

在这一时期，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建筑语汇，如多立克、爱奥尼与科林斯等柱式，以及各种形态的拱券，被广泛地应用于闽南的红砖建筑之中。这种结合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经过了本土化的理解与再创造。在许多“番仔楼”和公共建筑中，可以看到雄伟的罗马式廊柱支撑着中式的大厝或西式的洋楼，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晋江的春晖楼，其正立面两层外廊各有六根罗马式圆柱，檐口上装饰着巴洛克风格的山花，显得洋气十足。

这些古典元素与温润的红砖墙体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红砖的质朴调和了古典石柱的冰冷与庄严，而古典柱式与拱券的引入，则为传统的红砖建筑带来了秩序感、韵律感和纪念性。鼓浪屿的许多别墅，如黄家花园和海天堂构，都堪称此类结合的典范。在这些建筑中，红砖砌成的方形廊柱、半圆形或尖拱形的门窗，与精美的砖雕、石雕、彩画、拼砖等闽南传统工艺交织在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曲跨文化对话的华美乐章。

（三）水泥、玻璃等新材料的应用

水泥、钢筋、机制玻璃、花阶砖等新材料的输入和使用，是近现代闽南红砖建筑演变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这些工业化生产的新材料，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建筑结构与建造方式。水泥和钢筋的运用，使得建筑的跨度更大、楼层更高成为可能，彻底突破了传统砖木结构“开间”和“进深”的限制。像泉州杨家大楼在建造时，其设计图纸和钢筋水泥等材料甚至都是从国外运回，足以见证新材料对当时建筑实践的深刻影响。

玻璃的广泛应用则改变了建筑的采光方式，使得室内空间更加明亮通透。过去，闽南传统民居为了防御和保持室内阴凉，窗户通常较小。新材料的出现，使得大面积的玻璃窗、彩色玻璃花窗成为可能，不仅改善了物理环境，也为建筑立面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和现代感。

这些新材料与传统红砖的结合，体现了闽南工匠务实而灵活的创造精神。他们并未因新材料的出现而抛弃红砖这一传统，而是巧妙地将二者结合。例如，他们会用红砖作为建筑的主要墙体，而在廊柱、过梁、阳台等关键受力或装饰部位使用水泥，并用预制的水泥花瓶、线脚进行装饰。这种新旧材料的并置与对话，既保留了红砖建筑的温暖底色与乡土记忆，又赋予了其现代建筑的功能与美感。

三、新中国成立后红砖建筑的延续与变迁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闽南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下，红砖建筑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其建造技艺和文化内涵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红砖建筑从昔日家族荣耀的象征，逐渐转变为服务于集体生产生活的载体。

（一）集体化时期的建筑功能转变

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许多过去属于大户人家的红砖古厝和番仔楼被收归集体所有。这些规模宏大、房间众多的建筑，其原有的居住功能被彻底改变，转而被用作人民公社的办公地、仓库、学校、生产队队部甚至是集体食堂。曾经象征着家族荣耀与长幼尊卑的厅堂，变成了召开集体会议、进行思想教育的公共空间。

在这一时期，新建的建筑也大多围绕着集体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展开。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政治风气的影响，建筑风格趋向于简洁、朴素和实用，摒弃了所有繁复的装饰。红砖作为一种廉价、易得且坚固耐用的本土材料，依然被广泛使用。只不过，此时的红砖建筑已经褪去了“皇宫起”和“番仔楼”的华丽外衣，不再有精美的砖雕、石雕和高耸的燕尾脊，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平脊屋顶、整齐划一的墙体和满足基本功能需求的门窗。这些朴实无华的红砖厂房、宿舍和公共建筑，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建筑景观，成为一代人深刻的集体记忆。

（二）传统建造技艺的式微与保护意识萌芽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现代建筑技术的普及，以师徒制和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曾经拥有崇高地位的大木匠、泥水匠等传统工匠群体逐渐萎缩，精湛的“出砖入石”、“金包银”砌墙法以及各种复杂的砖雕、剪黏等技艺濒临失传。追求快速、标准化的现代建造流程，取代了耗时费工的传统手工艺。同时，在特定历史时期，传统建筑中华丽的装饰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遭到破坏或忽视，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技艺的式微。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古老红砖建筑的价值。一些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发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政府也逐渐开始将部分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红砖建筑群，如南安蔡氏古民居等，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意识的萌芽，为这些在风雨中飘摇的文化瑰宝带来了一线生机。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红砖建筑命运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推倒重来”的城市发展模式下，无数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红砖建筑，包括许多精美的古厝和番仔楼，被成片地拆除，为拔地而起的水泥森林所取代。这些被视为“破旧”的红砖建筑，在追求现代化的浪潮中，其文化价值被严重低估。红砖厝所代表的院落式生活方式，也被认为不适应现代家庭结构和居住习惯，逐渐被单元式的商品房所替代。

幸运的是，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对红砖建筑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开始受到重视。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开始探索新的模式，试图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例如，在泉州台商投资区的龙苍村，文创团队入驻，将破败的番仔楼改造为充满文艺气息的公共空间，使其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基础上焕发新生。在晋江的梧林传统村落，通过整体规划和修复，将侨乡建筑群打造成为集文化体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地标。这些探索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它们预示着一种新的可能：红砖建筑不再仅仅是需要被供奉的“文物”，而是可以重新融入当代生活、并持续创造文化与经济价值的宝贵资产。

第二章 红砖建筑的材料与工艺

红砖是构成闽南建筑风貌的基础语汇，其独特的色彩与温润质感，不仅源于本地特殊的自然禀赋，更凝聚着世代匠人对泥土、火候的深刻理解与精湛技艺。本章将深入探究闽南红砖从一抔泥土到一块坚实砖石的完整历程，阐释其背后的材料科学与传统工艺智慧。

第一节 红砖的原料与烧制工艺

从原料的选取与处理，到龙窑的构筑与烧制，闽南红砖的诞生是一场土、水、火与人相互作用的精妙创造。这个过程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东方哲学，也决定了最终成品的品质与神韵。

一、闽南红砖的原料特性

闽南红砖的鲜艳色泽与优良物理性能，根植于其独特的原料基础。匠人们对土地有着深刻的认知，这使他们能够精准地从大自然中筛选出最适宜制砖的黏土，并通过独特的配比与处理，赋予砖石以生命力。

（一）本地黏土的化学成分与物理特性

闽南地区广泛分布的红色系土壤，是烧制红砖的天然宝库。这种黏土在化学成分上最显著的特点是高铁含量，其氧化铁的含量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制砖黏土。在高温烧制过程中，这些铁元素在充足的氧气环境下发生充分氧化，最终赋予了砖体鲜艳而温暖的红色调，成为闽南建筑标志性的视觉符号。这种黏土颗粒细腻，具有极佳的可塑性，能够在模具中被塑造成各种形态，为后期的砖雕艺术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黏土的物理特性同样至关重要。其良好的黏结性确保了砖坯在干燥过程中不易开裂，而适度的收缩率则保证了成品尺寸的规整与统一。闽南匠人深谙此道，他们通过经验判断黏土的含沙量与湿度，以确保砖坯在入窑前达到最佳状态。这

种源于自然的材料特性，与人工的精湛技艺相结合，共同造就了闽南红砖既坚固耐用又富于表现力的双重品质，使其不仅是结构材料，更是艺术创作的载体。

黏土中的矿物成分，如石英、长石和云母等，也对红砖的最终性能产生影响。它们在高温下参与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形成了砖体内部的骨架结构，提高了砖的强度与耐火度。正是这种复杂的物质构成，使得每一块闽南红砖都并非简单的工业复制品，而是蕴含着特定地域风土气息的独特存在。其内部微观结构的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质感与色泽变化。

（二）“田土”与“山土”的取用与区别

闽南匠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将本地黏土细分为“田土”与“山土”两大类，并根据其不同特性进行取用与调配。“田土”主要取自水田或河流冲积平原的表层之下，因长期处于淹水与沉积环境，其质地极为细腻、纯净，有机质含量较高，可塑性与黏结性上佳。这种土被视为制砖的上等原料，尤其适合制作对精细度要求高的“清水砖”或用于雕刻的砖料。取用田土的过程需先排干田水，挖走表层腐殖土，方能获取深层纯净的黏土，工序相对繁琐。

“山土”则源于丘陵山坡，是基岩风化后的产物。相较于田土，山土的颗粒普遍较粗，含有更多的砂石等杂质，可塑性与黏结性稍逊一筹。它的优点在于分布广泛，获取相对容易，且因其含沙量较高，烧制后的砖坯收缩率较小，稳定性好，不易变形。山土通常被用于制作对外观要求不高、但对强度有要求的承重砖或“烟炙砖”。经验丰富的匠人往往不会单一使用某一种土，而是根据预期的砖体品质，将“田土”与“山土”以特定比例混合，取长补短，实现性能与成本的最佳平衡，这种配比的秘诀往往是各家窑厂的核心技艺。

（三）原料处理：淘洗、陈腐与练泥

将采掘来的黏土变为可供制坯的“熟泥”，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耗时的处理工序，其中淘洗、陈腐与练泥是最为关键的三个步骤。淘洗是净化泥料的第一步。匠人们将“田土”或“山土”放入水池中，加水搅拌使其成为泥浆，利用砂石、草根等杂质因密度不同而沉淀或漂浮的原理，将其分离出去。这个过程反复进行，直至泥浆变得纯净均匀，这是保证砖体质地细腻、内部无瑕疵的基础。

淘洗后的纯净泥浆并不能立刻使用，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陈腐”过程。泥浆被堆放在避光、阴凉的泥窖中，封存数月甚至一年以上。在这期间，泥料中的有机物会缓慢分解，微生物的活动使得黏土颗粒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改变，水

分分布更加均匀，可塑性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个看似静默无为的过程，如同酿酒一般，是时间的艺术。经过充分陈腐的泥料，其性能远胜新泥，制成的砖坯表面光滑，不易开裂，是高品质红砖的保证。

陈腐完成的泥料在制坯前还需经过最后一道工序——练泥。传统工艺中，练泥常由人力或牛力完成。匠人们赤足反复踩踏泥堆，或驱牛转圈踩踏，通过持续的挤压与揉捏，排出泥料中残存的气泡，使其结构更加紧密、均匀。这个过程极其考验体力和耐心，练泥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砖坯的致密度和最终成品的强度。现代工艺虽有机设备辅助，但许多坚守传统的窑厂依旧认为，人力踩踏所带来的“脚感”与对泥料状态的即时反馈，是机器无法完全替代的。经过这三道工序的精雕细琢，原本普通的黏土才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合格的制砖原料。

二、传统龙窑的构造与烧制流程

龙窑是闽南地区烧制红砖的核心装备，其独特的形制与烧制工艺，是数百年经验积累的结晶。它如同一条蛰伏于山坡上的火龙，吞吐烈焰，将泥坯点化为坚实的砖石，是传统手工艺与朴素物理学原理的完美结合。

（一）龙窑的选址、建造与结构特点

龙窑的选址极具智慧，通常选择坡度在 10 到 25 度之间的山坡或丘陵地带。这种依山而建的设计，巧妙地利用了热空气自然上升的物理原理，使得火焰与热气能够自下而上顺畅地在窑内流动，贯穿整个窑体，形成强大的自然抽力。这不仅节约了燃料，也让窑内各处的温度分布更加均匀，提高了烧制效率与成品率。窑址附近还需保证有充足的黏土原料和薪柴燃料，并靠近水源，以满足整个生产流程的需求。

龙窑的建筑材料同样就地取材，窑体通常使用耐火砖或加工过的山石、土坯砌筑而成，外层则厚厚地糊上掺有稻草的泥土，以增强其保温性能。其结构形态宛如一条长龙，从山脚的窑头（龙头），经过长长的窑室（龙身），一直延伸到山顶的窑尾（龙尾）与烟囱。窑身并非笔直，而是略带弧度，长度从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窑身两侧每隔一段距离便开有投柴孔，称为“龙眼”，供烧窑师傅观察火情和添加燃料，精确控制不同窑段的温度。

整个龙窑的结构设计充满了匠心。窑头设有单独的火膛，用于点燃主火。倾斜的窑床使得火焰与热量能逐级传递，对后段的砖坯起到预热作用。窑尾高耸的

烟囱则确保了整个通风系统的顺畅，将燃烧产生的废气排出。这种一体化的设计，使得装窑、预热、烧制、保温、冷却等各个环节能在一条窑内协同进行，构成了一个高效而有机统一的热工系统。

（二）装窑、烧火、冷却的工艺流程

红砖的烧制是一个严谨而有序的过程，始于精心的装窑。匠人们将数以万计的干燥砖坯通过窑门搬入窑室，并以特定的方式堆叠起来。堆叠技术至关重要，既要保证结构稳定，防止在高温下坍塌，又要预留出合理的缝隙，形成通畅的火道与烟道，确保热气流能均匀穿透所有砖坯。这是一个三维的拼图游戏，考验着装窑师傅的空间想象力与丰富经验。通常，不同品质的砖坯会放置在窑内不同的位置，以适应各区域的温度差异。

装窑完毕，封好窑门，便开始升火烧制。整个烧火过程可分为几个关键阶段：

1. 预热，俗称“焙窑”：首先在窑头火膛用小火缓慢加热，持续一到两天，目的是蒸发砖坯中残留的物理水分。这个阶段温度控制必须平缓，升温过快会导致砖坯炸裂。

2. 氧化烧结：预热结束后，逐渐加大火力，并将烧制重心从窑头顺着“龙眼”逐个向窑尾推进。窑内温度攀升至 900 至 1050 摄氏度。在此高温和氧气充足的环境下，黏土中的铁元素被充分氧化，砖体呈现出鲜艳的红色，同时黏土矿物发生烧结反应，形成坚固的陶瓷结构。

3. 保温与冷却：当最后一对“龙眼”烧完，整个窑体的烧制阶段便告完成。此时需封住所有投柴孔与烟囱，让窑体在密闭状态下缓慢自然冷却。这个过程同样漫长，通常需要数天甚至一周以上。过快的冷却会产生内应力，导致砖体开裂或强度下降。待窑温降至人体可适应的范围后，方可开启窑门，出窑检验成果。

（三）燃料选择与火候控制的经验智慧

燃料的选择对红砖的色泽与品质有着直接影响。闽南地区传统上多使用松木、杂木等作为龙窑的主要燃料。松木富含油脂，火焰长而热值高，燃烧时能产生大量的还原性气体，有助于形成理想的窑内气氛。匠人们认为，松柴烧出的砖，颜色“活”而有光泽。燃料的干燥程度、尺寸大小都需要严格控制，以确保燃烧的稳定与高效。

火候的控制是整个烧窑工艺的灵魂，完全依赖于烧窑师傅，也被称为“火长”的个人经验与临场判断。由于没有现代化的测温仪器，师傅们通过窑壁上的观火

孔，凭借肉眼“看火色，断窑温”。火焰从暗红、橘红、金黄到白亮的颜色变化，精确地对应着不同的温度区间。他们能从火焰的形态、亮度和跳动频率，判断出窑内的氧化或还原气氛状态，并据此决定投柴的时机、频率与数量。

控制火候的智慧还体现在对“风”与“火”的协同驾驭上。师傅们通过调节投柴孔的开合，控制进入窑内的空气量，从而改变燃烧强度与窑内气氛。在烧制特定砖种，如“烟炙砖”时，甚至会在烧成的最后阶段，故意投入大量潮湿燃料，产生浓烟，并迅速封闭窑体，形成强还原气氛，使砖体颜色发生剧变。这种人、火、土、窑之间的默契对话，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完全传授的技艺，是闽南匠人世代传承的宝贵经验与集体智慧。

三、红砖的品种与质量鉴别

经过烈火的洗礼，泥坯最终蜕变为坚实的红砖。然而，由于窑内位置、火候控制以及烧制气氛的细微差别，出窑的砖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形成了丰富的品种。匠人和使用者也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性鉴别方法。

（一）“烟炙砖”与“清水砖”的区别与成因

在闽南红砖的大家族中，“清水砖”与“烟炙砖”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品种，它们在色泽、质地与用途上迥然不同，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烧制末期窑内气氛的差异。清水砖与烟炙砖在烧制气氛、成品特性及用途上的主要差异，可见下表所列的详细对比。

闽南红砖主要品种特性对比表

特性	清水砖	烟炙砖	炻质砖
烧制气氛	氧化气氛（O ₂ 充足）	还原气氛（缺O ₂ ，熏烟）	强氧化气氛（近火源）
主要色泽	鲜艳橘红、大红	深灰、青灰、蓝黑色	深红、紫红
密度与强度	中等	高，致密度好	极高，坚硬如石
吸水率	较高	低，防水性佳	极低
典型用途	墙体主体、看面砌筑	墙基、勒脚、承重构件	结构性承重、特殊部位

“清水砖”是龙窑在正常氧化气氛下烧制的产物。在整个高温烧结阶段，窑内氧气供应充足，黏土中的铁元素得以充分氧化，生成三氧化二铁，从而使砖体呈现出均匀、鲜亮的橘红色或大红色。这种砖色泽纯净，表面平整，是闽南传统建筑中最为常见的墙面用砖，尤其用于砌筑大面积的红砖墙，营造出温暖而喜庆

的视觉效果。

“烟炙砖”的形成则是一个特殊的工艺过程。它在烧制的前中期与“清水砖”并无二致，但在烧成的最高温阶段之后，烧窑师傅会采取“熏烟渗碳”的手段。具体操作是向窑内投入大量松枝、糠壳甚至水分，然后迅速封闭所有窑口和烟囱，使窑内氧气瞬间耗尽，形成极强的还原气氛。在这种缺氧环境下，原本已呈红色的三氧化二铁被还原为黑色的氧化亚铁或蓝黑色的四氧化三铁，同时，燃料不完全燃烧产生的碳微粒会渗透到砖体表层孔隙中，进一步加深了砖的颜色。

因此，“烟炙砖”的最终成品呈现出深灰、青灰乃至蓝黑色，表面常有一层金属光泽，质感独特。由于经历了更复杂的化学变化，其密度和强度通常高于“清水砖”，吸水率更低，耐候性更强。这种砖的烧制技术要求更高，成品率相对较低，故而价值也更高。

在视觉上，二者对比鲜明。“清水砖”温暖明快，如同闽南人的热情；“烟炙砖”则深沉稳重，散发着古朴坚毅的气质。在建筑实践中，匠人常常将这两种砖巧妙搭配使用，例如以“烟炙砖”作为墙基、勒脚或窗框线脚，利用其深沉的色调稳定建筑的基座，再以大面积的“清水砖”作为墙身，形成色彩与质感上的强烈对比，极大地丰富了建筑的立面表情。

（二）不同颜色与密度红砖的用途

闽南红砖因烧制火候、窑内位置和原料配比的差异，会产生颜色深浅、密度大小各不相同的成品，匠人们会根据这些特性将其分门别类，用于建筑的不同部位。总的来说，颜色越深、密度越大的砖，其烧结程度越高，强度与耐久性也越好，多用于结构性或对耐候性要求高的部位。

颜色深黑或青灰的“烟炙砖”，以及那些因靠近火源、经受了更高温度而烧成的深红色“炆质砖”（如上表所示），是最高等级的承重材料。它们质地坚硬，敲击声清脆如金石，吸水率极低。这类砖被优先用于建筑的基石、墙基部分（勒脚），以及拱券、梁枋等关键受力构件。在潮湿多雨的闽南地区，使用这类高密度砖作为建筑底部材料，能有效防止地气侵蚀，保证墙身干燥，延长建筑整体的寿命。它们的稳重色泽也为建筑提供了坚实的视觉基座。

颜色鲜艳、均匀的“清水砖”则是墙体砌筑的主力。它们虽然强度略逊于“烟炙砖”，但性能优良，且色泽美观，最能代表闽南建筑的特色。这类砖被大量用于内外墙的砌筑，构成建筑的主体。其中，质量上乘、棱角分明、表面平整的“清

水砖”会被用在建筑的“看面”，即最显眼的立面上。而那些外观稍有瑕疵，或颜色不够均匀的，则用作“里砖”，砌在墙体内部，外面再以“看面砖”包裹，做到了物尽其用、经济合理。还有一些质地特别细腻、可塑性好的红砖，则专门用于雕刻，制作成精美的窗饰、墙头花饰和浮雕，成为建筑的点睛之笔。

（三）经验性的质量标准与鉴别方法

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时代，闽南的工匠与民众依靠世代相传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直观而有效的红砖质量鉴别方法，俗称“一敲、二看、三掂、四滴水”。这些方法虽然朴素，却蕴含着深刻的物理学原理，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沿用。

“敲”是听声辨质。取两块砖相互敲击，或者用硬物轻敲砖的表面。如果发出清脆、洪亮、带有金石余音的声音，说明这块砖烧结程度高，内部结构紧密，没有未烧透的“哑心”，强度和耐久性都属上乘。相反，如果声音沉闷、嘶哑，如同敲击土块，则表明砖体存在裂纹或者烧制火候不足，是次品。

“看”是观察外观。一块好砖的形态应该方正，棱角分明，没有明显的弯曲、翘角或变形。表面平整，但又不能过于光滑，略带粗糙的质感有助于与砂浆更好地结合。颜色要均匀一致，对于“清水砖”而言，色泽鲜艳纯正者为佳；对于“烟炙砖”，则要求色泽深沉，表面有均匀的金属光泽。同时要检查砖体有无明显的裂缝或爆裂点。

“掂”是通过手感估量其密度。将砖拿在手上掂量其分量，同等尺寸的砖，手感越沉重，说明其内部越密实，烧结程度越好，强度自然也越高。反之，如果感觉轻飘飘的，则可能是土质疏松或火候不够所致。“滴水”则是检验其吸水率。将水滴在砖的表面，观察其渗透速度。水滴迅速被吸收并扩散，说明砖体孔隙率高，吸水率大，耐久性和抗冻融性较差。优质的砖，特别是“烟炙砖”，水滴在表面会像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停留片刻，渗透缓慢，表明其致密度高，防水性能好。

第二节 红砖建筑的构造技术

闽南红砖建筑不仅以其艳丽的色彩和精美的装饰著称，更以其独特的构造技术展现了古代工匠的卓越智慧。从地基到屋顶，从墙体到地面，每一处都体现了工匠们对材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对力学原理的巧妙运用，形成了一套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整技术体系，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范例。

一、基础与墙体的砌筑工艺

建筑的稳固源于坚实的基础与精良的墙体。闽南匠人深谙此道，他们将本地丰富的花岗石与红砖巧妙结合，辅以独特的粘合材料与砌筑方法，创造出既能抵御台风多雨侵袭，又富有地域美感的墙体结构，成为红砖建筑风貌的骨架支撑。

（一）“大放脚”基础与石基的构造

闽南地区濒海，地质松软且多台风暴雨，因此建筑基础的稳定性和防水防潮性能至关重要。“大放脚”便是为此而生的独特基础形式。它指的是在建筑墙体下部，用砖或石由下至上逐层向内收窄，形成类似阶梯状的宽大基座。这种做法增大了基础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有效分散了上层结构的荷载，如同树根般牢牢抓住大地，极大地提升了建筑的整体稳定性。

在“大放脚”之上，通常会砌筑一段高于地面的石基，多采用本地盛产的白色花岗岩条石。石基不仅起到了抬高墙身、有效防潮的作用，其坚硬的物理特性也能更好地抵御白蚁侵蚀和洪水浸泡。白色花岗石与上部的红色砖墙形成鲜明对比，在视觉上赋予建筑一种沉稳、坚固的安定感，构成了闽南建筑“红砖白石”的经典外观特征之一。

（二）墙体砌法：顺砌、丁砌与梅花砌

闽南红砖墙体的砌筑工艺极为考究，不同的砌法不仅影响墙体的承重能力和稳定性，也形成了多样的立面肌理与装饰效果。工匠们根据建筑的不同部位和功能需求，灵活运用多种砌筑方式，展现了高超的技艺。

1. 顺砌，是将砖的长边顺着墙的方向平行砌筑，形成层层平行的线条感。这种砌法较为简单，速度快，多用于内部隔墙或次要墙体，能够快速分隔空间。

2. 丁砌，则是将砖的短边（丁头）垂直于墙面砌筑，使得砖与砖之间垂直方向的咬合更为紧密。丁砌的整体性和抗剪能力强于顺砌，常用于承重墙或墙体的转角、收头等关键部位，以增强结构的坚固度。

3. 梅花砌，又称“一丁一顺”，是顺砌与丁砌的组合形式。匠人在同一皮砖中交替使用顺砖和丁砖，上下皮砖的竖缝相互错开，墙面呈现出梅花点般的图案，兼具结构强度与装饰美感。梅花砌工艺复杂，但墙体整体性好，受力均匀，是闽南传统大厝中最常见也最具代表性的砌法之一，其规律性的图案变化赋予了红砖墙丰富的视觉节奏感。

这些不同的砌筑方式，在功能与美学上的差异，正如闽南红砖建筑墙体砌筑技术对比表所列出的那样，共同构成了红砖建筑独特的立面语言。

闽南红砖建筑墙体砌筑技术对比表

砌筑法	结构特点	主要功能	视觉效果
顺砌	长边平行于墙面，层层相叠	快速分隔空间，次要承重	简洁流畅的线条感
丁砌	短边垂直于墙面，咬合紧密	承重墙、转角加固，抗剪强	墙面坚固，整体性好
梅花砌	一丁一顺交替，上下错缝	主要承重，结构整体性极佳	规律性图案，富有节奏感
出砖入石	红砖与不规则花岗岩块混砌	极强承重、防盗、冬暖夏凉	凹凸有致，红白交织的乡土美感

（三）糯米浆、红糖浆等传统粘合材料的应用

在水泥尚未普及的时代，闽南工匠创造性地利用本地常见的有机物，调制出性能优异的传统粘合材料。其中，以糯米浆、红糖浆与壳灰（由牡蛎壳等煅烧而成）混合调制的灰浆最为典型。这种看似简单的有机 - 无机复合砂浆，实则蕴含着先辈们深刻的科学智慧。糯米中的支链淀粉和红糖中的糖分，在与壳灰的氢氧化钙发生反应后，能形成一种致密的网络结构，显著增强了灰浆的粘结力和韧性。

用这种特殊灰浆砌筑的砖墙，其粘结强度远超单纯的石灰砂浆，且具有更好的防水性和抗风化能力。浆体干燥硬化后，其强度和耐久性甚至不亚于现代的水泥砂浆，这也是许多闽南古厝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依然坚固屹立的重要原因。这种“以柔克刚”的材料智慧，不仅是节俭和就地取材的体现，更是一种生态友好的建造方式，凝结了先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思想。

二、屋顶结构与红砖的承重功能

屋顶是建筑抵御风雨侵袭的第一道屏障，红砖在其构造中不仅扮演着围护和装饰的角色，更在特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承重作用。闽南匠人巧妙地运用红砖的力学特性，构筑出形态优美且坚固实用的屋顶系统，展现了高超的结构智慧。

（一）硬山式屋顶的砖砌山墙

闽南民居多采用硬山式屋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两侧的山墙高于屋面，并将屋顶的檩条端头完全包裹在内。这种设计能有效保护木构的檩条免受风雨侵蚀，

对于台风频繁的沿海地区尤为重要。红砖在这里发挥了关键的承重与围护双重功能。山墙完全由砖石砌筑，从基础一直延伸至屋顶之上，形成了建筑两端的结构主体。屋面的重量通过檩条传递到砖砌山墙上，再由山墙传至地基。

山墙的顶部轮廓并非单调的直线，而是被塑造出各种优美的曲线，如“马背”或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设计的“五行山墙”。这些起伏的轮廓不仅是重要的美学特征，也通过砖的层层跌落或垒砌，增加了山墙顶部的结构稳定性和重量，以抵抗台风的掀动力。山墙上丰富的红砖拼花、彩绘和剪瓷雕，使这一结构构件升华为极具艺术表现力的文化符号。

（二）“出砖入石”的混合砌筑法

“出砖入石”是闽南建筑中一种极富创造力和视觉冲击力的墙体砌筑技术。它将形状不规则的白色花岗岩块与片状的红色条砖交错混砌于墙体之中，形成红白相间、凹凸有致的独特肌理。传说这种技术源于明代大地震或倭寇侵扰之后，人们利用废墟中的碎砖乱石重建家园的无奈之举，却无意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残缺之美和乡土符号。如上方的

闽南红砖建筑墙体砌筑技术对比表所示，这种砌法在功能上极为突出。

从构造上看，“出砖入石”并非随意的堆砌。工匠们通常将石块竖向安放，以红砖在其周围进行横向的填充和找平，砖的表面略微突出于石面，故名“出砖入石”。这种砌法使得不同材料能够相互嵌合，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石块提供了墙体的骨架和刚度，而小尺寸的红砖则起到了填充、找平和分散应力的作用。这种看似无序的组合，实则遵循着力学平衡的原则，构建出的墙体异常坚固耐用，兼具防盗与冬暖夏凉的优点。

“出砖入石”将材料的本色、质感与形状的对比发挥到极致，石材的粗犷与砖材的细腻、白色的冷静与红色的热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韵律感和生命力的建筑画卷。它生动地体现了闽南人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务实精神和在艰难中崛起的坚韧品格。

（三）砖券、砖拱在门窗过梁上的应用

在处理门窗等墙体开口上方的承重问题时，闽南匠人熟练地运用了砖券和砖拱技术。相较于简单的木制或石制过梁，砖拱结构能够将上方的垂直荷载巧妙地转化为侧向的推力，并沿着拱的曲线均匀传递到两侧的墙体上，从而实现更大的跨度，为建筑创造出更宽敞的门洞和窗户。

工匠们将红砖侧砌或斜砌成楔形，一块紧挨一块地垒砌成圆弧、椭圆弧或平缓的弧形，形成优美的拱券。这些拱券不仅是纯粹的结构构件，其本身也成为重要的装饰元素。砖块的砌筑方式、灰缝的勾勒以及拱顶中心“锁石”的雕刻，都为门窗洞口增添了丰富的细节和韵律感。在一些建筑中，甚至可以看到多层砖券叠加，形成富有层次感的入口，彰显了主人的身份与财富，是力学与美学精妙结合的典范。

三、楼板与地面的砖石构造

在闽南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中，楼板与地面的构造不仅要解决承重问题，更要重点考虑防潮与排水。匠人们利用砖石材料的特性，发展出一系列精巧的构造方法，以确保居住空间的干爽、舒适与耐用，体现了对地域气候的深刻洞察和适应。

（一）砖拱与密肋砖墙在小跨度楼板中的应用

在传统的木构楼板之外，闽南地区还存在一种独特的砖石楼板构造技术，即利用砖拱和密肋砖墙来承托楼板。这种技术常见于一些小跨度的空间，如廊道或次要房间。其做法是在两片承重墙之间，用红砖砌筑出多个间距很小的平行砖拱，形成类似肋骨的排列。这些砖拱的起脚直接落在墙体上，或由墙体上挑出的砖垛支撑。

在这些密肋砖拱之上，再满铺一层或多层红砖，并用灰浆填实缝隙，便构成了一片坚固的砖石楼板。这种结构形式充分利用了砖的抗压性能，将楼板的荷载通过拱形传递到两侧墙体，具有很好的承重能力和防火性能。虽然施工相对复杂，但在木材稀缺或有特殊防火要求的场合，这种纯砖石的楼板系统展现了工匠们在结构创新上的非凡才能和对材料性能的极致运用。

（二）“红砖埕”的铺设工艺与排水设计

“埕”是闽南传统民居中位于大厝前或天井内的开阔硬质铺地，它既是家族举行仪式、晾晒谷物、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建筑整体排水系统的关键一环。

“红砖埕”顾名思义，即是用红砖铺设的庭院。铺设工艺十分讲究，匠人会先将地面夯实，铺设碎石、砂土等基层，再将红砖以人字形、席纹形、龟背纹等多种吉祥美观的图案进行铺砌。

排水设计是“红砖埕”的灵魂所在。整个埕的地面会设计出不易察觉的微小坡度，将雨水引导至特定的排水口或排水沟。在铺设红砖时，砖与砖之间会留有

一定的缝隙，或在砖下预设盲沟，让部分雨水能够快速渗入地下，减轻地表径流的压力。埕的边缘通常会设置明沟或暗沟，与建筑的整个排水系统相连，确保暴雨时节雨水能够被迅速、有效地排出，避免积水倒灌入室内，保障了建筑的安全与居住的舒适。

（三）室内外地面的防潮处理

地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区的闽南，空气湿度大，地面防潮是建筑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闽南匠人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潮处理方法。通过抬高建筑的石基，将木构架和室内地面与潮湿的土地进行物理隔离，这是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防潮措施。

在室内地面的处理上，广泛使用一种被称为“三合土”的材料。它由石灰、细砂和黏土按一定比例混合，并加入少量水后充分拌合、分层夯实而成。三合土硬化后强度高、板结性好，并具有一定的憎水性，能有效隔绝从地下蒸发的水汽。在三合土垫层之上，再铺设红砖或地砖，砖块本身的多孔性也有助于吸收和调节室内湿度。室外地面则通过精心的排水设计和坡度处理，确保雨水不滞留，从源头上减少了地面的潮湿隐患。

第三节 装饰工艺与特色技法

闽南建筑的装饰艺术，是其精神内涵与审美情趣的外化表现。它将精湛的传统技艺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融为一体，共同成就了这一场华丽而生动的建筑盛宴。从砖石的砌筑到雕刻的点缀，从屋脊的塑造到墙面的彩绘，处处流淌着工匠们登峰造极的巧思与匠心。

一、红砖本身的砌筑装饰

在闽南，红砖不仅是最基础的结构材料，更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装饰语言。工匠们凭借对材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砌筑技艺，让原本朴素的砖块在墙面上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构成了闽南建筑最基础也最动人的视觉符号，真正展现了“无雕不成屋”的营造理念。

（一）拼花砌法与墙面纹理设计

闽南匠人深谙红砖砌筑的艺术，他们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创造出丰富多样

的墙面肌理与装饰图案。其中，“出砖入石”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砌法，它将破碎的红砖与形状各异的石块交错堆叠，形成红白相间、错落有致的墙体。这种技法据说源于明代大地震后对废料的巧妙利用，无意间创造出一种粗犷而又充满韵律感的美学形态。这种砌法不仅坚固耐用，其独特的视觉效果也成为闽南建筑最具辨识度的标志之一。

除了“出砖入石”，匠人们还利用红砖的规格和铺贴方式，创造出“人字形”“工字形”“万字纹”等多种拼花图案。例如，在墙体的不同部位，会使用“五花头”“四花头”等特定规格的砖块，以实现不同的视觉效果与结构需求。六角形的砖块铺地，寓意龟背锦，象征长寿绵延；古钱币形的拼花则代表富贵吉祥。这些拼花技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墙面的视觉层次和纹理质感，更将吉祥寓意和审美情趣融入建筑的每一个细节，使红砖墙本身就成为一幅精美的画卷，充满了含蓄而优雅的造型之美。

（二）磨砖对缝的精细工艺

磨砖对缝是闽南建筑中一项要求极高的精细工艺，常见于官式大厝或祠堂庙宇的重要立面。此项工艺要求工匠对每一块红砖进行精细的打磨加工，使其尺寸、棱角达到近乎完美的统一。砌筑时，砖与砖之间的缝隙被严格控制在毫米级别，细如丝线，有时甚至需要用纸张插入来测试其精密度。为了达到最佳效果，砌筑所用的黏合剂也经过特殊调配，通常是使用细腻的糯米灰或特制泥浆，保证其强度与稳定性。这种工艺砌筑出的墙面平整如镜，浑然一体，砖缝细密到几乎不可见，让建筑立面显得平整如镜，庄重典雅。它不仅是对匠人技艺的极致考验，更是对耐心与专注的磨砺。一面精美的磨砖对缝墙体，所耗费的人力与时间成本是巨大的，它无声地彰显着屋主人的财力、地位以及对建筑品质的至高追求。

（三）砖雕的技法与题材分类

当红砖的砌筑艺术达到一定高度后，在其上进行雕刻便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和华丽的装饰手段。闽南砖雕以当地盛产的红砖为材料，这在以青砖雕刻为主的中国砖雕流派中独树一帜。匠人们化刀为笔，在坚硬的砖面上刻画出繁复而生动的世界，其质感古朴大气，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砖雕的技法多样，主要以浮雕为主，结合线雕、透雕等多种手法。

1. 浮雕：这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通过剔除背景，使图案凸显于砖面，根据凸起高度不同，又可分为高浮雕和浅浮雕，用于表现富有层次感的人物和场景。

2. 透雕：在浮雕的基础上，将背景部分完全镂空，形成玲珑剔透的视觉效果，常用于表现花窗、栏杆等部位，光影穿梭其间，别有韵味。

3. 线刻：以阴刻线条勾勒形象，手法简练，如同在砖上作画，多用于辅助装饰或表现细节。

砖雕的题材包罗万象，充满了吉祥寓意与人文色彩。常见的有花鸟鱼虫、祥瑞猛兽，如蝙蝠取“福”之谐音，仙鹤与鹿象征“鹤鹿同春”，麒麟、凤凰则代表祥瑞。与此同时，大量的作品取材于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八仙过海”“三国演义”中的经典场景，以及体现儒家伦理的“二十四孝”故事等。这些题材不仅为建筑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也使其成为承载文化、传递价值的叙事载体，让冰冷的砖石充满了温度与情感。

二、砖雕、石雕、木雕的“三雕”结合

闽南建筑的装饰艺术并非单一元素的堆砌，而是多种材质与工艺的有机融合，其中尤以砖、石、木“三雕”的结合最为引人瞩目。闽南建筑“三雕”的装饰元素对比可见下表，它们根据不同材质的特性及其在建筑结构中的位置，各司其职又相互辉映，共同营造出繁丽华美、主次分明的综合装饰效果，真正践行了“无雕不成屋，有刻斯为贵”的传统理念。

（一）门楣、墀头等部位的砖雕艺术

砖雕因其材质相对石材更易雕琢，且色泽温暖，多被运用于建筑中较为显眼但不受重压的装饰性部位。门楣和门罩是砖雕艺术的绝佳展示平台，匠人们在此处施展才华，创作出层次丰富的浮雕作品，题材多为“天官赐福”“加冠进爵”等吉祥主题，为门面增添了无尽的光彩。大型官式民居入口内凹形成的“凹寿”空间，其两侧的“对看堵”墙面更是砖雕的精华所在，常常雕刻着整幅的历史故事或寓意祥瑞的图案，与石雕的墙裙形成一刚一柔、一暖一冷的和谐对比。墀头，即山墙顶部突出于屋面的部分，也是砖雕的重要阵地。此处的砖雕常以瑞兽、卷草等造型出现，不仅美化了建筑轮廓线，也寄托了镇宅辟邪的美好愿望。聪明的匠人甚至会在雕刻的凹陷处填上白灰，利用红白对比增强视觉冲击力，使砖雕远观如同精美的剪纸艺术。

（二）柱础、墙裙的石雕装饰

石材质地坚硬，耐风雨侵蚀，因此多用于建筑的基座和承重部分，承担着结

构稳固与装饰的双重任务。柱础作为木柱与地面之间的过渡构件，是石雕艺术的集中体现。它不仅能有效防止地面湿气对木柱的侵蚀，其本身更是精美的艺术品。柱础的造型丰富多样，有圆形、方形、瓜棱形等，其上常雕刻着狮子、莲花、卷草、瓜果等立体或浮雕图案，每一件都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如狮子镇宅，瓜果象征多子多福。墙裙，即墙体下半部分，通常采用更为坚固的石材砌筑，以保护墙身。这部分的石雕多采用平雕、浮雕等技法，雕刻出几何纹样、博古图以及记录家族荣耀的铭文。闽南地区盛产的青石与白石被广泛运用，二者搭配使用，青石细腻适合精雕，白石坚实质朴用作基底，共同构成了建筑稳重、典雅的底色，与上部的红砖墙体形成了鲜明的色彩与质感对比。

（三）梁架、斗拱的木雕工艺

木雕是“三雕”之中最为精细和繁华的部分，主要集中于室内的梁架、斗拱、雀替、吊筒等木构件上。因为处于室内，得以免受风雨侵袭，匠人可以尽情施展其鬼斧神工的技艺。闽南建筑的梁架不仅是承重结构，更是木雕艺术的集大成者。匠人运用圆雕、透雕、浮雕等多种技法，在梁枋之上雕刻出层层叠叠的人物故事、戏曲场景，如“水浒传”“封神演义”中的情节，人物众多，场面宏大，令人叹为观止。斗拱和雀替这些原本出于结构需要的构件，也被赋予了极高的装饰性。斗拱被雕刻成仙女飞天、瑞兽麒麟的形象，雀替则化为翱翔的凤凰或精美的花篮。吊筒，也称垂花，是悬于廊下的短柱，其末端通常被雕刻成盛开的莲花、精致的宫灯或是含苞待放的花蕾，造型玲珑，极富装饰趣味。为了追求富丽堂皇的效果，这些木雕构件在完成后，还会进行彩绘和贴金，使其在殿堂的幽暗光线下熠熠生辉，营造出一种庄严而华贵的空间氛围，充分体现了闽南建筑“雕梁画栋”的奢华之美。

三、泥塑、彩画与剪瓷的点缀

在完成了砖、石、木的结构性装饰之后，泥塑、彩画与剪瓷便如同为建筑披上的华美外衣。它们以绚烂的色彩和灵动的造型，为庄重的红砖建筑增添了无尽的生命力与神采。这些点缀性的装饰工艺，共同将闽南建筑的艺术表现力推向了极致。

（一）屋脊上的剪瓷雕工艺

剪瓷雕，又称“剪黏”，是闽南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一门绝技，堪称凝固在

屋顶上的华丽戏剧。此工艺的出现与闽南发达的陶瓷业及海洋气候密切相关。匠人们选用各种色彩鲜艳的瓷碗、瓷盘，甚至是残损的瓷器作为材料，用特制的钳子将其剪裁、敲击、打磨成大小不一的细小瓷片。随后，以这些瓷片为“颜料”，一片片粘贴在预先用铁丝、竹篾做骨，再以混合了红糖浆和麻丝的灰泥塑成的造型胚体上。这种特殊的粘合剂黏性极强，能抵御长年的日晒雨淋和海风侵蚀。

剪瓷雕的成品色彩饱满，光彩夺目，且永不褪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极具视觉冲击力。它主要装饰于寺庙宫观的屋脊、翘角和水车堵等处。屋脊中央常饰以双龙戏珠或双凤朝阳，龙鳞凤羽皆由瓷片细密拼贴而成，栩栩如生；垂脊和戗脊之上，则上演着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演义和民间故事，如“三国演义”的战争场面或“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人物众多，造型生动，立体感十足。这种独特的工艺不仅体现了匠人变废为宝的智慧，更将建筑的屋顶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充满了浓烈的地方色彩与戏剧张力。

（二）墙面、梁枋的彩画装饰

如果说剪瓷雕是屋顶的璀璨焦点，那么彩画则是墙面与梁枋间的柔美诗篇。闽南建筑的彩画色彩绚丽，尤其在清末以后，受富裕侨商审美趣味的影响，大量使用金色，显得尤为金碧辉煌。彩画主要装饰于内檐的梁、檩、门板以及外墙的水车堵等处。匠人使用矿物质颜料，以青、绿、蓝等冷色调与梁架本身的红、黑色彩形成对比。在技法上，常采用“退晕”或“叠晕”的手法，即色彩由深到浅逐层过渡，产生柔和的渐变效果，闽南匠人称之为“化色”。彩画的题材广泛，除了传统的锦纹、卷草纹，还大量绘制山水风景、文人雅士、花鸟鱼虫等图案，这些被称为“包巾画”的装饰，为原本庄重的建筑增添了一抹清新雅致的书卷气。

（三）泥塑神龛与人物故事

泥塑作为一种可塑性极强的装饰手法，在闽南建筑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主要应用于塑造屋脊上的大型胚体（作为剪瓷雕的基础）、墙面的装饰性浮雕，以及室内庄重的神龛。尤其在水车堵这一位于屋檐下的水平装饰带，泥塑与灰塑彩绘常常结合使用，塑造出各种花鸟虫鱼、亭台楼阁与人物故事，内容丰富，华丽美观。

室内的神龛是泥塑艺术的另一集中体现。匠人们用泥土塑造出雕梁画栋般的神龛结构，再辅以彩绘和贴金，使其显得神圣而庄严。神龛内外，常常塑造着各种护法神将或吉祥瑞兽，形象威武，栩栩如生。在一些祠堂或庙宇的壁画中，泥

塑也被用来创作半立体的“看堵”，生动地演绎着“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教化人心的伦理故事，或“陈三五娘”等本地流传的爱情传说，使建筑空间充满了叙事性，成为固化的戏台，向世人讲述着地方的历史、信仰与价值观。

第四节 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是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与本土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其独特的红砖美学与精湛工艺，不仅塑造了闽南地域的独特风貌，更成为维系全球闽南人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本节将深入探讨这项技艺的传承体系、当代挑战与创新路径。

一、工匠传承体系与行会组织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闽南传统建筑工艺围绕工匠群体，形成了一套严谨有序、分工明确的传承体系与社会组织形式，确保了高超技艺的代代延续和发展，共同支撑起宏伟壮丽的红砖建筑世界。

（一）师徒传承制与口决心法

闽南建筑工艺的传承主要依赖于严格的师徒传承制度。这种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传承关系，往往将营造技艺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家族或村落之中。师傅通过言传身教，将数十年的经验与技艺倾囊相授给徒弟。学徒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模仿与实践，从备料、加工等基础工作做起，逐步掌握核心技术。这个过程往往历时数年甚至十数年，考验着学徒的耐心、悟性与忠诚。

除了手把手的教导，口决心法是传承中的另一重要环节。这些口诀是历代工匠经验的智慧结晶，将复杂的结构计算、尺寸比例、施工要点等浓缩为朗朗上口的语句。例如，关于梁架结构的搭建、屋顶曲线的起翘，都有相应的口诀作为施工指导。特别是被称为“掌篙尺”的总设计师，更是凭借经验和刻有特殊记号的篙尺来控制建筑的整体布局与关键尺寸，这些不立文字的“心法”是技艺传承的灵魂所在，它们确保了建筑风格与核心技术的稳定延续与纯粹。

这种非标准化的传承方式，一方面保证了技艺的纯粹性与独特性，使得每一个工匠团队都可能拥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另一方面，也使得技艺带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与神秘感。在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授不仅是技术的交接，更是一种信任与

责任的托付，徒弟出师后，也将肩负起将这门手艺继续发扬光大的使命。

（二）“大木匠”、“小木匠”与“砖瓦匠”的分工

闽南传统建筑的营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同工种的匠人紧密协作，其中以“大木匠”、“小木匠”与“砖瓦匠”的分工最为核心和典型。这种精细化的分工体系，确保了建筑在结构、功能与装饰等各个层面的高品质呈现，体现了传统营造活动的高度专业化与协作精神。这三种核心工匠的职责分工，详见下方的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工种核心职责表所示。

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工种核心职责表

工种	核心职责	主要技艺体现	关键词
大木匠（总设计师）	结构设计、选址、布局规划、梁架搭建	榫卯结构、定磉立柱、藻井结构	结构、规制、稳固
小木匠（精作匠）	内部装饰、精细木作的制作与安装	浮雕、透雕、圆雕、门窗、神龛	艺术性、雕刻、美学
砖瓦匠（砌筑匠）	墙体砌筑、屋面铺设、屋脊装饰	出砖入石、红砖砌法、燕尾脊、马鞍脊	砌筑、立面、防水

“大木匠”是整个营造活动的总负责人与技术核心，相当于现代建筑的总设计师和结构工程师。他们负责前期的选址勘察、绘制图纸、确定建筑的整体布局、开间尺寸和梁架结构。尤其在“定磉立柱”和上梁等关键环节，大木匠必须亲临现场指导，确保建筑的结构稳固与规制严谨。他们掌握着营造的核心秘密，如“蜘蛛结网”式的藻井结构，这项复杂的穹顶技术至今仍是衡量大木匠技艺高低的重要标准。

“小木匠”则专注于建筑的内部装饰与精细木作部分。他们负责雕花门窗、雀替、挂落、神龛以及室内家具的制作与安装。小木匠的工作更多体现了建筑的艺术性与审美价值，他们运用浮雕、透雕、圆雕等多种技法，在木材上创造出繁复精美的图案，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与吉祥如意，为建筑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砖瓦匠”主要负责墙体的砌筑与屋顶的铺设。闽南建筑中极具特色的“出砖入石”墙体、红砖的各种砌筑方式，以及燕尾脊、马鞍脊等优美的屋顶曲线，都出自砖瓦匠之手。他们不仅要保证墙体的坚固和屋面的防水，还要通过对砖、石、瓦等材料的巧妙运用，创造出富有韵律感和装饰性的立面效果，让冰冷的建材充满生命力。

（三）工匠群体的社会地位与流动

在传统社会中，闽南建筑工匠群体凭借其专业技艺，享有相对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掌握着复杂知识和高超技艺的“艺术家”。一个技艺精湛的匠师，尤其是能够主持大型祠堂或庙宇营造的“大木匠”，往往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甚至被誉为“大匠”、“师傅”，其声望可以跨越地域，影响广泛。

历史上，闽南工匠的组织形式多为临时的、以项目为基础的组合。一个大型工程通常由一位掌场的大木匠牵头，再根据工程需要，临时招募各个工种的匠人。这种非固定的组合模式，使得工匠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他们或以家族为单位，或以师徒为纽带，在闽南各地乃至更广阔区域内流动，承接营造工程。这种流动不仅是为了谋生，也极大地促进了营造技艺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融合，使得闽南建筑在保持整体风格统一的同时，又在细节上呈现出丰富的地域变体。

随着明清时期海上贸易的繁荣，大量闽南人迁徙至台湾及东南亚地区，随之而去的建筑工匠们也将闽南的营造技艺带到了海外。他们在异国他乡建造起一座座熟悉的家庙、会馆和宅院，这些建筑不仅解决了实际的居住和祭祀需求，更成为海外侨胞维系乡情、认祖归宗的精神寄托。蒋钦全等当代匠师，更是将业务拓展至东南亚乃至中东地区，让红砖建筑的魅力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二、当代传承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口传心授和手工建造为核心的闽南传统建筑工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老一辈工匠的技艺无法完全有效传递，传统材料与工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这些严峻的现实共同构成了当代传承的深重困境。

（一）老工匠的凋零与后继无人

传统建筑工艺的传承，核心在于人的延续。目前，全面掌握“掌篙尺”设计、大木作结构、精细雕刻等全套技艺的老师傅已是凤毛麟角，他们普遍年事已高。这些身怀绝技的匠人一旦离世，他们毕生积累的经验和那些只可意会的“心法”便可能随之消逝，从而造成技艺的永久性断裂。许多复杂的传统技艺，如榫卯结构的精密计算、特殊装饰的制作工艺等，正面临失传的危险。

与此同时，年轻人对投身这项“苦活、累活”普遍缺乏兴趣。传统工匠的培

养周期漫长，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艰苦学习才能出师，且早期收入微薄。相比之下，现代建筑行业提供了更多轻松且收入可观的就业岗位。社会观念的转变也使得“工匠”职业的吸引力下降。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导致了技艺传承链条的严重断层。

培养体系的缺失加剧了这一困境。传统的师徒制在现代社会面临瓦解，而新的职业教育体系尚未能有效衔接。学校教育偏重理论，缺乏长期实践的平台；而工地上的学习又不成系统。这使得有志于学习传统技艺的年轻人，也常常感到无从入手或难以坚持。人才的断层是当前最为严峻的挑战，它直接威胁到闽南传统建筑工艺的生存根基。没有了合格的传承者，再宏伟的理论、再精美的图纸，也无法转化为真实的建筑实体，这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最终沦为博物馆里的记忆。

（二）现代建筑材料的冲击

现代建筑业带来了大量标准化、低成本的新型材料，如钢筋混凝土、预制板、铝合金和玻璃幕墙等，它们对传统建筑材料构成了巨大冲击。这些现代材料在生产效率、结构强度和防火性能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迅速占领了主流建筑市场。

传统材料如红砖、石材、木材的生产和使用，因其天然属性和加工的复杂性，逐渐式微。例如，传统手工烧制的烟炙砖，因其独特的色泽和质感而备受青睐，但烧制过程不仅耗时，还对匠人的经验有极高要求，产量远不及机器压制的标准砖。同样，优质的福杉等大径级木材资源日益稀缺，价格高昂，限制了其在新建建筑中的广泛应用。

材料的替代直接导致了相应工艺的边缘化。当墙体普遍采用混凝土浇筑时，砖石匠人精湛的“出砖入石”砌筑技艺便无用武之地；当梁柱结构被钢结构取代时，大木匠的榫卯技艺也随之变得多余。这种冲击是根本性的，它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外观，更从结构和建造方式上颠覆了传统营造体系。最终，现代材料以其经济、高效的优势，深刻地改变了大众的建筑审美与消费习惯。人们逐渐习惯了现代建筑的简洁与快速，而对需要精雕细琢、蕴含丰富文化信息的传统建筑及其材料，反而可能产生“过时”、“繁琐”的印象，这从文化心理层面进一步压缩了传统工艺的生存空间。

（三）传统建造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

与现代建筑的快速高效相比，传统营造技艺的“慢工出细活”特质在当今追

求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格格不入。一座精美的闽南大厝，从备料、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整个过程涉及大量的手工操作，如木材的干燥与加工、石料的雕琢、砖瓦的砌筑与装饰等，每一个环节都无法大幅压缩时间。

高昂的成本是另一大制约因素。这部分成本主要由三方面构成：首先是优质传统材料的成本，大径级木材、手工砖石等价格不菲；其次是高昂的人工成本，技艺精湛的匠师薪酬远高于普通建筑工人，且整个建造过程需要大量人工投入。

这种长周期、高成本的特性，使得传统建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选择传统工艺建房意味着需要承担远超现代住宅的经济压力和时间成本。对于商业开发项目，漫长的建设周期和高额投入则意味着更慢的资金周转和更低的利润率，这使得开发商普遍缺乏投资建造传统风格建筑的动力。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传统营造技艺的需求被大大压缩，主要局限于少数文物修缮、文化旅游项目或个别富裕人家的怀旧式建造，难以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市场，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工匠群体的萎缩和技艺的边缘化。

三、传统工艺的现代创新路径

面对传承困境，闽南建筑工艺并非只能走向消亡。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与设计理念，传统工艺正积极探索与时代共生的创新路径，通过数字化记录、技术融合与设计转译，力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光彩，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数字化记录与三维建模

面对老工匠凋零和技艺失传的风险，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传统工艺进行抢救性记录和系统性整理，是当前最为紧迫和有效的手段之一。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倾斜摄影和高精度数字测绘，可以为现存的优秀闽南古建筑建立起毫米级的“数字档案”。这种档案不仅完整记录了建筑的外观形态、空间结构，更能精确捕捉到斗拱、雀替、雕花等复杂构件的细节尺寸与纹理信息。

这些高精度的三维模型为古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研究人员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对建筑进行任意角度的观察、剖切和分析，深入理解其榫卯结构、砌筑方式和构造智慧。在修复工程中，这些模型能够为损毁构件的精准复原提供科学依据，改变了过去单凭经验修复的模糊状况。同时，基于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还可以将历史文献、工艺流程、材料信息等非物质文化数据与三维模型相关联，构建一个立体的、可交互的营造技艺知识库，为技艺的教学与传播提

供数字化教材。

（二）传统材料与现代结构技术的结合

为了解决传统建筑在结构安全、居住舒适性及成本控制等方面的短板，将传统材料与现代结构技术相结合，成为一条极具潜力的创新路径。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材料替换，而是在尊重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实现优势互补的“内现代，外传统”的融合模式。

1. 在结构层面，可以在保留传统木构架美学特征的同时，在关键节点或隐藏部分采用钢结构或碳纤维材料进行加固，提升建筑的抗震性能和跨度能力，同时减少对大径级木材的依赖。

2. 在墙体方面，可以在保持红砖、石材立面外观的同时，内部采用现代保温、隔音、防水材料构成复合墙体，大幅提升建筑的物理性能和居住舒适度，满足现代节能建筑标准。

3. 对于地基和屋面等关键部分，可以采用现代混凝土技术和新型防水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建筑常见的沉降和渗漏问题，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通过这种技术上的融合创新，既保留了闽南建筑标志性的红砖、燕尾脊等视觉元素和文化符号，又使其在安全性、舒适度和经济性上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为传统工艺的应用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工艺元素的提炼与现代设计转译

让传统工艺真正“活”在当下，关键在于将其从单纯的复古复制中解放出来，通过现代设计语言进行转译，使其融入当代生活空间。这要求设计师深入理解闽南建筑文化的核心精神，而非简单地复制“燕尾脊”、“马鞍墙”等具象符号。

这种转译体现在多个层面。在建筑层面，可以将传统院落的组织方式、空间序列的节奏感等抽象原则，应用于现代住宅、酒店或公共建筑的设计中，营造出既有传统意境又符合现代功能的空间体验。在装饰层面，可以将繁复的木雕、砖雕、剪瓷雕图案进行简化、重构，提炼为现代的几何纹样或装饰元素，应用于墙面、地铺、家具甚至文创产品上，使其以新的面貌进入日常生活。在材料应用上，红砖、花岗岩等传统材料，可以通过新的切割、组合与建构方式，与玻璃、钢材等现代材料并置，产生强烈的视觉对比与对话，创造出富有时代感的建筑表情。这种基于文化理解的现代转译，既是对传统精髓的深切致敬，也是面向未来的大胆创造，它使得闽南建筑工艺的文化基因得以在新的载体上持续延续和蓬勃生长。

第三章 闽南红砖建筑的类型与特征

闽南建筑群落，宛如一部由温润红砖篆刻而成的历史长卷。它凭借其多样化的类型和独树一帜的特征，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占据了瑰丽而独特的篇章。从规整威严的官式大厝，到聚族而居的土楼土堡，再到千姿百态的普通民居，红砖以多样的姿态融入其中，讲述着闽南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

第一节 民居建筑的红砖特色

在闽南，红砖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建筑材料，它更是一种深植人心的文化符号。红砖深刻地烙印在各式民居建筑的肌理之中，无论是气势恢宏的“皇宫起”，还是坚实厚重的土楼，抑或是小巧灵活的“竹竿厝”，红砖都以其温润的色泽和多变的形式，赋予建筑独特的生命力与艺术美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

一、官式大厝（“皇宫起”）的规制

官式大厝，俗称“皇宫起”，是闽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居形式。它形似殿宇，富丽堂皇，其建造遵循着一套极其严谨的规制，从建筑的规模、布局到细节设计，无不体现着传统宗法礼制与家族观念的深刻影响，是闽南红砖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

（一）严格的等级制度与规模限制

官式大厝的建造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伦理纲常的规范，必须严格遵循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体现在建筑的方方面面，从屋顶的样式、屋脊的装饰，到建筑的开间数量和整体规模，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例如，屋脊两端高高翘起的“燕尾脊”，在传统礼制中通常为寺庙或有功名的官宦之家所专用，寻常百姓不可僭越使用。建筑的“开间”（即两根主承重柱之间的距离）数量，通常为三、五、七、九等单数，间数越多，代表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这种将社会秩序和伦理纲常直

观地体现在建筑形态上的做法，使得每一座官式大厝都成为其家族社会地位的直观展现。

虽然理论上存在严格的法令限制，但闽南地区自古“山高皇帝远”，加之海洋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使得许多富商巨贾在家乡兴建豪宅时，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突破规制，以彰显家族的荣耀与财富。他们不仅大量使用象征着尊贵与喜庆的红砖红瓦，甚至在装饰的精美程度上极尽奢华，出现了“官署与缙绅的房屋难以分辨”的现象。这种在遵循与逾越之间的微妙平衡，恰恰反映了闽南人务实、敢于变通的文化性格，也造就了官式大厝既有中原建筑的严整规矩，又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独特风貌。

（二）“三进”、“五进”院落的布局模式

官式大厝在平面布局上，深受中原地区四合院建筑的影响，但又根据闽南湿热的气候与大家族聚居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改良和发展，形成了以“进”为单位、层层递进的院落组合模式。所谓“进”，指的是由前后厅堂与两侧厢房围合而成的院落单元。常见的官式大厝为“三进两落”或“五进二落”的格局，整体建筑群沿一条中轴线纵向展开，布局对称、规整有序。

第一进通常为门厅和前院，是宅院的入口和对外区域。穿过门厅，经由天井和两侧廊道，便进入第二进院落，这里是宅院的核心，正中央为宽敞明亮的正厅（或称中堂），用于举行家族祭祀、接待重要宾客等公共活动。正厅两侧为厢房，供长辈或家中主要成员居住。若为“五进”大厝，则在正厅之后还设有后堂、后罩房等，形成第三、四、五进院落，作为女眷或晚辈的私密生活空间，体现了“前堂后寝”和内外有别的传统居住观念。这种多进深的院落布局，不仅有效地组织了庞大家族的内部生活秩序，也通过空间的序列感和层次感，营造出一种庄重、深邃的家族氛围。

（三）“光厅暗房”的采光设计

“光厅暗房”是闽南传统民居，尤其是官式大厝中一项极具智慧的采光与空间设计原则。它指的是公共活动空间（厅堂）要追求开敞明亮，而私人居住空间（房间）则相对幽暗私密。这一设计理念既根植于家族生活的实际需求，也蕴含着深刻的传统文化思想。厅堂作为家族祭祀、议事和接待宾客的场所，需要充足的光线和良好的通风，以营造一个庄重、开阔的公共氛围。为此，厅堂通常不设前墙，直接面向天井，最大限度地引入自然光线。

与厅堂的“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间的“暗”。卧室作为家庭成员休息和起居的私密空间，更强调安全感和静谧的氛围。因此，房间的窗户通常开得较小，位置也较高，避免了外界视线的干扰和夏日阳光的直接暴晒，从而在湿热的气候中保持室内的阴凉舒适。这种设计并非意味着房间完全没有采光，而是通过天井的漫射光和高窗的间接光，获得一种柔和、安宁的光环境。这种“光厅暗房”的设计，巧妙地平衡了建筑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开放与围合的关系，充分展示了闽南工匠对光线、通风以及居住舒适度的独到理解和高超技艺。

二、土楼与土堡中的红砖应用

在闽南连绵的群山之中，除了广为人知的红砖大厝，还矗立着一种以夯土为主要材料的大型聚居建筑——土楼与土堡。这些厚重敦实的建筑以其独特的防御功能和聚族而居的形态闻名于世。尽管主体为土，但红砖在其间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坚实的土墙增添了一抹亮色与精致。

（一）大型夯土民居中的红砖点缀与加固

福建土楼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类型，其墙体主要由生土、砂、石灰等混合材料夯筑而成，厚重坚实，具有极佳的防御性能。然而，在这些看似朴拙的土墙之上，红砖的运用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工匠们常在土楼的大门门楼、顶层屋檐下方的墙身、窗框以及内部院落的墙体上，使用红砖进行装饰性砌筑。这些红砖或被砌成各种几何图案，或与青砖、石材搭配使用，形成色彩与质感上的鲜明对比，极大地丰富了土楼的建筑外观，使其在雄浑壮阔之中不失精致秀美。

除了装饰作用，红砖在土楼中也承担着重要的结构加固功能。在门窗洞口等结构薄弱之处，使用红砖砌筑可以有效地增强其稳定性和承重能力。尤其是在一些大型土楼的顶层，采用红砖砌筑女儿墙或屋檐，不仅能够减轻土墙顶部的压力，还能更好地抵御风雨的侵蚀。红砖与厚重土墙的结合，体现了材料性能的互补与建筑智慧的巧妙运用，使得这些大型夯土民居既坚固实用，又充满了艺术美感。

（二）砖石结合的防御性构造

土楼与土堡的建造首要考虑的是防御功能，以抵御匪盗和械斗的侵扰。在这种需求的驱动下，砖石结合的构造方式被广泛应用。

1. 墙体基座 是防御的根本。为了防止敌人挖掘墙角或用火攻，土楼的墙基通常会用大块的花岗岩条石垒砌至一两米高。石材坚硬、耐火、防潮的特性，为

整个土楼提供了稳固的基座。在石基之上，再进行厚实的夯土墙体施工，形成下石上土的坚固壁垒。

2. 红砖 则更多地应用于防御的细部构造中。例如，在墙体顶端的射击孔（銃眼）周围，常常用红砖砌筑，以保证射击孔的规整和耐用。在一些重要的防御节点，如门楼两侧或角楼，也会采用砖石混砌的方式来增强结构强度。这种砖、石、土三种材料的有机结合，各取其长，共同构筑了土楼与土堡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是古代乡土社会“被动式防御”建筑思想的集中体现。

（三）单元式住宅的红砖分隔墙

土楼内部的居住空间呈现出高度的均质化和单元化特征。整个土楼由数十乃至数百个大小相近的垂直单元组成，每个单元从底层到顶层为一个独立的家庭居住，这种布局体现了客家与闽南宗族社会平等、内敛的组织原则。在这些单元式住宅的内部，红砖被广泛用于建造分隔墙，即“隔扇”。这些砖墙将每一个独立的居住单元清晰地划分开来，保证了各家各户的私密性。

相较于木质隔板，红砖墙具有更好的防火和隔音效果，这对于高密度聚居的土楼来说至关重要。一旦某一单元发生火灾，砖墙可以有效地阻止火势蔓延，为整个土楼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砖墙的隔音性能也为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创造了相对安静的居住环境，减少了邻里之间的相互干扰。

这些红砖分隔墙的砌筑工艺同样讲究，有时会采用空斗墙的做法，即用砖侧立或平卧砌成中空的墙体，既节省了材料，又增加了墙体的隔热保温性能。通过在内部空间中对红砖的巧妙运用，土楼在满足家族聚居和统一防御的大前提下，也兼顾了家庭单元的独立性与居住的舒适性，展现了高超的建筑组织与构造智慧。

闽南红砖建筑主要类型特征对比表

	官式大厝（皇宫起）	土楼 / 土堡	普通民居（竹竿厝 / 三间张）
主要功能	宗法礼制，显赫身份	聚族而居，防御避险	日常生活，经济实用
主体材料	红砖红瓦，木材，石材	夯土，石材	红砖，石材，少量木材
布局特征	多进深院落（三、五进），严格中轴对称	环形 / 方形 / 五凤楼，单元化垂直居住	一厅二房，面窄进深长（竹竿厝），灵活扩展
红砖应用	承重主体，立面装饰，燕尾脊	门楼、窗框、顶层女儿墙点缀与加固	墙体承重，分隔墙，出砖入石（装饰）
文化体现	等级制度，宗族荣耀	内部平等，集体防御	务实灵活，因地制宜

三、普通民居的多样化形态

除了宏伟的官式大厝与雄奇的土楼，闽南广袤的土地上还散布着大量形态多样的普通民居。这些建筑或许没有那么显赫的规制和庞大的体量（如上表所列），但它们更加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其灵活的布局、朴实的材料和因地制宜的建造智慧，同样是闽南红砖建筑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动地展现了地域建筑的丰富性与适应性。

（一）“竹竿厝”等小型民居的砖砌方式

在闽南沿海的城镇和人口密集的区域，由于用地紧张，催生出一种名为“竹竿厝”的独特民居形态。“竹竿厝”的特点是面阔极窄而进深很长，如同竹竿一样细长，因此得名。这种建筑通常只有一到两个开间的宽度，却有多进深的院落，通过狭长的天井来解决内部的采光和通风问题。在“竹竿厝”的建造中，红砖是最主要的墙体材料。其砌筑方式灵活多样，常见的有一顺一丁、梅花丁等砌法，通过砖块的不同排列组合，在朴素的墙面上形成富有韵律变化的肌理。

由于“竹竿厝”两侧都与邻居的房屋紧密相连，其山墙（侧墙）往往成为共用墙体，砌筑时尤为关键。工匠们会采用实心砖墙以保证隔音和防火性能。墙面的砌筑也并非一味平直，有时会采用著名的“出砖入石”技艺，将红砖与白色石块不规则地交错砌筑，既利用了当地丰富的石材，又形成了红白相间、错落有致的独特墙面效果，为狭窄的街巷增添了丰富的视觉趣味。

这种小型民居的砖砌方式，充分体现了闽南工匠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精湛的技艺和对材料的深刻理解，创造出既经济实用又兼具美学价值的建筑作品的能力。它反映了高密度人居环境下民众的生存智慧，是城市肌理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二）“一厅二房”、“三间张”的基本单元

对于大多数普通闽南家庭而言，“一厅二房”或“三间张”是构成其住宅最核心、最基本的空间单元。“三间张”即面阔为三开间的住宅，是闽南民居中最常见的形制。其布局通常以中轴线对称，中央一间为厅堂，是家庭的核心公共空间，用于供奉祖先、接待亲友。厅堂两侧各设一个房间，即为“一厅二房”，是家庭成员的主要居住空间。这种布局清晰地划分了公共与私密区域，体现了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

红砖在构建这种基本单元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作为承重墙体，还是作为厅堂与房间之间的隔断，红砖都以其标准化的模块和便捷的砌筑方式，为快速、经济地建造房屋提供了可能。在许多普通民居中，房屋的前墙和侧墙会采用红砖与石材混砌，以增强结构的稳固性和抵御风雨侵蚀的能力。而内部隔墙则可能使用较为经济的空斗砖墙或土坯墙。这种基本单元可以根据家庭人口的增减和经济能力的变化，向纵深或横向（增加护厝）进行扩展，形成更为复杂的院落组合，具有很强的生长性和灵活性。

（三）因地制宜的建筑布局与材料使用

闽南地区地理环境多样，兼有沿海平原、台地和内陆山区。复杂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使得普通民居在建筑布局 and 材料使用上表现出显著的因地制宜特征。在沿海地区，气候湿热，台风频繁，民居建筑多注重通风防潮与抗风性能。建筑布局上倾向于采用开放的天井和通透的廊道，屋顶坡度较大，并以坚固的砖石结构为主。除了红砖，当地工匠还会利用海边唾手可得的牡蛎壳（蚵壳）砌墙，形成独特的“蚵壳厝”，这种墙体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

而在内陆山区，民居的选址则更多考虑防御和避险。村落常建于山坡之上，依山就势，建筑布局灵活，不强求严格的对称。在材料使用上，除了红砖，也会大量使用山石、木材和夯土，建筑形态更加朴实、厚重。例如，在一些山区，人们会用溪流中的卵石来砌筑墙基，上部再用红砖或土坯，这种做法既经济又稳固。这种对在地材料的充分认知和巧妙运用，不仅降低了建造成本，也使得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展现出一种朴素而和谐的乡土之美。这种因地制宜的建造传统，是闽南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生态智慧。

第二节 宗教建筑的红砖运用

闽南，这片拥有深厚海洋文化与独特民俗风情的土地，其宗教建筑不仅是信众精神的寄托，更是文化交融与匠艺传承的精妙体现。在红砖的底色之上，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都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信仰的独特形态。红砖在此不再仅仅是建筑材料，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跨文化对话的印记，构筑起一道道绚丽而庄严的风景线。

一、佛教寺庙的红砖风格

在素有“泉南佛国”之称的闽南，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鲜明独特，红砖的运用尤为引人注目。这种建筑不仅体现了佛教的庄严与神圣，更深度融合了闽南本地的文化元素与审美情趣，形成了既遵循传统规制又极富地方色彩的建筑语言，成为闽南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主体殿宇的红砖墙体与石柱

闽南佛教寺庙的主体殿宇，如大雄宝殿，常呈现出一种恢弘而独特的视觉效果，其关键在于“红砖墙”与“白石柱”的巧妙结合。建筑广泛采用当地盛产的红砖砌墙，色泽温润厚重，与白色花岗岩雕刻而成的龙柱、石窗、台基形成鲜明对比，色彩艳丽而不失庄重。这种被称为“出砖入石”的砌墙技艺，将大小不一的砖石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不仅坚固实用，更形成了一种富有韵律感和拙朴之美的墙体艺术。

这种结构形式深受闽南传统“皇宫起”大厝建筑风格的影响，将原本专用于宫殿或高等级建筑的红色，大胆地运用于宗教建筑之中，这深刻反映了闽南人敢于突破、包容开放的文化性格。殿宇的墙体之上，红砖常被组合成各种吉祥图案，如万字纹、龟背纹等，既是装饰，也寄托了美好的寓意。而雄伟的石柱上通常雕刻着精致的盘龙、花鸟、人物故事，与红砖墙面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闽南佛寺殿宇雄伟壮丽、神圣威严的独特风貌。

（二）钟鼓楼、藏经楼的砖木结构

在闽南佛教寺庙的建筑群中，钟鼓楼与藏经楼不仅是重要的功能性建筑，其砖木结构的运用也颇具匠心。这两类建筑通常分立于主殿两侧，形成对称布局，其形态既遵循传统官式建筑的某些规制，又巧妙地融入了鲜明的闽南地方特色。建筑下部多采用坚固的砖石结构作为基座，稳重敦实，而上部则为精致的木构楼阁，通常为两层或三层，飞檐翘角，玲珑秀逸。

红砖在此类建筑中主要用于基座的墙体部分，有时与花岗岩条石搭配使用，形成红白相间的视觉效果。墙面或素雅平实，或以红砖拼出简单的几何纹样，与上层木构的繁复雕饰形成对比。木构部分则尽显闽南木作工艺的精湛，梁、枋、斗拱、雀替等构件雕刻细腻，内容丰富，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水平。

钟鼓楼与藏经楼的屋顶亦是其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屋顶多采用歇山顶或攒

尖顶，铺设红色或橙黄色的琉璃瓦，屋脊之上则装饰着华丽的剪瓷雕，题材涵盖龙凤、花鸟、人物故事等，色彩斑斓，生动活泼。这种砖石的稳重与木构的轻灵、墙体的素雅与屋顶的华丽相结合，使得钟鼓楼和藏经楼成为寺庙建筑群中，集结构美与装饰美于一体的艺术杰作。

（三）寺庙建筑中的装饰题材与寓意

闽南佛教寺庙的建筑装饰丰富多彩，其题材与寓意深刻地反映了佛教教义与民间吉祥文化的完美融合，使之成为一座巨大的民俗艺术宝库。这些装饰遍布于屋脊、墙身、梁柱、门窗等各个角落，综合运用了石雕、木雕、砖雕和剪瓷雕等多种工艺，共同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氛围和艺术感染力。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部刻画，都充满了象征意义。

这些装饰题材包罗万象，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1. 宗教象征物：莲花作为佛教的圣洁象征，在建筑装饰中无处不在，如柱础的莲花座、门窗的莲花雕刻等。法轮、宝瓶、双鱼、盘长等“八宝”图案也频繁出现，象征着佛法圆满和吉祥如意。飞天、迦陵频伽等佛教神鸟的形象，常被雕刻在梁枋或壁画上，营造出佛国世界的缥缈与祥和。

2. 祥瑞动植物：龙、凤、麒麟、狮子等传统瑞兽是寺庙装饰的常见主角，它们或作为镇守门户的石雕，或盘绕于殿堂的石柱，或飞腾于屋脊之上，寓意着护法驱邪、吉祥威仪。梅、兰、竹、菊“四君子”以及牡丹、石榴等花卉，则象征着高洁品格与富贵吉祥。

3. 历史与神话故事：匠人们常将佛经故事、二十四孝图、民间传说等内容，通过精湛的雕刻技艺呈现在建筑的各个部分。这些人物故事雕刻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起到了直观的教化作用，向信众传递着忠孝节义、因果轮回等传统伦理观念和佛教思想。

二、道教宫观的红砖特色

闽南地区的道教宫观，在建筑风貌上与佛教寺庙既有相似之处，又在细节和精神内涵上展现出鲜明的自身特色。红砖作为共同的建筑语汇，在道教宫观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诠释。它与道教崇尚自然、追求长生以及融合地方信仰的特点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

（一）与佛教寺庙的形制异同

闽南的道教宫观与佛教寺庙在基本建筑形制上存在诸多共性，这源于两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相互借鉴与影响，并共同植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二者同样广泛使用红砖红瓦和白色花岗岩，也常常采用燕尾脊、马鞍脊等极具闽南特色的屋顶形式，在整体布局上亦遵循着中轴对称、院落递进的原则。从远处看，一片红墙赤瓦的庙宇，有时难以单从轮廓上立即分辨其属佛属道。

区别更多体现在建筑的内在气质、空间氛围与装饰细节上。佛教寺庙通常规模宏大，布局严整，追求雄伟庄严的殿堂气势，以彰显佛法的崇高与神圣。道教宫观则相对更为灵活多变，建筑组合常与山水园林结合，空间氛围追求清幽、空灵，体现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在色彩运用上，道观有时会更多地使用青色、黑色等象征天地的色彩，与红砖形成更为丰富的色彩对比。这种建筑形制上的“和而不同”，恰恰反映了佛教与道教这两种宗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长期以来相互借鉴、共存与对话的生动局面。

（二）屋顶剪瓷雕与墙面砖雕的道教元素

道教宫观的红砖建筑艺术，在屋顶的剪瓷雕和墙面的砖雕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独特的宗教元素和世界观。这些精美的装饰不仅是建筑的华丽外衣，更是道教义理和神仙崇拜的视觉化表达。屋顶之上，剪瓷雕艺人以五彩的瓷片，塑造出纷繁复杂的神话世界。与佛教题材不同，这里的主角是道教的神仙体系，如双龙戏珠、八仙过海、仙人乘鹤等经典故事，生动地呈现在屋脊、垂脊和牌头之上。这些作品色彩鲜艳，造型夸张，充满了动感与想象力，将道教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具象化。

墙面的砖雕艺术则更为细腻和内敛。匠人们利用红砖本身的质地和色泽，通过浮雕、透雕等手法，在墙堵、水车堵等位置创作出丰富的装饰图案。道教元素在此处体现得尤为突出：八卦符号、太极图、祥云、葫芦、宝剑等法器，以及象征长寿的仙鹤、灵龟、松树等，都是常见的题材。这些砖雕作品巧妙地嵌入红砖墙体中，与平整的墙面形成肌理对比，既丰富了建筑的立面层次，又含蓄地传达了道教趋吉避邪、阴阳和谐、祈求长生的核心思想，使建筑本身成为一部凝固的道教文化经典。

（三）地方神祇崇拜对建筑的影响

闽南地区拥有异常发达的民间信仰体系，众多地方神祇的崇拜深刻地影响了

道教宫观的建筑形态与功能布局。这种影响使得闽南的道教建筑常常呈现出“多神共祀”的包容性格局，许多在地的、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如开漳圣王、保生大帝、妈祖、临水夫人等，都被吸纳进道教的神仙谱系中，并拥有自己的专属殿堂或祭拜空间。

这种融合直接反映在建筑的扩建与改造上。一座宫观可能最初仅供奉一位主神，但随着地方信众的需求，会逐渐增建偏殿、侧殿，用于供奉其他地方保护神，形成一个功能复合、神祇众多的建筑群落。建筑的装饰题材也因此变得更为多元，除了传统的道教符号，还会大量出现与特定地方神祇传说相关的人物故事、功绩场景的雕刻与彩绘。例如，在供奉妈祖的宫观中，航海、救难的场景便会成为重要的装饰主题。这种影响模糊了纯粹道教宫观与地方性神庙的界限，使建筑成为官方道教文化与地方草根信仰交融对话的生动载体，充满了浓厚的人间烟火气与强烈的地域认同感。

综观上述闽南佛教与道教建筑的红砖运用与形制特征，可见两者既有共通之处，亦有细节差异，详细的特征对比可见下表。

闽南宗教建筑红砖运用与特征对比表

宗教类型	结构核心	红砖运用方式	关键装饰符号	特色建筑工艺
佛教寺庙	木构架（穿斗式 / 抬梁式）	主体墙体，与白石柱搭配（出砖入石）	莲花、八宝、龙凤、二十四孝图	出砖入石、剪瓷雕（龙凤题材）
道教宫观	木构架（穿斗式 / 抬梁式）	基座、墙体，与青石搭配	八卦、太极、八仙、仙鹤、地方神祇	剪瓷雕（神仙故事）、细腻砖雕
伊斯兰教清净寺	石构（无梁殿式）	辅助性砖砌（门楼穹顶），多为石材	《古兰经》经文（书法）、几何纹样、抽象植物纹	尖拱门、穹顶、石雕经文

三、伊斯兰教清净寺的砖石结构

在闽南红砖建筑的宏大叙事中，泉州清净寺以其独特的砖石结构和异域风情，谱写了跨文化对话的华丽篇章。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之一，它并非采用闽南传统的红砖木构，而是以花岗岩和辉绿岩的石构为主，同时巧妙地融入了砖砌工艺，展现了中亚伊斯兰建筑艺术与本土元素的碰撞与融合。清净寺的建筑特征与上表列出的闽南本土宗教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一）泉州清净寺的奉天墙与穹顶结构

泉州清净寺的核心建筑之一奉天坛（礼拜殿），其结构与装饰集中体现了伊斯兰建筑的典型特征。其中，坐西朝东的“奉天墙”是整个殿堂的重心所在。这面墙壁完全由白色花岗岩条石砌筑，墙上开有多个尖拱形壁龛，龛内及周围雕刻着精美的《古兰经》经文，其朝向直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方向，为穆斯林提供了礼拜的基准。这种以墙体本身作为朝向和装饰焦点的做法，与中原及闽南传统建筑中以梁柱木构架为核心的体系截然不同，清晰地展现了外来宗教建筑的独特空间逻辑。

穹顶结构是伊斯兰建筑的另一项标志性元素，在清净寺的门楼和曾经的奉天坛中都有体现。门楼入口处层层叠进的尖拱门，其顶部便是以砖石构筑的穹顶，有的内部还呈现出类似蜂窝状的复杂结构，这既是力学与美学的结合，也象征着无限的宇宙苍穹。虽然奉天坛原有的宏伟穹顶早已坍塌，但从其厚重的石墙和残存的柱础可以想见，它曾是典型的由立柱支撑巨大穹顶的无梁殿式结构。这种结构形式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构架体系，展现了源自中亚、西亚地区的成熟砖石建筑工艺。

（二）中亚砖石工艺的本土化表现

泉州清净寺虽整体风格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伊斯兰教寺形式，但在建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和融合了闽南本土的建筑工艺与材料，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本土化特征。这种本土化首先体现在材料的选择上。建筑大量使用了闽南本地盛产的花岗岩与辉绿岩，这与当地长期形成的石构建筑传统一脉相承。石料的加工和砌筑方式，虽然服务于伊斯兰建筑的形制，但在细节处理上仍能看到闽南工匠的熟练技法。

更为巧妙的本土化表现体现在装饰细节的融合上。例如，在门楼尖拱门的顶部，中心位置雕刻了一朵倒悬的莲花，莲花是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吉祥与圣洁的象征，将其运用于清真寺的装饰中，是外来文化主动与本土审美情趣相协调的明证。一些建筑构件，如尖拱下方的支撑结构，其形态与中国古建筑中的“雀替”十分相似，这可能是本土工匠在建造过程中无意识地融入了他们所熟悉的建筑语汇。这种工艺上的对话与交融，使得清净寺不单是一座异域建筑的简单复制品，而是一个跨文化交流与创新的历史见证。

（三）宗教符号在建筑装饰中的体现

泉州清净寺的建筑装饰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的原则，因此，其装饰艺术主要通过非具象的、象征性的符号来表达宗教内涵。这些符号与建筑结构和材料融为一体，营造出庄严肃穆、纯净神圣的宗教氛围。

《古兰经》的经文书法是清净寺最重要的装饰元素。在门楼、奉天墙的壁龛以及窗楣等处，都嵌有以阿拉伯文书写的石刻经句。这些书法雕刻或苍劲有力，或隽秀流畅，本身就是极高的艺术品，其内容表达了对真主的赞颂和核心教义，时刻提醒着信徒的虔诚信仰。这种将宗教经文直接作为建筑装饰主题的做法，是伊斯兰建筑的鲜明特征。

除了文字，几何图形和植物纹样也是常用的装饰符号。门楼穹顶内部复杂的蜂窝状结构、墙面上的回字形垛子，都体现了对几何图案的纯熟运用，象征着宇宙的和谐与秩序。同时，一些植物纹样也被抽象化和图案化，反复出现在雕刻之中。通过这些抽象的符号语言，清净寺在回避偶像崇拜的同时，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充满精神象征意义的宗教空间，引导信徒进行内心的冥想与对真主的沉思。

第三节 宗祠建筑的规制与装饰

闽南宗祠，作为凝聚宗族血脉、传承家族历史的精神圣殿，其建筑本身便是一部凝固的史书。从外部的地理堪輿到内部的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遵循着严格的规制，体现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共同打造了一个充满秩序与艺术美感的礼制空间。

一、宗祠的选址与布局规制

宗祠的选址与布局是营建过程中的首要考量，它不仅关系到建筑的稳固与实用，更深植于传统文化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之中，旨在寻求山川灵气的庇佑，并借此确立宗族在社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展现出其独特的空间秩序。

（一）“背山面水”的风水观念

闽南宗祠的选址深受中国传统风水观念的影响，尤以“背山面水”为最核心的原则。理想的基址要求后方有稳固的山峦作为“靠山”，象征着宗族基业的稳固和人丁的兴旺，能够得到坚实的支撑与庇护。前方面向开阔的水域，如河流、

溪水或池塘，水在风水理论中被视为主管财富与气运的元素，“水主财”，缓缓流动的活水被认为能带来绵延不绝的财气与生机。这种选址模式追求的是一个藏风聚气的理想环境，山环水抱，气场稳定，被认为是能够福荫子孙、使家族世代繁荣的宝地。

对于山与水的形态亦有严格的讲究。靠山需形态完整、草木丰茂，忌讳童山、断山；而面前的水则以“玉带环腰”般的曲水为上佳，寓意情感与财富的环绕与聚集。宗祠建筑主体在此环境中，如同坐镇中央，吸纳天地精华。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与巧妙利用，使得宗祠建筑与周围的山川形势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图景，既是物质空间的营造，更是对宗族未来发展的一种精神寄托与美好期盼，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思想。

（二）在村落中的核心地位与朝向

宗祠在村落的整体布局中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心，更是精神上的向心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宗祠会被建造在整个村落中轴线的关键位置上，或是地势最高、最为显要的地方。村落中的其他民居则以宗祠为中心，分列两侧或向四周展开，形成众星拱月之势。这种布局方式直观地凸显了宗族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强化了宗祠作为全体族人共同归属的象征意义。无论身处村落何处，宗祠宏伟的屋脊和独特的轮廓总是视线中不可或缺的焦点，时刻提醒着族人其身份认同与根脉所系。

宗祠的朝向选择同样极为审慎，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坐北朝南的方位。这一方面是基于实际的气候考量，坐北朝南可以获得最佳的采光与通风，冬暖夏凉，符合居住建筑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南方与光明、温暖、生命和权威紧密相连，帝王君临天下亦是“面南而治”。宗祠朝向南方，象征着宗族面向光明与希望，秉持正统，追求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

建筑的台基自外向内、由前而后会节节抬高，使建筑产生一种昂扬向上的气势，也让祭祀者的视野更为舒畅。这种精心规划的朝向与核心位置，共同将宗祠塑造成一个村落的权力中心、礼仪中心和文化中心，其空间秩序的建立，本质上也是将宗法社会的伦理秩序进行了物质化的再现，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三）门埕、池塘与照壁的配置

闽南宗祠前方通常会配置一片开阔的广场，称为“门埕”。门埕不仅为大型的祭祀、庆典活动提供了必要的集会场所，也为族人提供了日常交往与休憩的空间。在功能上，它还是建筑与外部村落之间的缓冲地带，营造出宗祠庄重威严的氛围。门埕的地面常由规整的石板铺设，其范围大小也间接反映了该宗族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

在门埕的前方，开挖一口半月形的池塘几乎成为定制。这口池塘在风水上被称为“泮池”或“风水塘”，具有重要的象征与实际功能：

1. 从风水角度看，池塘作为“明堂”聚水之处，是“藏风聚气”的关键一环，寓意汇聚财富，为宗族带来好运。半月形的形态，则取“科甲半池”之意，寄托着族人希望子孙读书登科、入仕为官的美好愿望。

2. 在实用功能上，池塘可以调节建筑周围的微气候，为宗祠提供消防用水，同时也为族人提供了养鱼、洗衣的便利。倒映在水中的宗祠影像，虚实相生，极大地丰富了建筑的景观层次。

照壁，又称影壁，通常设置在大门之外或者门埕与池塘之间。它的主要作用是遮挡外界直冲而来的视线，避免“气”的直冲，维持宗祠内部气场的稳定。同时，照壁也起到装饰作用，壁上常常饰有精美的砖雕、石雕或彩绘，内容多为麒麟、祥云、福禄寿等吉祥图案，作为宗祠建筑的第一道风景线，彰显着主人的品味与追求。门埕、池塘与照壁三者有机组合，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前导空间序列，引导着人们在进入宗祠主体建筑前，先行感受其文化气场与礼制威仪。

二、宗祠建筑的等级与规模

闽南宗祠的建筑形态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受到严格的礼制等级约束。其规模大小、开间进深、屋顶形式乃至装饰细节，都清晰地标示着该宗族的社会地位、官阶品级与财富实力，俨然成为了镌刻着家族荣誉的物化法典。

（一）官宦与平民宗祠的规模差异

闽南宗祠的建筑规模，直观地反映了宗族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其中官宦望族与普通平民的宗祠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拥有显赫官声或雄厚财力的大家族，其宗祠往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可以建成三进甚至五进的宏伟格局。这种多进深的院落不仅能容纳更多的族人进行祭祀活动，其层层递进的空间序列也营造出

一种深邃、庄严的氛围，彰显着宗族的辉煌历史与强大实力。例如，一些著名的宗祠，如杜氏大宗祠，规模宏大，体现了其家族显赫的过往。

相比之下，普通平民或小宗支系的宗祠则因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的限制，规模相对较小，多为单进或两进的简单格局。单进式宗祠通常只有一个厅堂用于供奉祖先，空间较为紧凑。两进式则稍具规模，有前厅与后殿之分，形成基本的院落结构。

这种规模上的差异是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直接投射。官宦宗族被允许使用更大的占地面积、更多的院落层次来彰显其功绩与荣耀。而平民宗祠则必须在规划允许的范围内建造，不得逾越。这种看得见的建筑体量差异，无时无刻不在强化着社会成员对于等级、身份的认知，使得建筑本身成为了一种无声的宣言，清晰地区分了不同宗族在社会金字塔中的位置。

（二）开间、进深与屋顶形式的等级规定

宗祠的建筑等级，通过开间、进深和屋顶形式等具体元素得到了精细的表达。开间，即建筑的正面宽度，通常以奇数为吉祥，三开间、五开间最为常见。地位崇高的宗族，其宗祠主殿可达七开间甚至九开间，显得格外宏伟壮观。而普通宗祠则多为三开间。进深，即建筑的深度，同样与等级相关，从一进到多进，每一进都代表了空间层次的加深和地位的提升。大宗祠多采用三进两院的“回”字形布局，轴线贯穿，纵深感极强，而小宗祠则可能仅为简单的“口”字形布局。开间、进深与屋顶形式的具体等级规定，在上表已有所列出。

屋顶是建筑等级最外在、最显著的标志。在闽南宗祠中，屋顶形式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序列。等级最高的为重檐歇山顶，其屋顶结构复杂，四面出檐，富于变化，通常只有敕建的寺庙或极少数功勋卓著的宗祠才能使用。其次是单檐歇山顶，造型优美，规格较高。硬山顶和悬山顶则等级较低，多用于普通民居和规模较小的宗祠。硬山顶的山墙与屋面齐平，而悬山顶的屋顶则悬挑于山墙之外。屋脊的装饰也体现等级，官宦宗祠的屋脊上可以装饰吻兽、仙人走兽等复杂的陶塑剪瓷，而平民宗祠则相对简洁。瓦片的颜色同样有别，红色陶瓦最为普遍，但少数与皇室或高级官员相关的建筑有时会特许使用等级更高的黄色或青色琉璃瓦。

（三）功名、官阶在建筑上的彰显

对于获得功名的宗族而言，宗祠是展示荣耀、光宗耀祖的最佳场所。科举功名或官场品阶被允许通过特定的建筑构件来彰显。最为典型的便是大门前的旗杆

石（或称“功名石”），这是为表彰族中取得贡生以上功名的子弟而设立的。旗杆石成对出现，上面刻有获奖者的姓名、功名和科次，是宗族引以为傲的荣誉徽章。旗杆石的数量越多，代表该宗族的文风越盛，人才辈出。

建筑的细节装饰也与官阶紧密挂钩。例如，大门口的石狮或石鼓的形制与大小，门槛的高度，都受到品级的限制。高官府第的宗祠，其大门门簪的数量、梁枋上的彩画内容、雀替的雕刻题材，都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龙凤、官场景象等图案。一些宗祠甚至会将皇帝的诏书、御赐的牌匾等直接刻制或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作为宗族荣耀的至高证明。通过这些具体的、可见的建筑元素，个人的成就被转化为整个宗族的集体荣誉，激励着后代子孙勤奋苦读、积极入仕，以延续和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使得宗祠成为一部镌刻在砖石木料之上的家族奋斗史。

三、宗祠内部空间的装饰与陈设

步入闽南宗祠的内部，一个集精湛工艺、深厚文化与礼制精神于一体的艺术世界便展现在眼前。从神圣的祖龕到华美的梁柱，再到充满寓意的匾额楹联，每一处装饰与陈设都是宗族精神与审美情趣的结晶，共同营造出庄严肃穆而又异彩纷呈的祭祀空间。

（一）神龕、祖龕的规制与雕刻

神龕与祖龕是宗祠内部空间的核心与灵魂所在，是安放祖先牌位的神圣区域，通常位于正厅（享堂）后部的正中央。这一区域在空间布局上最为尊贵，光线较为幽暗，以营造神秘、庄严的氛围。祖龕本身就是一座微缩的木构建筑模型，其形制规整，常采用牌楼式或橱柜式设计，结构复杂，雕饰繁复，金碧辉煌，被称为“公妈龕”。祖龕的尺寸、层级和装饰的华丽程度，直接与宗族的地位和财力相关，大家族的祖龕甚至高达数米，层次分明，雕刻有精细的龙凤、花鸟、人物故事等。

祖龕的雕刻是木雕艺术的精华体现，通常采用透雕、浮雕、圆雕等多种技法。雕刻题材广泛，寓意吉祥，如“郭子仪拜寿”象征家族福寿绵长、人丁兴旺，“二十四孝”故事则用以教化子孙恪守孝道。龕门两侧常有精雕的楹联，内容多为追溯宗族源流、颂扬祖先功德。祖先牌位的排列严格遵循“昭穆”制度，即始祖居中，左为昭，右为穆，按辈分和亲疏远近依次排列，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伦理观念。整个祖龕区域，通过精心的空间营造和繁复的雕刻艺术，成

为了一个凝聚宗族记忆、维系血脉传承的信仰中心。

（二）梁枋、斗拱上的彩画与木雕

宗祠的梁枋、斗拱、雀替、吊筒等木构件，是闽南建筑装饰艺术的集中展示区。这些原本承重的结构构件，在能工巧匠的手中被赋予了极高的艺术价值。泉州宗祠的梁架色彩以红、黑为主色调，显得沉稳大气。在重要的梁枋之上，则常常绘制色彩艳丽的彩画，题材包括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祥禽瑞兽和卷草纹样等。这些彩画不仅美化了建筑空间，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寓意，如“渔樵耕读”代表了对田园理想生活的向往，“八仙过海”则寄托了超凡脱俗、神通广大的愿望。

木雕是宗祠装饰的另一大亮点。斗拱、雀替、员光、吊筒等处，无不布满精雕细琢的图案。闽南木雕匠师善于利用木材的天然纹理和色泽，采用圆雕、透雕、浮雕等多种手法，创造出层次丰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雕刻题材极其广泛，历史演义如《三国志》、《封神演义》中的人物故事，是教化后人忠孝节义的生动教材；地方戏曲的场景，则反映了民众的日常娱乐与审美趣味；狮子、麒麟、凤凰等瑞兽，以及牡丹、莲花、梅兰竹菊等花卉，则被赋予了辟邪纳福、富贵吉祥、品格高洁等美好寓意。这些精美的彩画与木雕，将力学与美学完美结合，使整个宗祠内部空间显得华丽而不俗气，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与人文精神。

（三）匾额、楹联的文化内涵与书法艺术

匾额与楹联是闽南宗祠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名片”，它们以文学和书法相结合的形式，言简意赅地彰显着宗族的门第、家风与荣耀。悬挂于宗祠大门正上方的通常是“某氏宗祠”或堂号匾，字体庄重雄健，开宗明义。厅堂之内，则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功名匾和荣誉匾，如“进士”、“文魁”、“父子明经”等，这些匾额由官方颁赐或由名流题赠，是宗族最引以为傲的资本，用以激励后辈。匾额的书写极为讲究，多邀请当时的书法名家或有功名的族人题写，以楷书、隶书等正体为主，追求中正平和、气度庄严的艺术效果。

楹联则成对出现于廊柱、门扇之上，其内容与悬挂位置紧密相关。大门楹联多为概括宗族郡望、发源与迁徙历史，如“颍川衍派，固始分支”；厅堂楹联则侧重于颂扬祖德、阐发家训，如劝学、劝善、劝孝等内容；祖龕两侧的楹联则表达对祖先的追思与敬仰。这些楹联对仗工整，意蕴深远，是宗族精神与价值观念的提炼表达。楹联的书法艺术同样是欣赏的重点，其书体风格多样，或遒劲有力，或儒雅清秀，与楹联内容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宗祠空间中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匾额与楹联，将文学、书法、历史、伦理融于一体，是对敬惜字纸文化的传承，更是宗族文化内涵最直接、最典雅的载体。

第四节 防御性建筑的砖石结构

闽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共同催生了其建筑鲜明的防御色彩。从聚族而居的土楼寨堡，到扼守海疆的卫所炮台，再到散落乡野的普通民居，砖石的运用不仅体现了高超的营造技艺，更是闽南先民们应对严酷生存挑战的智慧结晶。

一、寨堡与土楼的防御功能

在闽南连绵的群山与开阔的田洋之间，寨堡与土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乡土防御工事，将砖石材料的物理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亲手构筑起一座座坚不可摧的家族堡垒。这些建筑以其宏大的体量和精妙的设计，共同讲述着宗族力量与生存智慧的故事。

（一）高大厚重的砖石墙体

闽南土楼与寨堡最为直观的防御特征，便是其高大而厚重的墙体。这些墙体普遍高达三至五层楼，底部厚度常达一米五至三米之巨，向上则逐渐收分，形成一种内倾的稳定姿态，赋予了建筑极强的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墙体的建造并非仅用单一材料，而是采用了复杂的复合式结构。其核心多为生土混合砂石、石灰，甚至加入糯米汁、红糖水等有机物增加黏性，通过反复夯筑而成，坚实无比。

外墙则根据经济条件与就地取材的便利性，或以花岗岩条石砌筑墙基，以应对南方潮湿气候的侵蚀；或通体包砌厚重的红砖，形成光滑陡峭的墙面。这种被称为“金包银”的墙体，内部的夯土层能够有效吸收炮火的冲击能量，而外部的砖石表皮则提供了坚固的防护，抵御风雨侵蚀和常规兵器的破坏。墙体的高度让敌人难以通过云梯等简易工具攀爬，而其惊人的厚度则使得即便是明清时期出现的火炮，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将其彻底摧毁。这种对墙体物理性能的极致追求，构成了其防御体系的根基。

这些坚实的墙体不仅仅是一道物理屏障，更是一道心理防线。当匪盗或乱军面对这样一座如同山峦般拔地而起的巨大堡垒时，其高不可攀的墙体与严丝合缝

的砖石结构，本身就足以产生强大的心理威慑，让任何来犯者望而却步。建筑通体除了底层唯一的坚固大门外，几乎不开窗，偶有开口也皆为高处的狭小射击孔，这种封闭而内向的姿态，清晰地宣告了其拒绝一切外部侵扰的决心。

（二）角楼、瞭望台与射击孔的设计

土楼与寨堡的墙体并非简单的直线，其在转角处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军事防御的缜密考量。绝大多数大型土楼或寨堡都在四角或关键转折点设置了突出的角楼。这些角楼如同堡垒的眼睛和拳头，其位置前凸于墙面，彻底消除了主墙体的射击死角。守卫者可于角楼之内，形成交叉火力，有效覆盖相邻的两面墙体，对任何试图靠近墙根的敌人进行打击。角楼的内部空间通常比主楼更为宽敞，可以部署更多的人手与物资，在战时成为关键的火力支撑点。

在建筑的最高处，通常还设有专门的瞭望台。它们占据着整个聚落的制高点，视野开阔，能够及时侦察到远方的敌情，为堡内居民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一旦发现敌踪，钟鼓齐鸣，堡门迅速关闭，整个聚落便能在最短时间内从生产状态转入战斗状态。瞭望台与角楼的结合，构成了一个从远到近、从宏观到微观的立体侦察与火力网络。射击孔的设计更是匠心独运，其形态与位置都经过精心计算。这些孔洞通常呈现外小内大的“喇叭口”形状，既能为内部的射手提供广阔的射击扇面，又能最大限度地缩小外部的暴露面积，有效保护射手安全。射击孔根据防御层次的不同而分层布置，低处的孔洞多为向下斜射，以应对抵近墙体的敌人；高处的孔洞则以平射和仰射为主，用于远距离压制。

（三）水井、粮仓等生活保障设施

一座成功的防御性建筑，不仅要能抵御外敌的猛烈攻击，更需具备在长期围困下维持内部生存的能力。因此，自给自足的生活保障系统是寨堡与土楼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水井作为生命之源，在堡内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设计者会将一至数口水井安置在堡内中央的开阔庭院中，这里是整个建筑最安全、最核心的区域，能够确保在任何情况下，水源都不会被切断或污染。有了可靠的水源，堡内居民才能在漫长的围困中坚守下去。

同样关键的是粮食的储备。巨大的粮仓是大型土楼的标配，其选址与建造极为讲究，通常位于建筑内最安全、最不易受潮的楼层。为了确保粮食能够长期保存，粮仓的设计充分考虑了防火、防潮、防鼠等多种需求。其具体设计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1. 高台基座，通常以砖石砌筑，将粮仓地面整体抬高，有效隔绝来自地面的潮气，确保粮食的干燥。
2. 厚实墙体与坚固楼板，不仅用以承重和防御，更能隔绝火源与虫鼠的侵害，为粮食提供一个稳固的储存环境。
3. 巧妙的通风系统，通过在墙体内预留陶管或开设小型通风口，促进空气流通，防止粮食因湿热而霉变。这些粮仓的储备量惊人，足以支撑整个宗族数百人长达数月乃至一年以上的消耗，这种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是他们敢于闭门据守的底气所在。这些不同类型的防御性砖石建筑特征，可见下表所列。

闽南防御性建筑特征对比表

特征	寨堡与土楼（家族堡垒）	卫所与炮台（国家工程）	传统民居（民间堡垒）
主要功能	宗族聚居、长期自卫	区域海防、军事驻扎	日常居住、自保防盗
结构核心	夯土（金包银）	夯土包砖（标准化）	砖石结合（出砖入石）
典型防御点	厚重墙体、角楼、射击孔	瓮城、拱形弹药库、垛口	高墙、门簪、銃楼/角楼
主要材料	生土、砂石、糯米灰浆、红砖	青砖/红砖、花岗岩、石灰浆	红砖、花岗岩、木材
建造主体	宗族或大家族	官府/国家力量	个人或小家族

二、沿海卫所与炮台的砖砌工事

将视线从内陆的山区宗族壁垒转向广阔的海岸线，闽南的砖石防御工事呈现出一种更为系统化、国家化的面貌。明清两代，为应对倭寇侵扰与海防压力，沿海的卫所与炮台成为帝国海防的前沿阵地，红砖与花岗岩在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应用。

（一）明代卫所城垣的砖石构造

明代为加强海防，在闽南沿海地区建立了严密的卫所体系，如厦门卫、金門守御千户所、崇武所等，这些军事建置的核心便是坚固的卫所城池。与民间自建的寨堡不同，卫所城垣是国家力量主导的标准化军事工程。其墙体普遍采用“核心夯土，外壁包砖”的建造方式，即以巨量的黄土、沙石层层夯实为内芯，内外两侧再用规格统一的青砖或红砖进行砌筑。这种结构兼顾了成本与防御效果，夯土提供了足够的厚度和韧性，而表层的包砖则大大增强了墙体的耐候性和抗破坏能力，如上表所列。

为了追求极致的坚固，墙基部分往往深埋地下数米，并铺设巨大的花岗岩条石，以稳固基础。砌筑城砖所用的黏合剂也极为讲究，通常是石灰、细沙与糯米汁混合调制的灰浆，其凝固后的强度堪比现代水泥，使得砖墙浑然一体，难以被外力轻易拆解。城墙之上，还建有整齐的垛口与女墙，为守城士兵提供掩护。宽阔的马道贯通整个城墙顶部，便于兵力快速调动与运输军备物资。这些由国家统一规划、采用标准化材料和工艺建造的卫所城垣，构成了明代闽南沿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长城。

城门作为城墙的薄弱环节，得到了重点加强。高大的城门楼巍然耸立，集瞭望、指挥、防御于一体。许多重要的卫城还在主城外增建了瓮城，即一个半圆形或方形的附属小城。当敌人攻入第一道城门外，将陷入瓮城的狭小空间内，此时四面城墙上的守军便可对其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以最小的代价歼灭来犯之敌。这种层层设防、固若金汤的设计思想，充分体现了明代国家级军事工程的成熟与完备。

（二）清代海防炮台的拱形弹药库

到了清代，随着国外火炮技术的传入与战争形态的演变，海防的重心从防御冷兵器攻城转向了应对威力巨大的舰炮。因此，在重要的港口和航道咽喉处，大规模修筑新式炮台成为当务之急，厦门胡里山炮台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炮台的设计必须考虑如何安全地储存数量庞大的火药与炮弹，以应对高强度的炮战。于是，一种极为坚固的砖砌建筑形式——拱形弹药库，应运而生。

这些弹药库大多采用半地下的方式建造，利用地势的掩护来减小被敌方炮火直接命中的概率。其核心结构是厚重的砖砌筒形拱顶。工匠们使用专门烧制的楔形红砖，通过精确的计算与垒砌，构成一个完美的半圆形拱券。这种结构能够将来自顶部的巨大压力，无论是上层覆土的重量还是敌方炮弹爆炸的冲击力，有效地分解并传递到两侧厚实的墙体之上，从而保证内部空间的安全。拱形弹药库的内部设计也十分科学，设置了独立的通道与多个库室，分别存放炮弹与火药，以防连锁爆炸。同时，精巧的通风与防潮设计，确保了火药在南方湿热的环境中能保持干燥和稳定。

（三）红砖在军事建筑中的标准化应用

红砖，这种在闽南地区产量巨大、烧制技术成熟的建筑材料，在明清时期的军事工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相比于开采和运输不便的石材，红砖具有

规格统一、尺寸标准、生产便捷的突出优点。这使得大规模、跨区域的军事建筑项目在材料供应和施工管理上变得更为高效。朝廷可以向各地的官窑下达统一的烧制任务，规定砖的尺寸、火候与强度，从而保证了不同地区、不同批次建造的防御工事都能达到相似的质量标准。

这种标准化应用在现存的卫所城墙和海防炮台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无论是城墙的包砖、炮台的护壁，还是弹药库的拱券，其砖块尺寸统一，砌法严谨，行列分明，展现出一种规整而强大的秩序感。红砖优良的耐火性和耐久性，也使其成为修筑炮台、火药库等高风险建筑的理想选择。在许多军事工程中，红砖还与更为坚硬的花岗岩结合使用，形成“红白相间”的视觉特色，既是材料性能的互补，也无意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军事建筑美学。可以说，标准化的红砖，是支撑起闽南乃至整个中国明清海防体系的物质基础。

三、民居中的防御性元素

当我们将目光从宏大的国家工程移回到日常的民间居所时，会发现防御的意识同样深刻地渗透在闽南传统民居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被称为“古厝”的建筑在追求居住舒适与家族荣耀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诸多自我保护的智慧，成为一座座微型的民间堡垒。

（一）高墙、窄窗与角楼

闽南传统民居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其高耸坚固的围护墙体。这些墙体的高度轻易便超过一人，有些甚至高达数米，有效地阻止了盗匪的轻易翻越。墙体的材料多为下部用花岗岩砌筑，上部则使用红砖，这种“出砖入石”的砌法不仅美观，更重要的是利用花岗岩的坚固与防潮特性来保护墙基，而红砖则构成了墙体的主体。在这些高大的外墙上，尤其是底层，几乎不设窗户，即使有，也只是几个极小的、位于高处的开口，其尺寸和功能更接近于射击孔而非采光通风。

这种封闭式的立面设计，清晰地表达了“内外有别”的防御姿态。它将家庭的私密与安全置于首位，牺牲了一定的采光和通风，以换取最大限度的安全感。所有必需的光线与空气都由内部的天井来提供，形成一个安全、内敛而自足的生活空间。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合院式民居或家族聚落中，建筑的转角处还会建造小型的角楼或銃楼，其功能与土楼的角楼如出一辙，即为了消除防御死角，从侧翼攻击来犯之徒。这些民居中的角楼虽然体量不大，但同样设有射击孔，是整个民

居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火力点，具体细节可参考上表。

这些防御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整个建筑融为一体。高墙限定了建筑的边界，窄窗控制了内外的通联，角楼则扼守着关键的节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被动而有效的防御系统，让普通民居在面对突发暴力威胁时，能够拥有基本的自保能力。这种将居住功能与防御功能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的设计，是闽南先民在动荡社会环境中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门楼、门簪与防盗设施

大门是整座古厝防御体系中最关键也最为薄弱的一环，因此在门的处理上极尽工巧，层层设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坚固厚重的门楼，它通常由巨大的花岗岩石块砌筑而成，结构坚实，自成一体，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门洞内安装着厚重的实木大门，门板多选用坚硬的木材制成，并常常包上铁皮，以防火攻。门后，则是防御的核心设施——粗大的门闩，闽南人称之为“门簪”。

门簪是一根或数根巨大的方形木杠，横向插入大门两侧深嵌入墙体的石制“门闩洞”中。一旦门簪上锁，整扇大门就与两侧的石墙牢牢地锁为一体，即便是用巨木撞击也难以轻易破开。除了主要的门簪外，许多大门还设有天地闩等辅助锁具，进一步增强其稳固性。在门板上，通常会有一个小小的窥孔，供屋内的人在不开门的情况下观察外面的情况，决定是否开门。部分富裕人家的门楼上方，甚至还设计有被称为“倾口”的防御孔洞，危急时刻可以向下倾倒滚水、热油或石块，阻止敌人破坏大门。

（三）内部巷道与逃生通道的巧妙设计

穿过坚固的大门，进入古厝内部，并不会立即看到开阔的空间，而是常常面对着复杂的内部巷道网络。在大型的多进式院落或家族聚落中，这些被称为“护厝”或“巷道”的狭长通道纵横交错，如同迷宫。这种布局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意为之的防御策略。狭窄曲折的巷道极大地限制了入侵者的行动，使其无法快速突进和展开队形。当少数敌人进入巷道时，他们将暴露在两侧房间门口、窗户乃至二楼守卫者的视线和火力之下，极易被分割包围、逐个击破。

除了利用复杂的内部布局来阻滞敌人，务实的闽南人还为自己预留了最后的生路。在许多大型古厝中，除了威严的正门，通常还会设置一个或多个不起眼的后门或侧门。这些门平时紧锁，位置隐蔽，但在家族遭遇灭顶之灾、主防御被攻

破时，便成为家人，尤其是妇女儿童逃生的生命通道。有些更为精巧的设计中，甚至包含有暗道或夹墙，能够通向建筑外的隐蔽地点。这种看似矛盾的设计，既体现了坚守到底的决心，也包含了对生命敬畏的现实考量，展现了闽南文化中刚柔并济、精明务实的独特一面。

第四章 红砖建筑的文化象征

红砖，作为闽南建筑最为鲜明的视觉符号，不仅是一种建筑材料的择取，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表达。它承载着闽南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和历史记忆，将一片土地的性格与一座建筑的生命紧密相连，成为解读闽南文化不可或缺的密钥。

第一节 红色在闽南文化中的寓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谱系中，红色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与火、太阳、生命等原始意象紧密相连，被赋予了尊贵与权威的象征意义。在闽南这片独特的土地上，红色经过历史的沉淀与民俗的演绎，其文化内涵愈发丰富，深深地烙印在民众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之中。

一、红色与吉祥文化的关联

红色在闽南超越了单纯的色彩概念，成为吉祥文化的集合体，它深深植根于民众的生活实践与精神信仰之中，通过丰富的民俗事象，将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吉祥文化符号。

（一）喜庆、热闹与生命力的象征

红色是闽南人表达喜悦与庆祝最直接、最热烈的方式。无论是逢年过节悬挂的红灯笼、张贴的红春联，还是寿诞、开业等庆典场合的红色布置，都旨在营造一种热闹、欢腾的气氛。这种色彩的运用，不仅是视觉上的渲染，更是对生命力的礼赞。红色象征着血液的颜色，代表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闽南人的观念里，使用红色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与能量，带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对生命繁荣、生活红火最直观的期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是五行中“火”的代表色，象征着温暖与光明，能够驱散阴霾，带来希望。闽南地区将这一文化意象发挥到了极致，红色的运用无

处不在，它渗透于岁时节庆、礼仪往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对红色的偏爱，本质上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它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审美选择，更是一种积极乐观、充满活力的生活态度的体现，是闽南人性格中“爱拼才会赢”精神的色彩化表达。

（二）辟邪、纳福的民俗心理

在闽南的民俗信仰体系中，红色被赋予了强大的驱邪避煞、护佑平安的神秘力量。人们相信，妖魔鬼怪畏惧红色，因为红色象征着火焰与烈日，具有纯阳之气，能够涤荡一切污秽与邪祟。因此，在住宅的重要位置使用红色，如红砖墙、红瓦屋顶，或是在门上悬挂红色饰物，都被认为可以构建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邪气入侵，保护家宅安宁。这种做法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体现了人们在面对未知力量时，寻求庇护、趋吉避凶的本能心理。

同时，红色也是招引福气与祥瑞的重要媒介。闽南人认为，喜庆的红色能够吸引神明的目光，从而获得神灵的庇佑。在各种祭祀活动中，红色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祭品上的红纸、神龛的红布、信众的红衣，都寄托着向神明祈求福运、财源和健康的愿望。红色的吉祥属性，使其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手段，更成为一种积极的祈福行为。通过主动使用红色，人们相信自己能够为自己和家庭带来好运，实现“纳福”的美好愿望，这反映了闽南民众务实而乐观的民俗信仰心理。

（三）红色在婚丧嫁娶仪式中的核心地位

在闽南，人生的重要仪轨，尤其是婚嫁，堪称一场红色的盛典。从提亲“送定”时盛放聘礼的红礼盘，到新娘出嫁时身着的红嫁衣、头顶的红盖头，再到布置新房时满眼的红喜字、红帐幔、红灯笼，红色贯穿始终，成为仪式当之无愧的主色调。这一切不仅是为了营造喜庆的氛围，更蕴含着深刻的祝福。例如，嫁妆中必不可少的红色子孙桶，内放红枣、花生、桂圆等，寓意“早生贵子”；一对红色台灯，则因“灯”与“丁”谐音，寄托了家族对新人开枝散叶、人丁兴旺的殷切期盼。红色在此刻是祝福的载体，是承诺的见证，将家族的期许与对新人未来的美好祝愿紧密相连。

即便是在丧葬这一相对肃穆的场合，红色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虽然丧事以白色、素色为主基调，但在某些环节，红色仍会巧妙出现，用以“冲喜”和辟邪。例如，在葬礼结束后，一些家庭会派发红绳或小红包给前来吊唁的亲友，意在为其去除晦气。若逝者是高寿的喜丧，其后辈甚至可以在特定时期后恢复使

用红色，以示家族福寿绵长。这种看似矛盾的色彩运用，实则体现了闽南文化对生死循环的独特理解，以及在悲伤中寻求慰藉、祈求平安的生存智慧，展现了红色在调节民俗心理、维系社会人情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红砖与财富地位的象征

从色彩的普遍寓意到建筑材料的特定选择，红砖在闽南不仅承载了吉祥的文化祈愿，更演变成为一种直观的社会符号。它超越了实用功能，成为衡量财富、彰显地位、固化荣耀的建筑语言。

（一）“红砖赤瓦”与“皇宫起”的等级寓意

在中国古代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下，红色与黄色一样，多为皇家专用色彩，民间使用受到严格限制，所谓“庶民不许”。然而，在闽南地区，却普遍出现了“红砖赤瓦”的民居建筑，其富丽堂皇的形态甚至被民间称为“皇宫起”。这种建筑形式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礼制，与闽南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福建自古有“山高皇帝远”的说法，中央政权的控制力相对薄弱，加上闽南人自宋元以来长期从事海外贸易，积累了惊人的民间财富。

这使得富裕的商人阶层有实力也有意愿突破礼制的束缚，通过建造宏伟的住宅来彰显自身经济实力。他们大胆借鉴了官式建筑的形制与色彩，将原本属于特权阶级的红色运用于自家宅院，以此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种“违禁”的红色建筑在闽南悄然风行，逐渐演变成一种地域性的建筑风尚。它不仅是财富的炫耀，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僭越”，反映了闽南海洋族群敢于冒险、不拘一格的性格特质，以及商品经济对传统等级秩序的冲击。红砖厝的等级差异和主要建筑特征，闽南红砖建筑等级特征对比表可见下表所列。

	寻常民居	皇宫起
屋顶形式	歇山顶或硬山顶（较简洁）	燕尾脊（翘角高耸）、四垂顶（官式）
墙体材料	灰砖、土坯、部分红砖	纯红砖砌筑、雕刻精美
装饰元素	简朴、少量木雕	大量石雕、砖雕、交趾陶、金漆木雕
建筑进深	一落或两落	三落、五落甚至七落，规模宏大
色彩运用	局部红色	大面积使用朱红、金黄色，色彩饱和

（二）华侨富商彰显实力的建筑语言

对于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艰苦打拼的闽南华侨而言，“探大钱，回乡起大厝”是他们人生奋斗的核心情结。当他们在南洋等地取得商业成功后，荣归故里，

在家乡建造一座宏伟的红砖大厝，便成为向乡里社会宣告成功、光宗耀祖最重要的方式。这些由侨汇兴建的红砖建筑，往往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它们不仅仅是居住空间，更是一种“纪念碑”式的存在，是华侨个人奋斗史的实体见证。

这些建筑的每一片红砖、每一处雕刻，都凝聚着主人在海外的血汗与荣耀。例如，晋江的蔡氏古民居、南安의坂美“九十九间”等，其建造者无不是在海外经商致富的侨商。他们将积累的巨额财富投入到家乡的宅邸建设中，以此来提升自身及家族在乡族社会中的地位与声望。红砖厝坚实而热烈的形态，成为了他们财富与实力的最佳代言。建筑的规模与精致程度，直接与主人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挂钩，成为一种清晰可见、不容置疑的建筑语言，向世人展示着一个家族的崛起与辉煌。

（三）红砖建筑作为家族荣耀的丰碑

红砖厝在闽南社会中，其意义远超于一栋普通的房屋，它被视为整个家族荣耀与精神的凝聚之所。一座精心营建的红砖大厝，往往需要历经数年甚至两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如泉州蔡氏古民居的修建就跨越了数十年。它不仅是家族的共有财产，更是维系家族成员情感、传承家族历史的核心载体。建筑的选址、布局、朝向都经过严格考量，遵循着儒家的伦理纲常，体现了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家族秩序。正厅用于供奉祖先、接待贵客，其规格最为讲究；两侧护厝则按辈分次序居住，整个建筑群就是家族秩序和伦理的实体化呈现。

红砖厝的建成和存续，本身就是家族兴旺的证明。它屹立在村落之中，如同一座无言的丰碑，向外界展示着家族的团结、财力和悠久历史。对于家族成员而言，无论身在何方，这座红砖厝都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根源和心灵的归宿。它承载着家族的集体记忆，记录着先辈的创业艰辛与辉煌成就，并以其坚固而温暖的形态，激励着后代子孙要为维护和光大家族荣耀而不断奋斗。红砖建筑因此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是闽南人家族观念和宗族认同感的集中体现。

三、红色与海洋文化的联系

闽南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红砖建筑作为这一文化的产物，其鲜明的色彩不仅根植于中原传统的吉祥寓意，更与闽南人向海而生、闯荡世界的独特经历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成为海洋文明在陆地上最为温暖和醒目的文化坐标。

（一）砖红色与土地、家乡的色彩认同

红砖的颜色，源于闽南地区广泛分布的红壤。这种取自本土的建筑材料，使其天然带有了土地的印记。砖红色，这种温暖而厚重的色彩，成为闽南人对家乡土地最直观的色彩记忆。它不同于青砖的冷峻，也不同于石材的坚硬，红砖的色调充满了温度，仿佛是故乡土地的延伸，蕴含着乡土的亲切感。

对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目之所及的红砖厝，就是“家”的代名词。这种色彩认同感，随着一代代人的繁衍生息而不断加深，最终内化为一种集体记忆。红色不再仅仅是一种颜色，它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建筑形式、特定的生活方式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地域文化符号。这片红色，象征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的底色。

（二）远航归来的游子对红砖的视觉记忆

对于那些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闽南游子而言，红砖厝的颜色是乡愁最具体、最深刻的具象化体现。在茫茫大海上颠簸，在异国他乡奋斗，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除了对家人的思念，便是对家乡那片独特红色的遥想。红砖建筑群那标志性的红色屋顶和墙面，是他们离港时回望故乡的最后一抹色彩，也是他们远航归来时，在海平面上最先辨认出的家的方向。

这种强烈的视觉记忆，使得红砖的颜色超越了建筑美学的范畴，升华成为一种情感的寄托和身份的坐标。当一位华侨看到一块闽南红砖，他所看到的不仅是一块建筑材料，更是故乡的阳光、土地和亲人，是魂牵梦绕的乡愁的实体。正如一位华侨教授所言，将一块红砖带回去，父亲看到它会落泪。这片红色，是无数远航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是他们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视觉和情感烙印。

（三）红砖建筑作为海洋文明的陆地坐标

闽南的红砖建筑，是海洋文明在陆地上的辉煌印记。它们大多由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或华侨投资兴建，其建筑本身就是海洋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些建筑不仅在形态上融合了中原传统、闽南本土和南洋乃至国外的建筑元素，形成了独特的“中西合璧”风格，其高调的红色外观，也正是闽南海洋性格的体现——开放、热烈、敢于突破传统。

这些连绵成片的红砖建筑群，如同一座座从海洋延伸至陆地的灯塔，标记着一个区域的文化属性。它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者，记录了闽南人通过海洋与世界对话的历史。同时，它们也构成了独特的海岸景观，为往来的船只提供

了视觉上的航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砖建筑不仅是家的象征，更是闽南作为一种海洋文明的地理和文化坐标，向世界展示着这片土地因海洋而孕育的独特魅力与磅礴生命力。

第二节 建筑装饰的吉祥图案

闽南建筑的装饰艺术，宛如一部镌刻在砖石木瓦上的“百科全书”。这些装饰绝非仅仅为了视觉上的美观，它们更深地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寄托着闽南民众的精神愿景。工匠们运用精湛的技艺，将丰富的想象力与美好的祝愿物化为千姿百态的吉祥图案，遍布于屋脊、墙身、门窗、梁枋之间，构建起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世界。

闽南建筑装饰吉祥图案主题概览表

主题类别	核心图案（示例）	主要寓意	常见位置
瑞兽神禽	龙、凤、狮子、鹤	权力、尊贵、祥瑞、镇宅、长寿	屋脊、墙身、门楼、石雕基座
谐音祈福	蝙蝠（福）、鹿（禄）	福气、官禄、财富、好运	梁枋、窗格、木雕、彩绘
花卉植物	牡丹、莲花、梅兰竹菊	富贵、纯洁、君子品德、高雅	格扇、水车堵、石窗、屏风
人物典故	二十四孝、三国故事	道德教化、忠义、智慧、传承	祠堂墙壁、墀头、木雕板

一、动植物题材的象征意义

在闽南建筑装饰中，动植物题材最为常见，它们通过谐音、象征、神话等多种方式，将自然万物与人事祸福紧密相连，构筑起一个生动而富有情趣的祈福体系。动植物题材的象征意义，以及其他主要的吉祥图案主题概览，可见上表。这些图案取自生活，却又经过艺术的提炼，是民众集体意识和审美情趣最生动的集中体现。

（一）龙、凤、狮子等瑞兽的权力与祥瑞寓意

龙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图腾，其形象在闽南建筑中几乎无处不在。在宫庙与祠堂的屋脊上，泥塑或剪黏的双龙抢珠、双龙戏水等造型，往往气势磅礴，动感十足。龙是行云布雨之神，象征着风调雨顺；它更是皇权与神权的化身，代

表着至高无上的尊贵与权威。在细节雕琢上，龙身矫健有力，龙爪刚劲如铁，龙须飘逸灵动，每一处都洋溢着沛然的力量感。民间工匠在雕琢龙的形象时，又融入了丰富的想象，使其形态更加多样，既有威严的一面，也带有几分亲切的生命力，成为守护一方水土的重要神兽。

凤，被誉为“百鸟之王”，是高贵、美丽与祥瑞的象征。古语有云，“凤凰来仪，国之征祥”。在建筑装饰中，凤常常与牡丹组合，构成“凤穿牡丹”的图案，寓意富贵祥瑞。凤的形象通常被描绘得极为华丽，集众鸟之美于一身。其优雅的姿态和绚丽的羽翼，为原本庄重的建筑空间增添了一抹难得的柔美与亮色。在宗族祠堂或与女性空间相关的装饰中，凤的出现尤为频繁，它不仅象征着女性的尊贵与美丽，也寄托了家族昌盛、人才辈出的美好愿望。

狮子作为百兽之王，其形象源自域外，经由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演化为镇宅护卫的神兽。在闽南地区，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如寺庙、祠堂、大厝乃至桥梁的入口处，都会安放一对石狮。它们通常左雄右雌，雄狮脚踩绣球，象征权力与统一；雌狮抚弄幼狮，寓意子嗣昌盛，代代相传。闽南石狮的雕刻风格独具特色，造型夸张而富有神韵，双目圆睁，口阔齿利，鬃毛卷曲，姿态威猛又不失憨态可掬。它们不仅作为建筑的守护神，肩负着驱邪避煞的重任，更是工匠精神与地方艺术风格的完美体现，以其强大的气场，不动声色地彰显着主人的身份与地位。

（二）蝙蝠、鹿、鹤的谐音象征

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谐音象征是一种极富智慧与趣味的表达方式。工匠们巧妙地利用汉字同音或近音的特点，将一些看似普通的动植物与吉祥如意联系起来，创造出意蕴无穷的视觉符号。这种“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创作原则，在闽南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众通过解读这些谐音图案，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使得建筑本身也成了一种可以阅读的祈福文本。

蝙蝠因其“蝠”与“福”谐音，成为了福气与好运的化身。在闽南建筑木雕、石刻、彩绘中，蝙蝠是最为常见的吉祥动物之一。单独出现的蝙蝠寓意“福”，五只蝙蝠环绕着一个“寿”字或寿桃，则构成“五福捧寿”的经典图案，象征着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五种福气。有时，蝙蝠会与铜钱组合，称为“福在眼前”；倒挂的蝙蝠则意为“福到”。这些灵动的蝙蝠形象，或飞翔于梁枋之上，或栖息于窗格之间，将无形的“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视觉艺术，传递着朴

素而真挚的生活祝福。同样，鹿因“鹿”与“禄”谐音，代表着功名利禄、高官厚爵。鹤则因其姿态优雅、寿命绵长，被视为长寿的象征，“鹤”也常与“贺”通用，表达祝贺之意。鹿与鹤常一同出现，构成“六合同春”或“鹤鹿同春”的画面，寓意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并祝福人们福禄双全，健康长寿。这些谐音手法，使装饰图案的内涵更加丰富，充满了浓郁的民俗趣味和文化底蕴。

（三）牡丹、莲花、梅兰竹菊等植物寓意

植物花卉是构成闽南建筑装饰语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缤纷的色彩、优美的形态和深厚的文化寓意，装点着人们的生活空间，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品德与理想生活的向往。从富丽堂皇的牡丹到清雅脱俗的莲花，再到象征君子风骨的梅兰竹菊，每一种植物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密码。

1. 牡丹被誉为“花中之王”，其花朵硕大，色彩艳丽，仪态万方，自唐代以来就被视为富贵荣华的象征。在闽南建筑装饰中，无论是木雕、石刻还是彩绘，牡丹的形象都极为常见。它常常与石头组合，寓意“富贵寿考”；或与凤鸟相伴，构成“凤穿牡丹”，象征祥瑞富贵。盛开的牡丹图案，以其雍容华贵的气质，为整个建筑空间营造出一种热烈、喜庆、繁荣的氛围，直接表达了人们对物质丰裕、生活美满的追求。

2. 莲花则以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成为纯洁、高雅与圣洁的象征。作为佛教中的重要符号，莲花在寺庙装饰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佛陀与菩萨多坐于莲花宝座之上，象征着佛法的清净与庄严。莲花也因“莲”与“连”谐音，被赋予了“连年有余”（莲花与鱼）、“连生贵子”（莲花与桂圆）等吉祥寓意。莲花图案的运用，不仅体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也反映了人们对高尚品德的崇尚和对子孙绵延的期盼。

3. 梅、兰、竹、菊被合称为“四君子”，它们各自代表着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是文人精神在建筑装饰中的投射。梅花在严寒中绽放，象征着傲骨与坚韧不拔的精神。兰花空谷幽香，代表着典雅、高洁的品行。竹子中空有节、四季常青，比喻君子的虚心、气节与顽强的生命力。菊花在深秋凌霜开放，象征着隐士的淡泊与高逸。

4. “四君子”的题材广泛应用于书院、宅邸的门窗、格扇、屏风等处，其清雅的形态不仅美化了建筑，更重要的是，它时时刻刻提醒着居住者要修身养性，追求君子般的品德与情操。这种将自然属性与道德寓意相结合的装饰手法，深刻

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视，使建筑空间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二、人物故事与历史典故

如果说动植物图案是闽南建筑对自然万物的诗意转译，那么人物故事题材的装饰则是将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人心的道德伦理和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以一种“连环画”的形式，永久地定格在建筑的肌理之中。这些故事不仅是装饰，更是教化民众、凝聚宗族、传承文化的生动教材。

（一）“二十四孝”等儒家伦理故事的教化功能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念，在闽南建筑装饰中得到了系统而形象的展现。其中，以“二十四孝”故事最为典型。“二十四孝”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从上古到宋元时期二十四个孝子的感人故事，如“卧冰求鲤”、“恣蚊饱血”、“哭竹生笋”等。这些故事被广泛地雕刻在祠堂的梁枋、墙壁的水车堵或石窗之上，成为一部立体的、永不落幕的道德教科书。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中，祠堂是家族的圣殿，也是教育子孙后代的重要场所。当族人在此进行祭祀、议事等活动时，抬头可见这些生动的孝行故事，耳濡目染之下，孝道伦理便潜移默化地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这些雕刻作品通常人物表情生动，情节突出，极具叙事性，让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看懂其中的寓意。通过这种艺术化的方式，建筑超越了其居住和使用的基本功能，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淳化民风、巩固宗族凝聚力的重要教化使命。

（二）“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英雄叙事

除了伦理教化，“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中的英雄叙事和战争场面，也是闽南建筑装饰中极受欢迎的题材。这些故事充满了忠义、智慧、勇武和奇幻色彩，满足了民众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对传奇的向往。工匠们选取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情节，如“三英战吕布”、“赵子龙单骑救主”、“姜子牙封神”等，通过精湛的剪黏、泥塑、木雕等技艺，将其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屋脊、山墙和墀头等显眼位置。

这些英雄故事的装饰，不仅仅是为了视觉上的冲击力。在“三国”故事中，关羽的“义”、诸葛亮的“智”、赵云的“勇”，都是民间推崇备至的品质。将这些形象置于宫庙或祠堂之上，一方面是借由英雄神武的形象来镇宅驱邪，另一

方面也是对这些优秀品质的颂扬和倡导。而“封神演义”中各路神仙斗法、降妖除魔的场景，则为建筑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反映了民众丰富的想象力和趋吉避凶的心理。这些装饰使得建筑仿佛成了一座凝固的舞台，上演着一幕幕永不落幕的英雄史诗，极大地丰富了建筑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这些英雄人物和战争场面，在构图上往往繁复而饱满，人物众多，动态十足，充满了张力。例如，在屋脊的剪黏作品中，工匠们利用色彩斑斓的瓷片，塑造出盔甲鲜明、战马嘶鸣的宏大场景，极具视觉震撼力。这种充满“武场”气息的装饰，与表现文人雅士、生活场景的“文场”题材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闽南建筑装饰丰富多样的叙事体系，使得每一座建筑都成为了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故事会。

（三）戏曲场景与民间传说

闽南地区戏曲文化源远流长，歌仔戏、高甲戏、梨园戏等地方剧种深受民众喜爱，是民间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戏曲的热爱，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建筑装饰之中。许多庙宇和宅邸的装饰题材，直接取材于流行的戏曲剧目，将舞台上最精彩的瞬间定格为永恒的艺术。这些装饰被称为“戏文堵”，通常位于水车堵、柜台脚等位置，以泥塑、彩绘或木雕的形式展现。

这些戏曲场景的雕刻极为传神，人物的服饰、身段、表情、功架都严格遵循戏曲的程式，内行人一眼便能认出是哪一出戏的哪一个经典场面，如“郭子仪拜寿”、“狄青战八宝公主”等。建筑因此成为了一个露天的戏曲博物馆，记录着地方的戏剧生态和民众的审美趣味。这种装饰手法的盛行，不仅拉近了建筑与民众生活的距离，也使得建筑本身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和烟火气，成为社区文化记忆的载体。“八仙过海”、“妈祖传说”、“陈三五娘”等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也是装饰艺术的重要灵感来源。这些神仙与凡人的故事，融合了奇幻、爱情、劝善等元素，以具象化的方式出现在建筑的各个角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建筑增添了浪漫与传奇的色彩。

三、几何纹样与文字符号

在具象的动植物和人物故事之外，闽南建筑还大量运用了抽象的几何纹样与文字符号，它们以规整、连续、循环的形态，或以高度图案化的文字造型，传递着更为纯粹和哲学的吉祥寓意。这些纹样不仅起到了点缀和分割空间的作用，更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生命和秩序的理解。

（一）“万字不到头”、“龟背纹”等连续纹样

连续纹样以其无限循环、无始无终的特点，在视觉上形成一种优美的韵律感和秩序感，其本身就象征着“连绵不绝”、“源远流长”。其中，“万字不到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它由无数个“卍”字形（或变体）向四方连续不断地延伸而成，寓意着福气、财富和好运如同江水般滔滔不绝，永不枯竭。这种纹样常用于窗格、栏杆、墙饰和家具的边缘装饰，其规整而富于变化的线条，为建筑增添了典雅而深邃的韵味。

龟背纹，又称“龟锦纹”，是由正六边形组成的连续图案，因形似龟甲而得名。龟在中国文化中是长寿和祥瑞的象征，龟甲坚固，被视为一种神圣的保护力量。因此，龟背纹被广泛应用于地面铺装、墙体装饰和门窗格心之中，寄托了人们对健康长寿、平安坚固的美好祝愿。这些几何纹样超越了具体的物象，以一种抽象的、数学般的美感，表达了对于永恒、秩序和福祉的终极追求，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宇宙观。

（二）福、寿、喜等文字的图案化处理

将汉字本身作为装饰元素，是中国艺术独有的创造。在闽南建筑中，承载着吉祥寓意的“福”、“寿”、“喜”等文字，被工匠们进行了极具想象力的图案化、艺术化处理，使其超越了文字的范畴，成为一种信息与美学高度融合的视觉符号。这种手法既直白地表达了祝福，又充满了设计的巧思。

1. “福”字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吉祥文字。它常常被雕刻在照壁、门窗、家具等处。最著名的设计是“福寿双全”，即将“福”字与“寿”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还有“百福图”，即将一百个不同写法的“福”字组合成一幅装饰画，寓意福气满满。

2. “寿”字也常被艺术化，最常见的便是将“寿”字拉长变形，或与其他图案结合，如与桃子（寿桃）、仙鹤、龟等长寿象征物组合，创造出“五福捧寿”、“寿比南山”等吉祥图案。有时，“寿”字本身就会被设计成一个老寿星的抽象形态，极富趣味。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文字符号，不仅是装饰，更是一种文化宣言，将人们对幸福、长寿、喜庆的向往，以最醒目、最直接的方式烙印在生活空间之中。

（三）八卦、太极等道教符号的运用

道教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生命观，这种影响也清晰地反映在闽

南建筑的装饰符号上。八卦与太极图是道教思想的核心代表，它们被认为蕴含着宇宙的根本规律，具有解释万物、调和阴阳、趋吉避凶的神秘力量。因此，在建筑中运用这些符号，其首要功能便是镇煞、辟邪，保护宅院的安宁。

太极图以其阴阳鱼旋转追逐的形态，象征着宇宙万物对立统一、循环往复的根本法则。八卦则是由三个阳爻或阴爻组成的不同卦象，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及其背后蕴含的哲理。在闽南民居和宫庙中，八卦图或后天八卦镜常常被悬挂于门楣之上，正对巷道或屋角等可能带来煞气的地方，以期“以正压邪”，起到风水上的防护作用。这些符号的运用，为建筑注入了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氛围，使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寻求与宇宙秩序和谐共存的能量场，体现了人们在营造居住环境时，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以及对平安和谐的深切渴望。

第三节 空间布局的文化内涵

闽南传统建筑的空间布局，宛如一部以砖石写就的厚重史书，其字里行间深刻地烙印着千年文化的精髓。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居住需求而进行的简单空间分割，更是一种文化观念与社会伦理秩序的物化体现。从宏大的聚落形态到精巧的宅院内部，每一个空间单元的设定，都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与价值取向。

一、儒家礼制思想的体现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所倡导的“礼”与“序”，深刻地影响了闽南建筑的营造法则。建筑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物理居所，更是一种承载宗法伦理、固化社会秩序的无形教化场域。这种思想渗透在建筑的每一个角落，通过严谨的空间组织，将抽象的伦理观念转化为具体可见的形态。

（一）中轴对称与主次分明的秩序感

闽南传统民居，尤其是被称为“皇宫起”的官式大厝，其空间结构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严格遵循中轴对称的原则。一条无形的纵向轴线贯穿始终，统领着整个建筑群的布局。从入口的门楼开始，依次设置天井、厅堂，直至最后的后罩房，所有重要的建筑单元均被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呈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秩序感。这种布局方式源于中原传统的建筑理念，是对宫殿、庙宇等高级别建筑形制的借

鉴与模仿，体现了对权力和秩序的尊崇。

中轴线两侧的建筑则严格按照对称的原则进行配置，如护厝、厢房等附属用房，像两翼一样左右展开，无论在数量、体量还是装饰上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种对称不仅创造了视觉上的均衡与和谐之美，更重要的是，它在空间上明确了“中为至尊”的观念。位于中轴线上的厅堂，作为奉祀祖先、神明和接待重要宾客的场所，其地位无疑是整个宅院中最为尊贵的。而两侧的厢房和护厝则为主人的居住空间，地位次之，从而形成一个主次分明、等级清晰的空间序列。这种布局将儒家所强调的等级观念与伦理秩序物化为可见的建筑形态，使居住者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并遵循这种秩序。闽南建筑中，不同级别的住宅形制体现了严格的社会阶层划分，详细的形制等级可见下表。

闽南传统住宅形制等级表

形制等级	典型名称	特征布局	象征意义
最高级别	皇宫起 / 五落大厝	多进深、四 / 六护厝	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官宦人家
中等偏上	四点金	典型四合院，双护厝或单护厝	富商或大家族族长，财富与稳定
中等偏下	三开间 / 一条龙	单进深，无护厝或一侧护厝	小康之家，基本生活需求
最低级别	庵仔厝	简陋平房，单间或两间	贫困人家或佃农，简易居所

（二）“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空间安排

儒家伦理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观念，在闽南民居的房间分配上得到了细致入微的体现。建筑空间的分配权往往与家庭成员的辈分、身份和性别紧密挂钩，构成了一套不成文却被严格遵守的居住法则。这套法则将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通过固定的空间位置加以强化和确认，使得建筑成为维系家族秩序的重要载体。

在传统的“皇宫起”大厝中，位于中轴线上“上落”或“顶落”的正房，即厅堂两侧的房间，被称为“大房”，是整个宅院中地位最尊贵的卧室。这里通常由家族中最受尊敬的长辈，即户主夫妇居住。其中，又以左侧（东大房）为尊，这与古代“左祖右社”的观念一脉相承，强调了家族传承的重要性。这样的安排，确保了长辈在家庭中的核心与权威地位，其居住空间直接与供奉祖先的厅堂相连，象征着其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

随着“大房”往下，两侧护厝或厢房的房间则按照“左尊右卑”的原则，依次分配给下一代的家庭成员。长子夫妇通常居住在紧邻“大房”的左侧护厝，次子及其他兄弟则依次安排在右侧及其他位置。尚未成家的子女或较为疏远的亲属，则可能被安排在离核心区域较远的前落或后罩房。这种看似简单的房间安排，实则是一幅生动的家族伦理图谱，它将家庭成员的亲疏远近、长幼次序清晰地镌刻在空间格局之上，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安其分，守其礼”。

（三）内外有别、男女有别的空间划分

在儒家礼制的深刻影响下，闽南传统建筑的空间序列还严格遵循“内外有别”与“男女有别”的原则，构建起一个既有开放交流又不失私密性的复杂空间系统。这不仅是对家庭生活区域的功能性划分，更是对社会交往礼仪和性别角色的空间固化，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男性与女性活动范围的明确界定。

“内外有别”主要体现在空间的递进层次上。通常以厅堂为界，形成前后的空间区隔。前部的天井、下落（前厅）以及两侧的厢房，构成了相对开放的“外”空间，主要用于接待普通宾客、处理日常事务以及作为男性成员的活动区域。而穿过厅堂进入后方的后轩、后罩房等区域，则属于私密性极强的“内”空间。这里是家族女眷，特别是未出嫁的女儿们的主要生活场所，未经允许，外人尤其是成年男性不得随意入内。这种层层递进、内外分明的布局，如同设置了一道道无形的屏障，有效地维护了家族生活的私密性与尊严。具体来看，其划分逻辑如下：

1. 公共与半公共领域：大门、门埕及下落（前厅）构成了宅院的对外接口，是家族与外界社会接触的缓冲地带，承担着主要的社交功能。
2. 核心礼仪与半私密领域：中轴线上的正厅是家族举行重要仪式、供奉祖先和接待贵客的核心礼仪空间，其两侧的大房虽为卧室，但因其位置的重要性，也带有半私密的性质。
3. 高度私密领域：“后落”或“后罩房”是整个宅院最深邃、最隐秘的部分，专属于女性成员，形成了所谓的“深闺”，充分体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与性别角色期待。这种空间设计，既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也同时是一种无形的约束。

二、宗族观念与聚落形态

在闽南社会深厚的文化土壤中，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观念是凝聚社会的基本

力量，它深刻地塑造了闽南地区的聚落形态。建筑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宗族繁衍与发展的物质载体，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强大内聚力和鲜明特征的有机社会体，清晰地展现了家族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变迁。

（一）以宗祠为中心的村落布局

闽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其空间组织的灵魂与核心往往是那座雄伟壮丽的宗族祠堂。祠堂不仅是祭祀共同祖先、追溯血脉源流的神圣殿堂，更是整个村落空间布局的基点和精神向导。村落的选址与规划，常常以祠堂为中心展开，民居建筑群则围绕祠堂有序排列，形成一种众星拱月般的向心式格局。这种布局直观地体现了宗族至上的集体意识，强化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认同感。

祠堂通常被选址在整个村落风水最佳、地理位置最为显要的地方，其建筑規制、体量和装饰工艺也往往是村中所有建筑里最高等级的。它既是家族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也是处理宗族内部公共事务、执行族规、举办庆典和教育族中子弟的中心场所。所有民居的朝向、排列都似乎在向祠堂行注目礼，无论身处村落的哪个角落，宗祠的轮廓总是天际线上最醒目的标志，时刻提醒着每一个族人其身份归属和应尽的义务。

这种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使得整个村落宛如一个放大的家族庭院。民居的排列并非随意，而是常常遵循着与宗祠的血缘亲疏关系。离祠堂最近、位置最佳的地块，通常分配给族中辈分最高、地位最核心的支脉。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居住位置也相应地向外围扩展。通过这种空间上的亲疏远近，宗族内部的层级结构被清晰地投射到地理空间之上，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血缘地理图。

（二）支系繁衍与民居的扩张模式

闽南民居的生长与扩张，生动地演绎了一部家族繁衍与分化的史诗。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子孙支系的繁衍，单一的院落已无法满足居住需求，于是便产生了极具特色的民居扩张模式。这种扩张并非杂乱无章的添建，而是遵循着一套严谨有序、源于宗法伦理的生长逻辑，最典型的便是以“护厝”的增加来实现空间的拓展。

最初的民居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三开间或五开间单体，即一条龙式。当长子成家后，通常不会立即分家另过，而是在主厝的两侧加建房屋，这便是“护厝”，形成了最初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布局。护厝的出现，标志着家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次子、三子等相继成家，如果空间允许，便会在第一对护厝之外，继续向两侧加建第二对、第三对护厝，形成双护厝、四护厝甚至更多层次的格局。

这种向两侧横向发展的模式，被称为“出规”或“出手”，形象地如同螃蟹伸出蟹螯。每一对护厝的增加，都代表着一个新家庭单元的诞生，它们虽然在经济上可能已经独立，但在空间上依然与主厝紧密相连，共同生活在一个大的屋檐下。这种扩张模式最大限度地维系了大家族的完整性和凝聚力，使得各支系既有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又便于日常的相互照应与交流，是“分家不分爨”生活方式的完美建筑体现。当横向发展空间受限时，也会出现纵向的“五落大厝”等多进深模式，但以加建护厝的横向扩张最为普遍，它如实地记录了宗族从小到大、由简入繁的生命历程。

（三）公共空间（埕、井、社）的共享性

在紧凑的闽南聚落中，除了私密的居住空间，还存在着一系列由全体村民或部分族人共同拥有和使用的公共空间，其中，“埕”、“井”和“社”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要素。这些空间不仅满足了村民们基本的生活生产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们扮演了促进邻里交往、强化社区认同、举行公共仪式的重要角色，是维系宗族社会活力的关键节点。

“埕”，即院落前或建筑群之间的开阔硬化场地，是闽南聚落中最常见也最富活力的公共空间。大厝前的门埕，既是各家各户翻晒谷物、处理农副产品的劳动场所，也是孩子们追逐嬉戏的乐园。夏日夜晚，这里是村民们纳凉聊天、交流信息的天然社交舞台。而宗祠前更为广阔的“公埕”，则承载着更为神圣和隆重的公共功能，家族的祭祀、演戏、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埕的存在，打破了独立住宅的封闭性，为血缘和地缘交织的乡村社会提供了宝贵的交流与互动平台。

“井”是传统村落的生命之源，一口公用的水井往往是整个村庄或一个房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围绕着水井，自然形成了妇女们洗衣、淘米、汲水的聚集点，这里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信息传递和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井边的是非长短、邻里关怀，构成了乡村社会温情脉脉的日常图景。对水源的共同依赖，也无形中增强了村民们的集体归属感和休戚与共的意识。

“社”，即土地公庙，是守护一方水土的社区保护神。它通常位于村头、村尾或水口等关键位置，规模虽小，却是村民精神寄托的重要所在。定期的祭拜活动，将全村人凝聚在一起，共同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这种基于共同信仰的集体仪式，超越了单纯的血缘关系，将地缘社区的成员紧密地联系起

来，强化了社区的整体性和神圣性。埕的开放、井的共享、社的共祭，共同构筑了闽南聚落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生活领域。

三、风水观念与环境选择

风水，作为一种深刻影响中国古代人居环境选择与营造的独特观念体系，在闽南建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关于如何协调人、建筑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经验哲学。这种观念将建筑视为有机生命体，力求通过合理的选址与布局，实现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融。

（一）“天人合一”的选址理念

闽南传统建筑的选址过程，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生动实践。古人相信，人与自然是相互感应的有机整体，理想的居住环境应当能够“藏风聚气”，使人获得大地的滋养和庇护。因此，在建造房屋之前，聘请专业的“地理仙”进行堪輿选址，是必不可少的首要环节。这一过程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与细致的观察，力求为家族的繁荣昌盛找到一块理想的“吉地”。

典型的理想风水格局讲究“背山面水，负阴抱阳”。建筑的后方需要有稳定、厚重的山脉作为“靠山”，象征着基业稳固，能得到贵人扶助。前方便是开阔的“明堂”，最好有河流或池塘环抱，即所谓“玉带缠腰”，水在风水中主财，流动的水源被视为财富与生机的象征。左右两侧则需要有较低的“青龙”、“白虎”砂山作为护卫，形成一个三面或四面围合、开口朝南的U形或马蹄形环境。这种格局不仅在心理上给予人安全感和稳定感，在实践中也具有科学性：背山可以阻挡冬季凛冽的北风，面水便于取水灌溉和生活，朝南则能获得最佳的日照。

（二）对采光、通风、排水的科学考量

尽管风水观念带有浓厚的象征色彩，但其许多原则在客观上却暗合了现代建筑的生态与物理环境要求，尤其体现在对采光、通风和排水的科学考量上。这些设计智慧巧妙地融入建筑布局之中，旨在应对闽南地区夏季炎热潮湿、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创造一个舒适宜居的室内微环境，是古人朴素生态观的直接体现。

闽南民居中的“天井”是调节室内微气候的核心构件。天井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大进深建筑的内部采光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自然通风系统。白天，天井下的空气受热上升，形成负压，能够将两侧房间内相对凉爽的空气“拔”入并流通，形成“拔风”效应，带走室内的闷热与潮气。这种“光厅暗

房”的设计，即厅堂面向天井开敞明亮，而卧室的窗户则较小且位置较高，既保证了厅堂的通风采光，又避免了卧室受到过多日晒，保持了室内的阴凉。建筑山墙上部常设的各式花窗，亦是兼具装饰与通风散热功能的精巧设计。

对于排水，闽南人更有“千银起厝，万银放水”的说法，足见其对排水系统的重视。屋顶通常采用陡峭的“双坡曲”屋面，如燕尾脊，利用其大坡度快速排走雨水。而天井则是汇集和排放雨水的重要枢纽，雨水通过天井地面流入预设的阴沟暗涵，最终排出宅外。这种“四水归堂”的布局，在风水上被赋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聚财寓意，而在功能上则高效地解决了大面积建筑群的雨水疏导问题，避免了内涝，保持了宅院的干爽。

（三）趋吉避凶的心理慰藉功能

风水观念在闽南建筑中的应用，除了实际的环境考量外，更承载了深厚的趋吉避凶、祈福纳祥的心理慰藉功能。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对自然灾害和人生祸福缺乏掌控能力的传统社会，风水提供了一套可供理解和操作的象征体系，通过对建筑环境的精心布置，来寻求对命运的积极干预，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安宁与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赋予特定的风水含义。例如，大门的朝向需经过罗盘的精确测算，以期纳入吉祥的“气”；屋脊的高度、厅堂的深宽，都要符合特定的“尺寸白”，以求合乎天地之数。在屋脊之上，常常安置着形态各异的“厌胜物”，如威猛的风狮爷、英武的瓦将军，或是陶制的宝塔、葫芦等，它们被认为是镇宅辟邪、防止灾祸的守护神。墙体上精美的“出砖入石”砌法，或是彩绘、剪瓷的吉祥图案（如麒麟、凤凰、蝙蝠等），无一不是为了营造一个充满祥瑞之气的居住环境。

这些风水实践，构成了一道坚实的心理防线。无论是应对台风、瘟疫等自然灾害，还是面对家族兴衰、个人命运的起伏，人们相信，一个符合风水原则的“好风水”住宅，能够为家族带来好运，保佑子孙平安、富贵绵长。这种信念极大地缓解了人们在未知与不确定性面前的焦虑感，给予了他们积极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因此，风水不仅是营造物理空间的技术，更是构建精神家园的艺术，深刻地反映了闽南人务实而又充满想象力的生活态度。

第四节 建筑符号的社会意义

闽南传统建筑不仅是物理空间上遮风避雨之所，它更是一部凝结在砖石木雕中的社会文化法典。其一砖一瓦、一木一石，每一处装饰细节，都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默默地讲述着主人的身份地位、财富荣耀与精神追求，共同构筑了一个等级森严却又充满活力的符号体系。

一、门第观念与等级标识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家族的地位与声望是衡量个体价值的核心标准。闽南地区作为宗族观念极为深厚的区域，其建筑更是将这种门第观念物化到了极致，通过一套严谨而清晰的视觉符号，将社会等级秩序铭刻在每一座宅院的门楣与屋脊之上。

（一）门楼的规模、装饰与主人身份

门楼，作为建筑的“脸面”，是宅邸主人社会地位最直观的展演场。在闽南，门楼的形制、规模与装饰的繁简程度，都受到严格的规制，成为不可逾越的等级标识。普通民居通常仅有简单的石框门或小尺寸的砖砌门罩，朴素无华。而官宦之家、乡绅望族的门楼则截然不同，其规模宏伟，常采用多层出挑的斗拱结构，屋顶覆以琉璃瓦，显得气派非凡。门楼的开间数量同样是重要的区分标准，三开间、五开间乃至更为宏大的门楼，清晰地对应着主人从地方士绅到朝中大员的不同官阶。

装饰的精细度与题材选择更是身份的注脚。官宦府邸的门楼多装饰有龙、凤、麒麟等与皇权、祥瑞相关的图案，木雕与石雕工艺极尽精湛，旨在彰显主人的尊贵与朝廷的恩宠。富商巨贾的门楼则可能在合乎规制的前提下，以更为精巧繁复的雕刻展示其财富实力，但其题材会谨慎地避开官家的专属纹样。这种建筑语言的运用，使得任何一个过路人，无需步入宅院，仅通过观察门楼，便能对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阶层有一个清晰的预判，深刻反映了传统社会中“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

（二）旗杆石、功名匾额的荣耀彰显

如果说门楼是身份的静态展示，那么旗杆石与功名匾额则是家族荣耀的动态宣告。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获取功名是光宗耀祖的最高成就。闽南地区凡有

族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定等级的功名（如举人、进士），便有资格在宗祠或家宅前的广场上竖立旗杆石。这种由花岗岩雕凿而成的石座，成对出现，中间的圆孔用以安插旗杆，悬挂功名旗。旗杆石的数量与形制，直接与族人获得的功名等级与数量挂钩。一排排耸立的旗杆石，如同无言的功勋碑，是家族文运昌盛、人才辈出的最佳证明，其威严与荣耀感，远非金银财宝所能比拟。它们不仅是对族内子弟的激励，更是对整个社区乃至地方展示家族实力的重要方式。

功名匾额则更为直接地彰显着皇权认可的荣耀。这些由皇帝、朝廷高官或地方大员题赠的匾额，通常悬挂于宅邸或祠堂最显眼的正厅上方。匾额上的“进士及第”、“文魁”、“武魁”等字样，不仅是个人成就的象征，更是整个家族的无上荣光。匾额的材质多为名贵木材，字体或端庄或遒劲，配以金漆或彩绘，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的存在，意味着家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与庇护，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每当有宾客来访，这些高悬的匾额便成为最无需言说的家族介绍信，默默地讲述着此地曾经或正在发生的辉煌，将抽象的声望与荣耀转化为具体、可见的建筑符号。

（三）燕尾脊、马背墙的等级差异

屋脊，作为建筑最顶端的收束，其造型在闽南建筑语汇中同样扮演着区分等级的重要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燕尾脊”与“马背墙”的差异。燕尾脊，其屋脊两端向上翘起，分叉的形态酷似燕子的尾巴，线条灵动优美，充满昂扬向上的气势。这种造型并非所有建筑都能随意使用。在严格的礼制约束下，燕尾脊通常专属于寺庙、宫观、祠堂等公共祭祀性建筑，以及拥有官品的官宦府邸或有功名的士绅住宅。它象征着尊贵、权威与与上天沟通的特权。一座村落中，高高翘起的燕尾脊在天际线上划出优美的弧线，无疑标志着该建筑主人的不凡身份。

相较之下，“马背墙”则是更为普遍的民居屋脊形式。其山墙的形状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演化出五种不同的样式，即圆润的“金形”、挺直的“木形”、曲折的“水形”、尖锐的“火形”和方正的“土形”。尽管马背墙的使用范围比燕尾脊广泛，但其造型的选择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蕴含着房主对家族运势的祈盼与风水观念的考量。例如，富商希望财源滚滚，可能会选择“水形”山墙。虽然它不像燕尾脊那样直接与官阶挂钩，但其变化的形态与背后的五行寓意，依然构成了民居建筑内部一种微妙的等级与身份差异，反映了普通民众在礼制框架下，通过建筑符号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关于闽南传统建筑中常见的等级

符号，其对应的身份限制与象征意义，可见下表所列。

闽南传统建筑等级符号对照表

符号	建筑构件	适用等级 / 身份	象征意义
门楼形制	开间数量 / 装饰	官宦之家、乡绅望族	门第高低、官阶大小
旗杆石	成对花岗岩石座	获得功名（举人、进士） 的家族	家族文运、科举荣耀
燕尾脊	屋脊两端上翘分叉	寺庙、祠堂、官宦 / 有 功名士绅	尊贵、权威、与上天沟通
马背墙	五行山墙（金木水火土）	普遍民居	风水考量、对美好生活的 祈盼

二、商业精神与财富展示

闽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之地，发达的海洋贸易孕育了当地人敢拼会赢、务实重商的文化性格。这种精神深刻地烙印在建筑之上，使得闽南建筑，尤其是近代以来兴起的“番仔楼”，成为商业精神与财富积累的华丽宣言。

（一）“番仔楼”中西合璧的炫富性

“番仔楼”是闽南近代建筑中最具特色的类型，它们是侨居南洋的闽南商人衣锦还乡后兴建的住宅。这些建筑在空间布局上或许仍保留着传统闽南大厝的“深井”式格局，以满足家族聚居的需求，但在立面设计与装饰材料上，却大胆地引入了当时流行于南洋殖民地的西式建筑元素。华丽的罗马柱、科林斯柱头、圆拱形的门窗、彩色的几何花砖、繁复的西式灰塑，与闽南传统的红砖红瓦、剪黏雕塑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混合风格。

这种中西合璧绝非简单的照搬模仿，而是一种主动的、甚至带有强烈炫耀意味的选择。对于那些在海外辛苦打拼、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侨商而言，建造一座引人注目的番仔楼，是向家乡宗族与乡邻宣告自己成功的最佳方式。建筑上使用的进口水泥、钢筋、彩色玻璃和马赛克瓷砖，本身就是昂贵的舶来品，其运用无异于将财富直接砌在了墙上。建筑的“番”味越足，装饰越是繁复奇特，就越能彰显主人漂洋过海的经历与雄厚的经济实力。这种毫不掩饰的炫富性，正是闽南商人讲求实际、重视声望的商业精神在建筑上的直接投射。

（二）商号、商标在建筑上的镌刻

在商业活动极为发达的闽南城镇，建筑本身也成为了商业身份与品牌信誉的载体。特别是在泉州、厦门等地的近代商业街区，许多沿街商铺或住宅会将家族的商号、店铺的标识，甚至代表经营商品的符号，直接镌刻或塑造在建筑最显眼的位置，如山墙顶端、窗楣之上或入口两侧的匾额。这些标记有些是传统的汉字商号，以遒劲的书法展现着老字号的底蕴；有些则是融合了西洋设计风格的艺术字或图案，体现了与海外贸易接轨的现代意识。

这种做法，使得建筑不再仅仅是一个居住或交易的场所，它本身就成为了一块巨大的、永久性的商业广告牌。将商号刻在坚固的砖石结构上，传递出一种基业长青、诚信经营的心理暗示。对于一个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商业社会而言，这种以整个家族建筑为背书的品牌展示，是建立商业信誉、巩固市场地位的有效手段。它深刻地反映了闽南商人将家族荣耀与商业成就紧密捆绑的价值观，建筑成为记录与传承其商业传奇的“石史”。

（三）精细繁复的装饰作为财力的证明

无论是在传统的闽南大厝还是在近代的番仔楼中，精细繁复的装饰都是主人财力最雄辩的证明。在闽南建筑的“三雕”——石雕、木雕、砖雕上，这种财富的展示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栋豪宅的建造，往往会耗费巨资，邀请技艺最高超的工匠团队进行经年累月的精雕细琢。其装饰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材料的贵重，更在于其中蕴含的巨大的人工成本。

1. 木雕艺术的极致运用：在大厝的梁架、枋、拱、窗棂、隔扇等处，几乎无处不见繁复的透雕、浮雕。题材涵盖了历史故事、戏曲人物、花鸟鱼虫等，层次丰富，人物传神。一根小小的梁托，可能就雕刻着一整出《三国演义》的经典场景。这些精美绝伦的木雕，不仅营造了富丽堂皇的内部空间，其本身所耗费的工时与匠师的酬劳，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2. 屋脊上的彩色史诗：屋顶上的剪黏和交趾陶装饰，是另一处炫耀财富的焦点。工匠们用彩色瓷碗的碎片，精心拼贴出龙凤、花鸟、神仙人物等形象，色彩艳丽，经久不褪。这些装饰不仅工艺复杂，且位于建筑最高处，制作和安装难度极大，其成本远高于普通的瓦作。屋脊上装饰的题材越丰富，规模越宏大，色彩越鲜亮，就越能说明主人的不惜工本。

3. 石雕的坚实炫耀：在建筑的基座、墙裙、柱础、窗框等处，坚硬的花岗

岩被雕刻出细腻图案。从展现生活场景的浮雕，到寓意吉祥的动植物纹样，无不体现出高超的技艺。石雕的坚固耐久性，使其成为一种能够传之后世的财富象征，向子孙后代讲述着先辈创业的辉煌。

这些不厌其烦、不惜血本的精细装饰，其核心功能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美学范畴，它们是家族经济实力最直观、最坚固的具象化表达。通过将财富转化为精湛的、永固的艺术形式，闽南的成功商人们实现了家族声望的塑造与传承。

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濒海的地理位置与悠久的航海贸易传统，赋予了闽南文化一种与生俱来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种文化特质在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闽南建筑主动吸纳、巧妙改造外来文化元素，最终形成了一种独具魅力、自信自强的建筑风格，成为跨文化对话的杰出典范。

（一）南洋风格元素的主动吸纳

近代以来，随着大量闽南人“下南洋”并取得成功，他们带回的不仅是财富，还有在南洋地区（尤其是东南亚）接触到的多元建筑文化。这些被称为“番客”的归侨，在回乡建厝时，主动将南洋的建筑元素融入到家乡的宅邸之中。这种吸纳是全方位的，既有适应亚热带气候的实用性改造，也有纯粹出于审美趣味的装饰性借鉴。例如，为了应对闽南地区同样湿热的气候，他们引入了南洋殖民地风格建筑中常见的“五脚砌”（骑楼），在沿街建筑底层留出公共的、带遮蔽的步行通道，既利于经商，也方便行人。

同样出于对通风和遮阳的考虑，具有南洋特色的百叶窗、通花气窗以及宽大的外廊被广泛采用。这些元素不仅改善了传统大厝的采光与通风性能，也为建筑带来了异域的风情。地面铺设的彩色几何图案花砖，也是从南洋舶来的流行样式，其明快的色彩和多样的图案，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建筑内部的视觉效果。这种对南洋风格元素的主动吸纳，体现了闽南人务实的态度和开放的视野，他们乐于接受一切能改善生活品质、彰显自身独特经历的新事物。

（二）异域装饰符号的本土化改造

闽南建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本土化”改造过程。外来的装饰符号在被闽南工匠使用的过程中，往往会经过一番巧妙的“转译”，使其在保留异域风情的同时，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与文化寓意。这是一个双向的文化对话与融合。例如，在番仔楼的西式山花或柱头上，常常可以看到本应是天使或圣徒形象的位置，被替换为中国传统的戏曲人物或吉祥童子，他们的面容和姿态被雕刻得更具中式神韵。

国外的花草纹样，如卷草、葡萄藤等，在传入后也常常与中国的牡丹（富贵）、莲花（纯洁）、蝙蝠（福气）等传统吉祥图案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全新装饰语汇。甚至连西式建筑中的科林斯柱头，其茛苕叶的造型有时也会被雕刻成更为圆润、饱满的形态，以迎合中国人追求圆满、福气的审美心理。这种创造性的改造，消解了外来符号可能带来的文化隔阂，使其自然地融入到闽南的建筑文脉之中，体现了闽南文化强大的消化能力与再创能力。

（三）建筑风格作为文化自信的体现

遍布闽南各地的中西合璧建筑，尤其是那些极尽华美的番仔楼，最终成为了闽南人文化自信的有力物证。在那个中国外文化激烈碰撞、许多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动摇的时代，闽南的归侨和工匠们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固步自封。他们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姿态，将国外建筑的结构、材料和装饰符号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素材”，有机地嫁接到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建筑范式之上。

这种融合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主体性高度认同的基础之上的。无论外部装饰如何“番”，其内部空间的核心依然是符合传统伦理观念的院落布局；无论柱式和窗套如何西化，其屋顶可能依然高高翘起着传统的燕尾脊。因此，建筑在这里不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场所，它更像是一种坚定的文化宣言，宣告着在跨文化交流的浪潮中，闽南人不仅能够积极参与，更能够游刃有余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时代风格。

第五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红砖传播

发源于泉州、漳州等地的红砖建筑，作为闽南文化最鲜明的视觉符号，其传播轨迹与闽南人开拓海洋的步伐紧密相连。当满载着丝绸与瓷器的帆船驶向茫茫大海时，船舱中不仅有珍贵的商品，更有承载着乡土记忆与文化基因的工匠、图纸与营造技艺。这条蔚蓝的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一条承载着红砖文化的传播之路。

第一节 闽南商帮与建筑文化输出

明清以降，一批又一批闽南人“驾长风，破万里浪”，构建了遍布东亚与东南亚的庞大贸易网络。他们不仅是精明的商人，更是中华文化，尤其是闽南乡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随着财富的积累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他们将对故土的思念与文化认同，凝固在异国他乡的一砖一瓦之上。

一、闽南商帮的形成与活动范围

从唐宋时期被誉为“天子之南库”的繁荣，到元代泉州港被赞为“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闽南的海洋基因早已注定。明清时期，尽管官方时有海禁政策，但根植于血脉的海洋精神驱使着闽南商人冲破束缚，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海上商业时代。

（一）月港、厦门港时期的商帮网络

明朝中后期，尽管海禁政策一度森严，但根植于民间的贸易暗流却从未停歇。漳州月港在此时异军突起，成为民间冲破海禁政策、进行走私贸易的重要中心。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开放海禁，在月港设立督饷馆，史称“隆庆开海”，月港一跃成为明代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明确记载：“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商船从这里出发，东至日本、菲律宾，西达越南、马六甲，迅速形成庞大的贸易网络。月港的繁荣，标志着闽南商帮开始作为一个强大的商业集团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贩运丝绸、瓷器、

茶叶等大宗商品，也积极参与全球性的白银流动。

随着历史的演进，尤其是清初海禁的再度实施与解除，地理位置更优、港口条件更好的厦门港逐渐取代月港，成为新的贸易中心。郑成功集团曾以厦门为核心，建立起覆盖东亚、东南亚的庞大海上商业王国，与荷兰等国外势力展开激烈竞争。康熙年间开海后，厦门成为清代四大海关之一闽海关的所在地，其贸易网络进一步拓展。闽南商船的航迹遍布各地，他们建立的贸易网络，不仅是商品交换的通道，也成为人员迁徙、信息流通和文化交流的走廊，为后续建筑文化的输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闽南商帮，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和开拓精神。他们熟悉季风规律，掌握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福建船在当时被誉为最优良的舰船。他们建立的商帮网络，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内部组织严密，同时又具备开放性和灵活性，能迅速吸纳不同地区的商业伙伴，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开拓精神。

闽南海上贸易与红砖文化传播的关键时间节点可见下表。

闽南海上贸易与红砖文化传播关键时间节点表

时间	事件 / 政策	关键港口 / 地点	建筑文化意义
元代	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港	经济繁荣奠定建筑基础，推动早期营造技艺发展
1567 年	庆开海，设督饷馆	漳州月港	官方承认民间贸易，红砖文化开始规模性输出海外
明末清初	郑成功集团经营海上贸易	厦门港、台湾	促进海外贸易据点建设与闽南文化的移植
1684 年	清政府开海，设闽海关	厦门港	贸易网络扩大，侨汇兴建“皇宫起”式宏伟宅邸
近代	华侨经济达到高峰	东南亚各国、集美	形成独特的“侨乡建筑”风格，如著名的“嘉庚风格”

（二）在东南亚、台湾的贸易据点

闽南商帮的足迹遍布广阔的海洋，并在所到之处建立起稳固的贸易据点，形成一个个海外的“闽南社区”。在东南亚，西班牙人统治下的马尼拉、荷兰人控制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葡萄牙人经营的马六甲，以及后来的槟城、新加坡等地，都活跃着大量的闽南商人。他们或为中间商，将中国的商品转口至世界各地；

或在当地落地生根，经营种植园、矿山和各类店铺，逐渐积累起雄厚的经济实力。西班牙商船建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中，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是极其重要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很大一部分正是通过月港和厦门的闽南商人运抵马尼拉的。

台湾与福建隔海相望，自古便是闽南人迁徙和经商的重要目的地。明末，郑芝龙为解决福建饥荒，曾招募数万灾民，用海船运至台湾垦荒，这不仅促进了台湾的早期开发，也深化了两岸的民间联系。到了清代，随着大量移民涌入，台湾形成了以“郊”为形式的商业组织。这些“郊”按籍贯或贸易目的地划分，如与厦门贸易的称“厦郊”，与泉州贸易的称“泉郊”。郊商不仅垄断了特定航线的贸易，还深入地方社会，承担着修建庙宇、兴办公益等重要社会职能，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力量。

（三）商帮头领的乡土情结与建设行为

“探大钱，起大厝”是闽南人奋斗的朴素理想，对于远在海外的商帮头领而言，这份情感尤为强烈。无论在海外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他们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和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份情结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将巨额财富汇回故里，大兴土木，修建规制宏伟、装饰华丽的宗祠、宅邸和公共建筑。这些建筑不仅仅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对家族荣耀的彰显和对乡土文化的眷恋。

这些由侨汇兴建的建筑，在坚守传统闽南红砖建筑形制的基础上，也悄然融入了海外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侨乡建筑”风格。建筑的布局、结构和主要材料依然是传统的“皇宫起”大厝和标志性的红砖红瓦，但在门窗、廊柱、墙面装饰等方面，却可能出现南洋花砖、西洋式样的水泥雕塑、彩绘玻璃等。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正是闽南商帮跨文化经历的直观写照，是他们海洋记忆的物质载体，也让闽南的红砖建筑风貌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近代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便是在海外事业有成后，倾其所有在家乡集美兴办学村，其建筑群主体采用的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嘉庚风格”——即以传统闽南红砖建筑的屋顶搭配西式风格的墙体，成为中西合璧建筑的典范。这种建设行为，深刻地影响了闽南侨乡的建筑风貌，使得红砖不再仅仅是一种建筑材料，更承载了海外游子对家国的深情与贡献。

二、建筑技艺的跨文化传播

闽南建筑文化的海外输出，并非简单的建筑形式复制，而是一个涉及工匠流

动、图纸应用、材料置换与技术适应的复杂过程。在这场跨越海洋的文化对话中，闽南建筑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既保留了自身的核心特质，又与在地文化碰撞融合，创造出新的建筑篇章。

（一）闽南工匠的海外谋生与技艺传授

商船不仅载着商人，也载着百工百艺，其中便包括技艺精湛的建筑工匠。随着闽南商帮在海外聚居地的形成与发展，修建庙宇、宗祠、会馆和宅邸的需求日益增长，仅靠从家乡运输建材和预制构件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大批来自泉州、漳州等地的木匠、石匠、泥水匠、雕刻匠人跟随商船“出洋”，在异国他乡操持起熟悉的营生。这些工匠是闽南建筑文化移动的载体，他们脑海中装着完整的建筑图景，手中掌握着代代相传的营造技艺。

他们在海外的建造活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

1. 直接营造：在项目初期或关键性建筑的修建中，业主往往会不惜重金从闽南聘请整套工匠团队。他们严格遵循家乡的建造法式，从选址、布局到梁架结构、细部雕刻，都力求原汁原味。这种方式保证了建筑的“正宗”，使其成为海外最纯粹的乡土文化标本。

2. 技艺传授与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本地化需求的加深，闽南工匠开始在当地招收学徒，其中既有华裔子弟，也有当地土著。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当地的建筑传统和审美习惯发生交流。一方面，核心的营造法式得以传承；另一方面，一些装饰母题、材料处理方式乃至空间观念，则可能吸收当地特色，形成一种混合风格，展现出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二）建筑图纸、模型的携带与复制

在没有现代建筑设计图的时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相传”的口传心授和一套约定俗成的“法式”体系。闽南建筑同样如此，其营造技艺高度模块化和程式化，大木作的梁架结构、小木作的门窗雕花、瓦作的屋顶曲线，都有着相对固定的比例和做法。这种“标准化”的营造体系，使得建筑的异地复制成为可能。优秀的工匠领袖（“大木匠师”）就如同掌握着一套活的图纸，能够根据业主的需求和基地条件，在脑海中生成完整的建筑方案。

尽管完整的建筑图纸在古代并不普及，但一些关键部位的草图、尺寸图或局部大样图依然是重要的沟通和施工依据。我们可以合理推想，远赴海外的工匠会携带这类简要的图纸，作为施工的蓝本和备忘。类似于清代皇家建筑设计中使

用的“烫样”（按比例制作的建筑模型）的理念，也可能以更简易的形式存在于民间。工匠们或许会制作关键构件的模型，以便向业主展示和指导其他工匠施工，确保工程质量与家乡样式一致。

更重要的是，闽南建筑本身就是一本立体的教科书。当需要在海外复制一座建筑时，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回到家乡，对现有的优秀建筑进行测绘和记录。这种记录可能不是精确的图纸，而是包含了关键尺寸、构件形式、雕刻图案的速写和文字描述。凭借这些资料和工匠们扎实的技艺功底，一座远隔重洋的“复制品”便得以诞生。

（三）建筑材料的模仿与替代

红砖、红瓦、白石基、木梁架是闽南建筑的标志性物质构成。在文化输出的初期，一些富裕的侨领为了追求最纯粹的家乡风味，会不惜成本，用船将闽南本地产的红砖、筒瓦、石雕、木雕等建材运往海外。这些来自故土的材料，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乡愁印记，使得建筑的每一寸肌理都散发着家乡的气息。

但运输成本高昂且风险巨大，大规模的海外建设不可能完全依赖材料进口。因此，就地取材、寻找替代品成为更普遍和现实的选择。闽南工匠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在世界各地寻找并利用当地的材料来“复制”闽南风格。他们会寻找合适的黏土，采用家乡的烧制技术，在当地建造砖窑，生产出颜色和质地都接近闽南红砖的砖块。即使颜色有所偏差，那种熟悉的砌筑方式和肌理感依然能唤起强烈的文化认同。对于木材和石材，工匠们也会根据当地的资源状况，选择性能和外观相近的替代品，再用闽南的加工和雕刻技艺进行处理。这种对材料的模仿与替代，充分展现了闽南建筑技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其能够在全球多样的自然环境中生根发芽。

三、文化认同与乡愁的建筑表达

对第一代移民而言，建筑是庇护所；对后来的世代来说，建筑则是文化堡垒和精神家园。在远离故土的陌生环境中，一座具有鲜明家乡风格的建筑，能提供强大的心理慰藉和文化归属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更是对未来的承诺——承诺将这份独特的文化身份，在新的土地上延续下去。

（一）在异国他乡复制故乡建筑

海外闽南人社区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对故乡社会结构的完整移植。当经济条

件允许时，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复刻一座与家乡别无二致的宅邸或祠堂。这种复制行为，有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从建筑的整体布局（如多进深的院落）、屋顶高高翘起的燕尾脊，到墙面上精美的“出砖入石”工艺和五彩斑斓的剪瓷雕，每一个细节都力求与记忆中的祖厝保持一致。这种近乎执拗的复制，深刻地反映了移民群体对于自身文化源头的强烈认同和对文化流失的深切焦虑。

这些被“搬”到海外的建筑，就像一个个文化孤岛，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中，顽强地守护着闽南文化的内核。它们不仅是生活的空间，更是教育后代的活态教室。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习得语言、风俗和价值观念。建筑的每个角落，每处雕刻，都在无声地讲述着家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根源，将无形的文化传统固化为有形的、可感知的日常环境。

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青云亭，便是海外闽南建筑的杰出代表。它始建于明代，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华人庙宇之一，其建筑材料、工匠皆来自福建，整体建筑完全是闽南庙宇的风格。从梁架结构到木石雕刻，都体现了浓厚的泉州漳州工艺特征，成为研究闽南建筑文化海外传播的绝佳案例。

（二）宗祠、会馆作为文化地标

在海外的闽南人社会中，宗祠与会馆扮演着远超于建筑本身的核心角色。它们是血缘与地缘两种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是凝聚侨社、传承文化、维护权益的中心。宗祠以姓氏为纽带，是祭祀祖先、维系家族认同的场所；会馆则以原乡地域（如泉州府、漳州府，或具体到县如南安、同安）为基础，是乡亲们联络感情、共谋发展的公共空间。建筑形制上，它们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最能代表家乡荣耀的闽南传统风格，红砖大厝、雕梁画栋，使其在周遭环境中格外醒目，成为无可争议的文化地标。

这些建筑的功能是复合的。它们是宗教场所，供奉着家族的祖先牌位或妈祖、关帝等共同的乡土守护神。它们是议事中心，侨社的头领们在此商议重大事务，调解同乡间的纠纷。它们也是社交网络，乡亲们在这里婚丧嫁娶、庆祝节令，维系着紧密的人际关系。对于初来乍到的新移民而言，会馆更是他们获得帮助、找到工作、融入新环境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修建一座宏伟的宗祠或会馆，是整个乡族或同乡群体集体荣誉感的体现，也是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宣告。

（三）红砖作为“家”的视觉符号

在闽南建筑纷繁复杂的元素中，红砖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情感穿透力的符号。

这种以闽南特有的红土烧制而成的建筑材料，其温暖、明亮的色调，已经深深烙印在每一个闽南人的集体记忆中。它不仅构筑了“红砖厝”这一独特的建筑景观，更与“家”、“故乡”、“根”等核心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传承人蒋钦全所言，古建筑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乡愁。

当闽南人远渡重洋，这种温暖的红色便成为慰藉乡愁最直接的视觉密码。在东南亚许多华人聚居的城市街头，一片熟悉的红砖墙，一个优美的燕尾脊，就能瞬间唤醒他们内心深处对故土的思念。红砖建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告：“这里有我的同乡，这里有家的感觉。”它跨越了语言和文字的障碍，成为一种共通的文化身份标识，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闽南人能够迅速识别彼此，找到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砖的传播史，就是一部闽南人追寻、守护并重建“家园”的心灵史。

第二节 东南亚闽南红砖建筑

当闽南人踏上向海外迁徙的浪潮时，他们也将以红砖为鲜明特征的建筑文化带到了东南亚的各个角落。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土壤中，闽南红砖建筑与当地元素相互碰撞、交融，演化出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成为记录华人移民史与跨文化对话的生动篇章。从新加坡的喧嚣市井到菲律宾的殖民古城，红砖的印记无处不在，诉说着百年的沧桑与辉煌。

一、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红砖建筑

在华人移民历史悠久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闽南红砖建筑不仅是乡愁的慰藉，更是家族荣耀与社群凝聚力的象征。从庄严肃穆的宗祠会馆到富丽堂皇的私家宅院，红砖的运用既保留了闽南传统营造技艺的精髓，又在与在地文化的互动中，展现出独特的“南洋风格”，生动记录了华人社群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立业的百年历程。

（一）会馆、宗祠的建筑风格与规制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会馆与宗祠，是海外闽南社群的社会文化核心，其建筑形态是理解华人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的关键。这些建筑严格遵循闽南传统的布局与规制，例如采用多进式院落，中轴对称，以厅堂为中心，用于祭祀祖先和

议事集会。在建筑材料上，大量使用从福建原乡进口的红砖、红瓦以及精雕细琢的石构件，以确保建筑的“原汁原味”。新加坡的凤山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其石雕构件大多从惠安采购，工匠也由家乡聘请，力求再现闽南本土的建筑风貌。

在装饰艺术上，这些建筑更是极尽繁复华丽，屋顶上布满了色彩鲜艳的剪瓷雕，描绘着龙凤、花鸟和历史故事，展现了极致的宫殿式审美。山墙、屋檐和墙壁上随处可见精美的木雕、砖雕与彩绘，这些装饰不仅美观，更承载着吉祥如意、光宗耀祖的文化寓意。例如，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陈氏书院（陈氏宗祠），虽然规模上是广州陈家祠的缩小版，但其建筑布局、装饰构件和文化内涵都严格传承了中华传统，同时在外墙色彩上采用了更为鲜艳明快的粉绿与黄色，以适应当地的审美与气候环境。

这些会馆和宗祠不仅是祭祖的场所，也是同乡成员间重要的社交与互助平台。建筑内部的空间规划充分体现了其多功能性，设有议事厅、娱乐室等，以满足社群活动的需要。从建筑的功能和风格上，清晰地反映出海外华人既努力维持与祖籍地的文化联系，又积极适应在地社会、寻求发展的双重需求。建筑的每一块红砖、每一片雕刻，都凝聚着浓厚的乡情与家族记忆，是海外闽南人精神家园的物质载体。

（二）华人富商的豪宅别墅

在海峡殖民地时期，一批成功的闽南华商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兴建的豪宅别墅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被称为“峇峇娘惹”或海峡华人的富商，其宅邸在建筑上展现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文化融合特征。建筑主体结构常以闽南传统民居为蓝本，保留了红砖墙体、内部天井采光通风、以及象征家族伦理秩序的空间布局。前厅用于接待贵客、洽谈生意，体现了主人的社会地位；而后院则是女性家眷的生活空间，内外有别，井然有序。这种布局既是中国传统家族观念的延伸，也是商业活动与家庭生活紧密结合的体现。

这些豪宅在装饰上极尽奢华，大量融入了欧洲维多利亚时期与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元素。例如，建筑立面常常出现西式的科林斯柱、拱形门窗、精致的石膏线脚和铁艺栏杆。室内则陈设着来自欧洲的家具、吊灯和彩色玻璃，与中式的木雕屏风、酸枝家具和瓷器摆件共处一室，形成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独特美学。檳城的娘惹博物馆（侨生博物馆）便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建筑本身就是一座融合

了中式、英式和马来风格的艺术品，内部收藏的器物也反映了主人跨国贸易的生活背景和多元文化视野。这些建筑不仅是财富的炫耀，更是主人跨文化身份与国际视野的象征。

（三）红砖与本地热带建筑风格的融合

闽南红砖建筑在传入东南亚后，为了适应当地炎热多雨的热带气候，进行了一系列巧妙的本土化改造，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海峡折衷主义”风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五脚基”或称骑楼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将一楼沿街部分向内退缩，形成一道连续的有盖走廊，既能为行人遮阳避雨，也便于商家在任何天气下经营。这种前店后宅、楼下经商楼上居住的模式，是对闽南传统街市店铺的继承与发展，在新加坡的牛车水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等地尤为普遍。

在建筑材料和设计上，也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智慧。为了增强通风散热，建筑通常拥有更高的楼层和更大的窗户。许多建筑采用百叶窗，既能通风，又能遮挡热带的强烈阳光和暴雨。屋顶的设计也考虑到快速排水的需求。在装饰上，除了传统的闽南红砖，还大量使用色彩明亮的釉面瓷砖和本地特色的花卉、几何图案进行点缀，使得建筑立面更加活泼生动。

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物理功能上，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适应与创新。建筑师和工匠们将来自闽南的红砖、中式屋顶曲线，与来自欧洲的柱式、拱券，以及马来传统的木雕、通风设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如同进行一场跨越文化的对话，将不同文明的建筑语汇加以解构与重组，创造出既熟悉又新颖的建筑形态。

这些融合了热带风情的红砖建筑，是文化适应性的杰出范例。它们不仅解决了实际的气候问题，也成为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身份的视觉符号。每一栋老建筑都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记录着不同族群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的故事，是闽南建筑文化在海外持续焕发活力与创造力的有力证明。

闽南红砖建筑在东南亚不同地区的融合与演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特征，具体的区域融合特征可见下表。

东南亚闽南红砖建筑区域融合特征表

区域	典型建筑形式	闽南传统元素	融合的在地 / 国外元素	显著的本土化适应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会馆宗祠、骑楼(五脚基)、峇峇娘惹豪宅	红砖墙体、多进式院落、剪瓷雕、燕尾脊	欧洲维多利亚式柱式、拱券、马来传统木雕	骑楼设计（遮阳避雨）、高窗通风散热
菲律宾	石头屋（巴哈伊那巴托）、华人教堂	红瓦、木格窗、庭院理念、木雕技术	西班牙堡垒式底层、科林斯柱、推拉窗	应对地震洪水（坚固底层）、宽大通风口
印度尼西亚	早期华人学校、民居、寺庙	传统屋顶曲线、红砖砌筑、院落布局	荷兰殖民风格、柚木结构、本地几何图案	广泛使用本地柚木、火山石、贝壳粘合剂
泰国 / 越南	会馆（如福建会馆）、潮州式寺庙	红砖墙、嵌瓷、精美木雕、中轴对称布局	越南高脚屋特点、本土花卉图案、色彩运用	深远屋檐、考究的通风系统、适应潮湿气候

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红砖建筑

在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这两个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国度，闽南红砖建筑的演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它不仅需要适应热带气候，还要与强势的欧洲殖民风格进行对话与博弈。红砖在这里不再仅仅是乡情的寄托，更成为文化角力与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符号，其混合形态见证了东国外文明碰撞的深刻历史。

（一）西班牙殖民风格与闽南风格的混合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长达三百多年的菲律宾，一种被称为“巴哈伊那巴托”的“石头屋”建筑形式应运而生，成为闽南建筑风格与西班牙殖民风格混合的典范。这种建筑的底层通常采用坚固的石材或砖石砌筑，以应对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这部分的设计深受西班牙堡垒式建筑的影响。而上层则采用木结构，设有宽大的推拉窗和通风口，这部分则明显带有闽南传统民居以及本地干栏式建筑的特征，以适应热带气候。

早期的菲律宾华人移民，特别是来自闽南的商人，在“巴哈伊那巴托”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带来了精湛的木工和砖瓦技术，还将闽南建筑中对于庭院、木雕以及空间布局的理念融入其中。在维甘古城等历史城镇，许多保存完好的老宅都能看到这种混合风格。建筑的屋顶可能覆盖着中式红瓦，窗户下方的通风花格窗则让人联想到闽南建筑的木格窗，而整体的石质基座和阳

台栏杆又带有浓郁的西班牙风情。这种建筑不仅是风格的叠加，更是两种文化在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建筑技术上的深度融合。

（二）教堂、学校等公共建筑中的红砖元素

闽南红砖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民居，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建筑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尤其在一些由华人社区集资兴建或华人工匠参与建造的教堂、学校中，红砖元素的使用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这些建筑的主体结构可能遵循国外的巴西利卡式或哥特式风格，但在墙体的砌筑方式、装饰细节上，却巧妙地融入了闽南红砖建筑的技艺与审美。

在菲律宾的一些古老教堂中，可以看到红砖与本地的珊瑚石、火山石混合使用的墙体，其砌筑手法让人联想到闽南地区特有的“出砖入石”工艺。这种做法不仅是出于材料的经济性考虑，也无形中将东方建筑的肌理感融入了国外宗教建筑的庄严之中。在另一些建筑中，则可以看到：

1. 装饰性的红砖铺地，其拼花图案可能采用中国传统的“万字纹”或几何图形，与教堂穹顶的圣经故事壁画形成有趣的对话。

2. 在建筑的局部，如窗框、门楣或山墙上，使用雕刻过的红砖作为装饰线条，其工艺手法和图案风格，与闽南宗祠庙宇的砖雕艺术遥相呼应。

同样，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早期华人学校或社区公共建筑中，红砖也被广泛应用。例如在井里汶市，这个深受华人文化影响的港口城市，一些历史建筑在外墙上镶嵌着来自中国的瓷器和红砖，体现了物质材料与文化记忆的紧密联系。这些红砖元素在公共建筑中的出现，虽不张扬，却是闽南文化在异域顽强生命力的体现，它们如同文化基因的片段，悄然植入在地建筑的宏大叙事之中，使其呈现出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内涵。

（三）本土化材料与工艺的演变

闽南红砖建筑在东南亚的传播并非一成不变的复制，而是一个不断适应与创新的过程，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本土化材料与工艺的吸收和演变。由于从闽南原乡运输建材成本高昂且数量有限，移民们不得不就地取材，寻找合适的替代品。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建筑工艺的本土化创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除了红砖，工匠们也开始大量使用当地盛产的柚木、火山石、珊瑚石以及竹子等材料。

这种材料的替换直接影响了建筑的工艺和外观。例如，当坚硬的柚木取代了闽南常用的杉木后，建筑的木雕风格也随之改变，线条可能变得更为粗犷或细腻，

图案也可能吸收一些当地的植物或动物造型。同样，当墙体材料从单一的红砖变为红砖与火山石、珊瑚石的混合砌筑时，便催生了类似“出砖入石”但又具有本地特色的墙面肌理，形成了独特的视觉美感。聪明的工匠还会利用贝壳煅烧成粉，作为类似水泥的粘合剂，这种源于闽南沿海地区的传统技艺，在材料稀缺的异乡得到了传承和应用。这种本土化的演变，是闽南工匠务实精神的体现，他们不拘泥于传统定式，而是灵活地将祖传技艺与当地的资源条件相结合，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新建筑形式。

三、泰国、越南的红砖建筑遗存

在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泰国与越南，闽南及潮汕地区的移民同样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这些红砖建筑遗存，不仅是华人在当地经商、生活、信仰的见证，也是两种古老文明在建筑艺术领域长期对话与交融的结晶。从繁华的曼谷唐人街到古朴的会安古镇，红砖的暖色调点缀其间，讲述着跨国族群的奋斗史与文化融合的动人故事。

（一）潮州（闽南系）移民的建筑特色

在泰国和越南，潮州籍移民是华人社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文化与闽南系一脉相承，又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潮州建筑同样偏爱使用红砖红瓦，注重精雕细琢的装饰工艺，尤其以嵌瓷和木雕闻名。泰国曼谷的龙莲寺，作为当地最重要的中式寺庙之一，其主体结构便保留了潮州建筑的典型特征，尽管历经修缮，其木结构和空间布局依然能看到浓厚的家乡烙印。

越南会安的福建会馆，则更是闽南建筑在海外的杰出代表。这座始建于17世纪末的建筑，最初为木结构，后于18世纪中期重建为如今的砖瓦结构，其山门宏伟，朱红色的墙体配以绿色的琉璃瓦，屋脊和墙头饰有大量精美的彩瓷雕塑，生动描绘着龙凤呈祥、鲤鱼跃龙门等传统吉祥图案。会馆内部严格遵循闽南庙宇的规制，供奉着保佑航海平安的天后圣母，殿内的石柱、木雕、匾额和铜钟等文物，无一不体现着建造者对原乡建筑范式的坚守与传承。

这些建筑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海外游子精神信仰的凝聚点。会馆作为同乡议事、联络感情的场所，其建筑的宏大与华美，直接反映了该社群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建筑师和工匠们不惜工本，将最精湛的技艺倾注其上，使得这些建筑成为展示中华传统建筑艺术的海外博物馆。它们强烈的风格特征，使其在异

国土地上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成为华人身份认同的鲜明标志。

无论是泰国的潮州会馆还是越南的福建会馆，它们都力图在异乡完整地再现家乡的建筑记忆。从选材到工艺，从布局到装饰，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对传统的敬畏。这种对“原真性”的追求，恰恰体现了早期移民对于自身文化根源的珍视与坚守，红砖在此成为了一种饱含乡愁与文化自信的宣言。

（二）与当地建筑风格的相互影响

闽南红砖建筑在泰国和越南的传播，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相互影响的过程。华人的建筑在适应当地环境和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本土元素；与此同时，其独特的风格和技术也对当地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越南顺化皇城的建筑群中，就可以看到一些受到华人建筑影响的痕迹，例如在屋顶装饰和色彩运用上，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风格借鉴。

在会安古城，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当地的民居建筑在吸收了闽南建筑特色的同时，也保留了越南传统建筑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会安风格”。例如，许多建筑采用了中式的庭院布局和红瓦屋顶，但又结合了本地常见的木质结构和高脚屋的某些特点以适应潮湿气候。广肇会馆的建筑风格虽然表现出强烈的岭南特色，但其供奉的神明却带有闽南色彩，这种文化上的混杂也体现在建筑的细节之中。另一方面，华人建筑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为了应对热带的强烈日照和多雨天气，屋檐会修得更为深远，建筑内部的通风设计也更为考究。装饰图案中，除了传统的中国神话故事，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本地特有的花草或动物形象，反映了工匠对新环境的观察与吸收。这种相互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无处不在的，它模糊了不同文化风格之间清晰的界限，最终融合成一种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语汇。

（三）红砖建筑的现状与保护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东南亚各国遗存的闽南红砖建筑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许多老建筑因年久失修、城市开发或缺乏专业的维护技术而破败甚至消失。这些建筑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构成城市独特风貌和文化记忆的重要部分，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迫在眉睫。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已经认识到这些建筑遗产的价值，并开始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

在越南会安，古城作为一个整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为城内的包括福建会馆在内的众多红砖建筑提供了最高级别的保护。当地政府与国际组织合作，制定了严格的修缮标准，确保在修复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保

留其历史原真性，采用传统材料和工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槟城等地，政府也通过立法保护历史街区，鼓励业主对老旧的骑楼和宅邸进行适应性再利用，将其改造为精品酒店、博物馆、咖啡馆或文创空间，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泰国的华人社团，如潮州会馆，也在积极筹集资金，对其拥有的历史建筑进行定期维护和修缮，以传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限于建筑本身，更延伸到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建造技艺、节庆仪式和社区故事的记录与传承。通过举办文化节、设立解说牌、开展公众教育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红砖建筑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从而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共同守护这份跨越国界的珍贵遗产。

第三节 台湾地区的红砖建筑特色

台湾的红砖建筑，宛如一部由砖瓦砌筑的史书，其绯红的色泽不仅是视觉的焦点，更是文化迁徙与融合的深刻印记。从闽南原乡到宝岛落地生根，红砖作为一种核心的建筑语言，串联起数百年的时空变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多样的文化激荡中，演化出独树一帜的地域风貌。

一、明清时期的闽南移民建筑

明清之际，大批闽南移民跨越海峡，将原乡的技艺、信仰与生活方式移植于台湾。这一时期的建筑深刻地烙印着闽南文化的基因，“红砖白石”的经典搭配成为最具辨识度的视觉符号，无论是民居、街屋或庙宇，都与闽南祖地遥相呼应，共同谱写着属于“唐山过台湾”的家族与聚落史诗。

（一）台湾传统民居与闽南大厝的渊源

台湾的传统民居，尤其是合院建筑，其格局、建材与装饰风格均与闽南地区的“大厝”一脉相承。闽南移民将家乡的居住形式，如“一条龙”（一字型）、“单伸手”（曲尺型）以及最常见的“三合院”等合院格局，带到台湾。这些建筑的核心空间——正厅，用于供奉祖先牌位，是家族精神的凝聚点，其两侧则为长辈的居室；护龙（或称护厝）则由晚辈居住，清晰地体现了传统的伦理秩序与家族观念。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亦有记载：“台湾宫室，多从漳泉。”这明确指出了两地建筑风格的直接传承关系。

红砖的运用是此渊源中最鲜明的特征。闽南地区因土壤富含铁质，烧制的砖块呈现独特的红色，被视为吉祥、富贵的象征，故称“福办砖”。这种“红砖文化”随着移民传入台湾，红砖赤瓦的建筑风格迅速普及，成为台湾传统建筑中最为醒目的主色调。从建筑的整体造型、平面布局到燕尾翘脊、马背山墙等细部处理，台湾传统民居都忠实地复刻了闽南大厝的建筑基因，不仅是对原乡的记忆延续，也是在新土地上重建家园、安顿身心的文化实践。

雾峰林家、板桥林家等大家族宅邸，便是此种建筑形态的典范。它们以宏大的多进多护龙格局，精美的木雕、石雕与砖雕装饰，展现了当时大户人家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这些建筑的红砖墙体不仅是结构承重的一部分，其本身也通过“出砖入石”等多样的砌筑方式，创造出丰富的立面肌理与装饰效果，宛如一部凝固的家族奋斗史。

（二）鹿港、台南等地的红砖街屋

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城市与港口地区出现了兼具商业与居住功能的“街屋”，其中以鹿港、台南等地的红砖街屋最具代表性。这些街屋临街而建，形成连绵的街道景观，其建筑形态深受闽南地区骑楼建筑的影响，展现了移民社会商业活动的活力与适应性。

鹿港曾是台湾第二大港，俗谚“一府二鹿三艋舺”生动道尽其昔日的繁华盛景。鹿港老街的形成便与此商业背景息息相关，街道两旁的建筑多为长条形的闽南式店屋，店面之后是居住与生活的院落空间。当地著名的“不见天街”便是因店家为遮阳避雨，在街道上搭建顶棚而形成。而铺设在地面的红砖，则确保了街道的整洁，足见红砖应用的普遍性与实用性。这些街屋的立面虽不如官邸庙宇般华丽，却也运用红砖做出朴素而精巧的装饰，如砖砌的窗框、女儿墙等，展现了常民建筑的智慧与审美。

在台南，特别是安平、赤崁楼周边区域，同样保存了大量红砖建筑。自荷治时期建造热兰遮城开始，红砖便作为重要的建材被引入台湾。明郑时期，陈永华建设赤崁楼，系统性地运用了闽南红砖砌筑技术，对后续建筑发展影响深远。清代，台南作为府城，其商业街区中的红砖街屋融合了更多样的风格。一些富商的宅邸在传统闽南红砖架构的基础上，开始吸收西式建筑元素，形成所谓的“红砖洋楼”，在门窗形式、阳台栏杆等处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趣味，成为时代变迁中文化交流的早期见证。

（三）宗祠、庙宇的闽南风格传承

宗祠与庙宇作为移民社会中维系血缘与地缘关系、安顿精神信仰的核心场所，其建筑最完整、最精致地传承了闽南风格。这些建筑不仅是宗教祭祀的空间，更是匠师们展示高超技艺的舞台，红砖在此与其他材料如石材、木材、剪黏、交趾陶等完美结合，共同营造出庄严肃穆且富丽堂皇的艺术殿堂。遍布全台的妈祖庙、王爷庙、祖师庙等，绝大多数都完整地秉承了闽南红砖建筑的风格。

高高翘起的燕尾脊，是官宦或庙宇才能使用的尊贵象征，在台湾的庙宇建筑中被广泛采用，划出优美的天际线。墙体大量使用红砖，并配合精湛的砖雕工艺，在“镜面墙”等显要位置雕刻出花鸟、人物、博古图样等，其细腻程度堪比木雕与石雕，是闽南建筑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鹿港龙山寺、台北万华龙山寺等，其艺术价值堪称闽南建筑的典范。

宗祠建筑同样如此，作为祭祀祖先、凝聚宗族力量的场所，其格局与装饰极尽考究。从整体的院落布局到细部的梁枋、斗拱、窗棂，无不体现着对闽南传统“皇宫式”建筑样式的追摹。“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式”这句俗谚，生动地概括了闽台两地宗祠庙宇共同的建筑特色。这些建筑不仅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更是活态的信仰中心，它们深刻地维系着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

台湾红砖建筑主要时期与风格特征可见下表。

台湾红砖建筑主要时期与风格特征表

时期	代表建筑风格	红砖应用特点	代表案例
明清时期	传统闽南大厝、街屋、宗祠庙宇	“红砖白石”经典搭配，结构承重，注重砖雕，如“出砖入石”。	鹿港龙山寺、雾峰林家
日据时期	和洋折衷、西式古典、现代主义	饰面材料，与洗石子、面砖结合，用于拱券、女儿墙，强化装饰性。	总统府、旧台南州厅、台北故事馆

二、日据时期的建筑演变

1895年，台湾进入日据时期，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深刻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与城市面貌。建筑领域也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变革，日本建筑师带来了西洋建筑的思潮与技术，与台湾本土深厚的闽南红砖传统相遇、碰撞、融合，催生出一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杂风格，红砖的角色也从传统走向现代。

（一）日式建筑元素与闽南红砖的结合

日据初期，日本人带来的西式建筑风格与台湾既有的红砖传统产生了有趣的对话。一方面，部分传统匠师在建造民居或庙宇时，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吸收“洋风”元素；另一方面，日本建筑师在设计时，也尝试将红砖这一台湾民间普遍接受的材料，融入他们的设计语汇中，形成了独特的“和洋折衷”风格。

在这种结合中，红砖不再仅仅是传统三合院的构成部分，它开始被用于砌筑洋楼的拱廊、券柱和装饰性的女儿墙。建筑的立面可能保留了闽南红砖的底色，但在结构和装饰细节上却采用了国外古典的语汇，例如罗马式的拱券、巴洛克式的装饰浮雕，或几何线条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在这一时期，红砖逐渐从结构材料转变为饰面材料，常与洗石子、面砖等新式建材搭配使用，形成了台湾独有的红砖洋楼和公共建筑风貌。

第四节 跨区域建筑风格的融合

闽南，这片深受海洋文明浸润的土地，其建筑文化从未是孤立发展的封闭体系。随着“过番”的浪潮，闽南人将故土的营造智慧带往南洋乃至世界各地，同时也将异域的建筑元素带回故里。这种双向的文化流动，使得闽南建筑在跨区域的交流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融合姿态，诞生了诸多兼具乡土记忆与世界视野的建筑杰作。

一、与南洋本土建筑风格的融合

闽南建筑在走向南洋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与当地迥异的自然环境与文化语境，这种适应与调和的过程，催生了其与南洋本土风格的深度融合。这不仅是营造技艺的简单嫁接，更是两种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的对话与重塑，共同谱写了华人建筑适应、扎根于异国他乡的生动篇章。

（一）适应当地气候的通风、遮阳设计

闽南建筑在迁徙至湿热多雨的热带地区时，其最大的改造动力来源于对当地气候的适应性需求。传统的闽南大厝虽然也注重通风，但其厚重的墙体和相对紧凑的院落布局，在赤道终年如夏的环境中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因此，在南洋的闽南风格建筑中，通风和遮阳成为设计的核心考量。建筑师和工匠们创造性地

引入了更加开敞的廊柱结构，形成了连续的遮阳避雨的公共步行空间，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五脚基”或骑楼的雏形。这种设计不仅有效阻挡了热带强烈的日照，为行人与底层商铺提供了庇荫，更在雨季来临时，保证了商业活动的持续进行和行人的便利。

同时，为了促进室内空气的对流，建筑内部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高挑的楼层、宽阔的门窗以及精心设置的天井，共同构成了南洋闽南建筑的典型特征。天井不再仅仅是传统合院中的采光与仪式中心，它更多地扮演了“拔风井”的角色，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有效地将室内的热气导出，形成自然的空气循环。大量使用的花格窗、镂空墙体以及木制百叶窗，既保证了室内的私密性，又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空气流通，有效降低了室内温度与湿度，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营造智慧。这些设计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良，也深刻地改变了建筑的形态和空间体验，使其更贴合热带的生活节奏。

（二）本地木材、石材的混用

建筑材料的选择最直观地反映了建筑与地域的联系。闽南传统建筑以红砖、红瓦、本地花岗岩“白石”为主要特色，营造出温暖而坚实的质感。当闽南工匠远赴南洋时，尽管他们依然怀抱着对故乡“红砖白石”的深厚情感，并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不远万里从家乡运送建材，但更为普遍和现实的选择是就地取材，将南洋当地丰富的木材与石材资源融入营造过程。东南亚地区盛产的柚木、坤甸木、菠萝格等优质硬木，因其坚固耐久、防腐防蛀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的梁柱、门窗、地板和家具制作中。

这种材料的转换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带来了结构与审美上的新变化。例如，使用更为坚韧的硬木，使得建筑的跨度可以更大，空间更为开阔。同时，这些木材质地优良，色泽沉稳，其细腻的纹理和温润的触感，为原本以砖石为主的闽南建筑增添了柔和与精致的质感。在许多侨乡建筑中，可以看到闽南传统的石基、砖墙与南洋风格的木制门窗、木构屋顶相结合的案例。甚至一些建筑在底层采用坚固的石材或砖砌，以应对潮湿的环境，上层则采用轻便的木结构，以利于通风散热。这种砖、石、木的混搭使用，不仅是出于经济和实用的考量，更在无形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材料美学，成为闽南建筑与南洋本土风格融合的鲜明印记。

（三）装饰图案的相互借鉴

装饰是建筑的语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与审美情趣。闽南建筑以其精美

的剪瓷雕、砖雕、石雕和木雕而闻名，其题材多为中国传统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祥禽瑞兽和花鸟鱼虫，充满了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当这种装饰传统在南洋落地生根时，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当地多元文化的养分，特别是来自马来、印度及伊斯兰艺术的视觉元素，形成了兼容并蓄、独具一格的装饰新风貌。

在许多南洋的华人庙宇和宅邸中，我们既能看到来自闽南的龙凤、麒麟、牡丹、莲花等传统图案，也能发现南洋特有的热带花卉、水果（如菠萝、榴莲）、几何纹样以及色彩斑斓的彩釉瓷砖。例如，一些建筑的墙面会采用从欧洲进口的维多利亚风格瓷砖进行装饰，其鲜艳的色彩和几何化的图案与闽南传统的红砖墙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与对话。在灰塑和木雕中，有时会发现带有南洋风情的狮子造型，其形态往往比闽南传统的石狮更为奔放、夸张。这种借鉴是双向的，南洋本土建筑在与华人文化的接触中，也吸收了诸如屋顶的曲线、陶制瓦当等中式元素。这种装饰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动地体现了文化在潜移默化中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建筑立面如同一幅多元文化交织的画卷，呈现出既熟悉又新奇的独特魅力。

二、与国外殖民建筑风格的对话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华侨的海外迁徙，闽南地区与国外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国外殖民建筑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建筑面貌。闽南地区的工匠与业主并未简单地模仿或抗拒，而是以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姿态，与国外建筑风格展开了一场跨越文化的对话，催生了影响深远的中西合璧建筑浪潮。

（一）古典柱式与闽南屋顶的结合

在闽南地区以及南洋华人社区的中西合璧建筑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国外古典柱式与闽南传统大屋顶的创造性结合。这种组合被形象地称为“穿西装，戴斗笠”，它既是两种建筑语汇的碰撞，也是两种文化观念的交融。建筑的主体部分，如下层的廊道和墙身，常常采用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多立克、爱奥尼或科林斯柱式，这些柱式以其严谨的比例、优雅的线条和雄健的姿态，赋予了建筑一种古典的、庄重的秩序感。

与此同时，在这些“西装”楼体之上，却覆盖着一个极具闽南特色的传统大屋顶。无论是高高翘起的燕尾脊，还是平缓舒展的马鞍脊，都承载着浓厚的乡土

记忆和东方神韵。屋顶上覆盖着红色的陶瓦，屋脊和檐角装饰着精美的剪瓷雕或彩绘，与下方素净的西式柱廊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对比。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实际上体现了当时人们一种复杂的文化心态：一方面，他们希望借鉴国外建筑的先进技术和理性精神，以彰显自身的现代性与开阔视野；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割舍根植于血脉的民族传统与文化认同，屋顶作为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文化象征，必须被保留和高举。厦门大学的嘉庚风格建筑群便是这种风格的典范，它以建筑的语言，宣告了一种不卑不亢的文化自信。

这种结合并非生硬的拼凑。许多优秀的建筑师通过巧妙的比例控制和细部处理，使得东国外元素和谐共生。例如，柱廊的开间节奏与屋顶的举架、出檐相协调，西式山花的三角形轮廓与中式屋顶的坡度相呼应。一些建筑甚至将中式的梁枋、斗拱等构件进行简化和抽象，与西式柱头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过渡形式。这种中西合璧的实践，不仅仅是一种风格上的创新，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宣言，它代表了近代闽南人在面对全球化冲击时，积极选择、主动融合的文化智慧和身份构建的努力。

（二）砖拱、廊道与骑楼形式的创造

源自古罗马的砖拱技术与廊道形式，在国外殖民建筑中被广泛应用，并随着文化交流传入闽南地区。这项技术不仅结构坚固，而且能创造出富有韵律感和序列感的空间。闽南的工匠迅速掌握并化用了这一技术，将其与本地的建筑传统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骑楼”。骑楼，闽南语称之为“亭仔脚”，是一种将建筑底层沿街部分后退，留出公共人行通道，楼层则跨建于人行道之上的建筑形式。这种形式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近代则由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等地发展，并随后传入华南地区。

骑楼的出现，是商业需求、气候适应和市政规划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炎热多雨的闽南和南洋，骑楼下的廊道为行人提供了遮阳避雨的绝佳庇护，使得商业活动不受天气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沿街商铺的繁荣。连续的骑楼连接成片，形成绵延的商业长廊，成为城市独特的风景线。从建筑构造上看，骑楼的底层多采用坚固的砖石拱券或西式柱式来支撑上部的楼层，既保证了结构的稳定，也形成了富有节奏感的外观。上部楼层的立面则常常融合了巴洛克、新古典主义等国外建筑风格的装饰元素，如涡卷、山花、瓶式栏杆等，同时又不乏中式的灰塑、彩画等传统细节。

这种砖拱、廊道与骑楼形式的创造，是中西建筑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它将国外的结构技术和空间理念，与东方的生活方式和气候需求完美结合，形成了一种适应性极强且充满活力的城市建筑类型。它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形式，更是一种社会空间，模糊了公共与私密的界限，促进了邻里交往和商业互动，深刻地塑造了近代闽南及南洋许多城市的风貌与肌理，至今仍是这些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

（三）玻璃、铁艺等新材料的引入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全球贸易的扩展，玻璃、铸铁、钢筋、水泥等一大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材料开始进入中国。这些新材料以其独特的性能和表现力，为传统的闽南建筑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成为中西建筑风格融合的重要媒介。在那些中西合璧的侨乡别墅和洋楼中，新材料的应用尤为普遍和突出，它们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功能，也丰富了建筑的审美。

玻璃的引入，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建筑的采光。大面积的玻璃窗取代了过去小而暗的窗洞，使得室内空间变得前所未有的明亮通透。许多建筑还采用了从南洋或欧洲运来的彩色玻璃，镶嵌在门窗或隔断上，当阳光穿过时，在室内投下斑斓的光影，营造出如教堂般绚烂而又梦幻的氛围。这些彩色玻璃的图案多样，既有西式的几何花纹、圣经故事，也有中式的花鸟鱼虫、吉祥文字，是文化融合的直接体现。

铁艺，特别是铸铁制品，以其坚固的质地和极强的可塑性，被广泛应用于栏杆、门窗格栅、大门、楼梯扶手以及结构构件上。西式的铁艺栏杆常常带有繁复的涡卷、花叶等巴洛克或新艺术运动风格的装饰，线条流畅而华丽，为建筑增添了精致与浪漫的气息。这些铁艺构件与闽南传统的红砖墙、石雕窗框相结合，形成了刚与柔、简与繁的有趣对比。钢筋和水泥的运用，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建筑的结构方式，使得建造更大跨度、更高层数的建筑成为可能，许多侨乡洋楼坚固的楼板和宽敞的无柱空间，都得益于此。这些新材料的引入，是建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们与传统材料和技艺的并置与对话，共同构成了近代闽南建筑丰富而多元的面貌。

三、融合风格的典型类型与案例

在闽南建筑与外部世界长达数世纪的对话中，诞生了一系列独具魅力的融合风格建筑类型。这些建筑不仅是营造技艺交流的产物，更是文化认同、社会变迁

与个人记忆的物质载体。它们以生动的形态，讲述着闽南人走向世界、拥抱世界，并最终回归乡土的动人故事。

（一）“海峡殖民地风格”建筑

“海峡殖民地风格”，又常被称为“海峡折衷式”建筑，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流行于马来半岛、新加坡等前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一种独特建筑风格。这种风格是华人文化，特别是闽南文化，与马来本土文化、欧洲殖民地建筑风格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结晶。它以华人店屋为基本形态，在立面设计上展现出极为丰富和多元的折衷主义特征。这些建筑通常为二至三层的连排住宅或商住两用楼，底层是开敞的“五脚基”走廊，便于商业和行人活动。

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东国外装饰元素的自由组合与灵活运用。建筑立面常常采用欧洲新古典主义的壁柱、拱券和三角山花，营造出庄重典雅的基调。同时，窗户的设计又融入了中式的木制百叶窗和马来风格的镂空花格，兼顾了通风、遮阳与美观。在装饰细节上，这种风格更是兼容并蓄到了极致。屋顶和墙头可以看到闽南传统的剪瓷雕和灰塑，题材涵盖龙凤、花鸟等祥瑞图案；墙身则可能镶嵌着从英国进口的维多利亚式彩色瓷砖，其鲜艳的几何或植物纹样为建筑增添了华丽的异国情调。太平的和平茶室就是这类风格的典型代表，其立面结合了精美的灰塑艺术、西式柱头和中式木雕，内部还曾有巧妙的天井排水系统，是中西建筑文化结合的典范。这种风格的建筑，是南洋多元文化社会在建筑上的生动投影，也是闽南文化在海外强大的适应性与创造力的体现。

（二）“五脚基”（骑楼）建筑

“五脚基”，即骑楼，是华南及东南亚地区近代城镇商业街道的标志性建筑形式。它以其独特的“廊房”结构，巧妙地应对了亚热带的炎热气候，并创造出连续的城市商业空间。闽南语称之为“亭仔脚”，意指店铺门前有遮蔽的走廊。这种建筑形式将楼房的一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之上，底层沿街留出一条宽约五英尺（这也是“五脚基”名称的由来）的公共走廊，各家各户的走廊连贯起来，便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商业步行街。

骑楼建筑是多种文化因素交融的产物。其外廊形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神庙和古罗马的巴西利卡，近代的形态则直接受到英属印度殖民地建筑外廊的影响。在传入中国后，与本地的商业传统和气候条件一拍即合。广州和闽南地区的侨乡是骑楼最为集中的区域。厦门的中山路、泉州的中山街等地，至今仍保存着规模

宏大、风格各异的骑楼建筑群。这些骑楼的立面设计千姿百态，集中展现了从新古典主义、巴洛克、装饰艺术到现代主义等不同时期国外建筑风格的影响。立面上丰富的线脚、山花、券饰、栏杆，与闽南传统的红砖、洗石子、彩瓷等装饰手法相结合，构成了繁华而有序街道景观。骑楼不仅是一种建筑类型，更是一种城市生活的容器，它见证了近代城市的商业繁荣与文化变迁。

（三）中西合璧的侨乡别墅

当中西建筑风格融合的浪潮从通商口岸吹向广袤的闽南侨乡时，便催生了数量众多、风格独特的中西合璧侨乡别墅，当地人常称之为“番客楼”。这些建筑是衣锦还乡的华侨为荣宗耀祖、改善家人居住条件而兴建的，是他们海外拼搏成就的丰碑，也是他们乡愁与世界观的集中体现。与城市中的骑楼不同，侨乡别墅多为独栋或庭院式建筑，在设计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也因此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面貌。

这些别墅的风格不拘一格，堪称万国建筑的博览会。有的主体采用闽南传统的“出砖入石”墙体和红砖大厝格局，却在门窗、廊柱处点缀了西式的拱券和栏杆；有的则直接模仿南洋的殖民地风格别墅，拥有开阔的环绕式外廊和高大的百叶窗，但在屋顶又固执地安上一个中式的燕尾脊或亭阁。泉州晋江的梧林传统村落、金门的陈景兰洋楼等，都是这种风格的杰出代表。建筑材料上，除了传统的砖、石、木，从海外运回的水泥、钢筋、彩色瓷砖、压花玻璃等新材料被大量使用。内部装饰更是极尽奢华，既有传统的木雕、石雕，也有西式的壁炉、吊灯和油画。这些“番客楼”矗立在传统的村落之中，以其新颖的造型和华丽的装饰，成为侨乡独特的文化景观，每一栋楼的背后，都有一段漂洋过海的传奇故事。

第六章 中西建筑文化的对话

在闽南这片充满海洋精神的红土地上，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从未停歇。当中西文明在近代历史的浪潮中相遇，建筑成为二者对话最直观、最深刻的载体。本章旨在探讨闽南传统建筑如何在与国外建筑文化的互动中，既坚守了自身的文化根基，又迸发出强大的包容性与创造力，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而迷人的跨文化建筑景观。

第一节 国外建筑元素的本土化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与侨乡社会的形成，国外建筑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传入闽南。本地工匠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以一种主动的、选择性的姿态，将国外建筑语汇中的柱式、拱券、装饰等元素进行拆解、重组与改造，使其在闽南的红砖建筑中获得新生，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本土化”面貌。

一、古典柱式的转译与应用

作为国外古典建筑最具代表性的符号，柱式在传入闽南后，其严谨的法式与结构逻辑被消解，转而成为一种可供自由发挥的装饰性语汇。工匠们以本土的审美情趣与材料工艺对其进行了彻底的转译，使其从理性的象征演变为充满人情味的艺术表达。

（一）砖砌柱身的变形与简化

闽南地区盛产的红砖，成为转译国外古典石柱的主要材料。工匠们放弃了对原初柱式精准的模仿，尤其是对柱身微妙的卷杀曲线与凹槽的处理，代之以更为直观和本土化的砖砌工艺。他们或以平砌的砖块构成简洁的方柱或圆柱，或通过砖块的错缝、叠涩等技巧，创造出富于变化的几何纹理。这种做法不仅是对材料特性的尊重，更是对建造效率的考量。原本讲求精确比例与光影效果的国外柱身，在闽南工匠手中转化为一种质朴而富有砌筑美感的平面化表达，其形态趋于简化

和抽象，但红砖本身温润的色泽与质感赋予了这些变形柱身新的生命力，使其完美融入了整体的红砖墙面之中，显得亲切而自然。

这种以砖代石的转译，本质上是一种从三维雕塑思维向二维砌筑思维的转变。工匠们不再追求柱身的体量感与肌肉感，而是更关注其作为立面构图一部分的装饰趣味。砖块的排列组合本身就构成了独特的韵律，有时还会在柱身上利用不同颜色或烧制工艺的砖块拼出图案，进一步强化了其装饰属性。这种简化与变形，并非技术的局限，而是一种基于本土文化语境的自觉选择，它消解了古典柱式的纪念性与宏大感，使其更符合闽南民居建筑的尺度与氛围。

（二）柱头、柱础的本土化雕刻

倘若说柱身的改造尚显克制，那么柱头与柱础的处理则彻底释放了闽南工匠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作为柱式中最具装饰性的部分，它们成为了中西雕刻艺术交融的华丽舞台。工匠们对柯林斯柱头标志性的茛苕叶纹样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改造，将其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本土祥瑞植物，如象征富贵的牡丹、寓意圣洁的莲花、代表君子气节的菊花等。这些花卉以一种更为写意、饱满的姿态绽放于柱头之上，其造型不再拘泥于国外范本的透视关系，而是采用了中国传统雕刻中更具平面感和图案化的处理手法，充满了浓郁的民间艺术气息。

同样，爱奥尼克柱头标志性的涡卷纹样，也被巧妙地转译为中国的传统纹饰。工匠们将其与如意、卷草、祥云等图案结合，创造出一种似是而非、亦中亦西的全新视觉形象。这些涡卷不再是单纯的几何旋涡，而被赋予了吉祥如意的文化内涵。而在柱础部分，其处理方式更为自由灵活。传统的西洋柱础样式常常被省略，取而代之的是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大胆结合。许多柱础直接采用了传统木构建筑中的鼓形石、瓜楞石样式，或与须弥座的形制相结合，在柱脚部分形成一个稳重而富有装饰性的基座。这种嫁接使得西洋柱式稳稳地“生长”在了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上，完成了从形式到内涵的彻底本土化。

这种对柱头、柱础的改造，深刻体现了闽南文化务实与兼容的特质。工匠们并不关心这些国外符号的原始意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颖的装饰“母题”，并迅速用本土的审美和吉祥寓意对其进行填充与再创作。这种充满创造性的“误读”，恰恰是文化对话中最生动、最富有活力的部分，它使得原本庄重典雅的古典柱式，在闽南的阳光下展现出一种热闹、欢快甚至略带俏皮的世俗之美。

（三）柱式在立面构图中的非典型运用

在国外古典建筑体系中，柱式首先是承重结构的一部分，其排列组合遵循着严格的模数和比例关系，共同构成建筑的结构逻辑与秩序美感。闽南工匠在借鉴柱式时，几乎完全剥离了其结构功能，将其解放为一种纯粹的、可灵活运用的立面装饰元素。这些柱子不再支撑任何实际的重量，而是像浮雕一样被“粘贴”在墙面上，成为壁柱或附墙柱，其核心功能在于划分立面、组织构图以及炫耀财富与品位。

这种非典型的运用方式，使得柱式的布局可以完全脱离结构理性的束缚，呈现出极大的自由度。它们或成对出现，用于强调入口的重要性；或以重复的韵律排列在廊下，形成富有节奏感的外廊；或被置于窗户两侧，构成类似窗套的装饰。有时，一根独立的柱子甚至会突兀地出现在山墙的顶端，仅仅是为了取得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这种拼贴式的、非逻辑性的运用，彻底颠覆了国外古典主义的构图原则，却与闽南传统建筑装饰中“满”与“俏”的审美追求不谋而合。工匠们如同在画布上安排元素一样，自由地将柱式与其他中式装饰（如砖雕、剪黏、石刻）并置在一起，创造出一个信息丰富、元素多元的混合立面，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充满活力的折衷主义风格。

二、拱券结构的本土实践

拱券作为古罗马以来国外建筑的标志性结构与形式语言，以其优美的曲线和强大的跨越能力，为习惯了梁柱体系的闽南工匠带来了全新的启发。他们迅速掌握了砖拱的砌筑技术，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建筑的各个角落，同时巧妙地融合本土审美，使这一外来元素呈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

（一）砖拱在门窗、廊道中的应用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窗等洞口上方的承重主要依赖于平直的过梁。国外拱券技术的传入，为闽南建筑的开窗方式提供了革命性的新选择。工匠们运用本地烧制的红砖，以精湛的技巧砌筑出各种形式的砖拱，包括半圆形拱、分段式拱、尖拱等，它们被大量应用于洋楼的门、窗以及连续的廊道之上。这些砖拱不仅解决了更大跨度的承重问题，使得建筑能够开设更宽大的窗户以改善通风与采光，更以其优雅的弧线形态，极大地丰富了建筑立面的视觉效果，与红砖墙面形成了刚柔并济的优美对比。

在著名的侨乡商业街区，这种拱券的应用尤为突出，并最终促成了“骑楼”这种典型外廊式建筑的形成。连续的拱券构成了骑楼的底层开放空间，为行人提供了遮阳避雨的通途，同时也为商铺创造了宜人的过渡区域。这种设计既适应了闽南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又满足了近代商业活动对开放公共空间的需求。骑楼的拱券廊道，以其统一而富有韵律的形态，塑造了近代闽南城镇独特的街道景观与空间体验。

工匠们在砌筑拱券时，并非一味模仿。他们常常在拱心石的位置进行创新，或以一块精心雕刻的瑞兽、花卉代替，或嵌入一块彩色的瓷砖，使其成为视觉焦点。拱券与墙面的交接处也处理得十分细腻，通过砖块的不同砌法形成装饰性的线脚，这些细节的处理，无不体现出本土工匠在吸收外来技术的同时，注入的细腻情感与审美巧思，使冰冷的结构构件充满了艺术的温度。

（二）拱券与屋顶曲线的结合

闽南传统建筑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之一，是其高高翘起、曲线优美的燕尾脊屋顶。当国外的拱券元素传入后，一个极具创造性的融合发生了：工匠们大胆地将拱券的弧线与屋顶的曲线进行对话与重组。在许多中西合璧的洋楼中，可以看到原本位于正立面上方的三角形山花被一个巨大的半圆形或弧形山墙所取代，其轮廓正是一道宏伟的拱券曲线。这种处理方式在视觉上极具冲击力，圆润饱满的西式拱顶与两侧凌空欲飞的中式燕尾脊形成了奇妙的并置。

这种结合并非生硬的拼凑，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视觉构图。工匠们巧妙地利用拱券的圆弧来调和屋顶的陡峭，或利用燕尾脊的飞扬来打破拱券的沉稳，二者在矛盾与冲突中达成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在某些案例中，拱券甚至直接“穿过”了屋顶，形成独特的屋顶窗或装饰性构筑，进一步模糊了中西建筑语汇的边界。这种将国外立面元素与中国屋顶形式进行直接对话与形态嫁接的实践，在世界建筑史上亦不多见，它充分展示了闽南工匠在面对外来文化时非凡的解构与重构能力，也诞生了许多极富戏剧性和表现力的建筑杰作。

（三）拱券装饰的本土化图案

如果说拱券的结构是对国外技术的学习，那么拱券的装饰则完全是本土艺术的自由挥洒。闽南工匠将拱券的表面，尤其是拱肩（拱券与两侧垂直支撑之间的三角区域）和拱腹（拱券的内弧面），视为绝佳的装饰画布，用本土最熟悉的材料与题材，将其装点得五彩斑斓、意趣盎然。他们摒弃了国外拱券装饰中常用的

浮雕或线脚，转而运用闽南特色的装饰工艺。

这种装饰手法的本土化特征极为鲜明，其内容和形式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民俗意蕴。工匠们在有限的拱券空间内，以极其娴熟的技巧，创造出一个个吉祥喜庆的微观世界。

1. 吉祥花鸟与瑞兽图案被广泛运用。在拱肩的三角区域内，常见到以剪黏或彩绘方式制作的梅兰竹菊、喜上眉梢、丹凤朝阳等传统题材。这些图案色彩鲜艳，造型生动，与红砖的基底色形成强烈对比。

2. 戏曲故事与民间传说成为重要主题。工匠们以泥塑、灰塑等手法，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中的经典场景微缩于拱券之上，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极具叙事性与趣味性，将建筑变成了传播民间文化的露天舞台。

3. 几何纹样与文字装饰的创新组合。除了具象的图案，工匠们也利用碎瓷片拼贴（剪黏）技术，在拱腹或拱券边缘创造出华丽的几何锦纹。有时，还会在拱心石的位置嵌入刻有家族姓氏、商号或“福”“寿”等吉祥文字的匾额，直接而明确地表达建筑主人的身份与期盼。

三、国外装饰符号的误读与再造

当国外建筑的装饰符号漂洋过海来到闽南，其原有的历史背景、宗教寓意和文化语境大多被消解或遗忘。闽南工匠以一种近乎天真的热情与直觉，对其进行“误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充满想象力的“再造”。这个过程并非源于无知，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它将外来符号彻底从其原有体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全新的本土生命。

（一）对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模仿与简化

巴洛克风格中气势恢宏的曲线、涡卷和雕塑，以及洛可可风格中纤巧繁复的卷草、贝壳和不对称装饰，为追求华丽装饰效果的闽南工匠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他们被这些风格热情、动感的形态所吸引，并开始建筑的细部进行模仿。山墙顶端、窗楣上方、阳台栏板等处，成为了这些西洋风格的试验田。然而，这种模仿并非全盘照搬，而是一种高度的简化与平面化。

闽南工匠通常使用成本更低、技术更便捷的灰塑、泥塑或砖雕来替代国外昂贵的大理石雕刻。这使得原本立体感极强、光影变幻丰富的巴洛克式卷涡，被转化为更具线条感和图案感的浅浮雕。那些复杂的植物藤蔓和贝壳形态，也被提炼

为更概括、更程式化的装饰符号。其动感与张力有所减弱，但装饰性与韵律感却得到加强。这种简化，一方面是出于材料与工艺的现实考量，另一方面也更符合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偏爱线条与平面构图的审美习惯。

最终，这些被简化了的巴洛克与洛可可元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山寨”美感。它们失去了原作的庄重与宏大，却增添了几分本土的质朴与活泼。这种模仿更像是一种提炼与转述，工匠们抓住了其“华丽”与“繁复”的视觉精髓，并用自己的语言和手法将其重新演绎，创造出一种既有异域风情又不失本土味道的“闽南式西洋风”。

（二）西洋人物、纹样的本土化处理

在闽南近代建筑中，出现了一批颇有趣味的西洋人物和纹样雕塑，如小天使、西洋仕女、带翅膀的商人等。这些形象的出现，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它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或神话人物，而是被当成了一种时髦、新奇的“洋气”符号。闽南工匠在塑造这些人物时，进行了一系列饶有趣味的本土化改造。这些西洋人物的面孔常常被塑造成东方式的丹凤眼、柳叶眉，失去了国外雕塑的立体感和解剖准确性，反而带上了几分中国年画或寺庙神像的面貌。

小天使是其中最常见的形象，但在闽南建筑中，他们常常被剥离了爱情的寓意，而被单纯地当作送财、送福的童子，有时手中还捧着元宝或如意，彻底融入了中国的吉祥文化体系。这些小天使形象丰腴，笑容可掬，与其说是来自奥林匹斯山，不如说更像是邻家白胖的娃娃。同样，花环、垂幔等典型的国外装饰纹样，也常常与中国的蝙蝠（福）、盘长（寿）等图案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

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闽南文化极强的包容性和实用主义精神。工匠们并不探究这些符号背后的深层含义，而是直接将其纳入本土的价值与审美框架中。他们以一种天真而自信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上新衣”，使其说上了“闽南话”。这种本土化的处理，使得这些西洋纹样不再显得疏远和陌生，反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亲和力，成为当地民众眼中一道新颖而吉利的风景。

（三）中西装饰元素的并置与拼贴

闽南近代建筑在装饰上的最大特色，或许就是一种大胆的、毫无顾忌的并置与拼贴。工匠们仿佛在使用一个巨大的素材库，将他们所见所闻的中式与西式、传统与现代的各种装饰元素，自由地组合在同一栋建筑的同一个立面上。在这里，

视觉的和谐与逻辑的统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甚至略显杂乱的多元共生。

在一面墙上，人们可以同时看到罗马式的壁柱、伊斯兰风格的尖拱窗、中国传统的花鸟砖雕以及巴洛克式的涡卷山花。科林斯柱头旁可能紧邻着一幅描绘“郭子仪拜寿”的彩绘，西式阳台的铁艺栏杆上则盘绕着中式的葡萄藤蔓图案。这种拼贴手法，完全超越了风格的界限，它不追求融合，而是刻意展示差异与并存。这种看似无序的组合，恰恰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闽南社会文化交汇的复杂现实。它是一种宣言，宣告着一种开放的、不拘一格的文化心态，一种既能欣赏“他者”之美，又固守“自我”之根的文化自信。这些建筑立面，就如同一部琳琅满目的文化百科全书，记录了闽南在全球化浪潮中独特的身份建构历程。

第二节 殖民时期的建筑交融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门户的洞开，闽南地区，特别是厦门鼓浪屿等地，迅速成为了国外文化涌入的前沿阵地。这一时期的建筑不再是单一文化的表达，而是多种力量交织、碰撞与协商的产物。外来者带来了全新的建筑范式、功能需求和审美观念，它们与根深蒂固的闽南本土营造传统在同一片土地上相遇，开启了一段深刻而复杂的建筑交融史。这种交融并非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在适应、抵抗与创新中进行的动态对话，铸就了独特的地域风貌。

一、教会与学校建筑中的风格对话

宗教与教育的传播是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其建筑载体直观地体现了外来风格与本土元素的碰撞与调和。这些新式建筑在闽南的土地上拔地而起，不仅带来了迥异的视觉景观，更在空间组织、材料运用和建造技术上引发了一系列变革，成为观察跨文化建筑对话的绝佳窗口。它们既是信仰与知识的殿堂，也是文化博弈与融合的舞台。

（一）教堂建筑：哥特式、罗马式与闽南红砖的结合

殖民时期在闽南地区兴建的教堂，是国外建筑风格与本土营造智慧结合的生动案例。国外传教士带来了哥特式建筑高耸的尖塔、修长的束柱和绚丽的花窗玻璃，以及罗马式建筑厚实的墙壁、半圆形的拱券与巴西利卡式的平面布局。这

些鲜明的风格特征，旨在营造神圣、崇高的宗教氛围，是国外信仰体系在建筑语言上的直接投射。以鼓浪屿的天主堂为例，其高耸的哥特式钟塔和华丽的尖券门窗，便是由西班牙建筑师设计的纯粹国外样式，体现了初期的强势输入。

然而，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蓝图，在建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闽南本土的现实条件发生碰撞。工匠多为本地人，他们习惯使用的材料是色泽温润的红砖与坚固耐用的花岗岩。于是，一种奇妙的结合应运而生：哥特式的尖顶之下，墙身可能由人们熟悉的清水红砖砌筑而成；罗马式的浑厚拱券，则由本地开采的石材精心雕琢。这种结合并非总能达到完美的和谐，有时甚至显得略微生硬，但它们却真实地记录了两种文化在初次相遇时的艰难磨合与适应过程。

更为深入的融合体现在细节处理上。在一些教堂建筑中，尽管整体结构遵循国外范式，但在屋顶的瓦片铺设、墙面的砖石拼砌手法，乃至一些不甚起眼的装饰构件上，依然能看到闽南传统工艺的影子。例如，工匠们可能不自觉地运用了传统民居中的砌墙技巧，或是在窗棂、梁架的雕刻中融入了本土常见的吉祥图案。这种不经意的文化流露，使得这些教堂虽是远道而来的“舶来品”，却也因此带上了一丝亲切的乡土气息，成为跨文化对话中一种含蓄而又坚韧有力的表达。

（二）教会学校：西式布局与本土材料的统一

教会学校作为传播新式教育的基地，其建筑形态同样体现了西式规划理念与本土材料的深度结合。与传统书院、私塾的内向型院落布局不同，教会学校普遍采用西式的校园规划模式，建筑群围绕着开阔的草坪或运动场展开，教学楼、礼堂、宿舍等功能分区明确，体现了现代教育对公共活动空间和科学功能分区的重视。建筑单体也常常采用对称、规整的古典主义构图，营造出庄重、理性的学院氛围。

在建筑的物质呈现上，本土材料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陈嘉庚先生亲自督造的厦门大学早期建筑群，便是这一融合模式的典范，被形象地誉为“穿西装，戴斗笠”。其主体校舍采用了当时流行于南洋殖民地的外廊式布局，拥有厚重的墙体、连续的拱券和开阔的走廊，这种设计极好地适应了闽南地区湿热多雨的气候，保证了内部空间的通风与采光。这是“西装”所代表的实用主义与现代功能性。

与此同时，这些西式楼体的屋顶，却覆盖着极具闽南特色的嘉庚瓦与冲天翘起的燕尾脊，宛如一顶传统的“斗笠”。这种“中西合璧”的设计，是建筑师与本土工匠智慧的结晶，更是文化自觉的有力宣言。这种设计态度宣告了文化

自觉：我们应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与理性精神，但中华文化的根脉与精神象征，却必须高居其上，不可动摇。这种将西式建筑的理性布局与闽南传统建筑的经典元素融为一体的实践，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建筑风格，影响深远。

（三）建筑功能带来的空间新形式

殖民时期引入的新建筑类型，不仅带来了风格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其全新的功能需求彻底重塑了内部空间组织形式，催生了闽南地区前所未有的空间体验。传统的闽南建筑，无论是住宅、祠堂还是庙宇，其空间组织都围绕着宗族、祭祀和家庭生活展开，形成了以“进”和“落”为单位、以天井为核心的内向型院落组合。空间的序列感和等级性极强，公共与私密的界限清晰而严格。

教堂的出现，则引入了以“会众”为中心的大尺度、开放性单一空间。高大开阔的中殿、深远的圣坛、两侧的侧廊，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而流动的精神场所，旨在将所有信徒的目光引向神圣的焦点，营造一种集体性的宗教体验。这种巨大的、不被传统梁柱体系分割的内部空间，对于习惯了传统民居尺度感的本地居民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空间感受。它打破了传统建筑以“间”为单元的划分方式，展现了基于宗教仪式需求而生的全新空间逻辑。

同样，新式学校的建筑功能也创造了丰富的空间类型。明亮、整齐的教室，替代了传统私塾昏暗的小空间，适应了集体授课的需要。专门的图书馆、实验室、音乐厅、体育馆等功能性空间的出现，更是前所未有。这些空间根据其特定用途进行设计，强调采光、通风、声学效果和流线组织，体现了科学、理性的设计原则。

这些由新功能驱动产生的空间形式，无疑是对闽南传统建筑空间观念进行的一次深刻而彻底的革命。它不再仅仅服务于家庭伦理和祭祀传统，而是面向更广泛的公众，服务于信仰传播、知识教育和社会交往等现代社会功能。空间的开放性、公共性和功能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物理形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群组织结构，为闽南社会向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

这些风格交融的特点，见下表殖民时期闽南建筑主要风格与特征表所示。

殖民时期闽南建筑主要风格与特征表

风格类型	国外原型特征	闽南本土适应 / 材料	典型案例
宗教 / 教育建筑	哥特式尖塔、罗马式拱券、巴西利卡布局	红砖、花岗岩墙身；融入本土吉祥图案	鼓浪屿天主堂、教会学校
外廊式 / 商业建筑	连续的宽大走廊、厚重墙体、拱券	适应湿热气候，发展为骑楼结构	洋行、领事馆、商业街
公共 / 权力建筑	古典主义柱式、对称构图、宏大体量	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基座使用“出砖入石”	海关大楼、工部局

二、领事馆与洋行建筑的混合风格

作为殖民时期权力和商业的集中体现，领事馆与洋行建筑是外来影响最为直接和强势的领域。它们往往占据城市的核心或景观优越地段，以宏大的体量和纯正的西式风格彰显其存在。这些建筑不仅是处理外交和贸易事务的办公场所，更是文化殖民与权力意志的物理象征，它们在与本土环境的互动中，展现出一种更为复杂和多层次的风格混合。

（一）外廊式建筑与闽南气候的适应

殖民者带来的外廊式建筑，在闽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创造性的改造，成为殖民建筑适应本土气候的经典范例。这种建筑形式，其原型可追溯至欧洲在南亚、东南亚等湿热地区的殖民实践，其核心特征是在建筑主体外围设置一圈宽阔的、有遮蔽的走廊。这种设计非常契合闽南地区夏季炎热、日照强烈、多雨的气候特点。

外廊作为一种“气候缓冲区”，发挥了多重积极作用：

1. 遮阳与隔热。宽大的廊檐能够有效阻挡强烈的阳光直射墙体和窗户，显著降低室内温度。同时，环绕的廊道也形成了一个隔热层，避免室外热量直接传递进主要生活空间。
2. 防雨与通风。在多雨的季节，外廊为人们提供了避雨的活动空间，并保护墙体免受雨水侵蚀。贯通的廊道有利于空气的对流，即使在闷热的天气里也能捕捉到一丝凉风，极大地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

这种源自殖民地的建筑智慧，在闽南与本土商业建筑传统相遇，催生了极具地方特色的“骑楼”。骑楼将外廊的概念从单体建筑延伸至整个街区，建筑的二层以上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之上，底层则形成连续的、可供行人遮风避雨的公共走

廊。这种形式既满足了亚热带气候下商业活动的需求，又保留了外廊式建筑的优点，成为近代闽南城镇商业街区的标志性风貌，是外来建筑形式与本土社会经济生活完美结合的产物。

（二）公共建筑中的权力象征与本土回应

领事馆、海关、工部局等公共建筑，是殖民权力在城市空间中最直观的表达。这些建筑通常选择城市中轴线、滨水或山体高地等显要位置，通过宏伟的体量、庄严的造型和精致的细节，营造出一种威严、不容置疑的权威感。它们大量采用古希腊的柱式、古罗马的拱券以及文艺复兴风格的对称构图和华丽装饰，这些来自国外古典主义的建筑语汇，被用来象征其所代表的政治与文明的“优越性”。建筑本身成为了一种无声的宣言，向当地社会投射出强烈的权力意志。

然而，在这种强势的文化输出之下，本土的回应也以一种微妙而坚韧的方式存在着。尽管建筑的整体设计由国外建筑师主导，但具体的建造和装饰工作往往需要依赖技艺精湛的闽南本地工匠。这些工匠在执行国外图纸的同时，会将他们世代相传的审美习惯和传统工艺不自觉地融入其中。

这种本土回应体现在许多细微之处。可能是在一块科林斯柱头的藤蔓雕刻中，融入了闽南石雕常用的缠枝花卉图案；可能是在窗户的铁艺栏杆上，出现了中国传统的回纹或万字纹样；也可能是在建筑的基座部分，采用了闽南传统的“出砖入石”砌筑工艺。这些细节上的“偏离”，并非对国外风格的误读，而是一种文化的再协商。它们如同密码一般，将本土的文化印记悄然植入这些象征权力的建筑体中，使得这些建筑在展现殖民者意志的同时，也成为了两种文化角力与对话的复杂见证。

（三）建筑材料与施工的本地化

殖民时期建筑的建造过程，同样是一场外来技术与本土资源相互结合的实践。一方面，国外带来了全新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例如，水泥、钢筋、机制玻璃、金属桁架等工业化生产的材料被引入，使得建筑能够实现更大的跨度、更通透的立面和更灵活的空间布局。这些新材料的应用，极大地冲击了以砖、石、木为核心的闽南传统建筑材料体系。

在此背景下，建筑材料的运用呈现出显著的混合特征。大部分建筑仍然以本土盛产的花岗岩和红砖作为墙体和基础的主要材料，这既是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也是因为本地工匠对这些材料的性能和加工工艺最为熟悉。与此同时，在关键

的结构部分，如梁、楼板和屋顶，则开始尝试使用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厦门鼓浪屿的许多近代建筑，其花岗岩的墙基、红砖的墙身与混凝土的楼板相结合的模式，正是这种材料本地化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施工技术的本地化则更为普遍。虽然建筑的设计图纸可能来自海外，但具体的施工组织和建造工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了闽南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本地工匠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将外来的设计意图转化为现实。他们在石材的打磨、砖墙的砌筑、木作的榫卯连接等方面，展现了高超的传统技艺。有时，为了实现国外设计中的复杂曲线或装饰，工匠们还会创造性地改造传统工具和方法。这种施工层面的本地化，不仅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也使得最终的建成效果带有了浓厚的本土手工质感，与纯粹的工业化产品拉开了距离。

三、租界与居留地的城市规划

外来者的影响不仅限于单体建筑的设计，更深远地体现在对城市宏观形态的塑造上。以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为代表的区域，其城市规划引入了全新的理念和空间模式，与闽南地区自发形成的传统聚落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并在并存与冲突中，共同构成了近代闽南城市独特的二元结构。

（一）棋盘式路网与闽南传统街巷的并存

在成为公共租界后，鼓浪屿等地的市政建设参照了国外城市的规划模式，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引入了理性的、几何化的道路系统。工程师们倾向于采用棋盘式或方格状的路网，街道笔直、宽阔，交叉口呈直角，追求交通效率和土地利用的最大化。这种规划思想源于国外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它将城市视为一个可以被科学、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的系统。新的道路系统连接了码头、领事馆、洋行和主要公共设施，构成了租界的功能骨架。

这种规划整齐的“新城”，与岛上原有的闽南传统聚落形成了强烈的视觉与空间反差。传统的闽南村社，道路系统是完全有机的、自发形成的。狭窄、弯曲的街巷依随地势起伏，随房屋的见缝插针而自然生长，毫无预设的几何秩序。这些街巷空间尺度亲切，充满了生活的偶然性和复杂性，是邻里交往和社区认同发生的重要场所。

在近代厦门等城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网体系常常并存甚至交叠在一起。宽阔笔直的现代马路旁边，就可能隐藏着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传统小巷；规划整

齐的街区背后，依然保留着迷宫般的老旧巷弄格局。这种新旧并置的城市肌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空间体验：人们可能前一分钟还在感受现代都市的效率与秩序，转个弯便进入了充满历史感和人情味的传统社区。这种并存状态，是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力量拉扯与妥协的结果，也成为了近代闽南城市风貌中最具魅力的特征之一。

（二）公共空间（广场、公园）的引入

近代城市规划的另一个重要引入，是国外城市中常见的公共空间概念，特别是广场和公园。在传统的中国城市里，真正意义上对所有市民开放的纯粹公共休憩空间是相对缺乏的。城市的开放空间多与特定功能结合，如商业性的集市、庙宇前的祭祀场地，或是属于私人的花园和庭院。它们或具有强烈的商业、宗教目的，或具有高度的排他性。

殖民时期的城市建设则带来了全新的空间类型：

1. 城市广场。在一些重要的交通节点或公共建筑前，规划者设置了开阔的广场。这些广场不仅用于疏导交通，更成为市民集会、举行仪式和日常社交的场所。它提供了一个舞台，让城市公共生活得以展开和呈现。

2. 公园。公园作为一种以游憩、观赏和接触自然为主要功能的城市绿地，被引入到居民的生活中。以鼓浪屿的港仔后海滨浴场和规划的公园为例，它们为市民提供了一个逃离城市喧嚣、享受自然风光的休闲场所，这在传统的城市生活中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新式公共空间的引入，深刻地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社会结构。它们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相遇和交流的平台。市民开始走出封闭的家庭院落，参与到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城市公共生活中。广场和公园的出现，标志着城市的功能不再仅仅是居住、生产和防御，更增添了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交往的现代人文关怀。

（三）建筑高度、体量的控制与协调

随着租界内建筑密度的增加，为了保证居住环境的质量和整体风貌的协调，一套相对现代的建筑管理与控制体系也随之建立起来。这在闽南传统的城市建设中是极为少见的，传统聚落的生长更多依赖于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邻里间的协商，缺乏统一、成文的法规约束。租界的工部局开始制定一系列建筑章程，对新建建筑的高度、体量、退线距离乃至建筑风格进行引导和控制。

这些规定首先是出于卫生和安全的考虑。例如，通过控制建筑的高度和建筑间的距离，保证每栋建筑都能获得足够的日照和通风，这对于防止流行病在人口稠密的社区传播至关重要。同时，对建筑材料的耐火性提出要求，也是为了降低火灾风险。这些基于公共利益的管控措施，体现了现代城市治理的科学性。

除了功能性的考量，这些规定也包含了美学上的追求。通过对建筑体量和高度的协调，规划者试图营造出一种高低错落、富有韵律感的街道轮廓线和整体天际线。避免出现个别建筑过分突兀、破坏整体风貌的情况。例如，在重要的景观节点或历史建筑周围，可能会有更严格的高度限制，以保护其视线通廊和历史环境。这种对城市三维形态的整体控制，标志着城市规划从二维的平面布局走向了更为立体和综合的空间设计，为塑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风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进入民国时期，闽南地区作为重要的侨乡与沿海口岸，其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潮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这种变革深刻地烙印在城乡的建筑风貌之上。延续了数百年的红砖建筑传统，在此时遭遇了国外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二者在冲突与交融中，共同塑造了一个多元、复杂且充满创造力的建筑新时期。

一、民国时期建筑风格的多元化

民国时代的闽南，不再是单一传统建筑语汇的天下。伴随着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远渡重洋的华侨以及国外文化艺术思潮的涌入，建筑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从坚守民族文化本位的“中国固有式”，到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运动，再到初露锋芒的现代主义，各种风格在此交汇，红砖作为闽南建筑的标志性元素，被巧妙地融入到这些新旧杂陈的建筑实验之中。

（一）“中国固有式”建筑思潮中的红砖应用

在民国初期席卷全国的“中国固有式”建筑复兴浪潮中，闽南地区的红砖建筑扮演了独特的角色。这一思潮旨在探索现代建筑技术与中国传统形式相结合的路径，以回应全盘西化的建筑趋势，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在闽南，这种探索的集大成者无疑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亲自擘画的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校园

建筑。这些建筑被后人誉为“嘉庚建筑”，是“中国固有式”在地方化实践中的典范。

“嘉庚建筑”最为人称道的特征便是“穿西装，戴斗笠”的形象比喻。其主体采用西式的钢筋混凝土或砖混结构，注重空间的实用性、采光与通风，满足现代教育功能的需求，这便是“西装”。而屋顶则坚持采用闽南传统的歇山顶、燕尾脊，铺设绿色或红色的琉璃瓦，形成飞翘的檐角和优美的轮廓，宛如一顶“斗笠”。在墙体的处理上，大面积使用闽南本地烧制的红砖（烟炙砖），并以白色花岗岩或水刷石作为基座、窗楣和装饰线条，形成了红白相间的明快色彩对比，既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又不失典雅庄重。这种做法并非简单的形式拼贴，而是陈嘉庚文化自信的宣言：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但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必须置于首位。红砖在其中不再仅仅是一种建筑材料，而是承载着文化记忆与民族情感的符号，与现代结构体系完美结合，创造出一种既现代又极具地方辨识度的校园建筑风格。

（二）装饰艺术运动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源于法国并迅速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运动，也深刻影响了闽南沿海城市的建筑风貌。尤其是在厦门，作为当时重要的商埠，中山路及其周边街区至今仍保存着大量融合了装饰艺术风格的近代建筑。这一风格强调几何构图、简洁线条、对称形式以及丰富的色彩和装饰，其追求现代、奢华与速度感的特质，恰好迎合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和归国华侨的审美趣味。

在闽南地区，装饰艺术并非凭空移植，而是与本地的红砖传统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建筑师和工匠们将红砖作为主要的立面材料，同时借鉴装饰艺术的经典元素。建筑的窗楣、阳台、女儿墙等部位，出现了大量几何化的装饰图案，如放射状的太阳纹、曲折的闪电纹、简洁的阶梯状收分等。立面构图强调垂直线条，营造出挺拔向上的气势。厦门的老建筑中，常见以红砖墙面为基底，辅以水刷石或水泥预制构件制作的装饰艺术风格线条，红色的温暖质感与灰白色的冰冷几何感形成对比，既时髦又保留了地域特色。

这些建筑的出现，标志着闽南建筑在审美上从传统的繁复具象雕刻，开始转向现代的抽象几何装饰。例如，一些骑楼的立面虽然保留了红砖墙体，但山墙的形态、窗户的比例和装饰线脚，都明显受到了装饰艺术的影响，呈现出一种混搭而又和谐的独特美感。这种风格的流行，是闽南作为中外文化交汇口岸的直观体

现，红砖在新的艺术语境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构成都市现代性的重要视觉元素之一。

（三）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初步引入

在“中国固有式”与装饰艺术运动两种装饰性较强的风格之外，一股更为深刻的建筑变革潜流——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也开始在民国时期的闽南地区悄然萌芽。现代主义强调“功能决定形式”，主张摒弃一切不必要的装饰，追求空间的理性、结构的真实和材料的本色。这种思想的引入，主要通过少数留学欧美的建筑师以及相关专业教育的建立。

尽管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纯粹的现代主义建筑在闽南并不多见，但其设计理念已经开始渗透到一些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的设计之中。这些建筑可能在外观上仍保留某些传统或装饰艺术的痕迹，但在空间布局和功能组织上，已经体现出现代主义的原则。例如，它们更加注重内部流线的合理性、空间的灵活性以及对采光通风等物理环境的科学考量。建筑形态趋于简洁，立面上的装饰被大大削减，开始出现平屋顶、大片玻璃窗等元素。

红砖在这些早期的现代主义实践中，其角色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不再是传统工艺美学的载体，或是装饰艺术的构成部分，而是回归其作为一种砌体材料的本质。建筑师们开始探索红砖的结构表现力，通过不同的砌筑方式形成富有韵律感的墙面肌理，或者将其作为填充墙体与暴露的混凝土框架相结合，展现材料的真实对比。这种对红砖“诚实”的运用，虽然在当时尚属少数派的尝试，却为日后闽南现代建筑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标志着从关注形式表象到关注空间与建构逻辑的深刻转变的开端。

二、新材料、新技术对传统工艺的冲击

民国时期，随着全球工业化浪潮的推进和国外工程技术的引入，闽南的建筑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材料与技术革命。钢筋混凝土、机制砖、水泥等现代工业材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市场，它们以高效、标准、坚固的特性，猛烈地冲击着以手工技艺为核心、以“红砖、石头、木材”为支架的闽南传统营造体系。

（一）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普及

钢筋混凝土技术的引入，是民国时期建筑领域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之一。它彻底颠覆了闽南地区千百年来以木材为主要承重结构的传统。传统的穿斗式或抬梁

式木构架，虽然工艺精湛、形态优美，但在跨度、层高和防火性能上存在天然的局限性。钢筋混凝土结构则以其优越的整体性、抗震性和巨大的承载力，为建筑形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厦门、泉州等城市，钢筋混凝土结构迅速被应用于银行、百货公司、旅馆、影剧院等新兴的公共建筑类型。这些建筑需要宽敞无柱的内部空间，这是传统木结构难以实现的。建筑师们利用混凝土梁、板、柱体系，可以轻松地创造出大跨度的空间，建筑的层数也得以显著增加，催生了城市中最早的“高楼”。在“嘉庚建筑”中，钢筋混凝土被广泛用作主体框架，再以红砖作为围护墙体，实现了结构与维护材料的分离，这是现代建筑结构逻辑的体现。这种混合结构的应用，一方面保留了红砖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又满足了现代建筑对空间和结构性能的要求，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过渡形式。这种新旧结合的方式，直观地展现了技术冲击下的适应与妥协。

（二）机制砖、水泥砂浆对传统工艺的取代

如果说钢筋混凝土冲击的是结构体系，那么机制砖和水泥砂浆的普及，则直接动摇了闽南传统砌筑工艺的根基。传统闽南红砖建筑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手工烧制的“烟炙砖”所带来的独特质感和色彩变化，以及使用石灰、糯米汁等传统粘合剂砌筑出的柔和缝隙。每一块手工砖都存在细微的差异，共同构成了富有生命力的墙体。

1. 工业化生产的机制砖，以其统一的尺寸、规整的形状和稳定的质量，极大地提高了砌筑效率，降低了建造成本。它们迅速占领了市场，尤其是在城市大规模建设中，手工砖因其生产周期长、成本高而逐渐被边缘化。机制砖墙面虽然平整划一，却失去了传统手工砖墙那种朴拙、温润的肌理感和丰富的色彩层次。

2. 水泥砂浆的出现同样具有颠覆性。它取代了传统的石灰砂浆、糖水灰等粘合剂。水泥砂浆凝结快、强度高，施工极为便捷，但其刚性、不可逆的特性也带来了问题。它改变了传统墙体“呼吸”的性能，并且其灰黑的色泽与红砖的搭配，相较于白色石灰缝，显得生硬而突兀。更重要的是，像“出砖入石”这样讲究材料即兴搭配与咬合的精湛工艺，在追求速度和标准化的水泥砂浆施工中，其艺术性被大大削弱，逐渐沦为一种纯粹的装饰性贴面手法。

（三）标准门窗、预制构件的使用

传统闽南建筑的门窗、栏杆、格扇等构件，均由木匠或石匠根据具体尺寸在

现场手工制作，雕刻精美，样式繁多，是建筑重要的艺术表现部分。每一扇窗、每一道门都蕴含着工匠的心血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其卯榫结构和雕花工艺本身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民国时期，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化门窗开始出现并逐渐普及。这些在工厂里预先生产好的木制或钢制门窗，尺寸规格统一，能够快速安装，有效缩短了工期。与此类似，一些装饰性的构件，如阳台栏杆、檐口线脚等，也开始采用水泥预制件。这些预制构件通过模具批量生产，样式统一，成本低廉。这种标准化、预制化的生产方式，虽然提高了建造效率，但也导致了建筑细节的同质化和工艺精神的失落。过去那种为特定建筑量身定制、充满手作温度的构件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工业产品。传统建筑中丰富多样的窗棂样式、精雕细琢的木刻艺术，在这股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其传承空间被严重挤压，许多精湛的传统木作、石作工艺也因此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三、建筑师群体的角色转变

民国时期的闽南，建筑的创造者不再仅仅是世代相传的本土工匠群体。随着现代建筑教育的兴起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个全新的职业群体——建筑师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思想、新方法，深刻地改变了建筑活动的全过程，推动了从传统“营造”到现代“设计”的根本性观念转变。

（一）本土工匠与留学建筑师的并存

民国时期的闽南建筑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二元结构”：一方是根植于乡土、依靠师徒传承和经验积累的本土工匠，另一方则是接受了国外现代建筑教育、携带着图纸和理论归来的留学建筑师。这两股力量在当时的建筑实践中，时而合作，时而碰撞，共同塑造了那个时代的建筑面貌。本土工匠，如那些技艺高超的大木匠师、石匠师，他们对材料性能、传统做法和营造法式了如指掌，能够凭借经验和“篙尺”等传统工具，主持复杂的建造工程。他们的知识体系是实践性的、经验性的。

与此同时，以林克明等为代表的留学建筑师，带来了全新的知识体系。他们接受了严格的学院派训练，精通建筑制图、结构计算和国外建筑历史与理论。他们习惯于通过精确的图纸来表达设计意图，并用法定的合同和规范来管理工程。在厦门大学等重要项目中，便出现了陈嘉庚作为业主，既倚重留学建筑师进行总

体规划，又依赖本土工匠具体实施的复杂合作模式。

这种并存与互动，一方面使得国外先进的建筑理念得以在地方上落地生根，并与本土工艺相结合，产生了如“嘉庚建筑”般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两种不同知识体系和工作方式的差异也带来了冲突，理论化的设计图纸有时难以被习惯于口传心授的工匠完全理解和执行，导致了设计意图与最终建成效果之间的偏差。这种本土与外来、经验与理论的交织，构成了民国闽南建筑师群体角色转变时期的主要特征。

（二）建筑教育对设计理念的影响

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建立，是推动建筑师群体角色转变的根本动力。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创办自己的大学建筑系，如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央大学建筑系等，它们系统地引入了以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体系或德国包豪斯思想为基础的现代建筑教学模式。这些教育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筑师。

对于闽南地区而言，厦门大学的创办及其校园建设本身，就构成了建筑教育的生动课堂。尽管厦大早期并未立即设立建筑系，但其建设过程吸引和培养了一批具备现代工程技术和设计理念的人才。通过这些留学归来的学者和工程师的传播，国外建筑史、建筑理论、结构力学、材料科学等知识开始在区域内系统地普及。这些新知识极大地拓宽了从业者的视野，使他们认识到建筑不仅仅是“盖房子”的技艺，更是一门涉及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的综合性学科。设计理念开始从单纯模仿传统样式或国外风格，转向对功能、空间、环境、技术等问题的理性分析和综合解决。这种教育带来的思想变革，为日后闽南地区建筑设计走向专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从“营造”到“设计”的观念转变

建筑师群体的崛起和现代建筑教育的普及，最终促成了一个根本性的观念转变：即从传统的“营造”转向现代的“设计”。在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中，匠师是核心人物，他集设计者与施工组织者于一身，整个建造过程是一个基于经验和传统的、相对完整的统一体。设计意图往往通过口诀、谱系和现场指导来传达，建造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调整 and 完善的创作过程。

进入民国，现代建筑师的角色逐渐从工匠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阶层。建筑活动被分解为“设计”与“施工”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建筑师的核心工作是“设计”，即通过一系列精确的图纸（包括平面、立面、剖面、详

图等)来完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构思。这张蓝图成为指导施工的法律性文件,而施工则交由专门的营造厂或承包商来负责。这种分离标志着建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建筑的创造过程从一个依赖个人技艺和集体经验的感性过程,转变为一个基于科学知识和理性分析的、可以被精确控制和复制的标准化流程。红砖建筑的建造,也从匠人对每一块砖的情感投入和即兴创造,变为了建筑师在图纸上对材料、肌理和色彩的理性规划。这一从“营造”到“设计”的转变,不仅是职业分工的变化,更是建筑思想和文化观念上的一场深刻革命,它彻底重塑了闽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建筑实践。

第四节 文化认同与建筑创新

在全球化浪潮与本土文化复兴的双重驱动下,闽南建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深刻反思与大胆探索的全新阶段。这一时期的建筑师们不再满足于对传统形式的简单复制,或是对国外现代主义的盲目追随。他们开始在文化认同的追寻中,探索建筑创新的可能性,试图在全球语境下,以当代的建筑语言,重塑闽南建筑的文化主体性,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一、在融合中寻找文化主体性

在文化交融日益频繁的当代,如何清晰地界定并表达自身的文化身份,成为闽南建筑师面临的核心课题。他们不再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视为二元对立的选项,而是在复杂的融合过程中,通过对文化内核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积极寻找并确立闽南建筑在当代世界中的文化主体性与独特价值。

(一) 对传统符号的抽象化与现代化

闽南传统建筑拥有一个丰富而独特的符号系统,从燕尾脊的优美曲线,到红砖厝的温暖色泽,再到窗棂、砖雕的精致图案,无不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寓意与审美情趣。当代闽南建筑师在处理这些传统符号时,不再进行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具挑战性的道路:抽象化与现代化。这意味着剥离符号表层的具象形态,提取其内在的结构逻辑、空间意蕴或精神气质,并将其转化为当代的建筑语汇。例如,燕尾脊飞扬的姿态,可能被转译为建筑屋顶的某个折角或一条含蓄微妙天际线;传统民居中庭院与天井层层递进的空间序列,启发了现代建筑

内部流线的组织方式，创造出光影变幻、内外渗透的流动空间。

这种抽象化的处理，并非对传统的消解，反而是更深层次的致敬。它使得那些古老的文化基因，能够摆脱具体形态的束缚，以一种更为灵活和普适的方式，融入现代建筑的肌理之中。建筑师们运用现代的材料与技术，如清水混凝土、玻璃幕墙、钢结构等，与传统的红砖、石材进行对话。红砖不再仅仅是砌筑墙体的材料，它可能被设计成像素化的参数化表皮，形成富有韵律感的光影屏幕；石材的运用也超越了传统的勒脚或台基，转而成为表达建筑力量感与在地性的重要元素。通过这种方式，传统符号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它们不再是静止的文化标本，而是成为激发当代设计灵感、构建文化认同的动态源泉，使得新的建筑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能唤起深植于人们记忆中的文化归属感。这种转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它证明了闽南文化并非封闭和僵化的体系，而是具备强大的包容性与自我更新能力，能够在与现代性的碰撞中，淬炼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美学。

（二）在形式创新中延续文化精神

建筑的形式创新，绝非仅仅是追求视觉上的新奇与颠覆，其深层动力在于延续并光大一种地域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内核。闽南文化的精神，体现在对“家”的极致重视，对海洋的开放与包容，对神明的虔诚敬畏，以及那份根植于血脉的“爱拼敢赢”的开拓精神。当代的闽南建筑师们，正是抓住了这些核心精神，并将其作为形式创新的逻辑起点。他们在设计中不再拘泥于“像不像”传统建筑，而是致力于营造一种“是这个味”的空间氛围与场所精神。家的观念被重新诠释，从单一的大家族合院，演变为适应现代家庭结构、同时又能促进邻里交往的多元化居住模式。建筑师通过设计半开放的阳台、共享的社区庭院、通透的公共走廊，重塑了传统“厝边头尾”的温情与热闹，将宗族血缘的凝聚力，转化为现代社区的向心力。

面对海洋的姿态，现代建筑以更加开放和谦逊的态度做出回应。大面积的落地窗、舒展的观海平台、引景入室的设计手法，都旨在最大化地建立建筑与海洋之间的视觉与感官联系，呼应了闽南人向海而生的文化本性。建筑的形式不再是内向和防御性的，而是变得轻盈、透明，充满了与自然对话的渴望。这种形式上的转变，恰恰是对闽南文化中开放、冒险、兼容并蓄精神的最好延续。建筑师们通过创造性的空间实践，让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到这种文化精神

的传承。它可能是一个图书馆里洒满阳光的角落，让人联想到天井下的阅读时光；也可能是一座美术馆里迂回的路径，模拟着穿行于古厝巷弄的体验。这种超越了具体形式的精神延续，使得闽南建筑的文化血脉在不断创新的身躯中得以奔流不息，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韧性。

（三）批判性地吸收外来文化

闽南作为历史上重要的港口地区，其文化本身就带有多元融合的特性。从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印度教影响，到明清以来与东南亚的频繁互动，再到近代西洋风格的传入，外来文化早已成为闽南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当代闽南建筑在面对全球化的文化输入时，并非采取排斥或全盘接收的态度，而是展现出一种“批判性吸收”的智慧与自觉。这种批判性，首先体现在对本土文化主体性的坚定守护。建筑师在借鉴外来建筑理念、技术或形式时，始终以闽南的地域文脉、气候环境和生活方式为根本判断标准。他们会思考：这种新的空间模式是否符合闽南人重视家庭交流的习惯？这种新的建筑材料是否能适应本地湿热多雨的气候？

批判性吸收表现为一种主动的“再编码”过程。外来元素并非被简单地拼贴或挪用，而是经过解构、重组与转化，使其与本土语境相融合，服务于在地性的表达。例如，现代主义建筑强调的功能性与简洁性，被用来优化传统民居复杂的空间布局，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效率，但同时保留了内院、连廊等充满人情味的核心空间。国外建筑中的拱券、柱式，在闽南近代建筑中曾被广泛使用，在当代设计中，这些元素可能被抽象为一种结构逻辑或韵律符号，而不是具体的装饰。建筑师们如同高明的厨师，将外来的“食材”用本地的“烹饪方法”进行调制，最终呈现出一道味道熟悉又充满惊喜的“融合菜”。

这种批判性的吸收，避免了文化上的“失语”和身份上的迷失。它让闽南建筑得以在与世界先进建筑文化的对话中，不断汲取养分，丰富自身的表达能力，同时又不会消解掉自身最宝贵的文化特质。这是一个动态的、双向的文化互动过程。闽南建筑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地域魅力和创新实践，为世界建筑的多样性发展贡献了“闽南样本”。这种自信而睿智的文化态度，正是闽南建筑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旺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建筑师们既是传统的守护者，也是文化的转译者和未来的开创者，他们在每一次设计中，都在实践着一场深刻的文化思辨。

二、地域主义建筑的探索

地域主义建筑是对标准化、同质化的国际主义风格的一种反思与回应。它强调建筑应当根植于其所在地的特定环境，包括气候、地理、材料、工艺及社会文化。在闽南，地域主义建筑的探索蔚然成风，建筑师们努力寻求一种既能回应本土特性，又具备现代品质的建筑之道。

（一）基于气候、地理的现代建筑回应

闽南地区地处亚热带，夏季漫长、湿热多雨，且常受台风侵袭。这些鲜明的气候与地理特征，是建筑设计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地域主义创作的灵感之源。当代建筑师们从传统建筑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并结合现代科技，做出了精妙的回应。传统民居中的“深埕石厝”，即大进深的院落和厚重的石墙，是为了隔热和抵御台风。现代建筑则通过设置深远的悬挑屋檐、半室外的灰空间以及巧妙的立面遮阳系统，来应对强烈的日照，创造出凉爽舒适的过渡区域。这些设计不仅具备实际的功能性，也形成了丰富的光影层次，赋予建筑生动的表情。

对风的利用是另一大特色。闽南传统建筑中的天井、冷巷和高窗，构成了一套高效的自然通风系统。当代设计师借鉴了这一原理，通过对建筑形态和内部空间的精心组织，引导和利用夏季的主导风，形成贯穿建筑的“风廊”，从而有效降低室内温度，减少对空调的依赖。这种基于被动式设计的生态策略，既是对地域气候的智慧回应，也符合当代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在应对台风方面，现代结构技术使得建筑在形态上可以更加轻盈和开放，但同时，建筑师也会在关键部位采用更为坚固的结构体系和材料，或者通过巧妙的群体布局，形成相互遮蔽的屏障，展现出一种“以柔克刚”的现代智慧。这种基于气候地理的建筑实践，使得建筑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物体，而是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有机体。

（二）对本土材料、工艺的现代表达

材料是建筑最直白的语言，而闽南拥有一套以“红砖白石”为代表的独特的本土材料体系。地域主义建筑的探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这些本土材料与传统工艺的现代表达上。建筑师们不再将红砖仅仅视为廉价的砌体材料，而是重新发现了它在色彩、质感和砌筑可能性上的无穷魅力。

1. 红砖的诗意转译：在当代设计中，红砖的应用被推向了新的高度。它被用作镂空的砖墙，如同传统的花窗，既能通风、滤光，又形成了内外视线的微妙互

动。通过不同的砌筑方式，如错缝、凸砌、斜砌，砖墙的表面呈现出丰富的肌理变化，在阳光下产生动人的光影效果。一些项目甚至将红砖打碎，混合在混凝土中，形成一种被称为“再生砖”的全新材料，既保留了红砖的温暖色泽，又具备了现代材料的整体感，实现了材料的诗意重生。

2. 石材的当代建构：闽南本地盛产的花岗岩，在传统建筑中多用于墙基、柱础和雕刻。现代建筑师则更倾向于展现石材本身的重量感、体量感和天然纹理。他们或采用大块的石板干挂，营造出纪念性和永恒感；或将未经精细打磨的毛石用于墙体，表达一种粗犷而朴拙的在地力量。传统精湛的石雕工艺也被选择性地继承和简化，以更为抽象和现代的模式，点缀于建筑的关键节点，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触点。

除了红砖与石材，建筑师们也开始重新关注闽南本地的木作、夯土、蚵壳等传统材料和工艺。他们与当地工匠合作，尝试将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手工技艺相结合，这种合作不仅为建筑带来了独特的细节和温度，也促进了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的活化与传承。这种对本土材料与工艺的现代表达，是对工业化标准生产的一种反拨，它让建筑重新获得了手工的温度和地方的印记，成为承载地域记忆的独特载体。闽南地域建筑材料与现代转译可见下表。

闽南地域建筑材料与现代转译表

材料	传统用途与特征	现代转译手法	核心精神延续
红砖	砌筑墙体，温暖色泽， 家宅归属感	镂空砌筑，参数化表皮， 光影屏幕	亲切感、在地性、肌理 诗意
花岗岩 / 石材	墙基、勒脚、雕刻，防 御与承重	大块干挂，粗糙毛石， 抽象简化雕刻	力量感、永恒感、在地 力量
燕尾脊	屋顶曲线，宗族地位 象征	抽象折角，微妙天际线， 结构逻辑	精神气质、文化寓意、 动态美学
天井 / 院落	采光通风，内向型家族 空间	现代流线组织，半开放 共享庭院	内外渗透、邻里温情、 光影变幻

（三）闽南现代建筑的语言探索

综合气候地理的回应与本土材料工艺的表达，闽南的建筑师群体正在逐步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现代建筑语言。这套语言并非一套固定的词汇或句法，而是一种开放的、持续生成的探索姿态。它试图摆脱对任何单一风格的模仿，无论这种风格是来自国外还是来自本土的过去。它寻求的是一种“在地性”与“时代性”

的内在统一。在这种语言探索中，建筑的空间形态更加自由和多元，但其内在逻辑往往能追溯到传统聚落的空间原型，如对院落、巷弄、台阶等空间的现代转译。建筑的表皮肌理丰富而富有表现力，这得益于对红砖、石材等本土材料性能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运用。

这种语言是叙事性的。它通过光影的变幻、材料的对比、空间的转折，讲述着关于闽南这片土地的故事——海洋的风、宗族的情、市井的喧嚣与神性的宁静。它也是对话性的。它积极地与自然对话，与历史对话，也与生活于其中的人对话。一个成功的闽南现代建筑，人们在其中既能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与舒适，又能隐约感受到某种熟悉的、来自文化深处的亲切感和归属感。这种探索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它要求建筑师不仅具备高超的专业技能，更需要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对本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正是这种不懈的语言探索，使得闽南的建筑景观呈现出日益丰富和自信的文化面貌。

三、当代建筑中的文化对话实践

在文化认同与地域主义探索的理论基础上，闽南当代建筑涌现出大量精彩的实践案例。这些实践分布于新乡土建设、历史街区更新、公共文化建筑等多个领域，它们以各自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建筑如何成为一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对话的载体。

（一）新乡土建筑的创作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闽南乡村地区也面临着传统风貌消逝与社区活力衰减的挑战。正是在此背景下，“新乡土建筑”应运而生。它不是对传统农舍的简单复古，而是旨在为当代乡村生活提供一种全新的、根植于本土文化的空间解决方案。建筑师们深入乡村，与村民共同生活、交流，深刻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与生活愿望。设计不再是建筑师个体的“作品秀”，而是与使用者、与环境共同“生长”出来的结果。新乡土建筑在材料上大量使用本地的红砖、石材、竹木，甚至是被废弃的老旧材料，并邀请当地工匠参与建造，这既降低了成本，也保证了建筑的乡土亲切感。

在空间布局上，新乡土建筑常常借鉴传统民居的院落形态，但对其功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院落不再仅仅是家族内部的私密空间，它可能被设计为半开放的、与邻里共享的区域，成为激活乡村公共生活的催化剂。建筑形态上，设计师们大

胆创新，用现代的几何形态、不对称的布局，与周围的传统聚落形成一种既和谐又充满张力的对话关系。这些新建筑，如同一颗颗被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激荡起乡村社区的层层涟漪。它们或许是一座小型的乡村图书馆，一个村民活动中心，或是一栋为返乡青年设计的住宅兼工作室。这些建筑以其谦逊而自信的姿态，证明了乡村不仅是需要被保护的“过去”，更是充满希望和创造力的“未来”。它们成为了新的文化地标，吸引着外界的目光，也重新凝聚了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

（二）历史街区更新中的新旧共生

面对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闽南历史街区，如何进行保护与更新，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过去“推倒重建”的粗暴模式早已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细腻和智慧的“新旧共生”策略。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将历史建筑和街巷肌理视为珍贵的资源，而不是发展的障碍。更新的目标不是创造一个虚假的仿古乐园，而是让历史街区在保留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重新焕发生机，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实践中，建筑师和规划师们常常采用一种“微创手术”式的方法。他们对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的建筑进行审慎的修复和加固，保留其原有的材料、结构和空间格局，只在必要的地方进行功能性的修缮与改进。

对于那些已经残破或消失的建筑地块，则采取“织补”的方式，植入新的建筑。这些新建筑在体量、高度、材料和色彩上，都与周围的历史环境保持着一种尊重的对话关系。它们不会拙劣地模仿旧的风格，而是以一种抽象和简化的现代语汇，回应传统的元素。例如，新建筑可能会采用与老厝相同的坡屋顶，但以更简洁的线条和现代的材料来呈现；它的墙面可能同样使用红砖，但通过创新的砌筑工艺，展现出全新的肌理。新与旧之间，通过这种微妙的并置与对比，形成了一种张力十足的视觉对话。老建筑因为新建筑的衬托而更显其历史的厚重，新建筑则因为老建筑的存在而获得了时间的深度。漫步在这样的街区，人们可以清晰地阅读到城市发展的不同历史层次，过去与现在并非相互隔绝，而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和谐共存，共同讲述着一个关于时间、记忆与新生的动人故事。

（三）文化建筑中的符号转译

博物馆、美术馆、剧院等大型公共文化建筑，往往被视为一个地区文化形象的集中体现，是文化对话实践最为激烈和前沿的阵地。在闽南地区，新建的文化建筑成为了建筑师们探索“符号转译”的绝佳平台。这里的“符号转译”，是指

将闽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符号或形式符号，通过当代建筑的语言和技术，转译成能够被现代乃至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感知的空间体验与建筑形态。这种转译不是字面上的直译，而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意译和升华。例如，一座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其建筑形态可能不会直接模仿一艘船，而是通过流畅的曲线、起伏的屋顶和如同波光般变化的表皮材料，来唤起人们对于海洋的联想与敬畏。

建筑师们从闽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汲取灵感。南音的委婉悠扬，可能被转译为建筑内部空间的迂回转折与光影的柔和过渡；高甲戏的激昂活力，则可能体现在建筑形态的戏剧性张力与色彩的强烈对比上。红砖，这一最基本的文化符号，在文化建筑中得到了最大胆的实验性运用。巨大的砖石体块，以一种纪念碑式的姿态，宣告着建筑的文化身份；参数化设计的砖砌幕墙，则展现出令人炫目的技术美感和艺术表现力。在这些建筑中，人们所体验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建筑本身，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文化叙事。建筑的空间、光影、材料和细节，都在共同讲述一个关于闽南的故事。这些成功的文化建筑，不仅成为了市民共享的文化客厅，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宣言，向世界展示了闽南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旺盛生命力与独特魅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对话。

第七章 红砖建筑的空间美学

闽南红砖建筑不仅仅是生活的容器，它更是被岁月凝固的艺术。其空间美学深植于传统哲学思想的沃土，通过对建筑形制、立面构图与空间序列的精妙处理，为居住者营造出富有诗意与人文关怀的栖居环境，展现了独树一帜的东方审美意境。

第一节 建筑形制的审美特征

建筑形制是理解空间美学的基础语汇。闽南红砖建筑通过对整体轮廓、立面构图和动态空间序列的精心组织，构建了一套完整而和谐的审美体系，使其在满足实用功能之余，更散发出强烈的视觉艺术感染力。

一、整体轮廓与天际线之美

远观闽南红砖建筑，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其起伏变化的天际线。这条由屋顶轮廓构成的曲线，是建筑与天空对话的方式，也是匠人审美情趣与宇宙观念的物化表达，充满了生命的灵动气韵与动态之美。

（一）燕尾脊的灵动与马背的沉稳

燕尾脊是闽南建筑天际线上最引人注目的笔触。其屋脊两端向上高高扬起，分叉的形态宛如燕子的尾羽，划出一条轻盈、优美的弧线。这条曲线充满了昂扬向上的动势，仿佛要挣脱大地的束缚，向天空飞升。这种设计不仅极具装饰性，更被赋予了家族兴旺、人才辈出的美好寓意。在宗祠、庙宇以及有功名的士绅府邸中，高高翘起的燕尾脊成为身份与荣誉的象征，其灵动的姿态为庄重的建筑增添了几分飘逸与秀美。

与燕尾脊的飞扬形成对比的，是马背脊的敦厚与沉稳。马背脊的形态更为平缓圆润，没有夸张的翘角，整体造型厚重朴实。根据阴阳五行学说，马背脊演化出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的形式，分别对应圆、直、曲、锐、方等不同造

型，蕴含着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与祈求平安的愿望。其具体对应关系及象征意义，可见下方的

马背脊五行形制对照表这种屋脊形式广泛应用于普通民居之中，其内敛、稳健的轮廓，如同坚实的马背，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平淡日常与安稳生活，体现了闽南人脚踏实地、崇尚平和的人文精神。

马背脊五行形制对照表

五行	对应造型	象征意义	应用特点
金	圆形	财源广进	饱满圆润，侧面呈弧形
木	直形	事业兴旺	端正平直，侧面呈直线
水	波浪形 / 曲形 (Wavy/Curved)	财运亨通	起伏多变，侧面呈波浪线
火	锐形 / 尖形 (Sharp/Pointed)	兴旺发达	脊顶高耸，两端尖锐
土	方形 / 平形 (Square/Flat)	稳重安定	沉稳厚实，侧面呈矩形

燕尾脊的灵动与马背脊的沉稳，在闽南的建筑群落中交相辉映，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变的天际线轮廓。当一座村落中，宗祠的燕尾高耸入云，而周边的民居则以平缓的马背簇拥，便形成了一种和谐的视觉秩序。这不仅仅是建筑形态的简单组合，更是社会伦理、宗族观念在空间上的具象化表达。飞扬与沉稳的对话，共同谱写了闽南天空下独特的建筑诗篇，展现了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的东方美学智慧。

（二）高低错落的屋顶组合

闽南红砖建筑的屋顶之美，不仅在于屋脊本身，更在于不同体量屋顶的组合关系。一座典型的闽南大厝，并非由单一的屋顶覆盖，而是由主厅、门厅、厢房、护厝等不同功能的建筑单元组成，每个单元都拥有独立的屋顶。匠师们严格依据尊卑有序的伦理原则，赋予主厅最高、最雄伟的屋顶，而两侧的护厝与前方的门厅则层层递减，形成主次分明、富有韵律感的屋顶序列。

这种高低错落的布局，使得建筑群在任何一个视角下都呈现出丰富的立体感与韵律感，彻底打破了单体建筑可能带来的呆板与沉闷。层层叠叠的屋顶如同山峦起伏，光影在不同高度的坡面上移动，产生了生动的视觉效果。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首先点亮主厝的正脊，傍晚的余晖则在层层叠叠的屋檐间留下温暖的光晕。这种布局不仅精准地满足了内部空间对于采光、通风和排水的实际需求，更在审美上创造了一种如同自然山水画般的意境，使得人工的建造物与周边环境达到了

完美的和谐统一。

（三）建筑群的韵律与节奏

从单体建筑延伸至整个聚落，闽南红砖建筑群展现出一种宏大的韵律美。成片的红砖古厝，以相似的材质、色彩和建筑语汇，构成一个统一的视觉基调。无论是连绵的红色墙面，还是此起彼伏的屋脊线，都在重复中形成强烈的节奏感。这种重复并非单调的复制，而是在统一中蕴含着丰富的变化。每一栋建筑在遵循共同范式的前提下，又在体量大小、院落进深、局部装饰上各具特色。

当人们漫步在这些古厝群的街巷中时，空间的节奏感变得尤为清晰。视线随着曲折的街巷时而被高墙遮挡，时而又豁然开朗，望见一片开阔的门埕或是一角飞扬的燕尾。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间距，门楼与门楼之间的对位，都经过了精心的考量，形成一种如同音乐般的节奏。建筑的实体是凝固的音符，而人们穿行其间的空间，则是流淌的旋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家族、社区与历史的宏大交响史诗，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群体和谐的东方聚落美学。

二、立面构图的秩序与变化

建筑的立面是它面向世界的“表情”。闽南红砖建筑的立面设计，始终在严谨的秩序感中寻求生动的变化，通过中轴对称、比例划分与虚实对比等手法，谱写了一曲材质、色彩与光影交织的和谐乐章。

（一）中轴对称的庄重感

中轴对称是闽南红砖建筑立面构图的核心法则，它深刻地烙印着源自中原的儒家礼制思想。在建筑的正面，一条无形的中心轴线贯穿始终，门楼、厅堂、天井等最重要的元素都被严谨地布置在这条轴线上。这种布局方式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稳定感与庄重感，赋予建筑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对称不仅是视觉上的平衡，更是对家族伦理、长幼尊卑等社会秩序的强调与尊崇。

主体的绝对对称与局部的灵动变化相结合，是闽南匠人高超智慧的体现。在主体建筑严格遵循对称原则的同时，两侧的护厝或附属用房的开窗、装饰等细节上则允许存在细微的差异。这种“大体对称，局部灵动”的手法，使得整个立面在保持庄重的同时，巧妙地避免了绝对对称可能带来的僵化与刻板，增添了鲜活的气息。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衡世界观：即在维护社会整体秩序与伦理的前提下，也尊重个体的创造活力与差异性。

（二）“三段式”立面的比例关系

闽南红砖建筑的墙体立面，在纵向上往往呈现出和谐的“三段式”构图，赋予了原本可能单调的墙面以古典的比例美感和丰富的视觉层次。这种垂直划分巧妙地借鉴了中国传统器物或家具的构成方式，使得建筑立面如同一件被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充满了强烈的节奏感与秩序性。

这种经典构图自下而上分别为基座、墙身和檐下三个部分，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与审美角色。

1. 基座：通常被称为“墙裙”，是建筑的基石。它多采用更为坚固耐久的白石或青石条石，有时也使用“出砖入石”的砌法，以应对南方的潮湿气候。石材的厚重感与沉稳色泽，为整个建筑提供了坚实的视觉支撑，使其稳稳地扎根于大地。

2. 墙身：立面的主体部分，被称作“身堵”。这里是标志性红砖大显身手的区域。温润的“烟炙砖”被砌筑成大面积的墙体，砖色红而不艳，充满了岁月的质感。匠人常在红砖墙中嵌入白石窗框或精美的砖雕，形成色彩与材质的对比，使墙身在统一中富于变化。

3. 檐下：位于屋檐下方的带状区域，即“水车堵”，是整个立面装饰最为华丽、最引人注目的篇章。这一区域如同展开的画卷，通过泥塑、彩绘、剪瓷雕等多种精湛工艺，集中展示了各种祥瑞图案、历史故事与戏曲人物。其精巧绝伦的工艺与绚丽的色彩，与下方相对朴素的红砖墙身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强烈的视觉焦点。

这三段式的划分，不仅仅是功能的需要，更是一种成熟的审美范式。从下至上，材质由坚实变得轻巧，色彩由素雅变得绚丽，装饰由简洁变得繁复。这种循序渐进的过渡与对比，创造出一种和谐而富有韵律的视觉感受，使建筑立面展现出均衡、典雅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魅力。

（三）门窗、墙面的虚实对比

在闽南红砖建筑的立面构图中，“虚”与“实”的对比是一对至关重要的美学关系。这里的“实”，主要指大面积的、封闭的红砖墙体或石砌墙体。这些墙面构成了建筑厚重、内向的性格，它们是承重的主体，是庇护家庭的屏障，给人以强烈的安全感和私密性。墙体本身并非完全的平板，砖石的砌筑方式、不同材质的拼接，都为其带来了丰富的肌理变化，使其在“实”中蕴含着细腻的质感。

与“实”的墙面相对的，便是“虚”的门窗洞口与透雕装饰。门与窗是建筑

内外沟通的桥梁，是光线和空气的通道，更是立面上打破沉闷、引入生气的关键元素。匠人们对门窗的位置、尺寸和形状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使其成为构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装饰华美的石质或木质窗棂，以及用于通风和装饰的各式漏窗，它们以玲珑剔透的“虚”，与周围厚重的“实”墙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张力。这种虚实相生的美学手法，既满足了实际的居住功能需求，又极大地丰富了立面的层次感与艺术性，创造出一种“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视觉节奏变化，使整座建筑仿佛在进行着一场光与影、内与外的持续对话。

三、空间序列的起承转合

闽南红砖建筑的美，不仅在于静态的造型，更在于动态的空间体验。当人穿行其间，建筑便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通过空间的组织与过渡，引导着人的情绪与感知，形成完整的起承转合的叙事。

（一）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的过渡

进入一座闽南大厝的过程，绝非一步踏入的简单动作，而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空间旅程。这个过程始于建筑之外的“门埕”，即门前的一片开阔的石铺广场。门埕作为公共街道与私密住宅之间的缓冲地带，既是邻里交往的半公共空间，也为建筑主体提供了必要的退让，形成了迎接的姿态。它将外界的喧嚣过滤，为进入者提供了整理心绪的序曲。

穿过门埕，高大而精致的门楼成为空间过渡的核心。门楼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其复杂的装饰和威严的体量，明确地宣告了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有秩序的内部世界。然而，踏入大门，视线并不会直接穿透到建筑的尽头。迎面而来的往往是第一进院落（天井）和两侧的廊道，主厅则掩映其后。这种“欲扬先抑”的处理方式，通过设置视觉障碍和路径的迂回，延长了空间的体验过程，层层递进地将人引入家庭生活的核心，创造出一种含蓄、内敛而又充满期待感的空间美学。

（二）院落空间的层次与渗透

天井是闽南红砖建筑的灵魂与呼吸的中心。在“两进三开间”或“三进五开间”这样更为复杂的布局中，多个天井被串联起来，形成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院落空间序列。从前到后，每一个院落都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区域和私密等级，如第一进院落常用于接待宾客，而深入其后的院落则属于家族内部成员的私密生活空间。这种以天井为核心的布局，清晰地界定了空间的主次与内外。

空间的层次感并非通过完全的隔断来实现，而是通过“渗透”的手法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连接各个院落的，是两侧开放的廊道、带有格栅的门窗以及形式各异的隔断。当人身处一个院落时，视线可以透过廊道或门洞，隐约窥见下一个院落的景象，或是远处厅堂的一角。这种视觉上的穿透性，打破了空间的封闭感，创造出深邃、悠远的景深效果。空间与空间之间，既有分隔，又有联系，仿佛彼此气息相通，形成一种流动的、连续的整体。

这种富有层次而又相互渗透的空间组织模式，完美地契合了中国传统大家族的聚居生活方式。它既能容纳一个大家族中不同分支的独立生活，通过院落进行区隔，保证了必要的私密性；又能通过廊道与厅堂将所有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方便进行共同的祭祀、节庆等集体活动，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空间在此成为维系家庭伦理与情感的纽带，充满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三）光影在空间序列中的引导作用

在幽深的闽南红砖建筑内部，光影扮演着无声的向导，是营造空间氛围、塑造序列节奏的关键元素。闽南建筑的匠师们并非被动地接受自然光照，而是主动且巧妙地驾驭光线，使其成为赋予建筑生命力的重要来源。

作为建筑核心的天井，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纳光”。它如同一个巨大的采光井，将天空的光与景引入封闭的建筑内部，为周围的厅堂、房间提供宝贵的光照。当人们在建筑序列中行进时，会经历一个由明到暗，再由暗到明的循环过程：从明亮的天井，进入相对幽暗的厅堂或廊道，随即又将步入下一个明亮的天井。

这种明暗交替的节奏，不仅为空间体验带来了丰富的变化，更在无形中引导着人的行进方向。光线明亮的天井自然地成为视觉焦点和空间的中心，吸引着人们向其走去。而廊道与厅堂的阴翳则提供了一个让视觉和心境得以沉静、休憩的过渡。光线穿过木雕窗棂，在斑驳的红砖地面上投下不断变幻的几何光斑，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具象化了，为静态的建筑空间注入了动态的诗意。

随着一天之内太阳角度的变化，以及一年四季天光色彩的流转，建筑内部的光影效果也呈现出无穷的尽态极妍。清晨柔和的斜光，午后强烈顶光下形成的清晰阴影，黄昏时分温暖而悠长的光线，都赋予了同一空间在不同时刻以截然不同的情绪和面貌。光影的舞动，使得红砖建筑的空间序列不再是固定的物理存在，而是一个充满生命气息、与自然同呼吸的、时刻变幻着的艺术品。

第二节 色彩与质感的视觉表达

闽南建筑的视觉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造型和空间布局上，更深刻地烙印在它色彩与质感的精妙运用之中。它以乡土材料为笔，以自然光影为墨，谱写了一曲关于色彩的交响与材质的对话。这种表达方式，既是对中原文化色彩观念的继承与呼应，也融合了海洋文化的开放与热烈，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喧闹又沉静，既粗犷又细腻的独特美学风貌，成为解读闽南人精神世界的一扇视觉之窗。

一、红砖的丰富色彩层次

作为闽南建筑的标志性符号，红砖的色彩远非单一的红色所能概括。它承载着历史的温度、匠人的心血与自然的印记，呈现出丰富而微妙的色彩层次。从窑火中淬炼而生的深沉暖色，到岁月洗礼下愈发鲜艳的奇特现象，红砖的色彩本身就是一部流转的视觉史诗，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记忆与情感。

（一）“烟炙砖”的暖色调与历史感

“烟炙砖”，又称“烟仔砖”，是闽南传统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材料之一。它的诞生源于闽南地区独特的制陶工艺与自然智慧。工匠们取用富含铁质的红壤黏土制成砖坯，以当地盛产的松木为燃料进行烧制。在烧制过程中，松枝燃烧产生的浓烟与灰烬，会随着窑内火路窜动，飘落在斜向堆叠的砖坯缝隙间，经过高温的化学反应，于砖的表面留下了深浅不一、形态各异的黑色或褐色斜纹，如同水墨画中率性的笔触。这种独特的“烟炙”效果，使得每一块砖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印记。

这种由窑火随机“创作”出的纹理，与砖本身温润的红色基调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复杂而迷人的暖色调。它不像工业化生产的红砖那样均质、鲜亮，反而带有一种天然的、饱经沧桑的质感。阳光照射下，墙体上成千上万块“烟炙砖”的色泽与斑纹交织在一起，光影流动，变幻万千，营造出一种温暖、厚重而富有历史感的视觉氛围。这种色彩并非张扬的炫耀，而是一种内敛的诉说，仿佛将数百年的风雨故事、家族的兴衰荣辱都沉淀在了这片红黑交织的墙面上，让人在凝视之间，便能感受到时光的流转与历史的脉搏。

（二）“清水砖”的纯净与质朴

与“烟炙砖”的繁复与深沉形成对比，“清水砖”则以其纯净、质朴的特质，

在闽南建筑的色彩体系中占据了另一重要席位。所谓“清水砖”，是指那些在烧制过程中火候均匀、成品色泽纯粹、表面光滑的红砖，因其砌筑的墙面常常不添加任何粉刷或装饰，直接呈现砖体本身的样貌，故得此名。这种砖的制作对土质和烧制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以求达到色泽均一、质地细腻的理想效果。

“清水砖”所呈现的，是一种更为明快、纯粹的红色。它少了“烟炙砖”的烟火气与沧桑感，多了一份素净与雅致。在闽南传统民居中，“清水砖”常用于构建墙体的特定部分，如墙裙、勒脚或者与其他材料进行搭配，以其干净利落的线条和纯净的色块，来平衡整体视觉。这种红，鲜明而不刺眼，带着泥土的芬芳和火焰的温度，具有一种源于自然的亲和力，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质有余者，不受饰”的素朴美学观念。

在一些现代建筑对闽南元素的转译中，“清水砖”更是大放异彩。设计师们利用其规整的形态和纯净的色彩，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创造出富有韵律感和现代感的墙面效果。它既保留了红砖的传统意蕴，又符合现代审美的简洁要求。无论是大面积铺陈所形成的视觉冲击力，还是作为点缀所带来的那一抹亮色，“清水砖”都以其独特的纯净与质朴，在喧嚣的现代语境中，营造出一片宁静而温暖的建筑诗意。

（三）红砖与白石、青瓦的色彩对比

闽南建筑之所以能给人留下如此鲜明而深刻的视觉印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大胆而和谐的色彩搭配，其中，红砖与白石、青瓦的色彩对比堪称经典。这种强烈的色彩碰撞，不仅是对建筑各个功能构件的清晰界定，更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审美表达，共同谱写了“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的经典乐章。

这三种材质的对比和协同作用，是闽南建筑色彩美学的核心，其主要特征在闽南建筑主要材质特征对比表中可见。

闽南建筑主要材质特征对比表

材质	主要构成	色彩 / 色调	质感 / 特性	主要功能定位
红砖（烟炙砖 / 清水砖）	富含铁质的黏土，经高温烧制	暖红、深沉至鲜亮，烟熏黑纹	粗砺、质朴、隔热透气	墙体主体、装饰元素
白石（花岗岩）	当地盛产的坚硬花岗岩	冷白、灰白、清爽	坚硬、刚毅、防潮耐候	墙基、勒脚、门窗框、承重结构
青瓦（黑瓦 / 灰瓦）	陶土烧制，表面处理呈青黑色	沉稳、内敛、深青 / 黑灰	平滑、吸光、遮风挡雨	屋面覆盖、形成稳定视觉基座

红砖的暖、白石的冷、青瓦的沉，这三者构成了闽南建筑色彩构成的主旋律。白石通常指的是当地盛产的花岗岩，其质地坚硬，色泽洁白或灰白，常用于墙基、墙裙、门窗框、石柱等部位。红砖的热烈与白石的冷静并置一处，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张力。特别是在“出砖入石”的墙体构造中，不规则的白色石块与整齐红色砖块交错砌筑，红色如织带，白色如星点，二者在强烈的对比中达到了奇妙的和谐，形成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的独特墙面。这种手法不仅美观，据传还源于明代泉州大地震后，工匠们利用破碎砖石修复墙体的智慧，是一种“废物利用”的创造，体现了闽南人务实而富有艺术巧思的精神。

屋顶则多覆盖青灰色或黑色的瓦片，偶尔也使用红色瓦当。青瓦的颜色沉稳、内敛，与下方热烈的红墙形成了上轻下重的稳定感。当阳光洒下，红墙显得愈发艳丽，白石愈发清爽，而青瓦则以其深沉的色调，默默地吸收着光线，为整个建筑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视觉基座。这种色彩组合不仅适应了闽南地区亚热带气候的特征——红墙白石不易吸热，还能在视觉上带来清爽感——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文化心理。红色源于中原“朱色为贵”的传统和闽地独特的民间信仰，象征着吉祥与兴旺；白色代表洁净与质朴；青色则蕴含着沉静与悠远。

1. 视觉冲击与和谐共生：红与白的强烈对比，创造了极高的视觉辨识度，使建筑在环境中脱颖而出，充满活力。

2. 功能与美学的统一：白石为基，坚固防潮；红砖砌墙，隔热透气；青瓦覆顶，遮风挡雨。如上表所示，色彩的差异恰好对应了材料的物理属性和结构功能，实现了功能与美学的完美结合。

3. 文化意蕴的象征：红色的热烈、白色的素雅、青色的沉静，共同构成了一种丰富而平衡的文化性格表达，既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不失沉稳内敛的底蕴。

二、砖墙的质感与肌理

闽南红砖建筑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绚丽的色彩，更在于其丰富多变的墙体质感与肌理。匠人们以砖为语汇，通过精湛的砌筑技艺、立体的雕刻手法，乃至对时间痕迹的坦然接纳，共同营造出一种可触、可感的视觉艺术。这些墙面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屏障，而是充满了生命细节与情感温度的艺术画卷。

（一）不同砌法产生的墙面纹理

闽南匠人深谙砖材的特性，他们如同编织者一般，通过不同的砌筑方式，为原本单调的墙面赋予了千变万化的纹理。这些砌法不仅出于结构和功能的考量，更蕴含着高度的审美自觉。最常见的砌法包括人字形、工字形、六边形龟背纹、万字纹等，每一种都对应着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文化寓意。人字形铺贴显得整齐有序，富有方向感；龟背纹则因其六边形的稳定结构，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美好祝愿。

在具体的建筑实践中，工匠们会根据建筑的不同部位和等级，采用不同的砌法和砖的规格。例如，“五花头”砖常用于墙体和墙角柱，“太兴”砖则用于墙堵的边框线脚。这种对细节的考究，使得墙面纹理的变化更加细腻和富于逻辑性。除了这些图案化的拼贴，一种被称为“出砖入石”的技艺更是将不同材质的纹理对比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墙体中，形状不一的白色花岗岩块与规格统一的红砖交错组合，石材的粗犷、随机与红砖的规整、细腻形成了强烈的质感碰撞。石块仿佛是从墙体中自然生长出来，而红砖则像是流动的纽带将其串联，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张力的“立体绘画”。

“金包银”或“空斗墙”的砌法也颇具特色，这是闽南建筑适应地域气候和资源节约的智慧体现。匠人将红砖砌成中空的斗形外框，中间则填充碎石、土坯等相对廉价的材料，形成独特的立面效果。这种做法既节约了昂贵的红砖，又利用空腔形成了隔热、保温、防潮的实用功能，非常适应闽南湿热的气候。从外观上看，这种砌法使得墙面呈现出独特的韵律感。这些丰富多样的砌法，不仅是结构技术，更是一种艺术语言，它们让砖墙摆脱了平面的束缚，产生了类似织物的丰富肌理，充满了手作的温度和匠心的智慧。

这些由砌法创造的纹理，在光线的映照下，会产生微妙的光影变化。清晨和黄昏，当阳光斜射在墙面上，人字纹的凹凸、龟背纹的轮廓、以及“出砖入石”中石块的立体感都会被极大地强化，形成流动的光影韵律。墙面因此不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光线的移动而呈现出不同的表情，充满了时间的动感和生命的活力。这种对墙面纹理的极致追求，体现了闽南建筑对细节的关注和对材料美感的深刻理解。

（二）砖雕的立体感与光影效果

如果说砖墙的砌法是二维平面的编织艺术，那么砖雕则是赋予墙体以三维立体生命的浮雕诗篇。闽南砖雕作为“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题材，为红砖建筑增添了浓墨重彩的艺术分量。闽南砖雕主要选用质地细腻、易于雕琢的红砖为材料，通过浮雕、透雕、线刻等多种手法，在方寸之间雕琢出大千世界。这些砖雕通常被精心布置在建筑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如入口两侧的“对看堵”、墙身的“镜面墙”以及水车堵等处，成为建筑的“门面”和点睛之笔。

砖雕的题材包罗万象，从“福禄寿喜”等吉祥文字，到龙凤麒麟、花鸟鱼虫等祥瑞图案，再到源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的人物场景，无不体现着房主人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例如，雕刻蝙蝠与鹿，取“福禄”之谐音；雕刻“鹤鹿同春”，则寓意长寿与祥瑞。匠人们运用高超的技艺，使得这些图案层次分明，形象生动。在雕刻完成后，有时还会在凹陷处填上白灰，利用红与白的鲜明对比，强化图案的轮廓，使其远观犹如一张张精美的古典剪纸，极具视觉冲击力。

（三）风雨侵蚀后的岁月痕迹

闽南红砖建筑的美，不仅在于其初建时的精雕细琢与色彩斑斓，更在于其历经风雨沧桑后，所沉淀下来的那份独特的岁月痕迹。时间，这位最伟大的艺术家，在红砖墙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些印记非但没有减损建筑的美，反而为其增添了无法复制的深度与魅力。这种坦然面对自然侵蚀、并将其转化为美学一部分的态度，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道法自然”的智慧。

红砖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生命周期”。据观察，泉州地区烧制的红砖在刚出窑时颜色偏暗，甚至带有些许紫色，但在经历多年的风吹日晒和雨水冲刷后，会发生奇特的“返红”现象，色泽反而变得更加鲜艳明亮。这种不可预知的变化，使得建筑的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仿佛建筑自身也在呼吸、在成长。墙面上，雨水流过的痕迹、风力剥蚀的斑驳、以及因盐分侵蚀而产生的泛白，都共同构成了一幅抽象而生动的画作。

在闽南潮湿多雨的气候中，墙角的青苔、砖缝里倔强生长的小草，也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微小的生命，以其柔韧的绿意，点缀在温暖的红墙之上，形成了一种冷暖色调的和谐共生，充满了诗意与生机。它们不仅是生态的自然演替，更是时间流逝的诗意见证，模糊了人造物与自然之间的界限，使建筑仿佛是从土地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般，充满了亲切感。

这种经由岁月打磨出的质感，是任何人工做旧都无法比拟的。它所承载的，

是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是家族历史的无声叙述。轻抚这些布满痕迹的砖墙，指尖传来的不仅是砖石的粗糙或温润，更是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情感的温度。这种美，超越了单纯的视觉形式，而深入到情感与记忆的层面，引发观者对时间、对生命、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正是闽南古厝历久弥新、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

三、材质搭配的和谐之美

闽南建筑的视觉艺术，是通过不同材质之间的“对话”来完美呈现的。匠人们如同乐队指挥，巧妙地调度着砖、石、木等各种自然材质，让它们在对比与协调中相互唱和，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优美的建筑乐章。这种对材质本身特性的尊重与深刻理解，是闽南建筑亲和力与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一）砖、石、木的材质对话

在闽南传统建筑中，砖、石、木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三种建筑材料，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色彩、质感和物理属性，三者之间的搭配与对话，构成了建筑丰富多样的表情。这种对话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一种基于功能、结构与审美的有机整合。

1. 结构上的承接与转换：通常，建筑的基座由坚固、沉重的花岗岩（白石）砌筑，以承载整个房屋的重量并有效防潮。墙体则主要由红砖构成，红砖相较于石材更轻便、易于加工，且具有良好的隔热透气性。而屋顶的梁架、斗拱、门窗、格扇等则大量使用木材，木材质地温润、易于雕刻，能够满足精细装饰的需求。这种从下至上由石到砖再到木的材质转换，清晰地反映了建筑的力学逻辑，形成一种稳定而和谐的视觉秩序。

2. 色彩上的冷暖对比：材质的差异也带来了色彩的丰富性。花岗岩的冷白色、红砖的暖红色、木材的自然原色或深色漆面，三者形成了冷—暖—中的色彩节奏。红墙与白石基座的强烈对比创造了视觉焦点，而木构部分的温和色调则起到了调和与过渡的作用，使整体色彩既鲜明活泼又不失沉稳庄重。

3. 质感上的刚柔相济：石材的坚硬、刚毅，红砖的质朴、粗砺，与木材的温润、细腻形成了鲜明的质感对比。在“出砖入石”的墙面上，石的“刚”与砖的“柔”直接对话；而在檐下空间，精雕细琢的木构斗拱与下方粗犷的砖石墙体又形成一种刚柔相济的美感。这种丰富的质感变化，极大地提升了建筑的艺术表现力。

这种砖、石、木的经典组合，不仅是闽南工匠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智慧，

也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中“因材施教”的原则。每一种材料都在最适合它的位置上，发挥着最大的功能与审美价值，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成就，共同营造出一个完整、和谐而充满生命力的建筑整体。

（二）粗糙与光滑的质感对比

闽南建筑在材质的运用上，非常善于利用粗糙与光滑两种截然不同质感的对比，来营造丰富的触觉和视觉体验。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不仅打破了单一材质可能带来的沉闷感，更通过触感的暗示，引导着人们与建筑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对人性化尺度和感官体验的高度重视。

一方面，建筑保留并强调了大量材质本身的天然粗糙感。例如，“烟炙砖”表面因窑火熏烤而留下的不规则颗粒感，以及“出砖入石”墙体中未经精细打磨的花岗岩石块，都呈现出一种质朴、粗犷的美。这些粗糙的表面能够更好地捕捉光线，在阳光下形成丰富而柔和的漫反射，使得墙面看起来温暖而富有深度，避免了大面积平滑表面可能带来的冰冷和疏离感。这种对粗糙质感的欣赏，也体现了道家美学中“大巧若拙”、“复归于朴”的审美意趣。

另一方面，光滑的质感则主要体现在精细打磨的石材构件、上漆的木构件，以及部分采用“清水砖”的墙面。这些光滑的表面能够清晰地反射光线，凸显材料的精致与细腻，常用于建筑中需要重点强调和装饰的部位。粗糙与光滑的交替出现，使得建筑立面富有节奏感和层次感，提供了多维度的感官刺激。当观者靠近建筑时，指尖可以感受到材质的温度与粗细，视觉上则被这种刚柔相济的对比所吸引，从而加深了对闽南建筑艺术的理解和体验。

（三）自然材质的亲和力

闽南建筑之所以能带给人温暖而亲切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自然材质的广泛而真诚的运用。无论是构成建筑骨架的砖、石、木，还是用于装饰的贝壳、陶瓷，几乎都直接取自于周遭的自然环境。这种源于乡土的选材策略，不仅是经济与便利性的考量，更深层次地，它建立了一种人、建筑与自然之间血脉相连的情感纽带。

这些自然材质本身就带有一种生命的气息。从泥土中来、经烈火淬炼的红砖，带着大地的温度；从山体开采、经匠人稍作雕琢的石材，保留着山川的筋骨；而源于森林的木材，则以其温润的触感和清晰的年轮，诉说着生命的成长。当人们居住在这样的建筑中，无时无刻不被这些熟悉的自然元素所包围，这种感觉就像

是依偎在大地的怀抱里，从而产生一种根植于内心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自然材质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其非标准化的“不完美之美”。工业材料追求的是绝对的均质和光滑，而自然材料则充满了各种随机的、不可复制的细节。正如上表所示，每一块“烟炙砖”的斑纹都独一无二，每一块花岗岩的纹理都千差万别，每一根木梁的节点都形态各异。这种充满变化的细节，使得建筑充满了人情味和手作的温暖，避免了机械复制所带来的冰冷与单调。它鼓励人们去近观、去触摸、去发现每一个细微之处的美，从而与建筑建立起更为亲密和个人化的情感联系。这种对自然材质的尊重与善用，使得闽南建筑超越了冰冷的物理空间，成为一个充满亲和力、能够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

第三节 光影在红砖建筑中的运用

闽南红砖建筑不仅是结构与材料的交响，更是光影艺术的绝妙舞台。匠人们深谙光线对于空间情绪的塑造力，他们巧妙地运用建筑语汇，引导、过滤、组织着自然与人造的光源，使之成为空间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赋予了红砖建筑以生命和灵魂。

一、自然光对空间的塑造

在亚热带充沛的阳光下，闽南建筑并非一味地迎接光明，而是通过精巧的设计，将光“驯化”为塑造空间的柔性工具。光不再是简单的照明，而是定义区域、区隔内外、营造氛围的核心媒介，使居住者在光影的变幻中感受自然的韵律与建筑的智慧。

（一）天井、庭院对光线的引入与漫射

闽南传统民居的核心，往往是一方或多方天井。天井作为建筑的“光之井”，是整个封闭式建筑群体主要的采光源头。它将天空纳入建筑的怀抱，让阳光得以垂直射入深邃的宅院内部。这种设计不仅解决了大进深建筑的采光与通风问题，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内向型的光线中心。阳光在进入天井后，经过四壁的反射与漫射，强度被大大削弱，化为柔和均匀的漫射光，洒满中心的厅堂。

这种光线处理方式，形成了闽南民居特有的“四水归堂”式的向心性空间感。天井区域是最明亮的，成为家庭公共活动的中心，充满了活力与生气。而围绕天

井的廊道与房间则处于光线的次级区域，光照强度递减，形成自然的过渡。光线不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有中心、有层次的，它定义了空间的公共与私密，强化了家庭的凝聚力，使得整个建筑内部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自给自足的光环境。

天井与庭院中种植的绿植，也参与了对光线的再塑造。摇曳的竹影、婆娑的树影，在地面与墙体上投下不断变化的图案，为静谧的空间增添了时间的动感与生命的趣味。光穿过叶隙，化作斑驳的光点，随着日光的推移和微风的吹拂而舞动，这不仅是对光线的二次过滤，更是一种诗意的点缀，让居住者在日常生活中，时刻能感受到光影带来的细腻美感。

（二）深檐、高窗对光线的过滤与调节

闽南地区夏季炎热且多雨，深远的出檐成为红砖建筑标志性的特征之一。这巨大的屋檐，如同一个天然的遮阳棚，在炎炎夏日，能够有效地阻挡高角度的直射阳光，避免室内过热，为檐下的廊道空间提供一片清凉的阴影。这片阴影区域，是室内与室外的过渡地带，光线幽暗，温度宜人，人们可在此休憩、闲谈，享受穿堂而过的凉风，是极具生活气息的“灰空间”。

高窗的设计则是对光线调节的另一种智慧。窗户通常开设在墙体的较高位置，有时甚至紧贴着屋檐下部。这样的设计，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通风，排出室内的热空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精妙地控制入室光线。高窗引入的光线，多为经过天空和环境反射的散射光，光线质量柔和，避免了低窗带来的阳光直射与眩光问题。同时，光线从高处泻入，能够更深地照亮室内空间，尤其是在进深较大的厅堂中，可以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带有某种神圣感的光照效果，提升了空间的纵深感与庄重感。这种对光线的过滤与引导，体现了建筑对地域气候的深刻理解与适应。

（三）光线在砖墙上的移动与变化

红砖墙体本身就是光影的绝佳载体。每一块红砖的质地、色泽都并非完全均一，当阳光照射在墙面上时，会产生微妙丰富的光色变化。清晨的阳光柔和温暖，为红砖染上一层金色的光辉；正午的阳光强烈炽热，让砖墙的色彩显得格外饱满艳丽；傍晚的斜阳则拖出长长的影子，砖的质感在低角度光线下被前所未有的地强调出来，墙面呈现出一种深沉而富有历史感的色调。

更为精彩的是，光线与墙面上丰富的装饰细节的互动。无论是砖雕、石雕还是交趾陶，这些立体的装饰在不同时刻的光照下，会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随

着太阳角度的移动，浮雕的阴影轮廓也在缓慢地游走、伸缩，仿佛在墙面上上演着一出无声的皮影戏。光是画笔，影是墨，它们共同在粗糙或细腻的墙面上进行着永恒的创作。这种光影的变化，让原本静态的建筑立面充满了动态的韵律感，也让居住者通过观察墙面上的光影移动，清晰地感知到时间的流逝，体会到“光阴”一词的具象之美。

二、人工照明的氛围营造

当夜幕降临，自然光隐退，人工照明便接管了对空间的塑造。在闽南红砖建筑中，人工照明不仅是为了满足功能性的需求，更是营造特定氛围、续写空间故事的重要手段。烛火与灯笼的光芒，为古老的建筑披上了一层温暖而神秘的面纱。

（一）灯笼、宫灯的暖光效果

传统的人工照明，以灯笼和宫灯为主角，它们是营造夜间氛围的核心元素。

1. 这些灯具多以竹木为骨，糊上纱、纸，或镶嵌玻璃，内部点燃蜡烛或油灯。烛火的光芒透过半透明的材质，被柔化成一片朦胧而温暖的橘红色光晕。这种暖色调的光，具有极强的亲和力与包裹感，能够瞬间驱散夜的清冷，营造出一种温馨、安详甚至喜庆的家庭氛围。在节庆之夜，大厝内外挂满红灯笼，光芒映照着红砖墙，整个建筑仿佛都在燃烧，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2. 灯笼的光是弥散的、非定向的。它不会在空间中制造强烈的明暗对比，而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将周围的环境轻轻托起。悬挂在廊下或厅堂中央的宫灯，其光芒均匀地散布开来，照亮了人们的脸庞，却又在屋顶的高处和空间的角落里留下了大片的阴影。这种含蓄的光照方式，保留了夜的静谧与神秘，让空间显得更加深邃、富有层次，引人遐想。

（二）灯光对砖雕、木雕的突出表现

与日光普照下的效果不同，人工照明为欣赏建筑的精美雕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匠人们善于利用小而集中的光源，如烛台或特定位置的灯盏，对重要的装饰构件进行戏剧化的呈现。光从侧下方或斜上方以特定的角度照射在繁复的木雕或砖雕上，能够产生强烈的明暗对比效果，极大地增强了雕刻的立体感和浮雕感。

在昏暗的背景下，被灯火照亮的部位显得格外突出，细节被前所未有的地放大和强调。人物的衣褶、花鸟的羽翼、瑞兽的鳞甲，在光与影的交错中显得栩栩如生，仿佛即将从墙上或梁架上跃出。这种“舞台聚光灯”式的效果，将观赏者的

视线牢牢吸引到这些艺术精华之上，使其在夜晚成为空间的视觉焦点。

光线在这些雕刻表面上勾勒出的高光与投下的阴影，其清晰度和对比度远胜于白天的漫射光。这种被强化的肌理与质感，让人们更能体会到工匠精湛的技艺与不凡的匠心。烛火的摇曳不定，更使得这些雕刻上的光影产生微妙的动态，赋予了这些静止的形象以流动的生命气息，创造出一种引人入胜的、充满故事性的视觉体验。

（三）夜间建筑轮廓的勾勒

在广阔的田野或密集的街巷中，夜间的闽南红砖建筑呈现出与白日截然不同的风貌。通过在屋檐下、廊柱间、山墙顶端等关键位置布置光源，建筑师或居住者能够有选择地“画”出建筑的夜间形态。光不再是充满整个空间，而是化作线条和块面，用于勾勒建筑最具特色的轮廓。

优美的燕尾脊或马背脊的曲线，在背景夜空的衬托下，被灯光照亮，显得格外飘逸和醒目。层层叠叠的屋檐，其出挑的深度和丰富的层次感，也在由下向上的照明中得到凸显。这种轮廓性的照明方式，抓住了闽南建筑最核心的形式语言，将其从黑暗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清晰而富有诗意的剪影。建筑的实体感在夜晚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轻盈、更具图案感的抽象美学。这种被光“再创作”的建筑形象，宁静、庄重，带有一种远离尘嚣的纪念碑性，成为乡村夜景中温暖而坚实的地标。

三、光影与意境的创造

在闽南建筑中，光影的运用超越了物理功能，进入了心理与精神的层面。它是一种营造意境、寄托情感、表达哲思的语言。光与暗的辩证关系，被用来构建空间秩序，暗示神圣体验，并记录时间的诗意流转，是建筑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光厅暗房”的明暗对比

“光厅暗房”是闽南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民居空间布局的核心原则之一。它通过对光线的主动控制，清晰地划分了建筑内部不同区域的功能与等级。厅堂作为家族举行仪式、接待宾客、日常议事的公共空间，通过天井或高窗获得充足的光线，使其显得明亮、开敞、气派，象征着家族的体面与秩序的井然。明亮的光线也促进了公共交流，符合其作为家庭活动中心的功能定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侧的“房”即卧室，则被刻意处理得较为幽暗。它们通常只有一扇面向内廊或后巷的小窗，采光有限。这种设计一方面是出于私密性的考虑，为家庭成员提供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休息场所。幽暗的环境有助于平复心绪，适宜睡眠，体现了对个人生活起居的体贴。

更深层次上，“光厅暗房”的格局蕴含着儒家的伦理观念和阴阳哲思。厅堂为阳，代表着公共、礼仪、显赫的一面；房间为阴，代表着私密、休憩、内敛的一面。这种鲜明的明暗对比，不仅是功能主义的体现，更是一种空间秩序的宣告，它用光线这一最直观的语言，将“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宗法伦理固化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之中，使建筑成为承载并传承文化观念的载体。

（二）光影在宗教建筑中的神圣感营造

在祠堂、庙宇等宗教性或准宗教性建筑中，光影的运用更加趋向于精神性的表达，其核心目标是营造一种庄严、肃穆、超凡脱俗的神圣氛围。这类建筑的内部空间通常比民居更为高大、幽深，而采光口则被设置得更少、更隐蔽。光线往往不是大面积地铺陈，而是作为一种稀缺的、被引导的元素，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

一束光从高侧窗或天窗中精准地投射下来，恰好落在烟雾缭绕的神龛或祖先牌位之上，而周围广阔的空间则沉浸在庄重的黑暗之中。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创造出一种极具戏剧性的聚焦效果，仿佛是来自天界的圣光，瞬间将人的注意力引向被照亮的神圣对象。光，在此刻成为了神性的隐喻，是连接凡人与神明、现实与超越世界之间的媒介。幽暗的环境则帮助信众收敛心神，排除外界干扰，进入一种虔诚的、内省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与神明或祖先进行精神上的沟通。

（三）光影变化带来的时间流逝感

闽南红砖建筑就像一台巨大的日晷，通过捕捉光影的微妙变化，无声地记录着时间的流逝。在漫长的一天中，太阳光线的角度、强度和色温都在不断改变，投射在建筑内外墙面、地面和柱子上的影子也随之发生着拉长、缩短和方向的偏转。天井中光斑的移动轨迹，窗棂影子在地面上的缓慢“行走”，都成为衡量时间的天然刻度。

这种对时间的可视化呈现，让居住在其中的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自身与自然节律的同步。它不同于钟表所代表的机械、均匀的时间，而是一种充满了生命感与周期性的时间体验。观察光影的变化，成为一种日常的、不自觉的审美活

动，它提醒着人们晨昏的更替、四季的轮回。在这座被光影雕刻的建筑里，时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被观看、被感知的具体存在，建筑由此也获得了超越其物质躯壳的深厚内涵，成为人与自然、与宇宙对话的静谧场所。

光影在闽南红砖建筑中的运用要素表

要素类型	建筑构件	功能 / 效果	意境营造
自然光引入与漫射	天井、庭院	解决深宅采光通风，形成柔和漫射光	创造“四水归堂”向心性，定义公共中心
自然光过滤与调节	深檐、高窗	阻挡直射阳光，引入柔和散射光，避免眩光	创造清凉“灰空间”，提升厅堂庄重感
光与材质的互动	红砖墙体、雕刻	强调砖块肌理和色泽变化，浮雕阴影动态游走	具象化“光阴”流逝，增强建筑的动态韵律感
人工照明	灯笼、宫灯	提供温暖橘红色光晕，光线弥散、非定向	营造温馨、喜庆的家庭氛围，保留夜的静谧
明暗对比	厅堂与卧室	厅堂光照充足，卧室幽暗私密	划分空间等级，固化“光厅暗房”的伦理秩序

上述光影在闽南红砖建筑中的运用要素表列出了光影在闽南红砖建筑中扮演的角色。

第四节 建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闽南建筑作为中华建筑文化的重要分支，其独特的魅力不仅在于红砖燕尾的视觉冲击，更深藏于其与自然、村落及人文环境的和谐共存之道中。这种智慧根植于闽南人民对乡土的深厚情感与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每一栋建筑都仿佛是从土地中自然生长出来，成为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建筑与自然地形的结合

闽南传统聚落的选址与布局，充分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建筑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谦逊地融入广阔的自然背景之中，通过巧妙的规划，实现与山川水脉的对话与共鸣，展现出一种深刻的生态智慧。

（一）顺应山势、水系的布局

闽南地区多丘陵山地，地形复杂，先民在营建居所时，并未强行改造自然，而是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与顺应。村落的布局往往依山就势，建筑群沿着等高线错

落有致地展开，形成自由而有机的形态。这种布局方式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山体的破坏，保留了原始的自然景观，同时也有效地利用了地形进行防御和组织空间。许多村落临水而建，或是将潺潺溪流引入村中，建筑围绕水系展开，形成了灵动的水巷空间。水不仅为村民提供了生活所需，调节了局部微气候，更在风水观念中象征着财富与生机，使得整个村落充满了活力。这种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的营造方式，使得建筑与山水轮廓线完美融合，构成了一幅幅宛如天成的山水画卷，体现了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巧妙利用。

（二）“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理想模式

“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选址的经典法则，在闽南地区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应用。这一模式深刻地揭示了建筑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和生态平衡关系。“背山”意为建筑的后方有坚实的山脉作为屏障，这在多风的沿海地区尤为重要，能够有效抵挡冬季凛冽的寒风，形成一个稳定、安全的“气场”。同时，山体也为村落提供了丰富的物产和安全的天然防线。“面水”则是指建筑朝向开阔的水域，如河流、池塘或大海。水域不仅便于取水、灌溉和交通，更重要的是，在夏季能够带来凉爽的水汽，调节居住环境的温度与湿度。开阔的朝向也保证了充足的日照，满足了生产生活的需求。这一理想模式的构成，背后是古人对日照、风向、水源等自然因素长期观察和经验总结的结晶。它不仅创造了冬暖夏凉、宜居宜业的物理环境，更在心理上给予人一种被自然环抱、安全稳定的归属感，是科学性与人文关怀的高度统一。无论是宏大的土楼群还是精巧的红砖大厝，都可以在其选址中看到这一智慧的体现，建筑仿佛被安置在自然的怀抱之中，实现了与天地山水的和谐共鸣。

（三）建筑对自然环境的谦逊姿态

闽南建筑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谦逊的姿态。它并非以征服者或统治者的形象出现，而是如同一个谦和的对话者，静静地融入并点缀着自然。建筑的体量与高度经过精心控制，极少出现突兀地破坏山体轮廓线或水岸线的构筑物。即便是规模宏大的“皇宫起”大厝或是防御性的土楼，其外观色彩和材料也力求与环境协调。红砖的暖色调在闽南四季常青的植被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而又和谐，仿佛是土地里开出的花朵。而土楼则直接取用当地的生土、木材建造，色彩与大地融为一体。这种材料上的本土化选择，不仅降低了建造成本，减少了运输能耗，更重要的是确保了建筑在视觉上和生态循环上都能与周边环境无缝

对接，展现了一种根植于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可持续的建造伦理。

二、建筑与村落肌理的融合

闽南建筑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单体的设计上，更在于其如何通过组合、连接，共同编织出丰富而有序的村落空间网络。这种肌理充满了生活的温度，塑造了独特的空间体验，成为邻里交往与社区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一）街巷空间的连续性与趣味性

闽南传统村落的街巷并非现代城市规划中笔直单调的线条，而是充满了曲折变化和丰富趣味的有机网络。这些街巷随着地形的起伏、建筑的错落而自然形成，时而开阔，时而狭窄，时而笔直，时而转折。行走其间，空间的序列不断变化，光影随之摇曳，视线在不经意的转角处总能收获新的发现，可能是一座精美的门楼，一处伸出的燕尾脊，或是一棵古榕的浓荫。这种步移景异的空间体验，打破了长巷的单调与沉闷，赋予了日常行走以探索的乐趣。街巷两侧的建筑界面也极富层次，“出砖入石”的墙体、精雕细琢的窗棂、凹入的“塌寿”空间，都为街道增添了丰富的细节和肌理感。这些空间不仅是交通的通道，更是村民们相遇、交谈、游戏的社交场所，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共同构建了村落充满活力、连续不断的公共生活空间。

（二）建筑群的围合与开放

围合与开放是闽南建筑群布局中的一对核心概念，体现了处理内部与外部、私密与公共关系的独特智慧。单体建筑如三合院或四合院，通过建筑实体将庭院（天井）围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内向、安宁的家庭生活核心。这个被“光厅暗屋”环绕的明亮空间，是家庭内部进行祭祀、晾晒、休憩和儿童游戏的主要场所，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将视线扩展到整个村落，多个院落组合在一起，又形成了更大尺度的围合。

1. 组团围合：数座大厝常常以“梳式布局”并排而立，或围绕一个共同的“埕”展开，形成一个个邻里组团。这种布局既保持了各家各户的独立性，又通过共享的外部空间促进了邻里间的交流与互助。

2. 村落边界：在村落的边缘，建筑物的密集排列，或是借助溪流、池塘等自然边界，形成了一道非正式的围墙，界定了村庄的范围，给予村民心理上的安全感和领域感。

在层层围合的同时，闽南建筑群又保持着高度的开放性。建筑与建筑之间留有必要的缝隙和通道，确保了空气的流通和消防的需求。朝向公共街巷或“埕”的立面通常设有开敞的门廊和窗户，鼓励着视线与活动的交互。这种围合与开放的巧妙平衡，既满足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与安全感，又营造了开放、共享的社区氛围，是闽南人中庸、和谐生活哲学的空间体现。

（三）公共节点（埕、井、树）的营造

在闽南村落的网络状肌理中，散布着许多看似微小却至关重要的公共节点，它们如同人体的穴位，为整个村落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埕”是最具代表性的元素，通常指建筑前开阔的平地，或由红砖、条石铺设而成。它不仅是晒谷、晾晒渔获的生产场地，更是村民们最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孩子们在这里追逐嬉戏，大人们在这里纳凉聊天，每逢节庆或婚丧嫁娶，这里便搭起戏台、摆开宴席，成为整个社区的节庆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水井同样是重要的社交节点。在自来水普及之前，井边是妇女们洗衣、淘米时聚集的场所，她们在这里交换信息、交流情感，形成了独特的女性社交圈。许多村口或“埕”的中央，都会生长着一棵或数棵高大的榕树。古榕以其广阔的浓荫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遮阳棚，是夏日里最受欢迎的休憩场所。这些公共节点与建筑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村落的公共生活网络，它们承载着琐碎的日常，也见证着重要的集体记忆，是维系社区情感、塑造地方认同不可或缺的元素。

闽南建筑和谐共生关键元素表

元素	空间位置	功能与意义
燕尾脊	屋顶正脊	审美象征、地位体现、文化符号
埕	建筑主体前部	生产晾晒、节庆广场、社交中心
光厅暗屋	建筑内部核心	祭祀礼仪、家庭核心、私密性保障
塌寿	门前凹入空间	遮阳避雨、过渡空间、邻里交流
宗祠 / 庙宇	村落中心或重要方位	精神信仰、宗族凝聚、社会管理

三、建筑与人文环境的共生

闽南建筑远非冰冷的砖石结构，它是有生命的容器，深刻地嵌入在地方的社会结构、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之中。建筑不仅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其自身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象征，成为人文环境的物质载体与生动舞台。如

上表列出的闽南建筑和谐共生关键元素，每个部分都承载着独特的功能与意义。

（一）建筑作为社区活动的舞台

从私密的住宅到开放的公共空间，闽南建筑的每一处设计都充满了对“人”的活动关怀，使其成为社区生活的天然舞台。大厝中的天井与厅堂，是家族内部祭祀祖先、举行家庭会议、教育子孙的核心场所，强化了血缘纽带和家庭伦理。而宅前的“埕”则将舞台延伸至邻里之间，它是孩童的游乐场、邻里闲话家常的“客厅”，也是举办“普度”、酬神演戏等集体活动的广场，将不同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街巷空间在满足通行的基本功能外，也为偶遇、站立交谈、小型买卖等自发性活动提供了场所。骑楼空间则为商贸活动和行人提供了遮阳避雨的便利，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与街道的活力。建筑以其灵活多样的空间形态，容纳并激发了从家庭到社区的各类活动，使得空间充满了人的气息与故事，实现了建筑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完美融合。

（二）宗祠、庙宇的精神中心作用

在闽南村落的布局中，宗祠与庙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核心位置，它们不仅是建筑上的地标，更是整个社区的精神向心所在。宗祠，或称“家庙”，是供奉共同祖先、维系宗族血缘关系的圣殿。它通常是村落中规模最宏大、装饰最华丽的建筑，其选址与朝向经过精心考量，体现了整个宗族的共同意志。在这里，族人进行祭祖、议定族内大事、执行族规、举办婚嫁庆典，宗祠是强化宗族认同感、凝聚集体力量的物理中枢。庙宇则是社区共同信仰的中心，供奉着妈祖、保生大帝、城隍爷等地方保护神。这些神明信仰超越了姓氏的界限，将不同宗族的村民团结在一起。围绕庙宇展开的庙会、祭典等活动，是社区一年中最为盛大的公共事件，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慰藉需求，也起到了调解社会矛盾、整合社区资源、促进地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宗祠与庙宇这两大精神建筑，共同构建了闽南传统社会稳定有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内核。

（三）建筑承载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

闽南建筑是闽南人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的物质结晶，其一砖一瓦、一樑一卯都诉说着地方的故事。“红砖文化”本身就反映了闽南人热爱生活、追求吉祥喜庆的审美情趣，以及通过海洋贸易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建筑装饰中大量的木雕、石雕、剪瓷雕等，其题材广泛，从历史演义、神话传说到花鸟鱼虫，不仅展示了高超的营造技艺，更是一部镌刻在墙壁上的“教科书”，向子孙后代传递

着忠孝节义、趋吉避凶等传统价值观。建筑的布局，如“光厅暗屋”，体现了敬天祭祖的礼制思想和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甚至建筑的营造过程本身，也充满了各种礼仪和禁忌，蕴含着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从选址时的风水勘测，到上梁时的隆重仪式，无不体现着天人合一、祈求平安的文化心理。建筑，就这样作为一种沉默的语言，将抽象的文化传统固化为可感的实体，代代相传，塑造并延续着闽南人独特的生活韵味与文化认同。

第八章 当代红砖建筑的传承与发展

当闽南红砖建筑走过数个世纪的辉煌，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在当代社会愈发凸显。面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与时间长河的侵蚀，如何科学、有效地传承并发展这一宝贵的建筑遗产，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本章将聚焦于红砖建筑的当代实践，深入探讨其在修复保护、技术应用及未来发展等多个维度上的现状、挑战与无限的可能性。

第一节 传统建筑的修复与保护

对闽南红砖建筑的修复与保护，不仅是对物质实体的挽救，更是对附着其上的历史记忆、文化精神与匠心智慧的延续。这项工作复杂而系统，要求我们必须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融合严谨的科学理念与精湛的传统技艺，让这些饱经沧桑的建筑得以长久留存，并焕发新的生命力。

一、修复原则与理念

修复工作绝非简单的翻新重建，而是基于对建筑遗产深刻理解之上的一种审慎的、科学的干预。一系列国际公认并结合在地化实践的原则，构成了闽南红砖建筑修复工作的核心指导思想，确保修复行为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一）“修旧如旧”与最小干预原则

“修旧如旧”是古建筑修复中广为人知的理念，但其内涵并非简单地恢复到某个理想化的“旧”，而是指保护文物及其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面貌。这要求修复工作必须以保存现状为基础，尊重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的改动与增补，因为这些痕迹本身就是历史信息的一部分。修复的目标是让古建筑呈现出“老当益壮”而非“返老还童”的状态，准确传递其岁月积淀的沧桑感。这一理念的实践核心是最小干预原则。修复行为应被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避免任何不必

要的改动或过度修复。这意味着，修缮工作应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只针对出现结构性病害或严重破损的部位进行处理。能够加固的构件绝不替换，能够小范围修补的绝不大面积更换，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材料、原结构及其承载的真实历史信息。

在闽南红砖建筑的修复中，这一点尤为重要。无论是墙体上因风雨侵蚀而产生的色泽变化，还是砖石间因岁月沉降而出现的细微错动，都是其生命历程的见证。修复者的任务不是去抹平这些痕迹，而是阻止其进一步恶化，确保建筑的安全与稳定。这种审慎的态度，源于对历史的敬畏，确保每一次干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必要之举，而非主观臆断的“美化”或“完善”。

（二）可逆性与可识别性原则

可逆性原则是现代文物保护的核心理念之一，它要求修复过程中采用的技术和材料应具备可移除性，以便在未来出现问题或有更先进的修复方法时，能够将建筑恢复到干预前的状态，而不对其原始部分造成永久性损害。这一原则是对未来负责的表现，承认了当前认知与技术的局限性，为后人留下修正与提升的空间。在闽南红砖建筑的加固或修复中，采用可逆的连接件或化学药剂，就比使用不可逆的水泥浇灌等方式更为可取。

可识别性原则则强调，任何新增补的部分都应与原始部分有所区别，能够被专业人员识别出来。这并非要求新旧部分在视觉上形成突兀的对比，破坏建筑的整体和谐，而是指在材料、工艺或标记上留下微妙而清晰的印记。例如，在修补一面红砖墙时，新补的砖块可以在背面做上标记，或其成分与旧砖有细微的、可通过专业仪器辨识的差异。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建筑历史信息的纯粹性，避免将后人的修复行为误读为原始的历史创造，确保建筑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两个原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建筑遗产真实性负责的严谨态度。

（三）使用原材料、原工艺的优先性

“三原”法则，即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是确保古建筑修复后风貌统一、韵味纯正的关键。优先使用与建筑原始材料相同或相近的材料，是维系其历史质感与生命力的核心。闽南红砖建筑的灵魂在于其独特的红砖，这种烟炙砖的色泽、质地甚至烧制时留下的天然花纹，都蕴含着丰富的地域信息和审美情趣。修复时若以现代机制砖替代，即便颜色相近，其承载的历史厚重感也将荡然无存。因此，寻找废弃古厝中遗留的旧砖，或按照传统配方和窑烧工艺重新烧制，成为修复工

作的首选方案。

同样，对传统工艺的尊重与沿用也至关重要。闽南建筑中常见的“出砖入石”墙体砌筑方式、榫卯结构的木作工艺、砖雕的雕刻技法等，都是历代工匠智慧的结晶。这些工艺不仅决定了建筑的结构稳固性，也塑造了其独特的美学特征。修复工作必须由掌握这些传统技艺的工匠来完成，确保修复的部分在手法和风格上与原作保持一致。

这种对原材料与原工艺的坚持，不仅是对建筑物质本体的尊重，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传承。它确保了修复后的建筑不是一件貌合神离的复制品，而是血脉延续的有机生命体，使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得以完整地延续下去。

二、传统修复技术的实践

将修复原则转化为可见的成果，依赖于一系列具体而精湛的传统技术。对于闽南红砖建筑而言，其技术实践主要围绕砖石结构、雕刻装饰以及材料本身展开，每一步都考验着修复团队的匠心与智慧。

（一）砖墙的加固与修补技术

闽南红砖建筑的墙体是其最主要的结构与表现元素，其修复技术尤为关键。针对墙体风化、酥碱、开裂等问题，修复实践发展出一套精细化的应对方法。对于表面轻微风化或破损深度较小（如小于 20 毫米）的砖块，通常不采用替换，而是使用“砖粉修复料”进行修补。这种修复料通常由残损严重的旧砖磨成的粉末，混合低强度的水硬性水泥或其他传统胶凝材料调配而成，其强度被严格控制，要低于原墙体砖块，以确保在未来的风化中，修补部分会先于原始砖块发生老化，从而保护原始砖面。

对于结构性损坏，如墙体空鼓，修复人员会先小心凿除疏松的砂浆层，然后采用与原墙体成分相近的砂浆重新填实，有时还会铺设钢丝网架以增强附着力。而当砖块破损严重、威胁结构安全时，则不得不采取“替换修复”。此时，新砖的选择与砌筑方式极为讲究，必须遵循“逐块修补”的原则，将干预范围控制在最小，并尽可能地保留周围的老砖面。整个过程旨在实现结构加固与风貌保存的双重目标，让修复后的墙体既坚固又充满历史的温度。

（二）砖雕、木雕的清洗与修复

砖雕与木雕是闽南建筑艺术的精华所在，其修复工作如同对待艺术品般需要细致与耐心。常年的风吹日晒和空气污染，往往使这些精美的雕刻蒙上厚厚的污垢，甚至出现开裂、缺损。

修复过程通常遵循以下步骤：

1. 评估与清洁：首先对雕刻的保存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检查裂缝、剥落和污染程度。清洁是第一步，也是极其关键的一步。针对不同的污垢（如积尘、鸟粪、苔藓等），需选用合适的物理或化学方法。物理方法如用软毛刷、棉签轻轻干拭，或采用可控的喷砂技术清除顽固积尘。化学方法则需选用中性且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先在不起眼处做小样测试，确保不会损伤雕刻表面和材质。

2. 加固与修复：对于出现松动或细微裂缝的部位，可采用渗透性强的加固剂进行深层加固。对于缺损的部分，则需要进行精细的修补。修补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需与原作的材质、颜色、质感高度匹配。木雕的修补可能会用到同种类的老木料，而砖雕的缺损则会用特制的砖粉混合物进行填充塑形。修复匠师需凭借高超的技艺，仿照原作的风格和刀法进行雕琢，力求让修补之处与原作融为一体，达到“无痕修复”的艺术效果。

（三）传统材料的复制与制作

在许多修复项目中，找到与原始构件完全一致的旧材料是可遇不可求的。此时，对传统材料进行精准的复制与制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更是一个研究过程。修复团队需要对原始材料的物理性能、化学成分、制作工艺进行科学分析。以闽南红砖为例，复制工作始于寻找与当年品质相似的陶土。接着，要通过分析老砖的成分，确定合适的掺料比例，并反复试验烧制温度、时间和窑内气氛，以求复制出与老砖色泽、硬度、吸水率都极为接近的新砖。

木材的复制同样复杂。修复团队需要辨识出古建筑所用的木材种类，并尽可能寻找相同树种、相似年龄和纹理的木料。在无法获得理想木料时，有时会采用材质性能相近的替代木材，但必须在修复档案中详细记录。对于瓦片、灰浆等其他材料，同样需要遵循类似的分析和复制流程。这一过程不仅为修复工程提供了合格的“零件”，也抢救和传承了濒临失传的传统建材制作工艺，其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文化价值。在材料的性能分析上，我们尤其关注传统砖材与现代砖材在强度、孔隙率等方面的差异，以确保复制品的相容性。闽南传统红砖与现代机制砖

材在修复中需严格区分，其主要性能对比可见下表。

闽南传统红砖与现代砖材性能对比表

性能参数	传统红砖 (烟炙砖)	现代机制红砖	修复要求考量
抗压强度	5 - 15 (偏低)	15 - 30 (偏高)	强度须低于原结构，避免应力集中
孔隙率 (%)	15 - 25 (较高)	8 - 15 (较低)	影响透气性及盐分迁移，需匹配
吸水率 (%)	8 - 18 (较高)	5 - 10 (较低)	关系到湿度调节，避免新旧材料差异大
烧制温度 (°C)	约 900 - 1000	1100 以上	影响质地和颜色的一致性

三、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尽管闽南红砖建筑的保护理念与技术日臻成熟，但在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这些挑战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需要系统性的对策来加以应对，以确保这一珍贵文化遗产能够真正地走向未来。

（一）资金、人才的短缺问题

古建筑的修复与维护成本高昂，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难题。闽南红砖建筑的修复因其对原材料和原工艺的严格要求，所需资金往往远高于普通建筑。许多产权归属于私人或宗族的古厝，其所有者往往无力承担巨额的修缮费用，导致建筑长期处于失修状态，加速破败。虽然政府对部分文保单位提供财政支持，但面对数量庞大的传统民居，这点投入显得杯水车薪。因此，探索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如设立专项保护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开展公益众筹等，成为破局的关键。

与资金短缺同样严峻的是专业人才的断层。掌握传统营造技艺的老工匠年事已高，而年轻人多不愿从事艰苦且收入不高的匠作行业，导致瓦作、木作、砖雕等传统手艺后继乏人。同时，兼具现代建筑科学知识与传统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修复设计人才也极为稀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建立完善的传承与教育体系。一方面，应通过认证、补贴等方式提高传统工匠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并鼓励他们“传、帮、带”培养学徒。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应开设历史建筑保护等相关专业，将理论教学与工地实践相结合，培养新一代的保护工作者，确保技艺与知识都能薪火相传。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保护压力

快速的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对闽南红砖建筑的生存环境构成了巨大威胁。在“拆旧建新”的开发浪潮中，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厝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

的是缺乏地域特色的“现代”楼房。这种现象不仅导致了建筑遗产的物理性消失，也割裂了地域文化的脉络。即使一些建筑得以幸存，其周边的历史环境和传统风貌也常被破坏，形成被现代建筑包围的“文化孤岛”，使其价值大打折扣。

面对这种压力，首先需要从规划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政府应将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区的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划定严格的保护红线，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对待古城和古村落的改造，应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转而采取“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在改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街巷肌理和建筑风貌。提升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也至关重要，让民众认识到这些红砖古厝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

（三）活化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

保护并非将建筑封存为静止的“古董”，适度的活化利用是使其恢复生命力、实现可持续传承的有效途径。将闲置的红砖古厝改造为博物馆、民宿、茶馆、文创空间等新业态，不仅能为建筑带来新的功能和经济收益，也能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进并体验其文化魅力。这种“以用促保”的模式已在泉州中山路、福州三坊七巷等地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活化利用的“度”，避免过度商业化对建筑本体及其历史氛围造成损害。一些地方在活化过程中，为了迎合商业需求而对建筑进行不当改造，例如破坏原有格局、添加夸张的现代装饰等，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破坏。利用应以保护为根本前提，所有的改造设计都必须遵循文物保护的各项原则，尊重建筑的原始空间结构和历史信息。

在利用业态的选择上，也应考虑其与建筑本身气质的契合度，优先引入能够彰显和延续其文化内涵的业态。例如，将古厝作为南音传习所或非遗工坊，就比开设喧闹的酒吧更能与其历史底蕴相得益彰。

最终，实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需要在政府、专家、投资者和公众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与协作机制。通过制定科学的活化导则、加强过程监管，并引导公众参与，确保活化利用能够真正服务于保护的最终目的，让闽南红砖建筑在当代社会中，既得到妥善的守护，又能绽放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光彩。

第二节 现代建筑中的红砖应用

红砖，这一古老而普遍的建筑材料，在经历了现代主义浪潮的冲刷与新型材料的挑战后，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以更加多样的姿态和丰富的内涵，在当代建筑实践中正在经历一场充满活力的复兴与重塑，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技术与艺术的重要媒介。

一、红砖作为结构材料的新形式

随着建筑科学的发展，红砖在结构上的应用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承重墙角色。通过技术创新与设计理念的深化，它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学美感与空间塑造力，成为建筑师手中表达结构逻辑和诗意建构的有力工具。

（一）砖砌体的结构创新与表现力

现代建筑对砖砌体结构的应用，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垂直承重。借助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力学分析，建筑师们开始大胆探索砖材在拉伸、受压、剪切、弯曲等复杂受力状态下的极限潜能。通过创新的砌筑方式，如旋转、错缝、悬挑等，砖墙本身就能形成富有动态和韵律的立面表情。参数化设计与机器人砌筑技术的结合，更是将砖砌体的精度和复杂性提升到了新的境界，能够实现传统手工难以完成的复杂曲面和镂空纹理。

这些技术革新使得砖砌体从单一的承重构件，转变为集承重、围护与装饰于一体的综合性表达元素。例如，通过精确计算设计的砖拱、筒壳和穹顶结构，不仅具备优良的力学性能，其本身也构成了壮观的内部空间。建筑师利用砖块的模数化特性，创造出如同编织品般精细的墙体肌理。光线穿过精心设计的孔洞，在室内投下变幻的光影，赋予了静态的建筑以时间的维度和生命的呼吸感。

这种对结构表现力的追求，使得砖砌体彻底摆脱了“朴素”或“廉价”的刻板印象，成为一种能够实现高度艺术化和技术化结合的结构形式。建筑师通过对砌筑工艺的重新发掘与创造，让每一块砖都参与到结构的逻辑叙事之中，使建筑的力与美得到完美统一，展现了砖材超越其物质属性的精神力量。

（二）砖与其他材料的混合结构

在现代建筑实践中，将红砖与钢材、混凝土等高性能材料结合使用的混合结构形式日益普遍。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而是基于对不同材料特性的

深刻理解，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在功能、经济性和审美上达到更优化的解决方案。在钢框架或混凝土框架结构中，砖墙常常作为填充墙或外围护墙使用，由主体结构承担主要荷载，砖砌体则负责保温、隔热、隔声以及塑造建筑内外空间。这种做法解放了砖墙的承重功能，使其在形式设计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

两种或多种材料的并置，形成了丰富的视觉对比和对话关系。红砖的温暖质感、朴素色泽与钢材的冰冷精确、混凝土的沉静厚重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材质的碰撞激发了独特的建筑表现力。例如，裸露的钢梁穿过古朴的砖墙，或是在平整的清水混凝土板上局部镶嵌红色砖块，都能创造出一种既现代又富有历史感的空间氛围。这种混合结构不仅是结构逻辑的体现，更是一种美学上的策略，通过材料的对话，丰富了建筑的层次和内涵，使其在满足现代功能需求的同时，也能唤起人们对传统建造记忆的共鸣。

（三）预制砖墙板的应用

为了适应建筑工业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预制砖墙板应运而生。这项技术将传统上需要在施工现场完成的砖砌过程，转移到工厂的生产线上进行。在受控的环境下，工人或自动化设备可以将砖块砌筑成预定尺寸和图案的墙板，或将薄片化的砖材作为饰面，与混凝土板浇筑为一体，形成砖饰面混凝土挂板。

预制砖墙板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施工效率，减少了现场的湿作业，并保证了砌筑的质量和精度，这对于实现复杂的立面图案和确保色彩、灰缝的统一性尤为重要。建筑师可以在设计阶段就精确设定每一块墙板的样式，实现高度定制化的立面效果。这些预制板材被运输到工地后，通过吊装和连接件快速安装，大大缩短了建设周期。尽管预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手工砌筑的“在地感”和随机性，但它通过工业化的方式，让砖材更好地融入了现代快速建造体系，并为建筑师在立面设计上探索模数化、韵律化的美学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红砖作为装饰材料的回归

在现代主义追求纯粹、简洁的几何形式之后，人们开始重新珍视材料本身的质感、色彩与温度。红砖以其独特的肌理和深厚的文化沉淀，从结构角色中部分解放，作为一种重要的装饰材料华丽回归，为现代建筑注入了温暖的人文气息。

（一）现代建筑中的红砖表皮设计

当代建筑愈发重视“表皮”的设计，它不仅是建筑的保护层，更是其与城市

环境对话、表达自身个性的关键界面。红砖凭借其丰富的肌理、温暖的色调和灵活的组合方式，成为建筑师塑造表皮的宠儿。不同于传统的承重墙，现代红砖表皮常作为幕墙系统出现，通过干挂或与主体结构脱开的方式，形成一层独立的“外衣”。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也为立面造型带来了无限可能。

建筑师通过改变砖的砌筑方式——如凸出、凹进、旋转或倾斜，可以创造出极富雕塑感的立面光影效果。镂空砖墙的设计尤为流行，它借鉴了传统建筑中的花格墙，既能保证通风和采光，又能形成一层半透明的视觉屏障，在内外空间之间建立起微妙的联系。在阳光下，这些精心排列的砖块如同像素点，共同构成一幅动态的光影画卷。

参数化设计工具的介入，让红砖表皮的设计语言更加丰富和复杂。建筑师可以根据日照、视线等环境因素生成复杂的砖块组合模式，创造出渐变、波浪或像素化的立面效果，使古老的材料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当代气息。这种对红砖表皮的精细化设计，体现了从“建造”到“织造”的观念转变，建筑的立面如同精心编织的挂毯，展现出细腻的工艺之美。

（二）室内空间的红砖装饰运用

红砖的温暖质感和复古气息使其在室内设计中备受青睐。裸露的砖墙成为一种流行的设计手法，被广泛应用于住宅、餐厅、办公室和商业空间中，营造出质朴、亲切而又充满个性的氛围。它既可以与工业风格的金属、水泥元素搭配，彰显粗犷不羁的美感，也可以与温润的木质家具、柔软的纺织品结合，创造出温馨舒适的居住感受。

在室内设计中，红砖的应用方式灵活多样，可以根据空间的需求和风格进行调整：

1. 作为背景墙：在客厅、卧室或餐厅中，选择一面墙完全或部分地裸露出红砖，可以迅速成为空间的视觉焦点。这面墙不仅具有装饰性，其凹凸不平的肌理还能在灯光的照射下产生丰富的光影变化，增加空间的层次感。
2. 营造特定区域：利用红砖砌筑吧台、壁炉或隔断，可以自然地划分空间功能，并为该区域赋予独特的属性。红砖的质感能够唤起人们对于传统壁炉或酒窖的记忆，为现代化的居住空间增添一丝历史的温度和手作的痕迹。

红砖墙面的处理方式也多种多样，可以保留其原始的粗糙质感，也可以在其

表面进行涂刷或做旧处理。例如，将砖墙刷成白色，既保留了砖的纹理，又使空间显得更加明亮、现代，这种手法在北欧和简约风格的设计中尤为常见。通过这些多样的应用，红砖成功地将一种外部建筑材料转化为营造室内氛围和情感体验的重要元素。

（三）红砖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红砖的魅力同样延伸到了室外景观设计领域。由于其出色的耐久性、防滑性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融性，红砖成为铺地、砌筑挡土墙、花坛和景观小品的理想材料。它饱经风雨后所呈现出的自然色泽变化和青苔痕迹，能够为景观赋予一种随时间流逝而愈发酵厚的美感。

在景观设计中，红砖铺地是最常见的应用之一。通过人字形、篮筐形等不同的铺设图案，可以形成富有节奏和引导性的地面纹理，为庭院、步道和广场增添视觉趣味。红砖的暖色调与绿色的植物形成悦目的色彩对比，共同营造出宁静而充满生机的户外空间。利用红砖砌筑的矮墙、座椅或雕塑小品，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其本身也成为景观中的点缀，强化了场所的整体设计感和人文气息。建筑与景观通过同一材料的延申使用，建立了更强的内在联系，实现了从室内到室外、从建筑到自然的无缝过渡。

红砖在现代建筑中的主要应用模式可见下表，它综合了结构、围护和美学功能。

红砖在现代建筑中的主要应用模式

模式	核心特点	设计价值
结构创新砌体	参数化设计、机器人砌筑、复杂曲面	展现力学美感与几何诗意
混合结构体系	与钢材 / 混凝土结合，砖作为填充 / 围护	实现功能、经济与美学的平衡
预制砖墙板	工厂化生产、现场快速安装	提高施工效率与砌筑精度
装饰表皮系统	干挂幕墙、镂空纹理、光影互动	丰富立面层次，实现高度艺术化
室内装饰应用	裸露砖墙、背景墙、区域划分	营造温暖质朴的人文气息

三、建筑师对红砖的现代诠释

在红砖复兴的浪潮中，建筑师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技术和形式的探索者，更是材料精神的挖掘者和诠释者。通过深刻的哲学思考与丰富的在地实践，建筑师赋予了红砖超越其物质属性的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

（一）路易斯·康等大师对砖的哲学思考

二十世纪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是现代建筑领域中真正理解并颂扬砖之精神的代表人物。他那句著名的“你问砖想要什么？砖说，我喜欢拱”的哲学式诘问，深刻地揭示了他对材料“本性”的尊重。在康看来，建筑师的职责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材料之上，而是去倾听、理解并帮助材料实现其自身的意愿和潜能。他认为砖的本质在于其微小的、适合人手把握的尺度，以及它在重力作用下通过砌叠形成拱与穹顶的天然倾向。

康的这一思想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众多杰作之中。在印度管理学院和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等项目中，他将平凡的红砖提升到了纪念性的高度。巨大的砖墙与完美的圆形开洞，展现了砖砌结构纯粹的力量感和几何美。光线通过厚重的砖墙，被赋予了神圣的质感。康通过对砖的运用，探讨了“静谧与光明”这一永恒的建筑命题，他让砖不仅仅是建造的工具，更成为一种能够唤起沉思、营造场所精神的媒介。

康对砖的哲学思考影响了整整一代建筑师。他们开始重新审视那些被认为是“过时”或“廉价”的传统材料，从中发掘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表现潜力。这种“向材料学习”的态度，促使建筑师不再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创新，而是更加关注建筑的内在秩序、建造逻辑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砖，在这些大师的诠释下，成为了承载思想、表达敬畏和连接人与建筑本源的诗意语言。

（二）国内建筑师的当代红砖建筑实践

在中国当代建筑领域，一批杰出的建筑师通过对红砖的创造性应用，回应着本土的文化传统与复杂的现实语境。他们的实践并非简单地复古或模仿，而是在深入理解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设计理念与技术，对红砖进行转译和重构，赋予其全新的生命力。

建筑师董豫赣设计的北京红砖美术馆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他以红砖作为最主要的建筑材料，结合青砖，通过精湛的砌筑工艺和对传统园林空间的现代转译，创造出一个既有当代艺术展览功能，又充满东方园林意境的独特场所。建筑中的拱、廊、庭院交织错落，光影在变化无穷的砖墙上舞动，使游客在观展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一种“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传统空间乐趣。

另一位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在其建筑实践中也频繁使用回收的旧砖瓦。他将这种带有时间痕迹的材料称为“再生砖”，并将其大量运用于宁波博物馆等项

目中。这些尺寸、颜色各异的旧砖被以一种看似随意却经过精心设计的方式砌筑起来，构成了独特的立面肌理。这种做法不仅是对材料的循环利用，更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珍视和延续，墙体本身就成为了一部记录城市变迁的史书。刘家琨等建筑师也在其作品中通过对普通红砖的巧妙运用，探讨了民间建造智慧与精英建筑学之间的对话。

（三）红砖建筑在文化、教育类建筑中的青睐

在众多建筑类型中，红砖尤为受到文化和教育类建筑的青睐，这并非偶然。大学校园、图书馆、美术馆等场所，其核心功能是知识的传承与文化的积淀，它们需要一种能够体现历史感、稳定性和人文关怀的建筑语言，而红砖恰好完美地契合了这些特质。

红砖所带有的学院气息根植于历史。从欧洲古老的大学到北美的常春藤盟校，红砖建筑几乎成为大学校园的经典范式。这种传统赋予了红砖一种与生俱来的学术庄重感和历史延续性。因此，新建的校园建筑采用红砖，能够迅速地融入现有的文脉环境，并唤起人们对于学术殿堂的认同感。红砖的温暖色调和宜人尺度能够营造出一种亲切、宁静的氛围，有助于师生进行学习与交流，这与文化教育建筑所追求的人文精神不谋而合。同时，砖作为一种耐久且能够优雅“变老”的材料，也象征着知识与文化的永恒与传承。从北京的红砖美术馆到世界各地的众多校园建筑，红砖以其独特的魅力，持续不断地为这些承载人类精神文明的场所，塑造着既经典又充满活力的空间形象。

第三节 新材料与旧工艺的结合

闽南红砖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对辉煌历史的坚守，更在于面向未来的开放与包容。当古老的营造法则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相遇，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新材料的引入与旧工艺的现代化改良，并未消解红砖建筑的传统神韵，而是在功能、美学与可持续性等多个维度上，为其注入了全新的时代活力，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彩对话。

一、传统工艺的现代化改良

传统工艺是闽南建筑精神气韵的根基，对其进行现代化改良，并非颠覆性的

革命，而是基于深刻理解的审慎进化。改良的核心在于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传统工艺的效率、精度与性能，使其在保留核心美学价值的同时，更能适应现代建造体系的要求，从而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让古老技艺在当代建筑实践中重焕生机。

（一）新型粘合剂与保温材料的结合

闽南传统建筑中，用于砌筑红砖的粘合剂极具地方特色，多就地取材，采用以牡蛎壳煅烧而成的壳灰，或混合糯米浆、红糖等有机物制成的灰浆。这种传统粘合剂不仅赋予了墙体独特的肌理与色泽，其自身也成为历史的见证。但在强度、耐久性和施工便捷性上，传统灰浆难以完全满足现代建筑对抗风、抗震和快速建造的需求，其固化周期长，且性能易受天气影响，限制了其在更大规模和更高标准建筑中的应用。

为了弥补传统材料的不足，现代建筑科学提供了更为高效的解决方案。高分子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作为新型粘合剂，展现出卓越的性能。这类粘合剂通过添加可再分散乳胶粉、纤维素醚等化学外加剂，大幅提升了粘结强度、抗拉强度、耐水性和抗冻融能力。施工时可以实现薄层砌筑，不仅节约材料，还能确保灰缝均匀，提升墙体的整体性和美观度。关键在于，这类新型粘合剂可以通过配方调整，模拟出传统壳灰砂浆的色彩与质感，使得新建或修复的红砖墙在外观上与古建筑保持一致，实现了“修旧如旧”的审美追求与“强于旧”的性能目标。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现代社会对建筑节能与居住舒适度的更高要求，保温材料的结合应用成为必然选择。传统实心红砖墙体虽然具有良好的热惰性，但其保温隔热性能较差，易造成冬季热量流失和夏季热量传入。现代改良实践中，通过构建复合墙体系统，将高效保温材料（如岩棉板、挤塑聚苯板或气凝胶毡）置于红砖外墙之内侧，形成“红砖表皮+保温层+内墙”的构造。这种做法在完全不影响闽南红砖建筑经典外观的前提下，极大地提升了墙体的热工性能，有效降低了建筑的能源消耗，使古老的建筑形式满足了当代绿色建筑的标准。

（二）机械化生产与传统手工的结合

传统闽南红砖的烧制是一门充满偶然性与艺术性的手工艺。工匠们依靠经验判断窑内温度，松木燃料燃烧后产生的草木灰自然落在砖坯上，经过高温烧结，形成深浅不一、纹理独特的“窑变”效果，每一块砖都因此而独一无二。这种富于变化的质感，赋予了红砖墙面灵动而朴拙的生命力。然而，手工制砖的生产效率

低下、成品率不稳定、尺寸一致性差等问题，使其难以适应现代建筑工业化的发展趋势。

机械化生产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现代化的隧道窑能够精确控制温度曲线，采用标准化的模具和挤压成型工艺，可以大规模生产尺寸规整、强度均一、物理性能稳定的红砖产品。这不仅保证了工程质量，也大大缩短了建设周期。机械化生产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手工美学的彻底放弃，一种“人机结合”的混合生产模式应运而生。在这种模式下，机械负责完成砖坯的挤压、成型与标准化烧制等基础工序，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在最后的表面处理环节，则重新引入传统手工技艺。工匠可以在烧制前的砖坯上进行手工拍打、刻画或滚压，以复现古法制砖的自然肌理；或是在出窑后，对砖的表面进行二次手工打磨或做旧处理，以打破机械生产带来的过度均质化，重新赋予红砖以手作的温度与独特的个性。

（三）数字化设计辅助传统砌筑

闽南红砖建筑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复杂精美的砌筑式样上，如“出砖入石”的错落有致、“龟背锦”的几何韵律以及各种寓意吉祥的砖雕图案。这些高超的技艺往往依赖于匠人的口传心授和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其几何逻辑复杂，难以用常规的图纸精确表达，导致传承困难且施工精度难以控制。

数字化技术的介入，为破解这一难题开辟了新的路径。建筑师可以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建筑信息模型等工具，对复杂的传统砌筑图案进行三维建模。在数字环境中，每一块砖的位置、角度、尺寸都可以被精确定义，设计师能够对墙体的力学性能、光影效果和材料用量进行精细化的分析与优化。这种数字化的预演，将原本依赖于经验的感性创作过程，转化为一套精确、可控、可传承的数字指令。

在施工现场，数字化设计的成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指导匠人作业。例如，利用增强现实技术，施工者可以通过佩戴增强现实眼镜，将数字化的砖块模型以1:1的比例叠加在真实的墙面上，从而清晰地看到每一块砖的准确位置和砌筑顺序。另一种方式是利用激光投影设备，将设计好的图案直接投射到待建的墙体基面上，匠人只需“按图索骥”进行砌筑即可。

这些技术的应用，并没有削弱工匠的价值，而是将他们从繁复的几何计算和定位工作中解放出来。匠人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砌筑手感、灰缝处理、砖面质感等核心工艺环节的把控上，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手艺”层面的专长。数字

化设计与传统砌筑的结合，本质上是现代科技对传统智慧的“翻译”与“赋能”，它不仅提高了复杂图案的实现精度与效率，也为这些古老技艺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二、复合材料的创新应用

在延续与改良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闽南红砖建筑的现代化探索亦大胆地迈向了复合材料的创新应用。这不仅是材料层面的简单叠加，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与当下、本土与全球、厚重与轻盈的美学对话。通过将红砖与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材料并置与融合，建筑师得以在尊重传统文脉的同时，创造出更符合现代功能的、充满视觉张力的新空间形态。

（一）透光混凝土、玻璃砖等新材料的尝试

传统闽南大厝受限于结构和材料，通常窗户较小，室内采光相对有限，空间显得较为幽深封闭。为了适应现代生活对明亮、通透空间的需求，同时避免因开设大面积窗洞而破坏红砖墙体的完整性和厚重感，一些前瞻性的设计开始尝试引入兼具砌块特性与透光功能的新材料。

透光混凝土便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材料。它通过在混凝土基体中有序地植入光导纤维，使得墙体在保持结构强度的同时，能够将一侧的光线传导至另一侧，形成独特的光点矩阵效果。当透光混凝土砌块与红砖砌块以特定韵律交错排列时，白天，阳光可以穿透墙体，为室内带来柔和而富有变化的光影；夜晚，室内的灯光则会透射而出，使整面墙壁仿佛闪烁的星空。玻璃砖作为另一种成熟的透光砌块材料，同样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红砖建筑的改造与新建项目中。它拥有与红砖相似的模数，可以无缝地融入砌体结构中，形成局部的透明或半透明区域，既能引入光线、模糊内外边界，又能保持墙体的肌理感。这些新材料的介入，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解决了传统建筑的采光问题，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

（二）红砖与金属、玻璃的对比与融合

红砖，以其温润的质感、朴素的色泽和深厚的历史感，代表着一种根植于土地的记忆。而金属和玻璃，则以其工业化的精准、冰冷的触感和透明的特质，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标志性语汇。在当代闽南建筑的创新实践中，这几种截然不同的材料被并置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冲突与美学张力。

1. 红砖与金属的对话

耐候钢板以其随时间变化的锈色表皮，与饱经风霜的旧红砖在色调上形成微妙的呼应，二者共同诉说着时间的流逝，却又分别代表着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的印记。纤细的黑色钢构件常被用作新增结构或门窗框料，其清晰的线条与红砖墙的厚重体量形成鲜明对比，勾勒出新旧交替的轮廓，既突显了历史建筑的存在，又明确表达了现代介入的谦逊姿态。

2. 红砖与玻璃的共生

大面积的落地玻璃幕墙被嵌入厚实的红砖墙体之中，这种“虚”与“实”的极致对比，使得红砖的厚重感愈发凸显，而玻璃的轻盈与通透也得到了强化。历史悠久的红砖庭院通过一道通透的玻璃连廊与新建部分相连，新旧空间在此交汇，视线得以穿透，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和谐对望。这种处理手法不仅改善了建筑的采光与视野，更在空间上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引导人们在穿行中感受时空的转换。

这种材料的融合，超越了单纯的装饰性拼接，它反映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设计哲学：尊重历史，但不被历史所束缚；拥抱现代，但不割裂文化的根脉。通过材料的对比与对话，建筑本身成为一部讲述闽南在地文化如何与全球化浪潮互动共生的立体文本。

（三）3D 打印技术对传统砌筑的模拟

3D 打印技术，作为数字化建造的前沿代表，正以其高度的灵活性和精确性，为传统砌筑工艺的再诠释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可能。尽管其材料（通常为改性混凝土或陶土混合物）和工艺（逐层堆叠挤出）与传统手工砌砖截然不同，但其核心的“增材制造”逻辑与砌筑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建筑师与研究者们正在探索如何利用 3D 打印技术来模拟甚至超越传统砌筑的美学与结构潜力。

通过复杂的算法编程，3D 打印机器人可以挤出具有精细纹理的单元体，模拟传统红砖的表面质感。更进一步，该技术能够整体打印出具有复杂空腔和非标准形态的墙体，这些墙体的形态可以完全模仿传统砖墙的“一顺一丁”、“梅花丁”等砌筑式样，甚至可以创造出传统手工艺难以实现的、更为有机的三维流动形态。这种模拟不仅停留在视觉层面，通过优化打印路径和内部结构，打印出的墙体可以在保温、隔音、承重等方面实现高度集成化的性能表现。例如，在墙体内部直接打印出中空的隔热腔体或强化的结构肋，将装饰、结构与功能融为一体。

这项技术为闽南红砖建筑的未来发展描绘了激动人心的前景：那些曾经依赖于少数大师级工匠才能实现的复杂砖砌艺术，未来或许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被精确、高效地复制与再创造，从而使传统技艺的“基因”在全新的技术载体上得以延续和突变。

三、性能提升的技术路径

让闽南红砖建筑在新时代焕发光彩，除了工艺改良与材料创新带来的美学革新外，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如何系统性地提升其各项物理性能，以满足现代建筑在安全性、舒适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严苛标准。这是一条以科技为导向、以问题为目标的精进之路，旨在让红砖这一古老材料在保留其文化身份的同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性能现代建材。

红砖建筑性能优化技术对比表

优化技术 / 墙体类型	核心材料 / 方法	保温隔热性能 (热阻值)	抗震性能提升	适用场景
传统实心红砖墙	粘土烧制，实心	较低（热惰性较强）	较差（需外部加固）	历史保护，非承重
自保温多孔红砖	陶土 / 废料，中空孔洞	中等偏高（无需外保温）	良好（承重与自保温一体）	新建，节能要求适中
内保温复合墙体	红砖 + 岩棉 / 挤塑聚苯板	极高（满足高等级节能）	依赖主体结构加固	新建 / 改造，保留外立面
配筋约束砌体	钢筋、圈梁、构造柱	依赖砖体自身或外保温	极高（增强整体性和延性）	新建承重墙，地震设防区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加固	碳纤维布 / 玻璃纤维布	无直接提升	显著提升（约束墙体）	既有建筑抗震改造

（一）红砖墙体的保温、隔热性能优化

闽南地区夏热冬暖，建筑的隔热与通风至关重要。传统的实心红砖墙虽然蓄热能力强，但其热阻值较低，意味着它在隔绝室外热量传入方面的效率不高，导致夏季室内温度容易升高，增加了空调能耗。为了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技术路径主要从砖体自身和墙体构造两个层面展开。上表也列出了不同墙体类型的保温性能对比。

首先是对砖体本身的改良。通过改变砖的内部构造，在不影响其承重能力的前提下，制造出多孔或中空的红砖。这些孔洞将砖体内部的实心粘土替换为若干

个封闭的空气间层，由于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这种设计显著增加了热量传递的路径和阻力，从而大幅提升了单块砖自身的保温隔热性能。这种自保温砌块无需额外的保温层即可满足一定的节能设计要求，是一种成本效益较高的优化方案。

其次是发展更为高效的复合墙体系统。除了前述的内保温做法，外墙外保温系统也为红砖建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在这种体系中，红砖作为结构承重墙，其外侧粘贴保温层，并由饰面层提供保护和美观效果。当需要保留红砖外观时，饰面层可以采用超薄的红砖贴片或仿红砖质感的涂料，从而实现保温性能与传统风貌的统一。

更前沿的探索则聚焦于材料科技的突破。例如，将具有高热阻特性的气凝胶材料以颗粒状掺入陶土中，制成气凝胶增强型保温红砖。将相变材料微胶囊引入砖体或砂浆中，利用其在特定温度下吸收或释放大量潜热的特性，可以主动调节墙体表面温度，实现对建筑室内热环境的“智能”缓冲，为优化红砖墙体的热工性能开辟了新的道路。

（二）抗震、防火性能的增强

传统砖石结构，尤其是未经加固的砌体，在地震作用下表现脆弱，是建筑安全领域的一大短板。提升闽南红砖建筑的抗震性能，是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现代结构工程为此提供了成熟的解决方案，即“约束砌体”或“配筋砌体”技术。该技术的核心是在砖墙的关键部位（如墙体转角、门窗洞口两侧）设置竖向钢筋，并在墙体中按一定间距配置水平钢筋或钢筋网片，再通过浇筑混凝土构造柱和圈梁，将原本松散的砖块约束成为一个整体。这些“骨架”极大地增强了墙体的抗剪和抗弯能力，使其在地震中能够承受更大的变形而不易倒塌，具体增强效果可见上表。

对于已有的古旧红砖建筑进行抗震加固，则常采用外部增强的方法。例如，在墙体外侧粘贴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如碳纤维布或玻璃纤维布。这些轻质高强的材料能够有效约束墙体，提高其整体性和延性，且对建筑原始风貌的影响较小。

在防火性能方面，红砖本身属于不燃材料，具有天然的防火优势。性能提升的重点在于整个墙体系统的耐火极限，特别是当采用复合墙体时。需要确保所选用的保温材料具有优良的防火等级（如A级不燃的岩棉），并对穿墙管线、防火分隔等细部构造进行妥善处理，防止火势通过墙体内部蔓延。使用特制的耐火砂浆砌筑，也能在高温下更长时间地保持墙体的结构稳定性，从而为人员疏散和

火灾扑救赢得宝贵时间。

（三）绿色、环保型红砖的研发

传统粘土红砖的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了双重压力：一是大量挖掘粘土会破坏耕地和生态；二是烧制过程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并产生可观的碳排放，这也是许多地区限制甚至禁止生产实心粘土砖的主要原因。为了让红砖建筑的传统得以延续，研发绿色、环保的新型红砖已成为行业共识和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

技术研发的首要路径是寻找粘土的替代原料。大量的工业废弃物，如粉煤灰（火力发电厂的副产品）、煤矸石、钢渣、建筑垃圾等，都具有成为制砖原料的潜力。通过特定的工艺配比和处理技术，将这些废弃物作为主要骨料，不仅减少了对自然粘土的开采，也为“城市矿产”的循环利用提供了有效途径，实现了“变废为宝”。

另一条重要的技术路径是革新生产工艺，降低能耗与排放。非烧结砖技术是其代表，它利用水泥的胶凝作用或化学激发剂，在常温或蒸汽养护条件下使废料混合物固化成型，完全省去了传统的高温焙烧环节，能耗极低。即便是需要烧结的工艺，也可以通过优化窑炉设计、利用余热回收技术以及使用生物质燃料、工业废气等清洁能源，来显著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和碳足迹。这些绿色环保型红砖在满足建筑性能要求的同时，也承载了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确保了闽南红砖这一文化载体能够以一种对环境更友好的姿态，继续书写其在未来的篇章。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实践

闽南红砖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美学价值，其建造与存在方式本身亦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日益关注生态环保与能源危机的当下，重新审视并挖掘闽南红砖建筑的可持续性内涵，对于探索现代建筑的绿色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红砖的生态与环保价值

红砖，这一源于土地的古老建材，在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下展现出其独特的生态与环保价值。从原料的获取、烧制工艺的演进到最终的循环利用，红砖的整个

生命周期都贯穿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为现代建筑材料的生态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一）原料的本土化与可再生性

闽南红砖建筑的生态价值，首先体现在其核心材料——红砖的原料本土化特性上。闽南地区拥有丰富的红土资源，这种富含三氧化二铁的黏土为红砖的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就地取材”的原则极大地缩短了原材料的运输距离，显著降低了因长途运输而产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是典型的低碳建造模式。这种对本土资源的依赖与利用，不仅构筑了地域建筑的独特性，更是一种对自然禀赋的尊重和顺应。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构成红砖的黏土是地球上分布广泛的资源，其本身源于岩石的风化，在地球的物质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较于需要大量开采矿石且生产过程高耗能的钢材、水泥等现代建材，红砖的原料获取对自然环境的扰动相对较小。在合理的开采与后期土地复垦措施下，黏土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可再生性。

在当代，一些创新的制砖工艺甚至开始探索利用造纸污泥、河道淤泥等废弃物作为部分原料，与黏土混合烧制，这不仅实现了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减少了对原生黏土的依赖，还进一步拓展了红砖原料的来源，赋予了这种传统材料更加积极的环保意义，使其在循环经济的框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二）低能耗、低排放的烧制工艺探索

传统红砖的烧制过程虽然需要耗费燃料，但古老的轮窑技术本身也在不断演进，以寻求更高的能源效率。闽南地区的匠人很早就懂得利用窑炉内的热量进行循环预热和干燥砖坯，减少热量散失，这种朴素的节能智慧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优化。到了现代，随着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和技术的进步，红砖的烧制工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朝着低能耗、低排放的方向不断探索。

1. 燃料的革新：传统的烧制多依赖木材、煤炭，而今，使用天然气、生物质燃料等清洁能源或工业废料作为补充燃料，已成为重要的改进方向。这不仅能有效减少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还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优化能源结构。

2. 窑炉技术的升级：现代化的隧道窑、辊道窑等新型窑炉，通过精确的温度控制、余热回收系统以及高效的隔热材料，极大地提升了热能利用效率。例如，

利用烧成带产生的高温烟气来预热和干燥进窑的砖坯，并将冷却带的热空气回收利用，形成一个高效的内部热循环系统，使得单位产品的能耗显著下降。同时，配备先进的烟气处理设备，能够对排放的废气进行净化，确保其达到环保标准，从而改变人们对烧砖“浓烟滚滚”的刻板印象。

（三）旧砖的回收与再利用

红砖建筑的另一个突出环保价值在于其材料的可回收性与再利用潜力。当一座红砖建筑走向生命的终点时，构成其主体的旧砖并不会简单地沦为建筑垃圾。相反，这些经过岁月洗礼的旧砖因其独特的质感和历史痕迹，往往成为备受青睐的“二次材料”，在新的建筑或景观项目中重获新生。这种循环利用的实践，完美诠释了“变废为宝”的环保理念。

闽南地区常见的“出砖入石”砌筑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对废弃砖石材料巧妙再利用的传统技艺。在当代建筑实践中，旧红砖的应用场景更为广阔。它们可以被完整地拆卸下来，用于修复古建筑，保持其历史风貌的真实性；也可以作为装饰元素，用于新建筑的墙面、地面铺装或景观小品，营造出质朴而富有韵味的复古风格。即使是破碎的红砖，也可以被粉碎后作为再生骨料，用于制作新的墙体材料、地砖，或作为道路建设的基层材料，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减轻垃圾填埋场的压力。这种从“摇篮到摇篮”的循环模式，不仅节约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也延续了材料的生命与文脉。

二、传统智慧与现代节能技术的结合

闽南红砖建筑所蕴含的生态理念，并不仅仅停留在材料层面，更体现在其对气候的巧妙适应和对自然能源的被动式利用上。这些传承已久的传统建筑智慧，在今天与先进的现代节能技术相遇，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为打造舒适、低耗的绿色人居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可行的路径。

（一）天井、冷巷等被动式节能设计的应用

闽南传统民居在布局上处处体现着适应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巧思。其中，天井和冷巷的设计，是其被动式节能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设计无需耗费任何能源，仅通过精妙的物理空间组织，就能有效地改善建筑内部的微气候，实现天然的通风与降温。

天井作为建筑内部的“气候缓冲器”，扮演着多重角色。在夏季，它能形成

显著的“烟囱效应”：白天阳光照射下，天井内的空气被加热后上升，带动室内原本相对凉爽的空气流动，形成自下而上的自然通风，带走室内的热量与湿气。到了夜晚，天井向天空开敞的“冷辐射”效应使其成为一个冷源，不断将冷空气沉降于建筑底层，为次日的凉爽奠定基础。

穿梭于建筑组团之间的冷巷，则像是整个聚落的“微风通道”。这些狭窄的巷道在夏季因两侧高墙的遮挡，大部分时间处于阴凉之中，其温度远低于开阔地带。当外部空气流经冷巷时，会因“文丘里效应”而加速，并被巷内较低的温度冷却，形成一股股凉爽的微风，穿堂入室，为室内带来惬意的清凉。

厚实的红砖墙体，以其优良的热惰性，成为调节室内温度的另一道天然屏障。白天，它能有效阻隔和延迟室外热量向室内的传递；夜晚，当室外温度降低后，它又会将白天吸收的热量缓慢地释放出去，使得室内温度的波动远小于室外，创造出“冬暖夏凉”的舒适体感。这种传统的被动式设计智慧，正是现代绿色建筑所追求的低技术、高效能的典范。

（二）太阳能、雨水收集等主动式技术的整合

在充分尊重和利用传统被动式节能智慧的基础上，现代建筑设计进一步将太阳能、雨水收集等主动式生态技术巧妙地融入红砖建筑的更新与建造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无缝对接。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寻求技术介入与建筑本体的和谐共生，使其在保持传统风貌的同时，具备更高的能源与资源利用效率。

在屋顶或庭院的适当位置，可以隐蔽或整合化地安装太阳能光伏板，将充沛的日照资源转化为电能，为建筑的日常照明、设备运行提供清洁电力。同时，太阳能热水系统也可以与建筑设计相结合，满足居民的生活热水需求，大大减少对常规能源的消耗。这些现代技术模块被精心设计，使其在视觉上不至于破坏红砖建筑优美的“燕尾脊”天际线和整体的传统韵味。对于雨水资源，闽南地区充沛的降雨为雨水收集利用提供了绝佳条件。通过在屋面设置集水系统，将雨水引导至地下或庭院内的储水模块，经过简单的过滤净化后，可用于庭院浇灌、景观水体补水、冲洗地面甚至冲厕，有效节约了宝贵的自来水资源，并在暴雨期间起到削峰填谷、缓解市政排水压力的作用。

（三）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考量

可持续的建筑实践要求我们将视野从单一的设计或施工阶段，扩展至建筑从

规划、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直至最终拆除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在这个完整的链条中，闽南红砖建筑展现了其贯穿始终的可持续性潜力。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考量，是实现建筑真正绿色化的核心所在，它要求每一个环节都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准则。

设计阶段是决定建筑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的关键。在这一阶段，通过建筑信息模型等数字化技术，可以对红砖建筑的各项性能进行模拟优化，如通过调整开窗、遮阳和庭院布局，最大化自然采光和通风效果，从而降低运营阶段的能耗。材料选择上，优先采用本地生产的、可循环的红砖及其他天然建材，并精确计算用量，减少浪费。建造过程中，推行干法施工和预制构件技术，可以减少现场湿作业带来的污染和资源消耗。

在长达数十年的运营和维护阶段，红砖建筑的可持续性体现在其低维护成本和良好的耐久性上。红砖材质坚固，能够抵御风雨侵蚀，而其良好的热工性能则持续不断地为使用者节省空调和取暖费用。当建筑最终需要改造或拆除时，全生命周期考量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回收和再利用建筑材料。正如前述，红砖、石材、木料等都可以被重新投入新的建设循环中，避免了“建造-废弃”的线性模式，真正形成一个闭合的、可持续的物质循环圈。

三、红砖建筑在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的地位

在当代全球通行的各类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中，如 LEED、BREEAM 以及中国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等，尽管评价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其核心目标均指向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保护室内外环境。闽南红砖建筑凭借其固有的生态属性和传承的营造智慧，在这些现代评价体系的框架下，依然能够展现出不俗的竞争力与独特的价值。

（一）红砖对室内微气候的调节作用

红砖作为一种多孔材料，具有优良的吸湿和解湿能力，这一特性使其如同一个天然的“湿度调节器”，对维持室内微气候的稳定与舒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闽南地区潮湿的季节里，砖墙能够吸收空气中多余的水分，降低室内湿度，避免墙体结露和霉菌滋生，创造一个相对干爽的居住环境。当天气转为干燥时，墙体又会缓慢释放出之前储存的水分，提高空气湿度，避免人体因过度干燥而感到不适。

这种对湿度的双向调节能力，有效改善了室内的物理环境品质，减少了对除湿机、加湿器等设备的依赖，从而在客观上降低了建筑的运行能耗。在许多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室内环境质量”是一个重要的评分大项，而红砖材质对湿度的良好调节作用，无疑为建筑在此项得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体现了传统材料在营造健康、舒适人居环境方面的独特价值。

（二）红砖建筑的热舒适性研究

热舒适性是衡量居住环境品质的核心指标之一，也是绿色建筑评价关注的重点。红砖建筑之所以能够在没有空调的时代为人们提供相对舒适的居住体验，其关键在于厚重墙体所带来的优异热工性能。现代建筑物理学的研究证实，红砖材料具有较高的热惰性指数，这意味着它能够有效地减缓室外温度波动对室内的影响。

1. 隔热与保温：夏季，厚实的砖墙能够有效阻挡白天的热浪，使室内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依然保持凉爽。到了冬季，它则能减少室内热量的流失，起到良好的保温作用。一些研究通过计算机模拟和现场实测数据对比发现，传统红砖厚墙的隔热性能甚至优于某些现代轻质墙体。

2. 时间延迟效应：红砖墙的热惰性还表现为显著的“时间延迟”效应，即墙体外表面温度达到峰值的时间，与内表面达到峰值的时间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差。这种延迟效应使得室内最高温度的出现时间推迟到傍晚甚至夜间，此时室外气温已经下降，通过开窗通风即可快速散发热量，从而大大改善了居住者的热感受，降低了制冷需求。

在绿色建筑评价中，通过建筑热工性能计算和模拟，红砖建筑在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自然通风利用等方面的得分潜力巨大，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建筑的能耗表现和用户的舒适体验。

（三）红砖在绿色建筑认证中的得分点分析

综合来看，闽南红砖建筑在申请绿色建筑认证时，其得分潜力分布在多个方面，体现了传统建筑智慧与现代绿色理念的高度契合。在“节地与室外环境”类别中，其紧凑的庭院式布局和对本土环境的尊重，有助于获得高分。在“节能与能源利用”方面，天井、冷巷带来的高效自然通风，以及厚墙体的优良保温隔热性能，都是重要的被动式节能措施，能够直接转化为认证评分。

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方面，结合雨水收集系统的设计能够显著提升得分。

而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类别中，红砖的本土化生产、旧砖的回收利用以及“出砖入石”等传统工艺的应用，都与评价标准中鼓励使用乡土材料、再生材料的导向高度一致，是明确的加分项。在“室内环境质量”方面，红砖对湿度的调节作用、良好的自然通风与采光设计，共同确保了健康的室内环境，能够获得评审专家的认可。这种多维度的优势，使得红砖建筑在现代绿色建筑的舞台上，不仅不是一个过时的符号，反而是一个充满价值、亟待被重新认识和发掘的宝库。

红砖建筑可持续性优势与绿色建筑评价对应表

可持续性优势	对应绿色建筑评价类别	具体得分点（示例）
原料本土化与低碳运输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优先使用本地生产材料，降低运输能耗和碳排放。
旧砖回收与再利用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使用可再生材料、降低建筑垃圾产生。
天井与冷巷设计	节能与能源利用	高效利用自然通风，降低制冷需求。
厚墙体的热惰性	节能与能源利用	围护结构优异的热工性能，降低运行能耗。
红砖的湿度调节	室内环境质量	维持室内湿度稳定，提升热舒适性。
雨水收集系统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非传统水源利用，节约自来水资源。

上表列出了红砖建筑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优势以及它们如何对应现代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各项得分点。

第九章 红砖建筑的社会功能

闽南红砖建筑不仅是遮风避雨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维系社会关系、承载文化记忆的复杂系统。它以其独特的空间语言，无声地塑造着闽南人的社会交往模式与伦理秩序，成为观察地方社会结构与文化特质的重要窗口。本章旨在深入探讨红砖建筑在社交、区隔与仪式等方面的多重社会功能。

第一节 建筑空间的社交功能

红砖厝的每一处空间设计，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从开阔的庭院到交错的街巷，这些空间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共同编织出一张复杂而充满生命力的社会交往网络，将家族、邻里乃至整个社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塑造了充满人情味的闽南社会生活图景。

一、公共交往空间的营造

在闽南的传统聚落中，建筑并非仅仅为了满足基本的居住功能，其设计哲学中蕴含着对公共生活的深刻理解与精心营造。这些空间超越了单纯的物理属性，成为凝聚人心、传递温情、塑造集体记忆的文化容器，是闽南人开放包容、重视乡土人情精神的物质载体。

（一）埕、院作为家族活动的中心

闽南红砖大厝前开阔的“埕”，是家族公共活动的核心舞台。这个由红砖或石板铺就的户外广场，不仅是日常晾晒谷物、处理渔获的生产场所，更是家族成员互动交流、维系情感的非正式空间。傍晚时分，家人在此纳凉闲谈，孩子们追逐嬉戏，一幅温馨的家庭生活画卷便在“埕”上缓缓展开。它巧妙地模糊了严格的室内外界限，将自然光线与生活气息引入居住空间，营造出开放、共享的家庭氛围。

“埕”的功能远不止于日常起居，它更是家族重大庆典的举办地。无论是婚

丧嫁娶的仪式，还是年节祭祖的庄重场合，“埕”都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来容纳众多的亲族与宾客。例如，在婚礼中，迎亲的队伍和宴请的酒席常常就在“埕”上设置，热闹的场面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与社会地位。而在丧葬仪式里，“埕”则转变为寄托哀思、接受亲友吊唁的肃穆场所。这种空间的灵活性与多功能性，使其成为维系家族认同、延续传统礼俗不可或缺的一环。

深藏于建筑群内部的庭院，即“天井”，则扮演着另一种性质的交往中心。相对于对外开放的“埕”，天井更为私密，主要服务于合院内部的核心家庭成员。它不仅是采光、通风的关键设计，也为核心家庭提供了一个相对静谧的交流场所。长辈们在天井旁的廊下看顾子孙，女眷们在此进行针线活计或准备家务，营造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在一些多进深的大厝中，层层递进的天井也巧妙地划分了不同的家庭单元，既保持了大家族的整体性，又给予了小家庭相对的独立性，体现了闽南社会复杂的家庭结构与人际关系。

（二）街巷作为邻里交往的纽带

闽南传统聚落的街巷，并非现代城市中纯粹的交通通道，它们是邻里社会生活自然延伸的有机部分。这些街巷尺度宜人，蜿蜒曲折，两侧的红砖厝门窗多向巷道开启，形成了丰富的“灰空间”，鼓励着人们走出家门，进行各种非正式的交流。清晨，人们在巷口相遇，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启一天的睦邻关系；午后，妇女们端着小凳坐在自家门口，一边处理家务一边与邻里闲谈，交换着各家的信息；孩子们则把街巷当作最天然的游乐场，在穿梭奔跑中建立起最早的伙伴情谊。

这些由建筑自然围合而成的街巷空间，其物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交往的模式。狭窄的巷道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使得眼神的交汇、话语的传递变得轻而易举。两侧建筑立面上丰富的砖雕、石刻和窗棂装饰，也为人们的驻足停留提供了视觉上的趣味和闲谈的话题。街巷不再是分割住宅的界线，反而成为连接家家户户的社会纽带。许多小生意，如剃头担、修补匠、卖货郎等，也沿着街巷流动，不仅提供了便利的服务，更带来了外界的信息与新鲜感，使得整个社区的社交网络更加活络。这种充满烟火气的街巷生活，是闽南邻里关系紧密、守望相助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空间基础。

（三）井边、榕树下的公共生活

在闽南的村落里，除了由建筑直接围合的空间外，一些关键的自然与人工节点也演变为充满活力的公共交往中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水井边和古榕树下。

这些地方往往位于村落的中心或交通要道旁，成为超越家族界限、面向整个社区的开放社交场所。

水井作为旧时生活不可或缺的水源地，自然而然地吸引着每天前来取水的村民，尤其是妇女们。在等待打水的间隙，她们在此洗衣、洗菜，分享着邻里间的长短、交流着育儿持家的经验。这里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妇女议事会”，许多村庄的舆论和人情往来信息在此汇聚与传播。井边的社交活动具有高度的日常性和规律性，它将不同家庭的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基于共同生活需求而产生的社群网络，是维系村庄凝聚力的重要一环。

古老的榕树以其巨大的华盖和盘根错节的形态，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遮阳庇荫之所，成为村落中另一个重要的公共客厅。

1. 纳凉闲谈的中心：炎炎夏日，村民们，尤其是男性长者，喜欢聚集在榕树下，下棋、喝茶、讲古论今。这里是村庄的“信息中心”和“娱乐中心”，各种新闻、政策、传说故事在此交汇流传。

2. 孩童的乐园：宽阔的树荫和虬结的树根是孩子们捉迷藏、荡秋千的绝佳场所，他们在榕树下的集体游戏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3. 非正式的议事空间：当村庄面临一些公共事务或邻里纠纷时，榕树下也常常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商议与调解地点。在轻松自然的环境下，许多问题得以化解。

井边和榕树下，这些看似平凡的地点，凭借其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与红砖建筑共同构建了闽南社会多层次的交往空间。它们承载着浓厚的乡土记忆，见证了社区的喜怒哀乐，是闽南人情社会充满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二、空间划分与社会关系

闽南红砖建筑的内部布局并非随意的设计，而是一套严谨的社会关系图谱的物质化体现。它通过对空间的精心划分与组织，将儒家文化中的尊卑、长幼、内外的伦理秩序固化于砖石木梁之间，无声地规范着家庭成员的行为与互动，是传统社会结构在居住空间中的深刻烙印。

（一）内外、上下的空间等级

闽南红砖厝的空间布局严格遵循着“内外有别、上下有序”的宗法伦理原则，“内”与“外”的划分是其空间组织的首要逻辑。以中轴线为基准，厅堂等用于

祭祀和接待宾客的公共空间位于核心位置，属于“外”的一部分，展现家族的体面与礼仪。而两侧及后部的“大房”和“后房”则是家庭成员的居住区，属于“内”的空间，注重私密与安定。从前厅到后堂，再到私密的后轩或后落，空间的层层递进，不仅是物理上的深入，更象征着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外人通常止步于厅堂，只有最亲近的家人或尊贵的客人才会被引入更深层的空间。

“上”与“下”的等级秩序则更为鲜明地体现在房间的分配上。在传统的合院布局中，正厅（上厅）两侧的“大房”是整个宅院中最尊贵的位置，通常由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居住，体现了对其地位的尊重。晚辈则按照辈分和亲疏关系，依次居住在两侧的护厝或次要的房间里。这种以“中为尊、长者上”的安排，将儒家的孝悌伦理固化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使得家庭成员在每日的起居坐卧之间，都能潜移默化地感受到这种等级秩序的存在，从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维系家族内部的稳定与和谐。

（二）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过渡

闽南红砖建筑在空间设计上展现了从公共到私密过渡的精妙智慧。这一过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置的“灰空间”来实现的，如檐廊、榫头、过水廊等。这些空间既不完全开放，也不完全封闭，它们在家门之外、庭院之内创造了一个富有弹性的中间地带，巧妙地处理了个人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外部街巷进入宅院，首先经过开放的“埕”，再进入半围合的门廊，然后才是内部的厅堂，这一系列的空间序列本身就是一种过滤和缓冲。在合院内部，连接厅堂与两侧大房的“榫步”，以及护厝面向天井敞开的部分，都是典型的过渡空间。它们是居住者从私密的卧室走向公共的厅堂或庭院的必经之路，为心理和角色的转换提供了重要的缓冲区。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半私密的活动，如梳洗、小憩或与家人的短暂交谈，既能保持与公共区域的联系，又不必完全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之下。

这种富有层次感的过渡设计，体现了闽南人对于人际交往尺度的精准把握。它避免了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直接对冲，使得居住其中的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和社交需求，灵活地选择自己所处的空间位置。这种设计哲学不仅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更重要的是，它在物质层面维系了家庭内部微妙的社会关系平衡，使得既定的礼仪规范得以在一种更为自然和人性化的环境中被遵守，展现了高超

的建筑艺术与社会智慧。

（三）空间使用中的礼仪规范

在闽南红砖建筑中，每一个空间都被赋予了特定的礼仪内涵，人们在其中的行为举止受到一套不成文但深入人心的规范约束。这些规范是社会伦理在建筑空间中的投射，是维持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例如，作为建筑核心的厅堂，是整个家族的脸面所在，其使用礼仪最为严格。这里是敬天法祖、接待贵客的神圣空间，日常状态下必须保持整洁庄重，孩童不能在此肆意喧哗打闹。举行祭祀仪式时，家庭成员的站位、跪拜的顺序都严格按照辈分长幼排列，空间秩序与家族伦理秩序在此刻达到高度统一。

进入不同空间的行为也受到礼仪的制约。例如，进入长辈的房间前需要先在门口请示，不能贸然闯入，以示尊敬。在家宴中，主位设于厅堂最核心的位置，通常由家族中最尊贵者或最重要的客人就坐，其余人则按次序分坐两旁，座次的安排直观地反映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即便是在日常的行走中，也存在着潜在的规范，例如中门通常只在重大节日或迎接贵客时开启，平时家人多走两侧的边门。这些看似细微的空间使用规范，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行为准则，将伦理道德内化为人们的日常习惯，确保了传统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三、建筑作为社会活动的容器

闽南红砖建筑远非静态的居住之所，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舞台，承载着一个人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完整生命周期。从个体的生命仪礼到群体的节庆祭祀，再到社区的公共事务，建筑以其多变而包容的空间形态，为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载体。

（一）婚丧嫁娶等仪式的举办场所

闽南地区的婚丧嫁娶仪式繁复且讲究排场，红砖厝以其独特的空间结构，为这些重要的生命仪礼提供了理想的举办场所。在婚礼中，宽阔的前“埕”是迎亲队伍抵达、燃放鞭炮、展示嫁妆的核心区域，热闹的场面在这里汇聚，向整个社区宣告新家庭的缔结。厅堂则成为拜别父母、行交拜礼等核心仪式的庄重舞台。新娘“上头”（盘发梳妆）的仪式则在相对私密的房间内进行，体现了内外有别的空间逻辑。整个建筑的功能分区与婚礼流程紧密结合，从公共的喧闹到私密的准备，空间引导着仪式的顺利进行。

丧葬仪式同样深度依存于红砖厝的空间。逝者停灵于厅堂，这里转变为供亲友吊唁的肃穆空间，其庄重感与日常的会客功能形成对比，凸显了生命仪式的特殊性。前“埕”则用来搭建灵棚，容纳前来悼念的乡邻。整个宅院从内到外，都根据丧葬礼俗的需求进行了功能上的临时转换。建筑空间在此时不仅是一个物理容器，更成为一个情感与记忆的载体，它见证了家族成员的生死离合，其一砖一瓦都浸染了浓厚的生命情感，成为家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生命仪礼的举行，极大地强化了建筑的社会意义。它不再仅仅是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居所，而是承载了家族血脉延续、社会关系确认等核心功能的文化符号。通过在这些仪式中对空间反复、程式化的使用，家族的传统、价值观和集体记忆被不断加固，并代代相传。建筑与人的生命历程相互交织，共同书写着一部厚重的家族史诗。

（二）节庆、祭祀活动的空间需求

闽南地区拥有丰富多样的岁时节庆与宗族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对空间有着极高的要求，而红砖建筑及其聚落形态，正是为满足这些需求而生。无论是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传统佳节，还是各姓氏的宗族祭典，都需要能够容纳大量人群、支持复杂仪式的空间。家族祠堂与大型的红砖厝成为这些活动当之无愧的中心。

祠堂作为祭祀祖先、凝聚宗族的圣地，其空间布局完全服务于祭典的需求。宽阔的祭厅、有序排列的牌位、能够容纳全族男丁一同祭拜的庭院，都体现了对空间规模与等级秩序的严格考量。在祭祖大典时，族人按照辈分、支系在指定的位置就位，每一个空间节点都对应着一种身份与责任。而在春节这样的普适性节日里，家家户户的红砖厝内部同样上演着空间的大戏。厅堂被布置一新，成为祭拜神明与祖先的核心场所，人们在此焚香祷告，祈求新一年的平安顺遂。而“埕”和天井则挂满灯笼，成为孩子们嬉戏放鞭炮的乐园，也为亲友间的拜年走访提供了充足的社交空间。

这些节庆与祭祀活动，通过对建筑空间的周期性、仪式化使用，极大地强化了社区的文化认同感与社会凝聚力。建筑在此刻化身为一个神圣且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舞台。人们在这些共同的仪式与空间体验中，确认彼此的社会关系，重温共同的历史记忆，维系着地方文化的生生不息。建筑，因此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维系人与神、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媒介。

（三）社区议事、纠纷调解的地点

在传统的闽南社会中，正式的法律体系之外，存在着一套依靠乡绅、族长和地方舆论来维持秩序的非正式治理机制。而承载这些功能的，往往就是社区中最具公共性的建筑空间，如宗族祠堂或村中大庙。这些地方因其神圣性和公共性，天然具备了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权威性。当村庄需要商议修建水利、铺路搭桥等公共工程时，族中长老便会召集村民于祠堂之内，共同商议，集资出力。

在处理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时，祠堂同样扮演着“社区法庭”的角色。在庄严肃穆的祖先牌位前，纠纷双方更容易放下个人意气，在族长的调解下达成和解。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调解方式，相比于冷冰冰的官府律法，更具人情味和实际效力。建筑空间所营造的庄重氛围，以及祖先“在场”的心理暗示，为调解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持。一些村落的公共榕树下或庙前广场，也常常成为处理日常小摩擦的非正式场所，体现了社区治理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第二节 宗教活动的场所特征

闽南地区的宗教活动深深植根于其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建筑空间作为信仰的物质载体，不仅为纷繁复杂的仪式提供了具体的场所，其本身也成为引导信众体验、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从庄严肃穆的寺庙宫观到融入日常的家庭神龛，这些场所共同构成了闽南人精神世界的空间版图。

一、寺庙宫观的仪式空间

寺庙宫观是闽南地区最主要的公共宗教活动中心，其空间组织围绕着一系列复杂的仪式而展开，体现了神圣与世俗、个体与集体之间明确的秩序。建筑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具有其特定的仪式功能和象征意义。

（一）主殿、拜殿的布局与功能

闽南寺庙的布局严谨，通常沿中轴线纵深展开，形成多进院落。主殿，或称大雄宝殿，是整个建筑群的核心，供奉着寺庙的主神。其位置显赫，体量宏伟，地坪往往也最高，以此彰显主神的至高地位。主殿内部空间深邃，光线相对幽暗，旨在营造一个远离尘嚣、静谧庄严的氛围，引导信众专注于与神明的精神交流。神像被安置在精心雕刻的神龛内，前方设有供桌，用于摆放祭品。

在主殿之前，通常设有一个过渡性空间，称为拜殿或拜亭。此处空间相对开阔，光线更为充足，是信众进行跪拜、上香、献祭等主要仪式行为的场所。拜殿既与主殿紧密相连，又通过天井等形式与之分隔，形成了从世俗到神圣、从公共到私密的层次递进。信众在拜殿完成一系列仪式动作，目光则穿过缭绕的香火，聚焦于主殿内庄严的神像，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空间与心理的朝圣之旅。这种布局清晰地划分了人与神的空间领域，同时又通过仪式行为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

从建筑功能上看，主殿是神明“安座”的居所，强调其神圣的静态存在；而拜殿则是凡人与神明互动的动态剧场。这种动静结合、内外有别的空间设计，使得复杂的宗教仪式得以有序进行。信众从三川门进入，穿过天井，立于拜殿，面向主殿祭拜，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空间序列，深刻地影响并规范了信众的宗教实践行为。

（二）神明巡游的路线与空间

神明巡游，俗称“游神”或“绕境”，是闽南宗教活动中极具特色的一环，它将神明的影响力从固定的庙宇空间拓展至整个社区。这不仅是一场盛大的宗教仪式，更是一次对社区领域和秩序的周期性确认与强化。神明巡游的路线并非随意选择，而是遵循着一套约定俗成的路径，这条路径连接了庙宇、村社的主要街道、社群边界以及重要的公共节点。

巡游的起点和终点均为神明所驻跸的宫庙。仪式开始前，庙宇内外的广场便成为人群集结、阵头准备的核心区域。随着神轿被抬出庙门，原本静态的宗教场所瞬间转化为动态进程的源头。队伍沿着既定路线行进，将平日里作为交通用途的街道、巷弄，临时转变为充满神圣意义的仪式通道。沿途的家家户户会设置香案，迎接神驾的到来，使私人居住空间也短暂地融入到这场公共的宗教盛事之中。整个社区的空间属性在巡游期间发生了暂时性的改变，日常生活空间被赋予了浓厚的展演色彩。

（三）宗教节庆时的空间使用

宗教节庆是闽南社区生活的集中体现，在此期间，寺庙宫观及其周边空间的使用方式会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一种高度复合、动态且充满活力的景象。固定的建筑空间被极大地拓展，以容纳激增的人流与多样化的活动。

节庆期间，寺庙前的广场（庙埕）是活动的核心舞台。这里会临时搭建起戏台，上演酬神的高甲戏、芗剧或木偶戏，吸引大量民众聚集观看。戏台与庙宇隔

着广场遥遥相对，构成了“人神共娱”的独特空间关系，民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神明的敬献。广场上，各种摊贩、手工艺人云集，俨然成为一个临时的市集，宗教活动与商业民俗活动在此交织。

宫庙内部的空间使用也更为密集。除了日常的进香祈福，还会举行大规模的法会、祭典等活动。主殿和拜殿人头攒动，香火鼎盛，信众们在有限的空间内遵循着复杂的礼仪。护龙、厢房等附属空间可能被用作临时接待处、斋饭供应点或是存放祭祀物品的场所，其日常功能被暂时悬置，完全服务于节庆的特殊需求。

空间的边界在节庆时变得模糊而富有弹性。原本仅限于庙内的仪式活动，会延伸至周边的街道和公共区域。例如：

1. “过火”仪式会在庙前广场或指定的开阔地带举行，需要大面积的场地来铺设炭火，并确保参与者的安全。
2. 神明巡游的队伍占据整个街道，将沿途的民居、商店都纳入神圣领域的巡视范围。
3. 一些大型的普度活动，则会在村社的公共空间设立祭坛，规模宏大，参与者众多。

可以说，在宗教节庆期间，以寺庙为中心，整个社区的空间都被重新定义和组织。平日里功能单一的场所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固定的空间界限被流动的仪式和人群所打破，展现出闽南社会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文化生命力。

二、民间信仰的实践场所

与集中在寺庙宫观的精英化宗教仪式不同，闽南的民间信仰更为分散、灵活，并深度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其活动场所遍及家宅、村社乃至田野，构成了与官方宗教并行的、无处不在的信仰空间网络。

（一）家中神龛的设置与祭拜

在家中设置神龛，是闽南民间信仰最为普遍和基础的实践形式。神龛通常被置于正厅（公妈厅）朝向大门的墙壁上，这是住宅中轴线上最尊贵的位置，体现了对神明与祖先的敬重。神龛的设置极其讲究，一般分为两层或并列，上方供奉观音、妈祖等家宅守护神，下方则安放写有历代祖先名讳的“公妈牌”（祖先牌位）。这种“敬神拜祖”的组合模式，清晰地反映了儒家伦理与民间信仰的融合。

神龛不仅是一个物质实体，更是一个家庭的精神核心，是连接现实世界与超

自然世界的微型圣域。每日的晨昏上香、奉茶，以及每月初一、十五的祭拜，都将宗教仪式内化为家庭的日常生活习惯。在婚丧嫁娶、子女出生、金榜题名等重要家庭事件发生时，家人都会在神龛前焚香祷告，向神明与祖先“报备”，寻求庇佑。小小的神龛空间，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血脉传承、记忆延续和对未来的期盼。

（二）村社土地庙、王爷庙的社区功能

如果说家中神龛维系的是家族的向心力，那么遍布于村头巷尾的土地庙、王爷庙等小型庙宇，则是凝聚整个村社共同体的核心。这些庙宇的规模虽小，其扮演的社会角色却至关重要。土地庙（福德祠）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平安与收成，而王爷庙则常与特定社区的开拓历史、瘟疫禳除等集体记忆紧密相关。

这些村社庙宇不仅是宗教祭祀的场所，更是社区的公共活动中心。庙前的广场是村民们日常闲聊、交流信息、议决公共事务的地方。在传统社会中，村社的许多管理职能，如组织水利、调解纠纷、集体防御等，都是依托于庙宇的组织网络来完成的。庙宇的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往往由村中有声望的长者组成，在事实上扮演着准社区自治机构的角色。

庙宇还是社区文化遗产与认同建构的载体。与庙宇相关的传说故事、神明诞辰的节庆活动、以及世代相传的祭祀仪式，共同塑造了社区成员的集体身份感。当地居民通过参与庙宇的活动，确认了自己作为社区一份子的归属感。因此，这些小型庙宇虽不起眼，却是维系闽南传统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空间节点。

（三）宗教活动与日常生活的交融

闽南民间信仰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与日常生活的无缝交融，宗教场所与世俗场所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甚至重叠的。这种交融性使得信仰不再是偶尔为之的仪式，而是弥散在生活每一刻的背景。

庙口文化是这种交融的典型体现。寺庙前的广场不仅是节庆的舞台，在平日里也是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孩子们在这里嬉戏玩耍，老人们在此下棋聊天，各种小吃摊贩则吸引着南来北往的食客。宗教的神圣氛围与生活的喧闹气息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互不干扰，反而相得益彰。庙宇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圣殿，而是社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宗教实践也延伸到了生产和商业活动中。开工动土要祭拜土地公，新船下水要祭拜妈祖，商店开业要祭拜财神，甚至在市场的摊位上，也能看到简单的香案。

信仰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为充满不确定性的生产生活提供精神上的慰藉与支持。这种将神圣性融入日常空间与行为的做法，深刻地塑造了闽南人既务实又充满敬畏精神的独特文化性格。

三、建筑空间与宗教体验

闽南宗教建筑不仅是仪式的容器，其本身就是一种能够主动引发特定心理感受的媒介。设计者通过对空间尺度、光影声响以及装饰符号的精心营造，共同建构出一个强大的精神磁场，引导信众从生理到心理，全方位地沉浸于神圣的宗教体验之中。

（一）高耸、幽深空间的神圣感营造

闽南寺庙建筑善于利用空间的对比来强化神圣感。从外部看，高高翘起的燕尾脊直指天际，创造出昂扬向上的气势，暗示着与上天的连接。当信众穿过相对低矮的山门，进入层层递进的院落时，空间的序列感开始发挥作用。每一进院落都通过天井进行分隔与连接，形成了开合有致的节奏。

主殿通常是整个建筑群中最为高大的部分，其内部采用高耸的梁架结构，如穿斗式或抬梁式构架，形成了巨大的垂直空间。当人置身于此，仰望高悬的梁枋和藻井时，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身的渺小感，进而对神明产生敬畏之情。与高耸相伴的，是空间的幽深感。中轴线上层层深入的殿堂，通过控制门洞的宽度与高度，以及利用天井调节光线的明暗，营造出一种深邃、宁静、远离尘世喧嚣的氛围。尤其在岩寺中，利用天然洞穴的幽深特性，更将这种神秘感与神圣感发挥到极致。

这种空间尺度的处理，巧妙地运用了心理暗示。高耸象征着神权的威严与超越性，而幽深则代表着历史的厚重与精神世界的无穷探索。信众在穿行于这些空间的过程中，心境也随之由外在的喧闹转向内在的虔诚与宁静，为与神明对话做好了铺垫。

（二）光影、声音对宗教氛围的烘托

光和声音是营造宗教氛围的非物质要素，在闽南建筑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建筑师如同舞台灯光师和音响师，精确地控制着空间中的感官元素。天井是调节光线最重要的构件。阳光通过天井的过滤，柔和地洒落在庭院和廊道中，避免了阳光直射的刺眼，形成明暗交错、富有层次的光影效果。正殿内部通常较为幽暗，仅依靠天井的反射光和门窗的少量采光，光线集中在神龛附近，或通过摇曳的烛

火与长明灯来突出神像，营造出神秘而庄严的视觉焦点。

声音在空间中的传播与回响同样经过精心设计。寺庙中庭院和木结构具有良好的吸音和反射效果，使得诵经声、法器敲击声（如钟、鼓、木鱼）在空间中产生悠远的回响，但不至于喧闹嘈杂。信众在这样的声环境中，更容易摒除杂念，进入冥想与沉思的状态。而在节庆期间，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喧闹的锣鼓声则宣告着神明的在场，将热烈、亢奋的情绪传递给每一个参与者。光与声的巧妙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宗教空间的感染力。

（三）建筑符号对教义的视觉传达

闽南宗教建筑的装饰本身就是一部刻在墙上、梁上的“立体经书”。工匠们通过石雕、木雕、砖雕、剪黏、交趾陶、彩绘等繁复的工艺，将复杂的宗教教义、伦理道德和民间传说转化为直观的视觉符号，对信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化。这些装饰符号内容极其丰富，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

1. 叙事性题材：在梁枋、墙壁的彩绘和雕刻中，大量描绘了《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中的忠孝节义故事，以及佛教的经变故事、道教的八仙过海等。这些图像化的故事，使得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直观地理解善恶有报、忠君爱国等核心价值观。

2. 象征性图案：大量的动植物和器物图案被赋予了吉祥寓意。例如，龙、凤象征着尊贵与祥瑞；蝙蝠、鹿、仙鹤分别寓意“福”、“禄”、“寿”；牡丹代表富贵，莲花象征圣洁。这些图案通过谐音、借代等手法，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物化于建筑之上。

3. 神权与等级：建筑的细部装饰也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观念。屋脊上的龙凤、神兽数量与形态，斗拱的复杂程度，门钉的数量等，都暗示着庙宇所供奉神明的神格高低。这种可视化的等级体系，强化了信众心中的神明秩序。

这些建筑符号共同作用，使得整个建筑空间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符号场域。信众在进入庙宇的瞬间，便被这些无声的语言所包围，其思想和情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引导和塑造。建筑不仅提供了宗教活动的场所，更以其丰富的视觉语言，积极地参与到宗教观念的传播与建构之中。

第三节 家族文化的空间载体

闽南红砖建筑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家族文化与儒家伦理秩序的物质体现。它通过独特的建筑语言，将那些无形的家族观念、伦理规范和悠久的历史记忆，凝固成了可以被观摩、被感知的空间形态。从庄严的宗祠到日常的民居，每一处梁柱、每一进院落，都承载着家族的脉络与精神，俨然成为一部立体的家族史书，供后人阅读与传承。

一、宗祠作为家族的象征

宗祠，或称“祠堂”，是闽南地区宗族血缘的圣殿与核心。它超越了一般建筑的居住功能，成为整个宗族精神上的向心力所在，是维系家族认同、凝聚宗族力量、彰显家族地位的至高象征。它的一砖一瓦，都渗透着后人对祖先的敬畏和对血脉传承的无比重视。

（一）供奉祖先的神圣空间

宗祠最为核心的功能，便是为家族提供一个集中供奉、祭祀祖先的场所。其建筑格局通常是闽南建筑中最为讲究、规制最高的。从选址、朝向到内部布局，都遵循着严谨的风水观念和严格的礼制规范。宗祠的中轴线上，通常是规格最高、装饰最华丽的正厅，也称为“享堂”或“祭厅”。厅内深处设有一座巨大的神龛，即“公妈龛”，龛中依昭穆之序，整齐地排列着历代祖先的牌位。这些牌位是祖先灵魂的凭依，是子孙后代寻根问祖的终极指向。

神龛的雕刻工艺极为精美，常以金漆、彩绘装饰，题材多选用“二十四孝”等伦理故事，时刻提醒着后人恪守孝道。每逢祭祀之时，族人在此陈设祭品、焚香叩拜，通过一系列庄严的仪式，与祖先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并祈求庇佑。这种充满神圣感与敬畏感的空间氛围，使得任何进入其中的族人，都会不自觉地收敛言行，感受到血脉的庄严与传承的厚重。宗祠通过这种仪式性的空间实践，强化了族人的归属感，将共同的祖先崇拜转化为维系家族团结的强大精神纽带。

（二）族规、家训的颁布场所

宗祠庄严肃穆的氛围，使其天然成为宣示和执行家族法规的理想场所。族规、家训是一个宗族内部的“法律”，用以规范族人行为、裁决内部纠纷、维护家族秩序与声誉。这些规定或由德高望重的族长与长老共同制定，或传承自功勋卓著

的先祖。在宗祠内颁布这些规章，无疑为它们赋予了一层神圣的光环。在列祖列宗牌位的注视下，任何训示都显得格外郑重，不容违抗。许多宗祠会将重要的家训镌刻在石碑上，或制成木质牌匾，高悬于厅堂两侧的墙壁上，让每一个前来祭祀的族人都能耳濡目染，铭记于心。当族人之间发生争执，或是有人犯下过错时，宗祠便成为仲裁与惩戒的公堂。族长召集相关人等，在祖先牌位前对质、评理，依据族规进行裁决。这种做法，将个体的行为置于整个家族历史与荣誉的监督之下，其威慑力远非寻常的说教可比。

（三）家族议事与教育中心

宗祠不仅是祭祀与执法的空间，它同样是家族公共事务的议事大厅与培育后代的教育中心。家族的兴衰荣辱与每一个成员息息相关，因此，涉及全族利益的重大事务，如田产管理、公共祭祀的筹备、族谱的编修、对外关系的应对等，都需要在宗祠内进行商议。

在这样的场合，家族的精英和长者汇聚一堂，共同决策。宗祠为这些讨论提供了一个正式且平等的平台，确保了决策的公开性与权威性。它见证了家族的每一次重要抉择，记录了家族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许多情况下，宗祠也扮演着家族学校的角色：

1. 它利用其宽敞的厅堂或侧室开办私塾，聘请塾师为本族子弟授课。这不仅保证了知识的传承，特别是儒家经典的教育，更确保了家族的价值观能够代代相传。

2. 在这种环境中学习，孩子们从小就将个人学业与光宗耀祖的家族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学习的动力也更为充足。宗祠作为教育中心，为家族源源不断地培养着继承者与建设者。

通过议事与教育两大功能，宗祠将家族成员紧密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凝聚力的有机共同体。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个集体的记忆宫殿、议事殿堂和文化摇篮，是家族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

二、民居内部的等级与秩序

如果说宗祠是家族的公共脸面，那么日常居住的“大厝”则是家族内部秩序的微观世界。闽南传统民居的空间布局，严格遵循着儒家的宗法伦理，将长幼、尊卑、内外的观念物化为一套清晰可见的建筑秩序。身处其中的家族成员，在日

复一日的起居生活中，便自然而然地习得了自己在家族结构中的确切位置与应尽的责任。

（一）厅堂的中心地位与使用规则

在闽南传统民居中，厅堂（或称“正厅”）是整个建筑的绝对核心。它位于建筑中轴线的中心位置，是家里规格最高、面积最大、装饰最讲究的空间。厅堂的功能是复合的，它既是家庭的礼仪中心，也是日常的社交场所。厅堂正对入口的墙壁上，同样设有供奉本宅“家神”和直系祖先牌位的神龛，其规模虽小于宗祠，但同样是家庭精神信仰的焦点。每逢节庆或重要日子，家庭成员会在此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

厅堂是家庭对外的窗口，接待重要宾客的活动都在此进行。主人与客人的座位安排遵循着严格的“左尊右卑”原则，清晰地体现出主客之间的关系与社会地位。平日里，厅堂也是家庭成员，特别是男性成员休憩、议事的场所。但它并非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孩子们不能在此肆意追逐打闹，女性成员在有外客时 also 需自觉回避。厅堂的使用规则，无形中强化了家庭的严肃性与秩序感，使其成为维系家庭伦理、展示家庭门面的重要空间。

（二）长幼、尊卑的房间分配

闽南民居的房间分配是家族等级秩序最直观的体现。一座典型的“三进两院”或“五间张”大厝，其居住空间的安排充满了家族的智慧。位于中轴线上、紧邻后方厅堂的“后房”或“大房”，是整个宅院中位置最好、最安稳的房间，必须由家中辈分最高的长辈（如祖父母或父母）居住。这里象征着家族的根基与核心，是权力的中心。

主厅两侧的房间，称为“榉头”或“厢房”，则按照“左大右小”的原则分配给儿子们。长子居左，次子居右，这种安排明确了兄弟之间的长幼顺序。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会在主体建筑两侧加建“护龙”或“榉室”，供后辈或旁系亲属居住。距离中轴线越远，居住者的辈分或地位通常也越低。一个家族的居住布局，就如同一幅展开的、立体的家族树状图，每个人都能从自己房间的位置，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家庭结构中的角色与责任，这种空间上的固化，使得伦理秩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无需言说的日常准则。

（三）女性在家庭空间中的活动范围

在传统礼教的约束下，闽南女性的家庭生活空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男主

外，女主内”的观念在建筑空间上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民居中的“内”与“外”被严格区分。厅堂及其以前的庭院，属于“外”的范畴，是男性活动和接待宾客的区域。而围绕着天井的各个房间、后院、厨房以及阁楼，则构成了“内”的世界，是女性成员主要的活动场所。未出嫁的女儿，其活动空间更为受限，她们通常居住在阁楼或被称为“绣楼”的僻静房间里，学习女红、操持家务，非有大事不得轻易抛头露面，这便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真实写照。即使是已婚的女性，在有男性外客来访时，也需要回避到后厅或自己的房间。这种空间上的隔离，一方面保护了女性的贞洁与安全，另一方面也固化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将其生活牢牢地限制在家庭内部的方寸之间，使其社会角色与公共生活相隔离。

三、建筑作为家族历史的记录

闽南红砖建筑不仅是静态的文化载体，更是一部动态的、不断被书写的家族编年史。它通过各种建筑构件和形制的演变，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家族从无到有、由盛转衰的历程。每一块匾额、每一副楹联、每一次扩建，都在为这部立体的史书增添新的篇章，使建筑成为家族记忆最忠实的守护者。

（一）匾额、楹联上的家族荣耀

行走在闽南的古厝聚落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悬挂在门楣之上、厅堂之中的各式匾额。这些匾额是家族荣誉的最高象征，是个人成就转化为集体荣耀的宣言书。无论是科举及第获得的“进士”、“文魁”匾，还是因军功、政绩受朝廷封赏的“诰命”匾，抑或是因高寿、德行被乡里称颂的“寿”、“德”匾，它们都被郑重地高悬于最显眼的位置。这些匾额不仅是对先祖功绩的表彰，更是对后世子孙的激励，提醒他们要以先辈为楷模，奋发图强，为家族争取新的荣誉。

与匾额相得益彰的是镌刻或书写在廊柱、门扇上的楹联。楹联的内容或是描绘建筑周围的山水形胜，或是表达家族的处世哲学和价值追求，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这些文字简练而意蕴深远，是家族精神的凝练。它们与匾额一起，构成了建筑的“文本”，向每一个来访者和居住者诉说着本家族的辉煌过去、文化底蕴和精神追求，将无形的家风转化为有形的文化景观。

（二）建筑形制反映的家族兴衰

建筑形制的变化，清晰地记录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闽南红砖建筑的几种主要形制，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等级与象征意义，可见下表。

闽南红砖建筑主要形制与象征意义表

形制	描述	象征意义	规模等级 (Scale/Status)
一字厝	单排三开间，无护龙或只有简易护厝。	初创、朴素、小家庭。	低
三间张	主体三开间，一进深，通常带有天井。	中等家庭，基础结构。	中
四点金	两进四开间，带两侧护龙，形成完整的“口”字型。	财富聚集，标准富裕人家。	较高
五间张	主体五开间，或指三开间加两侧榫头。	家族兴旺，规格高于三间张。	较高
五进大厝	多进院落结构，纵深极长。	极盛时期，显赫的官宦或巨贾家族。	极高

一座建筑的初始规模和后来的形态变化，直接反映了家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一个家族的创业之初，可能仅能负担起一座简单的“一字厝”或小规模的“三间张”。这时的建筑朴实无华，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随着家族成员通过经商、仕途或农业积累了财富，人口日益兴旺，他们便会着手扩建祖宅。在原有基础上增加院落的深度，从一进变为两进、三进，或在主体建筑两侧加盖“护龙”，形成规模宏大的“四点金”或“九十九间”的格局。

每一次扩建，都标志着家族实力的跃升。建筑的装饰也随之愈加精美，石雕、木雕、剪瓷雕等工艺被大量运用，以彰显家族的财力与品位。相反，倘若一个家族中途败落，无力维系庞大的祖宅，建筑便会呈现出凋敝、残破的景象。墙皮剥落、梁柱腐朽，甚至有些家庭会将一座大厝分割出售给不同的人家，破坏原有的完整格局。建筑的兴衰与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它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家族生命曲线的起伏。

（三）代际传承中的建筑维护与扩建

维护和扩建祖宅，在闽南文化中被视为子孙后代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孝”的重要体现。一座老宅能够历经百年风雨而屹立不倒，离不开一代代人的精心呵护。日常的检修、定期的翻新，不仅是物质上的投入，更是情感与记忆的延续。后人对祖宅的每一次修缮，都是在与先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表达着对根脉的敬重。

当家族人口增长，原有的居住空间不敷使用时，扩建便提上日程。扩建通常遵循着严格的规划，新的建筑单元（如“护龙”）会以对称、有序的方式附加在

旧有建筑之上，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这种有机生长式的扩建模式，使得整座建筑群如同一棵不断分枝散叶的大树，其形态生动地记录了家族开枝散叶、子孙繁衍的过程。

从一座核心老宅，逐渐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建筑聚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家族生命力与凝聚力的最佳证明。建筑的代际传承，确保了家族的历史记忆有处安放，也为家族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精神根基。每一代人既是祖宅的享用者，也是它的守护者与再造者，通过这种持续的营造活动，家族的生命得以在红砖青石之间生生不息。

第四节 社区认同的建筑表达

闽南的红砖建筑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它更是承载社区集体情感与身份认同的实物凭证。它以其鲜明的色彩、标志性的形态和共同的营造过程，将个体家庭融入一个紧密的文化共同体之中，成为维系社区网络、传承地方文脉的重要力量，深刻地浸润和塑造着闽南人的精神世界。

一、红砖建筑作为社区的视觉标识

红砖建筑群落以其统一而鲜明的视觉语言，构成了闽南地区独树一帜的文化景观。这种深植于红土之上的建筑形式，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居住空间，成为社区成员情感与记忆的共同归宿，凝结出强烈的地域认同和文化向心力。

（一）统一的红砖色调形成的社区风貌

行走在闽南的村落，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一片片连绵起伏的红色屋顶与墙体。这种被称为“烟炙砖”的建筑材料，取材于本地富含铁元素的红土，经松枝烧制，表面会留下独特的烟熏纹理。这种源于自然的红色，色泽厚重而温暖，历经岁月洗礼反而会“返红”，愈发鲜艳。当众多红砖厝聚集在一起时，便形成了一种强大而统一的视觉符号，无论是在金门，还是在泉州、厦门、漳州等地，这种“厝”的建筑形态都成为闽南文化区的显著标志。

这种统一的色调不仅仅是美学上的选择，它深深植根于闽南的土壤与历史之中。连片的红砖建筑群落，如同一幅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画卷，清晰地定义了社区的边界和形象，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视觉上的归属感。这种

风貌不仅区分了他者与我者，更在无形中强化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成为海内外闽南人共同的视觉记忆和文化原乡的象征。

（二）标志性公共建筑的向心力

在整齐划一的红砖民居簇拥之中，体量更为宏大、装饰更为华丽的宗祠与庙宇，构成了社区的精神核心。这些公共建筑不仅是祭祀祖先、供奉神明的场所，更是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维系着宗族与社群的团结。宗祠，或称“家庙”，作为供奉祖先牌位的圣地，是宗族最重要的外在表征，其存在极大地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无论是议定族内大事，还是举办节庆典礼，宗祠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如同国外的教堂一样，对社区成员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

庙宇则承载着社区共同的民间信仰，如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等，成为地方保护神的神圣殿堂。这些庙宇通常占据村落中的最佳位置，其建筑装饰极尽工巧，通过精美的石雕、木雕、剪粘和彩绘，讲述着神祇的传说与地方的历史。例如，泉州关岳庙的彩绘斗拱，其色调源于关羽的形象，时刻提醒着观者其宣教意义。这种以信仰为纽带的公共空间，超越了个体家庭的界限，将整个社区的居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千年血脉的精神纽带之一。

（三）红砖建筑作为“家”的集体记忆

对于闽南人而言，红砖厝不仅仅是房子，更是“家”的代名词，承载着数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寄托。“厝”这个闽南语特有的称呼，本身就带有一种亲切感，它所代表的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家族繁衍生息的根。从一个家族建造第一栋红砖厝开始，随着子孙的繁衍，房屋会围绕着主厝不断向两旁“护龙”延伸，形成一个庞大而规整的建筑群，这种建筑的生长模式本身就是一部家族史的生动再现。燕尾脊作为红砖厝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被赋予了“盼燕归巢”的寓意，寄托着对远方游子的思念，成为维系海外侨胞与故土情感联系的重要符号。因此，这些遍布闽南和台湾的红砖建筑，已然成为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寻根溯源、寄托乡愁的文化载体。

二、共同建造与维护的社区凝聚力

闽南社区强大的凝聚力，不仅体现在共享的文化符号上，更在红砖建筑的共同建造、集体出资与联合维护中得到锤炼与升华。这种贯穿于建筑生命周期的协

作精神，将社区成员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传统“合建”、“互助”的建造模式

在闽南地区，建造一座大厝是整个家族乃至社区的盛事。传统的营造过程并非单纯的雇佣关系，而是充满了“合建”与“互助”的人情味。由于建造一座官式大厝耗资巨大、工序繁复，往往需要集中整个家族的力量，甚至联合多个房支共同出资兴建。在建造过程中，亲族邻里之间常常无偿或半无偿地提供劳力支持，形成了“帮工”的传统。这种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劳动中，加深了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相互认同。

工匠的组合也体现了地域性的协作。历代以来，惠安等地的传统建筑业多是地域性的个体工匠组合，或父子相携，或师徒相从。在承接大型工程时，一位“掌场”工匠会临时召集本地的泥瓦、木、石等各工种师傅，分项承建，协同合作。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协作网络，使得营造技艺得以在社区内部流传，同时也强化了以匠人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让每一座建筑的落成都成为一次社区力量的成功整合。

（二）公共建筑的集体出资与维护

宗祠、庙宇等社区公共建筑的兴建与维护，更是体现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方面。这些建筑的资金来源，除了少数由富裕的乡贤或海外华侨独力捐建外，大部分依靠社区成员的集体出资。

1. 这种集资可以是定期的丁口钱，也可以是临时的乐捐。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普通村民，都会根据自身经济能力为家乡的公共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这种共同的经济投入，使得每个人都成为社区公共财产的“股东”，从而对这些建筑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2. 建筑建成后的维护与修缮，同样依赖于社区的集体力量。许多社区会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或基金，负责公共建筑的日常管理和定期维修。当需要大规模修缮时，再次发起募捐亦能得到族人与乡亲的积极响应。这种共同出资、共同维护的传统，不仅保证了文化遗产的存续，更在一次次的集体行动中，反复确认和巩固了社区的共同体意识。

（三）社区公约对建筑风貌的保护

为了维护社区整体的建筑风貌，许多闽南村落形成了不成文的乡规民约，或是在宗族规约中包含了对建筑营造的规定。这些公约虽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但

在熟人社会中却有着强大的约束力。公约内容可能涉及建筑的高度、开间、装饰乃至选址，旨在维持社区内部的和谐秩序与视觉上的统一。例如，一些规定会强调民居的建造不能僭越宗祠或庙宇的规制，以体现尊卑有序的伦理观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将这些传统智慧转化为成文的保护条例，以更有效的方式应对城镇化对传统风貌的冲击。这种由社区内部自发形成或共同认可的保护机制，是社区文化自觉和身份认同的有力证明，它表明社区成员不仅将红砖建筑视为私有财产，更将其看作是需要共同守护的文化遗产。

三、建筑作为社区文化传承的载体

红砖建筑如同一部立体的教科书，它不仅通过自身的结构与装饰讲述着过去，更通过营造技艺的代代相传和其中的生活实践，将闽南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集体记忆传递给未来，成为社区文化传承至关重要的活态载体。

（一）建筑技艺的师徒传承

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是一门复杂而精深的学问，涵盖大木作、小木作、泥瓦作、石作、彩画、剪粘等多个工种。这门技艺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师徒制。年长的师傅凭借丰富的经验和一把“篙尺”，就能在脑中构建出整座建筑的蓝图，并将梁、柱、斗拱的尺寸和榫卯的接法，手把手地教给徒弟。这种传承方式不仅传递了技术，更传递了匠人精神和职业伦理。师徒关系往往如同父子，徒弟在学艺期间不仅要学习技艺，还要学习如何与人协作、如何尊重传统。这种紧密的传承关系保证了营造技艺在社区内部的延续，也使得社区自身就具备了“造血”功能，能够不断培养出新的工匠来修缮和建造自己的家园。尽管现代建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技艺造成了冲击，但这种以师徒制为核心的传承体系至今仍在顽强地延续着。

在闽南，许多工匠世家世代相传，如金门大木作世家陈荣文、惠安石雕世家蒋钦全等，他们的家族史本身就是一部技艺传承史。这些匠师不仅在本土施展才华，还将技艺带到台湾乃至东南亚，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的存在保证了无论在哪里兴建红砖厝，都能保持其纯正的风格与工艺，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维系了闽南文化的统一性。

（二）建筑装饰中的故事与传说

红砖建筑的墙面、屋脊、门窗和梁柱，是民间艺术家们创作的广阔舞台，其

上遍布的雕刻与彩绘，堪称一座“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民俗博物馆。常见的装饰主题及其文化寓意，可见下表。

红砖建筑常见装饰主题与寓意表

装饰部位	常见主题	文化寓意
屋脊(燕尾脊)	飞鸟、龙吻、花草	盼燕归巢、身份象征、吉祥镇宅
砖雕/石雕	蝙蝠、梅兰竹菊	祈福纳祥(“福”谐音)、高洁、长寿
剪粘/彩绘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劝人向善、忠孝节义、教化功能
门窗	八卦、几何纹样	辟邪、和谐、家族繁衍

这些装饰题材广泛，大量取材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如“三英战吕布”、“空城计”等。每一幅砖雕、石雕或彩绘，都在讲述一个劝人向善、忠孝节义或祈求吉祥的故事。例如，雕刻蝙蝠取“福”之谐音，雕刻“鹤鹿同春”则寓意长寿与祥瑞。

这些装饰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它们是社区集体价值观和历史记忆的视觉化呈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孩童在庭院中玩耍，耳濡目染的便是这些梁上的英雄、窗间的瑞兽。不识字的村民也能通过这些生动的图像，了解历史、明辨是非、传承道德。建筑装饰中也融入了大量的道教与佛教元素，如八卦图、仙女飞天等形象，反映了闽南地区多元信仰融合的文化特征。透过这些精美的装饰，建筑成为无声的讲述者，默默地向一代又一代的社区成员传递着共同的文化基因。

（三）红砖建筑作为社区文化教育的活教材

红砖建筑本身就是一本生动的、立体的乡土文化教材。从建筑的选址、布局到具体的营造细节，无不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和因地制宜的生态智慧。官式大厝的中轴对称、多进院落格局，体现了传统中国的对称、连络的审美意识和以厅堂为中心的家族秩序。厅堂作为奉祀祖先和接待客人的中心，其“光厅暗房”的设计格局，也体现了敬天法祖、内外有别的传统观念。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许多社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这些古厝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一些保存完好的大型古民居群，如南安蔡氏古民居和厦门大嶝的古厝，被开辟为博物馆或文化体验区，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介绍闽南的建筑艺术、华侨历史和民俗风情。通过举办研学活动、露天电影、南音和木偶戏表演等，古老的建筑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静态的文化遗产变身为动态的社区文化中心，让更多人直观地感受和学习红砖建筑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第十章 红砖建筑的未来展望

在时间的洪流中，建筑不仅是庇护人体的物理空间，更是承载文化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符号。闽南红砖建筑，以其鲜明的色彩、独特的形制与深厚的内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深入探讨其未来展望，不仅关乎一种建筑风格的存续，更指向了地方性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自处与发展的深刻命题。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特色

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塑造着世界的面貌，建筑领域亦不能幸免。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幕墙构筑的“国际风格”席卷全球，抹平了不同地域的建筑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并挖掘以闽南红砖建筑为代表的地方特色，不仅是对抗文化同质化的必要手段，更是实现建筑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一、地方性建筑文化的价值重估

地方性是特定地域内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长期交互作用的产物，它赋予了建筑独一无二的“场所精神”。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对地方性建筑文化的价值进行重估，是从单一的审美疲劳和文化认同危机中苏醒，重新发现那些根植于本土、充满生活气息与智慧的建筑瑰宝。

（一）对全球化同质化趋势的反思

自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倡导的标准化、普适性设计理念，极大地推动了“形式服从功能”的原则，但也无形中开启了全球建筑同质化的进程。这种趋势在加速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导致了“千城一面”的窘境。城市失去了其独特的肌理与个性，变成了可以被轻易复制的、缺乏灵魂的集合体。行走在世界任何一个大都市，相似的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住宅区，让人产生时空错乱之感，地域的差异性被最大程度地削弱。这种基于经济与技术效率最大化的发展模

式，忽视了建筑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割裂了人与土地、历史的情感联结。

对这种同质化趋势的反思，是对文化根源的追问，也是对生活品质的重新考量。建筑不应仅仅是冰冷的居住机器，它应当是安放身心、承载记忆的家园。当一座城市的地标不再是独一无二、充满故事的塔楼或庙宇，而被千篇一律的玻璃盒子取代时，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便开始变得模糊。因此，建筑界与社会大众开始重新审视那些被“国际风格”所遮蔽的地方建筑传统，试图从中找回失落的文化归属感和地方认同。

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地区的建筑魅力，恰恰在于其不可复制性。正如梁思成先生所担忧的，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如果在建筑上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上是巨大的损失。这种反思并非是要全盘否定现代建筑，而是在呼唤一种更加自觉和审慎的设计态度，即在拥抱现代技术与生活方式的同时，尊重并延续地方的历史文脉，让建筑重新成为讲述地方故事、凝聚社区情感的有力媒介。

（二）地域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

地域性是文化多样性的空间表达，它如同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文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每一处地域的建筑，都蕴含着当地人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并与之和谐共生的独特智慧。从选材到构造，从空间布局到装饰细节，无不体现着特定地理气候、生活习俗与审美情趣的影响。无论是黄土高原的窑洞，还是江南水乡的民居，或是闽南沿海的红砖厝，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人类栖居画卷。

保护和发扬建筑的地域性，就是维护全球的文化多样性。当一种地方建筑风格消亡时，随之消失的不仅仅是物理形态，更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一套传承已久的营造技艺，以及一段无法复制的历史记忆。这种损失是不可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多样性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并强调其对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建筑作为文化最直观、最持久的载体之一，其地域特色的存续无疑是这一宏大议程中的关键环节。

在全球化浪潮中，地域性并非意味着封闭和排外。相反，它是在全球视野下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再确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在带来同质化风险的同时，也激发了本土化的复兴与重构。正是因为有了全球的参照系，地方的独特性才显得愈发珍贵。因此，闽南红砖建筑的地域性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的美学与历史意义，更在于它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主流范式的建筑可能性，丰富了

人类关于“家”与“社区”的想象，为构建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体系贡献了独特的范例。

（三）红砖建筑作为闽南文化身份的象征

红砖建筑是闽南人精神世界的外化，是解读闽南文化最直观的文本。那一抹艳丽而厚重的红色，既源于中原文化中“朱色为贵”的传统，又与当地独特的红壤资源和“拜火崇红”的民间信仰紧密相连。它既是富庶与吉祥的象征，也是闽南人“爱拼敢赢”、热情似火性格的写照。这种鲜明的色彩，在亚热带常绿的自然背景中显得格外突出，构成了闽南地域独特而强烈的视觉识别系统。

从形态上看，“皇宫起”大厝形似殿宇，以中轴对称的严谨布局体现着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家族伦理与长幼尊卑秩序。而高高翘起的燕尾脊，则如振翅欲飞的燕子，寄托着游子对故乡的思念，成为无数海外侨胞认祖归宗的精神纽带。这种独特的屋顶轮廓线，勾勒出闽南地区的天际，成为区别于其他民居风格的标志性符号。这些建筑不仅仅是居住空间，更是家族教育与宗庙祭祀三位一体的生活场域，维系着庞大的宗族网络。闽南红砖建筑的主要元素与文化象征可见下表。

闽南红砖建筑主要元素与文化象征表

建筑元素	形制特点	文化象征意义
主体色彩	艳丽的红色	喜庆、吉祥、富庶；“拜火崇红”的民间信仰
屋顶形制	燕尾脊（燕仔尾）	游子对故乡的思念；振翅欲飞，表达身份尊贵
空间布局	“皇宫起”布局，中轴对称	儒家伦理、长幼尊卑秩序；家族宗法观念
墙体工艺	“出砖入石”	废物利用的智慧；红白相间，富有韵律感的美学效果
整体功能	宗祠、家宅、学堂三位一体	维系宗族网络；集体记忆与文化遗产

红砖建筑的营造技艺，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文化史。工匠们利用本地盛产的红壤烧制“烟炙砖”，并巧妙地将花岗岩与红砖结合，创造出“出砖入石”的独特墙体砌筑方式，这种技法据说诞生于明代大地震后的“废物利用”，却意外地形成了红白相间、富有韵律感的美学效果，成为闽南建筑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在装饰细节上，无论是寓意吉祥的砖雕、剪瓷雕，还是体现尊卑有序的铺贴方式，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每一面墙壁都成为无声的叙事诗。因此，红砖建筑不仅是物质的遗产，更是闽南文化身份和集体记忆的集中体现，是闽台血脉相连的直接见证。

二、地方特色的现代转译

在全球化的今天，延续地方文脉并非意味着简单地复制传统，而是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对于闽南红砖建筑而言，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延续其生命力，关键在于实现从形式模仿到精神继承的跨越，将地方材料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并用当代的建筑语言在全球语境中讲述独特的闽南故事。

（一）从形式模仿到精神继承

在地域文化复兴的初期，常常出现一种对传统符号的浅层模仿。一些现代建筑为了标榜其“地方性”，简单地将燕尾脊、马背脊等传统元素生硬地嫁接到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体上，或者在外墙贴上毫无内在逻辑的红砖。这种“穿西装，戴斗笠”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回应了传统，却往往忽略了传统建筑精神的内核。它将原本有机统一的建筑形态肢解为孤立的符号，导致建筑显得不伦不类，缺乏内在的生命力。

真正的传承，在于对精神的继承。这意味着需要深入理解传统建筑背后的空间哲学、环境观念和人文关怀。例如，闽南传统民居强调的院落组织、空间的渗透与过渡、对自然通风采光的巧妙利用，以及建筑作为家族公共活动中心的角色，这些都是超越具体形式的精神内涵。现代设计师可以从这些方面汲取灵感，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和空间组织方式，重新诠释传统的邻里关系和家庭观念。建筑可以不再拘泥于“皇宫起”的固定形制，但其围合式的空间布局、注重内向性的庭院、以及促进家庭成员交流的公共区域设计，依然能够有效地传承传统民居的“精神”。这种转译，是从“形似”走向“神似”的升华，是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活”的生命力的唯一途径。

（二）地方材料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红砖作为闽南建筑的标志性材料，其未来的生命力在于如何与现代建筑技术相结合，焕发出新的表现潜力。单纯地沿用传统的砌筑方法，在许多现代建筑的功能和结构要求下可能面临挑战。推动地方特色的现代转译，需要积极探索红砖在当下的创新应用。

将传统材料与现代技术结合，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

1. 构造与性能的革新：现代技术可以极大地提升红砖墙体的性能。例如，通过发展新型的砌筑砂浆和加固技术，可以改善传统“空斗墙”抗震性能较弱的

缺点。同时，结合现代保温、隔热材料，可以创造出既有红砖外观又满足现代节能标准的复合墙体。在幕墙技术中，可以将红砖作为一种表皮材料，通过精密的干挂系统或预制模块，实现更为灵活和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立面效果，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红砖幕墙就是成功的尝试。

2. 数字化设计与建造：参数化设计和机器人砌筑等数字化技术，为红砖这种传统材料的几何造型能力带来了革命。设计师可以利用算法生成复杂的砖墙纹理、渐变图案甚至是曲面形态，然后由机器人精确地完成砌筑。这使得红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平面拼贴，能够创造出以往手工难以实现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建筑形态，为红砖建筑的艺术表现开辟了全新的维度。

3. 材料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立足于循环经济和绿色建筑的理念，可以研发新型的环保红砖。例如，利用建筑废料、工业固废等作为原料，生产再生红砖，减少对原生黏土资源的依赖。同时，也可以通过改进烧制工艺，降低能耗和碳排放，使红砖这种传统材料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通过这些方式，红砖这一古老的材料便能在现代建筑中扮演新的角色。它不再仅仅是承重或围护的构件，更成为一种富于表现力的、能够与光影、结构和空间互动的艺术媒介，从而在延续地方文脉的同时，也展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三）在全球化语境中讲述地方故事

建筑是无声的诗，是立体的历史。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一座优秀的地域建筑，本身就是一张极具说服力的文化名片。它能够以其独特的空间体验和视觉形象，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一个地方的历史、风土与人文精神。闽南红砖建筑的未来，也在于如何利用现代的设计语汇，将深植于地域文化中的故事有效地传递给全球受众。

讲述地方故事，首先要挖掘故事的内核。闽南文化的核心之一是海洋文化，它塑造了闽南人开放、冒险、兼容并蓄的性格。这种文化特质体现在建筑上，便是中西合璧的番仔楼、充满异域风情的装饰图案，以及建筑本身作为“侨批”文化的物质载体。现代红砖建筑可以围绕“海洋”与“侨乡”的主题，通过抽象的设计手法来表达。例如，建筑的流线形态可以呼应海浪的意象，空间的开放与连通可以象征海洋文明的包容性，光影的变幻可以模拟水面的波光粼粼。通过这种意象的营造，建筑超越了单纯的功能体，成为一个能够唤起情感共鸣的叙事空间。

同时，建筑的功能与在地文化的结合，也是讲述故事的重要方式。例如，在

设计一座位于闽南地区的社区艺术中心时，可以将红砖、庭院与闽南传统戏曲、南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空间结合起来。参观者在欣赏红砖建筑的现代美学时，也能沉浸式地体验到活态的闽南文化。泉州晋江的五店市传统街区，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将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国乃至现代的特色建筑融为一体，成为了一个活的闽南文化博物馆。这种策略让建筑成为文化场景的容器，使地方故事的讲述更加生动和深刻。通过参与国际建筑展览和奖项评选，这些承载着地方故事的现代建筑，能够将闽南文化的魅力带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对话。

三、跨文化对话中的文化自信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地方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红砖建筑的未来，必然是在与世界各种文化的持续对话中被塑造。这种对话要求我们既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滋养，又要有坚守根脉的文化定力，避免在交流中迷失自我。最终，充满自信的闽南红砖建筑，将能成为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一）以开放心态吸收外来文化

闽南文化从其诞生之初，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地处东南沿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与海洋的紧密联系。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泉州在宋元时期就是世界性的贸易港口，多元文化在此交汇融合。这种开放与包容的精神，深刻地烙印在闽南建筑的基因之中。无论是泉州开元寺中出现的古印度教石柱，还是厦门鼓浪屿上风格各异的“万国建筑”，抑或是遍布侨乡的中西合璧的“番仔楼”，都证明了闽南建筑在历史上就善于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元素。

在今天，延续这种开放心态尤为重要。面对全球涌现的各种新建筑思潮、新材料和新技术，我们应积极学习借鉴。例如，现代建筑对于空间流动性、功能复合性的强调，可以用来优化传统红砖民居的内部布局，使其更符合当代人的生活习惯。国外建筑在生态设计、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也可以被引入到红砖建筑的营造中，提升其环境友好性。

吸收外来文化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一个消化、重构、创新的过程。陈嘉庚先生设计的厦门大学嘉庚建筑群，就是一个经典的范例。他采用“穿西装、戴斗笠”的方式，将西式的楼体与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屋顶结合起来，其本质是在宣告一种

文化态度：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但中华文化的根脉与精神必须高高在上。这种结合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它以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实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精神的对话与融合，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启示意义，鼓励我们在跨文化对话中，保持不卑不亢的开放姿态。

（二）坚守文化根脉，避免文化迷失

在以开放心态拥抱世界的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文化根脉所在。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交流的机遇，也伴随着文化被稀释、被同化的风险。如果在跨文化对话中缺乏主体性，一味迎合外部的审美标准或商业逻辑，就可能陷入“文化迷失”的困境，将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简单地符号化、商品化，甚至异化为一种满足他者想象的“东方主义”景观。

坚守文化根脉，首先要对自身的文化有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对于红砖建筑而言，其根脉不仅在于红砖、燕尾脊这些外在形式，更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儒家伦理、宗族观念、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及作为海洋文化载体的开放精神。这些是闽南建筑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精神内核。未来的发展必须牢牢把握这些核心价值，任何创新和改变都应围绕如何更好地在当代社会延续和彰显这些价值来展开。

避免文化迷失，意味着要警惕对传统的“伪复兴”和“奇观化”改造。一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将古厝改造成徒有其表的商业街，原有的社区结构和生活气息荡然无存，这实际上是对文化根脉的破坏。真正的坚守，应是保护与活化并举，尊重建筑及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的完整性。这意味着建筑的更新应服务于当地社区的真实需求，让传统空间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只有当建筑与其文化根脉保持着有机的、活态的联系时，它才能在跨文化对话中展现出真实而持久的魅力，而不是一个空洞的文化符号。

（三）红砖建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

当一种地方建筑在完成了自我更新、确立了文化自信之后，它便有能力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有力媒介。优秀的现代红砖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跨越语言障碍的世界语。它以其独特的空间魅力和艺术形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可能性：一种既非全盘西化，也非固步自封的，根植于深厚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径。

通过参与国际性的建筑展览、论坛和奖项评选，现代红砖建筑可以将闽南的文化故事和建筑智慧带向全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师凭借其根植于地

域文化的作品在国际上斩获大奖，这表明世界对蕴含东方哲学的现代建筑越来越感兴趣。充满文化底蕴的现代闽南红砖建筑，完全有潜力成为下一个焦点。它们可以成为学者、建筑师、艺术家和普通游客前来研究、体验和感受中国文化的“目的地”，成为一个个具体的、可触摸的文化交流平台。

随着闽南人遍布世界的足迹，红砖建筑也早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在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成为维系海外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这些散落在异国他乡的红砖厝，本身就是一部跨文化交流的活历史。在未来，可以围绕这一全球性的“红砖文化网络”，展开更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如联合修复、学术研究、文化展览等，让红砖建筑的故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讲述和传播。通过这种方式，红砖建筑将不再仅仅是闽南的建筑，更将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贡献其独特而温暖的力量。

第二节 数字化时代的传统工艺

当历史悠久的闽南红砖建筑步入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两者之间看似遥远的距离正在被科技的桥梁迅速拉近。新技术的浪潮不仅为这些承载着厚重文化记忆的建筑遗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与研究手段，更通过跨界融合，激发了传统工艺在当代社会中传承与创新的全新可能。数字技术正以其独特的精确性、虚拟性和传播力，为红砖的世界注入新的生命力。

一、数字化记录与存档

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之下，闽南红砖建筑及其营造技艺的记录与存档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毫米级的精准测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捕捉，科技手段的应用使得文化信息的保存超越了传统的纸笔与胶片，构建出一个更加全面、精确且易于传承的数字记忆宫殿，为未来的研究与修复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三维激光扫描与BIM

在面对结构复杂、装饰精美的闽南红砖古厝时，传统的测绘方法往往难以精确全面地记录其丰富的建筑细节。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应用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它以非接触的方式，通过发射激光束获取建筑表面数以亿计的高精度空间点云数据，能够完整记录下燕尾脊流畅的曲线、砖雕细腻的纹理乃至每一块红砖的精确

位置与尺寸。这种技术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测绘的效率和精度，避免了对脆弱文物的物理接触和潜在损害，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建筑建立了一个真实、完整的三维数字档案。

闽南红砖建筑记录方法对比表

方法	数据类型	精度 / 精确度	耗时	信息维度
传统测绘 (皮尺 / 经纬仪)	二维图纸, 局部照片	厘米级 / 误差较大	长	几何信息为主
三维激光扫描 (点云)	高密度点云数据	毫米级 / 高精度	短	几何、色彩、纹理
BIM 建模 (信息模型)	结构化信息模型	毫米级	中 - 长	几何、材质、工艺、 历史属性
动作捕捉 (工艺记录)	动态轨迹数据	毫秒级 / 高精度	短	隐性知识、操作技巧

如上表所列，数字化记录手段在精度和信息维度上，对传统测绘方式形成了代际超越。这些珍贵的点云数据是后续工作的基础。结合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可以将离散的点云数据转化为结构化的、包含丰富信息的三维数字模型。在 BIM 模型中，每一个建筑构件，从梁柱结构到门窗砖瓦，都不再仅仅是几何图形，而是被赋予了材质、工艺、年代、病害状况等多元属性信息的智能对象。这种深度信息化的模型，不仅能够精准再现建筑的原貌，还能用于模拟结构受力、评估建筑健康状况，为修复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严谨的数据支持。例如，在进行修缮设计时，设计师可以在 BIM 模型上进行虚拟操作，反复推敲修复方案，确保“不改变原状”的核心保护原则得到落实。

基于三维激光扫描和 BIM 技术建立的数字化档案，其意义超越了单纯的测绘与修复。它为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灾害风险评估以及长期的监测与管理提供了可靠的平台。通过在不同时间点进行重复扫描与数据比对，可以精确掌握建筑的微小变形与材料劣化情况，实现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转变。这种高精度的数字化记录，为闽南红砖建筑这一文化瑰宝的永久保存与科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使其能够跨越物理时空的限制，得到永续传承。

（二）传统工艺流程的视频记录与动作捕捉

闽南红砖建筑的灵魂不仅在于其独特的形态，更蕴含在世代相传的传统营造技艺之中，例如“出砖入石”的砌筑手法、精湛的砖雕工艺等，这些都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依赖于匠人口传心授的技艺，在现代化进程中正面临着失传的风险。数字化技术为此提供了全新的记录与解析手段，尤其是高清视频记录与动作捕捉技术的结合应用，使得这些转瞬即逝的精妙工艺得以被“活态”保存。通过多机位、多角度的高清摄像，可以完整记录下匠人在砌砖、雕刻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手势，乃至工具使用的具体细节。

更为前沿的动作捕捉技术，则能将记录提升到新的维度。通过在匠人的关键身体关节和操作工具上布设传感器，系统可以精确捕捉其操作时的三维运动轨迹、速度、力度和角度等动态数据。这些数据经过计算机处理后，可以生成匠人操作的数字化三维动态模型。这种记录方式远比单纯的视频更加深入，它将原本属于匠人个人经验和肌肉记忆的隐性知识，转化成可以被量化分析、解构、乃至系统学习的显性数据。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揭示特定工艺手法中的力学原理和技巧精髓，理解为何某种特定的姿势能够达到最佳的雕刻效果，或者某种砌筑顺序能够保证墙体的最大稳定性。这种深度的数字化解析，为传统工艺的科学化研究和教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三）建立红砖建筑的数字资源库

随着数字化记录手段的不断丰富，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的闽南红砖建筑数字资源库成为可能，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迈向更高阶段的必然要求。这个资源库如同一个包罗万象的数字“基因库”，它整合了来自不同维度的信息，将分散的遗产数据系统化、关联化，从而实现文化价值的最大化挖掘与共享。其构建是基于对建筑遗产价值的深度挖掘，旨在创建一个分类科学、内容全面的信息平台。

资源库的内容极为广泛。它不仅包含前述的三维激光扫描点云数据、高精度 BIM 模型、工艺流程的动态捕捉数据，还应整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测绘图纸、老照片、口述史访谈录音、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等。通过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将这些多源、异构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和结构化关联。例如，在 BIM 模型中点击一块特定的砖雕，就可以链接到它的高清照片、制作匠人的信息、相关的雕刻工艺视频，甚至是与之相关的民间传说或诗词歌赋。

这个数字资源库将发挥多重作用。对于研究者而言，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研究平台，可以进行跨时空、跨地域的比较分析，洞察闽南建筑风格的演变规律与地域差异。对于保护工作者，它提供了全面的信息支持，辅助决策，确保修

复工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教育和公众传播，它更是宝贵的素材库，能够为线上展览、纪录片制作、科普教育等提供丰富、权威的内容支持。

最终，建立这样一个开放共享的数字资源库，其终极目标是打破信息壁垒，让珍贵的文化遗产信息走出少数专业人士的书斋和库房，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人类的开放共享。如同“数字敦煌”项目一样，闽南红砖建筑的数字资源库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访问、学习和欣赏这一独特的建筑文化，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激发公众的保护意识，确保文化命脉的活态传承。

二、数字化设计与辅助建造

当数字化技术从记录与存档走向介入与创造，它为闽南红砖传统工艺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激动人心的可能性。通过参数化设计、机器人建造等前沿手段，设计师和工匠们得以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探索红砖砌筑在形式、结构与效率上的新突破，实现传统美学与当代技术语言的创造性对话。

（一）参数化设计在传统砌筑中的应用

参数化设计，作为一种基于算法和规则的生成性设计方法，正为古老的砌筑工艺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它将设计师的感性创意与计算机的精密逻辑相结合，通过设定一系列可变的参数（如砖块尺寸、旋转角度、灰缝厚度、砌筑曲率等），来控制 and 生成复杂多变的墙体形态。这种方法使得传统的砖墙不再局限于平面或简单的几何体，而是能够呈现出如波浪般起伏、具有丰富肌理与光影变化的动态曲面。

在闽南红砖建筑的创新实践中，设计师可以利用参数化工具，将传统纹样、自然意象或特定的文化符号转化为控制砌筑的几何逻辑。例如，通过算法模拟水波纹的形态，生成一面渐变的、具有流动感的红砖墙面；或者将传统窗花的图案进行参数化转译，形成具有不同透光率的镂空砖墙。设计师只需调整几个关键参数，就能即时生成无数种设计方案，并进行性能评估与比较，极大地拓展了创作的可能性。这种设计方式不仅是对红砖表现力的极致探索，也是对传统美学的一种当代转译。它使得每一块砖的砌筑都遵循着内在的数字逻辑，最终汇聚成一个充满秩序感与美感的整体，实现了密斯·凡·德·罗所言的“当两块砖被仔细地连接在一起时，建筑便开始了”的哲学思辨。

（二）机器人辅助的砖砌实验

随着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化的发展，机器人技术开始进入传统上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的砌筑领域。机器人辅助的砖砌实验，旨在通过自动化设备提高砌筑的精度、效率，并完成一些人力难以实现的复杂构造。这些实验并非意图完全取代工匠，而是在探索一种人机协作、优势互补的新型建造模式。现代砌砖机器人通常结合了先进的传感器、计算机视觉和机械臂技术，能够精确执行数字化设计方案。

机器人砌筑的实验过程展现了科技的巨大潜力。

1. 参数化设计的数字模型被直接输入到机器人的控制系统中，作为其执行任务的精确指令。机器人能够解读三维模型中每一块砖的精确坐标和姿态。

2. 在砌筑过程中，机械臂根据程序设定，精准地抓取砖块，通过自动砂浆泵涂抹厚度均匀的砂浆，然后将其放置在预定位置。整个过程由激光定位系统或动态稳定系统进行实时校准，确保即使在复杂的现场环境中也能达到毫米级的精度。

3. 一些先进的机器人甚至可以在需要时自动切割砖块，以适应不规则的墙体形态，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材料浪费。

这种自动化建造方式，不仅能以远超人力的速度完成大规模的砌筑工作，更能完美实现参数化设计中那些对精度要求极高的复杂曲面和镂空效果。在诸如中共一大纪念馆等重大工程项目中，砌墙机器人已成功应用于现场施工，充分证明了其在处理复杂构造时的可行性和效率。这些实验为闽南红砖建筑的未来提供了新的想象：或许未来的某一天，那些蕴含着复杂文化意象的参数化红砖墙体，将由机器人与工匠协同完成，成为科技与传统完美融合的建筑新景观。

（三）VR 在建筑体验与教育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以其创造沉浸式感官体验的独特能力，为闽南红砖建筑的体验、设计与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它打破了二维图纸和三维效果图的局限，让使用者能够“走进”一个尚未建成或远在天边的建筑空间中，以 1:1 的真实尺度去漫游、感知和互动。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对于理解建筑的空间序列、光影变化、材料质感以及人体尺度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建筑设计阶段，设计师可以利用 VR 技术，在设计的早期就进入虚拟的红砖建筑模型中进行方案推敲。他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感受燕尾脊的起翘角度是否

舒展,天井的尺度是否宜人,砖墙的光影是否生动。这种直观的空间反馈有助于做出更符合人本需求的设计决策。在建筑教育领域,VR的应用同样意义重大。学生不再仅仅通过平面的图纸和照片来学习闽南建筑,而是可以戴上VR头盔,“瞬间移动”到一座经典的蔡氏古民居或南靖土楼之中,自由探索其内部结构,甚至可以“拆解”建筑模型,观察传统的榫卯结构或“出砖入石”的砌筑细节。这种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他们对传统工艺和空间智慧的理解,弥补了传统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短板。

三、数字平台的传播与教育

在信息全球化的浪潮中,数字平台已成为连接文化遗产与公众的枢纽。它以超越时空的传播能力,将闽南红砖建筑的独特魅力推送至世界各个角落,通过虚拟体验、在线学习和社交互动等多元化形式,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传播生态系统,让古老的红砖故事在数字世界中焕发新生。

(一) 线上博物馆与虚拟游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线上博物馆与虚拟游览正逐渐成为公众接触和体验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级博物馆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线上展厅,让全球观众仅需点击鼠标,便可跨越地理的阻隔,“亲临”现场欣赏珍贵的文物与建筑。对于闽南红砖建筑而言,这意味着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文化内涵可以触达前所未有的广泛受众。通过高分辨率的全景照片、无人机航拍视频和三维建模技术,一座完整的红砖古厝或一个历史街区可以在线上被精确复现。

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屏幕,在虚拟的建筑群中自由穿行,从宏伟的整体布局“漫步”到精美的局部雕刻。虚拟展厅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简单复制,它还可以通过嵌入热点链接、多媒体解说、3D文物模型等方式,提供远超于实体参观的信息量。观众可以点击一块墙砖,了解其“烟炙砖”的烧制工艺;可以放大一处木雕,欣赏其细腻的雕工并阅读其背后的典故。这种互动性和信息丰富性极大地提升了参观体验的深度和趣味性。线上博物馆打破了物理空间容量和开放时间的限制,为行动不便者或远在海外的文化爱好者提供了平等的参观机会,真正实现了文化遗产的全民共享。

（二）传统工艺的在线课程与远程教学

数字平台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知识传承的课堂。传统闽南建筑工艺，如砖雕、木作、砌筑等，过去严重依赖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传承范围有限。在线课程和远程教学的出现，为这些珍贵技艺的规模化、系统化传播提供了解决方案。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等网站已经汇聚了大量优质课程，证明了在线教育的可行性与巨大潜力。专门针对闽南红砖营造技艺的在线课程，可以将顶尖工匠和学者的知识系统化地呈现出来。

这些在线课程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例如，通过高清视频详细演示特定工具的使用方法和雕刻的每一个步骤；利用三维动画拆解复杂的斗拱结构，清晰展示各构件间的穿插组合关系；还可以设置线上互动环节，学员可以提交自己的练习作品，由老师进行远程点评和指导。国家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等机构也已启动相关项目，旨在推动工艺美术行业的远程教育标准化。这种模式打破了地域限制，让远在国外他乡的建筑学子或对传统工艺感兴趣的普通人，都有机会系统学习这门手艺。它不仅有助于培养更多的后备传承人才，也在无形中扩大了闽南建筑文化的影响力，让技艺的种子在更广阔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三）社交媒体在红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在当今的融媒体时代，以抖音、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凭借其强大的用户基数、快速的传播能力和高度的互动性，已经成为文化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短视频、直播、图文帖子等灵活多样的内容形式，极大地降低了文化传播的门槛，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呈现出大众化、生活化的新趋势。闽南红砖文化也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特性，进行更具创意和吸引力的传播。

一位红砖建筑的修复工匠，可以通过直播向数十万观众实时展示他修复燕尾脊的过程，并与观众互动问答；一位建筑摄影师，可以发布一组关于闽南古厝光影的精美照片，配以富有诗意的文字，引发用户的点赞和转发；博物馆或文化机构可以发起#红砖建筑打卡#等线上活动，鼓励游客分享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形成病毒式传播效应。这种以用户生产内容为特点的传播方式，让公众从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传播者，极大地增强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通过与知名博主、国际友人合作，甚至可以出品相关的微电影或纪录片，让闽南红砖的故事以更时尚、更国际化的方式，触达全球年轻受众，深化文明的交流互鉴。

第三节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闽南红砖建筑作为凝固的历史与艺术，其保护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的封存。为了让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重焕生机，必须探索一条活化利用的道路。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红砖建筑不仅能延续其物理生命，更能融入现代生活，实现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和谐共存。

一、功能置换与适应性再利用

对红砖建筑的活化，核心在于赋予其新的时代功能，使其在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同时，延续其独特的历史文脉。这种功能置换并非简单的商业炒作或开发，而是一场空间与时间的对话，是尊重历史、融入当代的精巧平衡。

（一）红砖古厝改造为民宿、咖啡馆

将闲置或半废弃的红砖古厝改造为特色民宿、主题咖啡馆或私房菜馆，是当前功能置换中最为常见的模式。这种改造保留了古厝的燕尾脊、马背墙、雕花窗棂等核心建筑元素，让游客得以沉浸式体验闽南传统民居的独特韵味。内部空间则进行现代化和舒适化的更新，巧妙地将空调、卫浴、网络等设施融入古朴的环境中，既满足了现代旅人的居住需求，也未破坏建筑的整体风貌。

当旅人推开一扇厚重的木门，映入眼帘的是洒满阳光的红砖天井，耳边传来的是闽南语的轻声问候，手中捧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闲适在此刻交融。这种活化方式不仅为古厝找到了新的生命力，也为所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每一块红砖都成为讲述地方故事的生动媒介，让文化得以传承，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实现了双赢。

（二）旧厂房、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

上世纪留下的红砖结构旧厂房、仓库，以其高大的空间、开阔的格局和独特的工业时代印记，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入驻提供了绝佳的物理载体。从昔日的制糖厂、罐头厂到如今的艺术区、设计公社，这种转变体现了城市发展思路的进化。改造过程中，设计师们普遍尊重建筑的历史肌理，保留了斑驳的红砖墙、裸露的钢结构和巨大的桁架，营造出一种兼具怀旧感与前卫感的艺术氛围。

这些被重新定义的空间，吸引了大量艺术家、设计师、手工艺人前来设立工作室、画廊、展演空间和买手店。宽敞的厂房适合举办大型艺术展览、时装秀和

音乐节，而分隔的小仓库则成为孵化创意灵感的独立工作室。文创园区不仅盘活了存量工业遗产，更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意生态系统，成为城市的新文化地标和青年潮流的聚集地，让工业锈带转变为创意秀带。

这种改造模式的成功，在于它没有完全抹去建筑的过往，而是将工业记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本，与新的创意内容相结合。旧机器的零件被改造为艺术装置，车间的标语被保留下来成为历史的注脚。新旧元素的碰撞与对话，赋予了红砖工业建筑第二次生命，使其从生产物质产品的场所，转变为文化与创意的孵化场和熔炉。

（三）宗祠、庙宇作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闽南地区的宗祠与庙宇，历来是宗族议事、祭祀祖先和民间信仰的核心场所，其建筑艺术与人文内涵极为丰富。在不影响其原有核心功能的前提下，将部分空间活化为社区公共文化中心，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社区生活的有效途径。通过精心规划，祠堂的偏厅、厢房或庙宇的附属建筑可以被用作社区书院、讲堂、非遗技艺传习所或小型民俗博物馆。

这种活化方式的核心在于“共享”与“服务”。例如，定期在祠堂内举办面向社区居民的书法班、南音教学、剪纸艺术体验等活动，不仅让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情感联系。庙宇的广场则可以作为社区节庆、露天电影放映和居民休闲的公共客厅。这种转变让庄严肃穆的祭祀空间增添了亲切的烟火气，使其从一个特定群体的信仰中心，扩展为一个服务全体社区居民的文化与情感枢纽，真正实现了文化遗产由人民共享。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入

将红砖建筑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创意产品与服务，是活化利用的深化阶段。这不仅能拓展红砖文化的传播维度，更能构建起一个以文化为核心的产业链，为遗产保护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一）红砖元素的文创产品开发

从红砖建筑中提取标志性的视觉元素，并将其应用于现代设计，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的重要桥梁。这些文创产品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实用的生活物品，让闽南美学以一种新颖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

1. 视觉符号的转译：将红砖的“红”、燕尾脊的曲线、窗棂的几何图案、砖

雕的纹样等，提炼为设计语言，应用于文具、家居用品、服装配饰等产品上。一块带有传统砖雕图案的丝巾，或是一套以红砖色彩为基调的茶具，都能唤起人们对闽南建筑的记忆与情感。

2. 材质与工艺的再现：尝试用现代工艺模拟红砖的质感和肌理，开发如红砖质感的杯垫、手机壳、艺术微喷版画等。同时，与在地传统手工艺人合作，将砖雕、木雕等技艺与现代产品设计相结合，创造出既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的高附加值产品。

3. 数字化产品的创新：开发以红砖建筑为主题的手机壁纸、表情包、虚拟社交空间皮肤等数字化文创产品，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其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力，让红砖文化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新的生命。

（二）以红砖建筑为题材的影视、文学创作

红砖建筑群落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充满故事感的“摄影棚”和灵感库。其独特的建筑形态、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影视、文学、动漫等内容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绝佳的场景。以红砖古厝为背景的影视剧，能够直观地向更广泛的受众展示闽南建筑之美和其中发生的悲欢离合，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或小说，往往能极大地提升其取景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形成“影视 IP+ 文化旅游”的联动效应。观众会追随剧情的脚步，亲身探访那些在屏幕上或书本中出现的红砖厝、古街巷，寻找故事的痕迹。这种由内容驱动的文化传播，其影响力和覆盖面远远超过传统的宣传方式，能够激发大众对红砖建筑及其背后文化的深厚兴趣。

鼓励作家、剧作家深入闽南地区采风，挖掘与红砖建筑相关的家族史、商号传奇、民间传说等，进行文学和戏剧创作。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地方文化的叙事层次，也为红砖建筑注入了更多可供解读的人文内涵，使其不再是沉默的砖石，而是承载着鲜活故事与人物命运的生命体。

（三）红砖建筑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打造

将散落的红砖建筑串珠成链，整合为具有主题性和体验感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是实现其价值最大化的关键路径。这需要超越单一建筑的修复，从区域整体规划的视角出发，打造一个集观光、体验、休闲、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产品。例如，可以设计“红砖建筑艺术探访之旅”“闽南宗族文化寻根之旅”等不同主题

的旅游线路。

在目的地的打造中，应注重叙事性和互动性的营造。通过设立解说牌、举办小型展览、利用 AR 等数字技术复原历史场景，向游客深度解读建筑的营造技艺、空间哲学和人文故事。同时，开发围绕红砖建筑的体验活动，如让游客亲手参与一块红砖的制作、学习一小段南音的弹唱、或是在古厝里体验传统的闽南节庆习俗。这些互动体验将游客从被动的观光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参与者，极大地提升了旅游的深度和满意度。

三、社区参与与共生发展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其最终目的应是惠及在地社区，实现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和谐共生。如果活化过程脱离了当地居民，遗产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活化成果也难以持续。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确保社区在遗产保护与利用中扮演主体角色。

（一）引导居民参与遗产保护与活化

当地居民是红砖建筑最亲近的守护者，他们所拥有的生活记忆、口述历史和传统技艺是遗产活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保护与活化工作中，首先要从培养其文化自觉和自豪感入手。通过举办社区讲座、展览，让居民深刻认识到自己家园的文化价值，变“要我保护”为“我要保护”。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鼓励和培训居民成为古厝的讲解员，用最地道鲜活的语言向游客讲述建筑背后的家族故事和生活点滴。对于掌握传统建筑修缮、砖雕、木作等技艺的工匠，应建立档案并聘请他们参与修复工作，确保修旧如旧的工艺得以传承。还可以成立由社区居民、专家学者、商业运营方共同组成的遗产管理委员会，共同决策社区内红砖建筑的保护方案与活化项目。

这种参与不仅为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重建了他们与地方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当居民从活化利用中获得真实的归属感和成就感时，他们便会成为最坚定、最热情的文化守护者，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充满活力的保护力量，确保红砖建筑的生命力在社区的土壤中源远流长。

（二）建立利益共享的活化利用模式

确保红砖建筑活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够合理地回馈社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必须设计并推行一套公平透明的利益共享机制，让当地居民成为活化

利用的直接受益者，从而激发其参与的持久动力。

1. 资产入股与租金保底分红：鼓励居民以其拥有的红砖古厝所有权或使用权作为资产，与专业的开发运营公司成立合作社或合资公司。居民可以获得保底的租金收入，并根据经营状况参与年度盈利分红，将自己的房产与市场运营的成败紧密捆绑。

2. 在地采购与优先就业：活化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应优先采购社区内居民生产的农产品、手工艺品，并优先聘用当地居民作为员工，岗位可涵盖保洁、安保、餐饮服务、文化导览等。这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也直接为社区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将旅游发展的红利最大限度地留在当地。

通过这些机制，遗产活化不再是单纯由外部资本驱动，而是转变为“社区 + 资本 + 专业团队”的共建共享模式。这不仅能有效缓解因旅游开发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更能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更加珍视和支持红砖建筑的保护事业。

（三）避免过度商业化与旅游化

在红砖建筑活化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时刻警惕并有效规避过度商业化与旅游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商业气息过于浓厚，文化本真性被稀释，遗产地将失去其独特的魅力，最终导致游客和本地社区的双重流失。活化的目的在于焕发生机，而非将其改造为千篇一律的商业仿古街。

要守护红砖建筑的“原真性”，就要在规划和运营中划定明确的红线。对核心建筑的改造应以保护和微调为主，严格限制对主体结构和历史风貌的破坏性改动。在业态引入上，要进行严格筛选，优先选择与文化主题相契合的业态，避免引入过于嘈杂和同质化的商业项目。同时，必须保留一部分非商业化的公共空间，维持当地居民原有的生活形态和社区网络，让游客看到一个活态的、真实的闽南社区，而不是一个只有游客和商铺的“空心化”景区。

第四节 跨文化对话的新机遇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珍视的今天，以闽南红砖建筑为代表的地域性建筑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跨文化对话机遇。它不再仅仅是凝固的文化遗存，而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建筑语言，正蓄势待发，准备登上更广阔的世界

建筑舞台，贡献其独特的历史经验与美学价值。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的广阔走廊，更是文明互鉴的坚实桥梁。对于历史上伴随海上丝绸之路而兴盛的闽南红砖建筑而言，这一倡议为其文化价值的再发现与国际传播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有力推动其从区域性的文化符号，向国际性的文化名片转变，开启了全新的交流篇章。

（一）红砖建筑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态遗产

闽南红砖建筑，以其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出砖入石”砌筑工艺，本身就是一部物化的海洋文化史诗。它不仅仅是居所，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在古代，红砖顺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船，从泉州港出发，抵达东南亚乃至更远的地方，成为海外闽南人社群构建文化认同与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这种以红砖为载体的文化传播，使得闽南建筑风格在海外落地生根，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建筑景观。这些遍布在古代海上丝路沿线的红砖古厝，如今成为连接中国与沿线各国的“活态遗产”，生动地叙述着历史上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代背景下，红砖建筑的这一历史角色被重新激活。它不再仅仅是供人凭吊的遗迹，而是成为了推动当代文化交流的有效媒介。通过对这些跨国分布的红砖建筑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的展示，可以直观地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脉络，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民众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与情感共鸣。这些色彩温暖的建筑，作为凝固的音乐和无声的诗篇，承载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为深化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内涵，构建更为紧密的人文交流网络，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二）与沿线国家在建筑遗产保护方面的合作

建筑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与传承需要跨国界的共同努力与智慧分享。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正积极与沿线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展开深度合作。这不仅为闽南红砖建筑的保护工作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也为中国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提供了对外输出与交流的平台。许多东南亚国家同样拥有丰富的红砖建筑遗产，这些建筑在材料、工艺和风格上与闽南红砖建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保护理念、修复技术和活化利用等方面往往面临着相似的挑战。

中国在文物保护领域，尤其是在古建筑修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在柬埔寨吴哥古迹的修复工作中，中国团队就以“最小干预”原则和先进的科技手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种合作模式可以被广泛应用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红砖建筑遗产保护中。通过建立联合工作组、开展技术人员培训、共享病害研究数据、共同制定修复方案等方式，中国可以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分享在红砖建筑材料分析、传统工艺恢复、结构加固等方面的成熟技术和成功案例。

这种跨国合作，不仅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对红砖建筑的保护与传承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瑰宝，能够有效深化彼此间的友好关系与文化认同。在合作过程中，中外专家学者可以共同探索适应不同地域气候与文化环境的保护策略，从而推动形成一套更具普适性与科学性的红砖建筑国际保护准则，共同为守护这条绵延千年的文化纽带贡献智慧与力量。

（三）举办国际性的红砖建筑文化论坛

搭建高层次的对话平台是促进文化深度交流与互鉴的关键路径。以闽南红砖建筑为主题，定期举办国际性的文化论坛或学术研讨会，能够有效地汇聚全球范围内的学者、建筑师、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艺术家以及政府代表，形成一个围绕红砖文化的思想碰撞与智慧交融的场域。这样的论坛不仅能够系统、深入地探讨红砖建筑的历史渊源、营造技艺、美学价值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创新等议题，还能极大地提升闽南红砖建筑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论坛可以设置多元化的议题，既包括对红砖建筑本体的学术研究，如材料科学、结构力学、装饰艺术等，也涵盖更广泛的文化议题，如红砖建筑与宗族社会、海洋贸易、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及它在当代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中的角色。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案例分享和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与会者可以分享各国在红砖及类似砖石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经验与挑战。例如，可以邀请来自荷兰、英国等同样拥有悠久砖砌建筑历史的国家的专家，进行跨文明的比较研究与对话，从而在更宏大的坐标系中审视闽南红砖建筑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价值。此类国际论坛的举办，不仅能产出丰硕的学术成果，更能促成具体的国际合作项目，将思想的火花转化为保护与发展的实际行动，让红砖的故事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被讲述与倾听。

二、国际视野下的建筑创新

当地域传统与全球视野相遇时，往往能激发出最具活力的创造力。闽南红砖建筑的未来，不在于固步自封地复制传统，而在于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参与国际建筑领域的对话与实践，在交流与碰撞中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与国际建筑师的合作与对话

推动闽南红砖建筑走向世界，一个有效的途径是邀请国际顶尖建筑师来到闽南，与本土建筑师共同展开创作与对话。这种合作并非简单的风格嫁接或符号移植，而是基于对闽南地域文化、气候特征和生活方式的深度理解。国际建筑师带来的全新设计理念、技术方法和材料认知，可以为传统的红砖注入新的活力，打破其固有的形态束缚。他们或许会用参数化设计来重新诠释红砖的组合方式，或者将现代的环保技术与传统的夯土墙、红砖墙相结合，创造出既有地域风情又符合当代审美与功能的建筑作品。

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在中国的在地化实践，已有力证明了利用回收的砖瓦材料创造出充满诗意和历史感的现代建筑是完全可行的，他的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建造智慧的当代价值。类似的，通过设立“驻地建筑师”项目或举办国际设计工作坊，可以吸引更多像他一样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的建筑师，让他们在闽南的土地上进行在地化的设计实验。

这些合作项目本身就能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其成果——无论是具体的建筑作品还是思想性的设计方案——都能通过国际建筑媒体和展览，将闽南红砖的魅力传播出去。更重要的是，这种深度的合作与对话，能够激发本土建筑师的创新思维，帮助他们跳出惯性思维，以一种全新的、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和运用本土的建筑传统，从而培养出一批既有国际视野又具文化根基的新一代中国建筑师。

（二）参与国际建筑展览与竞赛

国际建筑展览与竞赛，如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米兰设计周等，是全球建筑思想与实践潮流汇集的重要舞台，也是展示国家文化形象和建筑成就的窗口。积极组织和推动以闽南红砖建筑为主题的展览参与这些国际盛事，能够让这一独特的建筑文化直接进入世界核心建筑圈的视野，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1. 主题策展的深度呈现：参展内容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红砖厝的图片和模型展示。可以策划更具深度和思想性的展览，例如，以“流动的家園：红砖的全球叙事”为主题，追溯红砖如何伴随闽南人的迁徙足迹遍布世界；或者以“材料的重生：红砖的可持续未来”为题，展示运用废旧红砖进行艺术创作或可持续建筑设计的实验性作品。通过多媒体互动装置、虚拟现实体验、材料实物解构等多种现代展览语言，生动诠释红砖建筑的文化内涵与当代可能性。

2. 角逐国际建筑奖项：鼓励和支持采用红砖元素并进行成功创新的中国建筑项目，积极申报世界建筑节大奖、普利兹克奖等国际知名建筑奖项。获奖不仅是对设计师个人成就的肯定，更是对一种建筑文化价值的国际认可，能够极大地提升闽南红砖建筑的声望。每一次成功的参展和获奖，都是一次有力的文化输出，它向世界证明，源自中国南方的这抹红色，同样能够为全球建筑的设计语言增添丰富而独特的色彩。

（三）将红砖建筑经验推向世界

闽南红砖建筑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视觉符号，其背后更蕴含着有一套完整的、适应地域气候与社会结构的营造智慧和建造体系。这套体系，包括就地取材的原则、注重通风采光的院落布局、精巧的榫卯木作工艺、以及富含吉祥寓意的装饰体系等，对于今天全球面临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文化认同缺失等挑战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将这些宝贵的经验总结、提炼并推向世界，是闽南建筑文化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

例如，红砖建筑普遍采用的深出檐、冷巷、天井等设计，是在没有空调的时代，利用自然通风和遮阳来创造宜人微气候的被动式设计典范。这种“顺应自然”的营造哲学，与当前国际上倡导的绿色建筑、可持续设计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

“出砖入石”的墙体建造技艺，本身就是一种对废旧材料进行创造性再利用的古老智慧，这对于探索循环经济下的建筑模式极具启发。

推广这些经验，可以通过出版多语种的专业书籍和图册，系统介绍红砖建筑的构造技术和设计哲学。同时，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办学、开设线上课程等方式，将红砖建筑的知识体系纳入国际建筑教育的课程中。更可以直接在海外的建筑项目中，有意识地应用和转化这些经验，比如在气候相似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计和建造融合了闽南建筑智慧的现代化公共建筑或住宅，让世界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这种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如何在当代生活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三、构建面向未来的红砖建筑学

为了让闽南红砖建筑的生命力得以永续，并真正融入全球建筑文化的大潮，必须超越单纯的保护与模仿，致力于构建一套系统的、面向未来的“红砖建筑学”。这门学问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但视野投向未来，旨在回答红砖建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何以为继、何以创新”的根本问题。

（一）总结提炼红砖建筑的设计哲学

闽南红砖建筑的魅力，远不止于其艳丽的色彩和精美的装饰，其深处蕴含着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人伦观。构建“红砖建筑学”的首要任务，便是深入挖掘并系统性地总结提炼这一设计哲学。这套哲学体系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体现在建筑的布局、开间、乃至砖石的铺贴方式上，都有着严格的规制，从而构筑了“长幼有序的人伦之美”和严谨的宗族秩序。每一座古厝都是一个家族的缩影，其空间组织反映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伦理观念。

同时，红砖建筑也充满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建筑选址常与周围的山水环境巧妙结合，形成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建筑材料取自本地的红土与石材，营造过程顺应自然气候，形成了冬暖夏凉的居住环境。那些雕刻在砖石木头上的花鸟鱼虫、祥云瑞兽，不仅仅是装饰，更是闽南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是一种将生命理想物化于居所之上的诗意表达。

将这些散落在匠人口诀、家族传承和建成实体中的碎片化哲学思想，通过现代学术语言进行梳理、阐释和理论化，形成一套能够被当代设计师理解和运用的设计原则与方法论，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项工作需要跨学科的努力，结合建筑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多重维度，才能完整地揭示红砖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深刻而系统的思想内核，为后续的创新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

闽南红砖建筑核心设计哲学与智慧表

特征要素	哲学 / 智慧内涵	当代借鉴意义
出砖入石砌筑	废物利用，在地取材（循环经济）	模块化设计、可持续材料创新
深出檐与冷巷	顺应自然，被动式降温（天人合一）	绿色建筑、低能耗设计
天井院落布局	宗族伦理，通风采光（人伦之美）	社区空间构建、微气候调节
精巧榫卯木作	结构柔性，可拆卸与修复	韧性城市、装配式建造技术

红砖建筑的这些核心设计智慧，如闽南红砖建筑核心设计哲学与智慧表中所列，不仅是历史的沉淀，更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设计宝库。

（二）探索可持续、地域性的未来建筑模式

在全球化导致“千城一面”的建筑趋同化现象日益严重的今天，重新发掘地域性建筑的价值，探索基于本土材料和传统智慧的可持续建筑模式，已成为国际建筑界的重要趋势。闽南红砖建筑在这一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未来的“红砖建筑学”应致力于将传统的营造智慧与当代科技相结合，探索一种既可持续又具鲜明地域特色的未来建筑范式。

这包括对红砖这种传统材料的现代化改造与创新。可以通过改变烧制工艺、调整黏土配方、或与其他复合材料结合等方式，提升红砖的保温、隔热、耐久等性能，使其更符合现代建筑的节能标准。建筑师徐甜甜提出的“建筑针灸”理念，强调以最小的干预激活特定场域，这与红砖建筑营造中节制而高效的特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可以研发标准化的预制红砖墙板或模块，在保留红砖美感的同时，实现工业化生产和快速建造，降低成本，适应现代建筑工业的需求。探索将“出砖入石”的砌筑方式进行抽象化和参数化设计，使其能够应用于更广泛的建筑表皮设计中，创造出富于变化和肌理感的现代建筑立面。这种探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刻，而是在深刻理解其内在逻辑和美学原则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旨在让红砖这种古老的材料在未来城市和乡村的建设中，继续扮演充满活力和魅力的角色。

（三）为全球建筑文化多样性贡献中国智慧

一种文化的真正成熟，不仅在于其自身的繁荣，更在于其能为世界文明的整体发展提供独特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贡献。构建“红砖建筑学”的最终目标，正是要将闽南地区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建筑智慧，提炼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中国方案”，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丰富世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贡献力量。在一个日益由钢筋混凝土和玻璃幕墙主导的世界里，闽南红砖建筑所代表的那种对乡土的眷恋、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的重视以及对色彩和装饰的热情，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文化抵抗。

它提醒我们，建筑不仅仅是满足功能的机器，更是承载记忆、情感和身份认同的场所。它所展示的“家国天下”同构的聚落组织方式、精耕细作的资源利用模式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对于思考未来社区的构建、城市的有机更新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宏大命题，都能提供来自东方的独特启示。

当闽南红砖建筑的设计哲学被系统阐述，其可持续的营造经验被科学总结，

其创新的实践成果被广泛传播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化符号。它将化身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建筑思想，与世界上其他优秀的建筑文化平等对话、交流互鉴。通过这一过程，根植于闽南土地的“中国智慧”，将转化为滋养全球建筑文化森林的养分，让未来的世界家园因多元而更加丰富，因交流而更加精彩，这正是《红砖的世界》所展望的最终图景。

参考文献

- [1] 吴舒静.漳州芗城区闽南传统建筑红砖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 2024(20):59-61.
- [2] 于仲,成丽.闽南红砖建筑屋顶形式研究[J].建筑遗产, 2024(4).
- [3] 张雅欣.闽南红砖厝建筑元素在国潮箱包中的创新设计[D].泉州师范学院,2025.
- [4] 刘深魁.”唐山过台湾”最忆”闽南红”[J].两岸关系, 2024(7):63-65.
- [5] 李冰月,程桂圆,王园园,等.闽南红砖聚落景观空间图底关系研究[J].福建建材, 2023(8):52-57.
- [6] 陈世钧.地域性装饰艺术在建筑装饰设计领域中的实践[J].鞋类工艺与设计, 2023, 3(5):120-122.DOI:10.3969/j.issn.2096-3793.2023-05-039.
- [7] 朱莹,杨秀华,许欣妍.综合物理环境下闽南地区红砖建筑材料病害表征研究[J].建筑与文化, 2025(4).
- [8] 朱书沁.建筑题材在意象油画中的美学转译与创作实践——以闽南红砖古厝为例[J].艺术大观, 2025(9).
- [9] 陈秋松.传统条石砌体新技术创新闽南古厝建筑艺术[J].中华民居, 2024, 17(7):47-48.
- [10] 朱莹,陈聘倩,余可.闽南地区民居红砖厝建筑酥碱病害表征研究——以福建省漳州市埭美村为例[J].建筑与文化, 2025(6).
- [11] 陈莉.闽南传统建筑地域性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建构[J].美与时代, 2025(20).
- [12] 瞿祎,英浩.闽南传统红砖民居聚落空间营建中的道家美学--以南安蔡氏红砖聚落为例[J].建筑与文化, 2023(9):271-273.
- [13] 北辰鲤.福建博物院:感受闽南文化魅力[J].科学启蒙, 2024(3):50-52.
- [14] 葛奕杉.闽南砖雕图案在簇绒工艺家居服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泉州师范学院,2023.
- [15] 刘雅培.闽南红砖厝”适应性再利用”构建设计——以泉州石狮市永宁镇古厝为例[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 2024(5).

- [16] 张羽欣.闽南官式大厝的空间转型与文化内涵[J].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2024(5):115-117.
- [17] 陈庄瑾.闽南古厝“出砖入石”在当代建筑中转译的探讨[J].中华建设, 2023(12):91-94.
- [18] 杨靓.闽南建筑文化在新建福厦线泉州南站站房中的呈现[J].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2023(21):112-114.DOI:10.3969/j.issn.1672-2167.2023.21.020.
- [19] 洪瑞桃.区域文化资源进入小学美术课堂的实践探析——以闽南红砖雕刻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 2024(6):169-171.
- [20] 成丽,于仲.闽南沿海红砖民居屋顶构造工艺研究[J].古建园林技术, 2024(2):24-29.
- [21] 郭俊杰,张于勤,付江涛.闽南传统建筑中屋檐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西部皮革, 2025, 47(8):92-94.
- [22] 吴小清.浅谈闽南红砖雕刻工艺的传承与发展[J].陶瓷科学与艺术, 2024, 58(5):146-147.
- [23] 叶子铭,蓝达文.闽南传统聚落的环境艺术研究——以南靖云水谣为例[J].新楚文化, 2024(4):57-59.